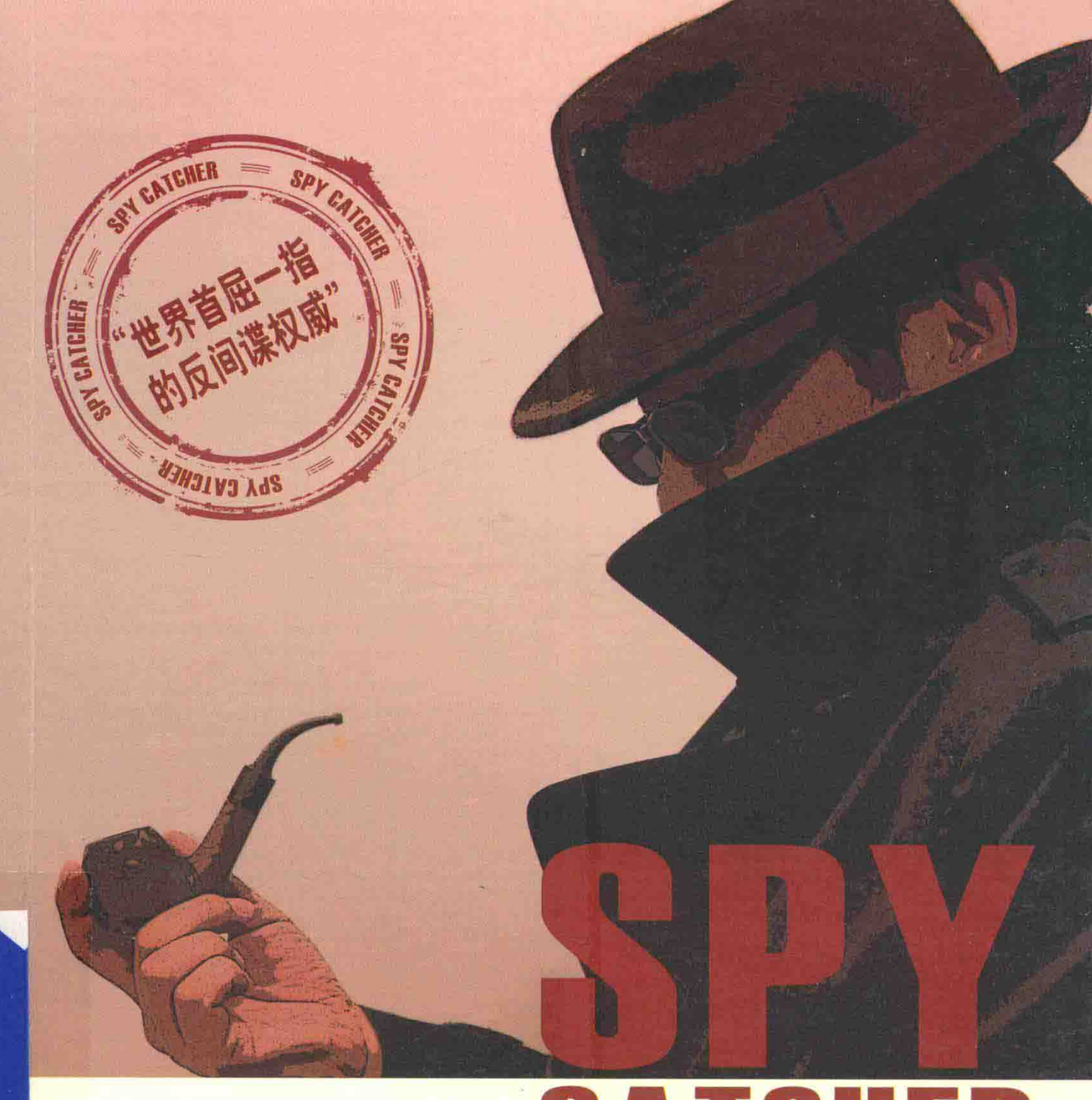



# CATCHER
# 我的反间谍生涯

〔荷兰〕奥莱斯特 · 平托 著
姚越秀　陈凤吾　李淑廉　范维信 译

译林出版社







# SPY CATC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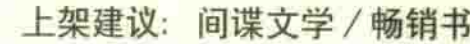
## 我的反间谍生涯




奥莱斯特·平托上校，从大学期间便加入情报部门，“二战”爆发后，为英国、荷兰以及盟军组织反间谍工作。他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中，抓获各类间谍无数，被称为“纳粹间谍的克星”。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平托上校无疑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反间谍权威。”

书中回忆了作者亲自处理的间谍案件：其中涉及可怜的美女间谍、狡诈的双面间谍、可耻的卖国贼、骄傲的爱国者、勇敢的地下反抗者……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平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反间谍工作理论和实践——如反对用刑、变相体罚和精神折磨等——的看法。

本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战”中盟国和纳粹德国之间尖锐的斗争，以及战争压迫下人性的复杂多样。







定价：65.00元




# SPY CATCHER

# 我的反间谍生涯



〔荷兰〕奥莱斯特·平托 著
姚越秀 陈凤吾 李淑廉 范维信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反间谍生涯 /（荷）平托著；姚越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7
（国际畅销榜）
ISBN 978-7-5447-5373-9

Ⅰ.①我… Ⅱ.①平… ②姚… Ⅲ.①间谍－情报工作－荷兰 Ⅳ.①D756.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473号

书　　名　我的反间谍生涯
作　　者　〔荷兰〕奥莱斯特·平托
译　　者　姚越秀　陈凤吾　李淑廉　范维信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373-9
定　　价　65.00元

# 目　　录

## 第四部分　休假中的反间谍人员



## 第五部分　为谁搞情报？



## 第六部分　解放

# 第一部分　绪言

# 第一章　我是怎样成了反间谍人员的

几年来，我在国内一些大城市作过一系列讲演，并允许人们向我提出问题。在头两次讲演之后我便发现，听众们总是提出同样问题："你是怎样成了反间谍人员的？"嗣后，英国广播公司（BBC 电台）对我参与处理的几起案件作了广泛报导，使我名声大振，于是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对此，我总是说，这些事情细讲起来话就长了，而且，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姑且不谈也罢。

可是，鉴于本书很可能是我留给世人的最后著作，看来是到了谈及此事，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生涯的时候了。"选择"这个词对我来讲或许并不贴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是年迈人的一种享受，我才发现，是命运悄悄地把我推上了这条道路，而我本人却毫无察觉。

谨请读者允许我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遥远的日子。那时候，人们还能够自由走动，还有条件买票到任何想去并且能够去的地方，还能得到护照、签证，还谈不到什么边界、禁区。但是，20 世纪初发生的几个事件给这清平世界投下了阴影，这一阴影与其说预示着威胁，倒不如说意味着苦难。

在我的故乡荷兰，人们对那些不受欢迎的德国来客的趾高气扬感受颇深。

出于幽默感而平易近人或者希望了解别人的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和自己的不尽相同——而与别人往来，这些从来都不是德国人的主

要品德。在20世纪头十年越过边界来到荷兰的德国人遭到的两次失败，未能使他们学得稍微谦逊一些。不管来自何方，他们大部分人都把荷兰的习惯斥之为“土里土气的生活方式”。他们指责我们的铁路系统，批评我们的公共建筑和街道，甚至对我们的啤酒也横加褒贬，说是不合他们的口味。有件事虽然已时隔六十年，但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有一次父亲请他的一位德国相识吃饭，这位客人不停嘴地又吃又喝，每上一道菜都狼吞虎咽，表现得全无体统，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在他们国家，请客要比这讲究得多！

这件小事实在不能让人对德国人产生起码的好感。

我还记得1908年的一件事，事情虽小，却意味深长。那时我十八岁，和一位同学去黑森度假。火车进入德国境内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检票员走进车厢。我们忘记把车票放在哪里了，找了两三分钟。检票员很不耐烦，气急败坏地对我们又喊又骂，仿佛我们不是他国家的客人，倒是两名在逃的罪犯。我用德语请他安静点，别这样粗暴无礼，他却声嘶力竭地嚷道：

“Ich trage des Kaisers Rock！”（德语：“我穿的是德皇发的制服！”）

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回答说：

“Der ist aber schmutzig.”（“可惜已经脏了。”）

后来我们听到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骄横咆哮，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我禁止你对德国皇帝陛下进行任何影射攻击！”

这就是德国检票员对批评他制服不干净的一个荷兰青年的训斥。

第二年，即1909年，父亲考虑到每个年轻人都应当尽早学会自立的本领，把我送到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当时我十九岁，已经显示出学习语言的天赋，这对我的前程大为有用，可惜我没有加以开拓。

在塞纳河左岸看到的巴黎同《波希米女人》上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巴黎大同小异。依然是那些充满浪漫色彩的学生，放荡不羁的艺术

家和他们的模特儿，人们通宵达旦地谈论爱情、艺术和享乐，一切都显得那么真诚坦率，亲密无间。

巴黎也有它的政治生活，而这种生活的倾向在我早就对德国的那一套相当反感的心灵里引起共鸣。整个法国，特别是巴黎学生，厌恶德国人，仇视德国。1870 年的失败，巴黎被围困——数以万计的成年男女都还记得他们孩提时代经受的苦难，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以及法国给侵略者的巨额赔款，这一切都在他们心灵里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战争的失败永远不会使一个有血气的民族一蹶不振，而只能激起它更大的勇气去报仇雪恨，从而播下更多仇恨的种子，产生更多仇恨的浪潮。法国人正是这样。“On les aura！”（法语：“我们不会轻饶他们！”）是巴黎各阶层男女老少，特别是巴黎大学学生们的口头禅。在音乐会上，针对德国人的民歌一个接一个，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叫“Merci， Bons Allemands”（“谢谢你，德国佬”），这指的是将来德国人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的那一天。

他们这种情感在我心灵中扎根之深，同我的想法如此吻合，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只要谈到对德国人的仇恨，我马上就像今天法国人常说的那样，成了一个“比国王还激进的王权主义者”。

在法国的第一年，我住在塞纳河左岸一条叫做佩梯斯 · 佩雷斯的窄小街道的一座学生公寓里，同房间还住着两三个青年。尽管住在一起，我们之间的友谊不过是一般学生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渐渐成了一个叫弗朗西斯 · 沃尔德的朋友。他年龄比我大得多，当时大概有二十五岁的样子，是个身强力壮的高个子青年，肩膀宽阔，肌肉发达。我一向喜欢体育，每天用拉力健身器锻炼。他用的健身器是特制的，装有十二个弹簧，而一般的只有六个。

虽然我被称为体育健将，但用尽吃奶的力气充其量也只能把他的健身器拉开一两英寸，很多大力士也都望尘莫及。他拿起健身器，深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来，接着以钢铁般的力量把健身器拉到尽头。

这精彩的场面使人叹为观止，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力大无穷的人。

我的朋友沃尔德不光有非凡的体力，而且是全法国的柔术冠军。有好几次他请我同他较量较量，让我随便用什么方法自卫，只要没有危险：拳打、脚踢、头顶，但我总是被摔倒在地。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没有把我的脖子扭断，这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掐一朵花一样轻而易举。同他在一起完全不用为安全担心，晚上出去散步也丝毫不用害怕。那时节，像蒙特鲁热和伯勒维莱这样的街区是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那里，暴徒、流浪汉和罪犯们自由出没，肆无忌惮地几下子就砍掉一个倒霉者的脑袋。

虽然我无法与弗朗西斯相比，但作为一个业余拳击家，开始在大学，随后在整个巴黎，最后在全法国都颇有声望。对英雄业绩狂热的向往使我们更为接近，友谊与日俱增。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继续住在佩梯斯·佩雷斯街上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一致同意找一套大一点的住所两人共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拉斯佩尔大街找到一套合适的房子，搬进去之后又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依靠父亲供养上学，而弗朗西斯却靠在哈瓦斯通讯社[①]工作糊口。哈瓦斯通讯社是与美联社、路透社齐名的最大通讯社之一。弗朗西斯工作时间极不规律，有时彻夜不归，甚至两三天不见踪影。那时候，除了有什么热门新闻之外，我对报纸极少关心，所以觉得他经常加班加点是工作性质所致。学习几乎占去我全部时间。每当傍晚归来，看到弗朗西斯留下的便条，说他被召去干一件紧急工作，两天之后才能回来，我都丝毫不感到意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两人惬意地坐在噼叭作响的壁炉旁边，我把一本书放在膝头聚精会神地读着，弗朗西斯懒洋洋地伸开双腿坐

---

① 法新社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易名。——译者注

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火舌上下跳动。他突然打破长时间的沉寂，高声问道：“奥莱斯特，你能保守机密吗？”

“我想是能够的。怎么啦？”我问道。

“你能担保永远不向人透露我要对你说的肺腑之言吗？”他继续说，“除了现在的同事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要泄露给你的机密。”

“毫无问题，我发誓，”我说，“你要告诉我的一切，永远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好吧，”弗朗西斯点点头说，“我并不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那只不过是个掩护而已，也不叫弗朗西斯·沃尔德。我在第二厅工作，名字叫……”（甚至现在，我也不能披露他的真实姓名，所以沿用认识他时他所用的名字：弗朗西斯·沃尔德。）

大概是脸部的抽动显出我的疑惑，弗朗西斯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名片上有他的真名实姓，下边写着：

内政部特派员

巴黎　索塞依斯大街 11 号

这就是一直到今天仍然举世闻名的“第二厅”的地址。

七年以前，我受一家全国性报纸委托查询外交官布尔盖斯和麦克林神秘失踪的案件，曾同巴黎的这个机构有所接触。它的头头带着显而易见的不快告诉我，由于各种羁绊，在这两位先生飞离英国十二天之后才得到消息。倘若是第二天就得知的话，可以肯定，这两位先生无论如何也无法离开法国。

这是题外话，还是让我们回到那天晚上在拉斯佩尔那套房间的谈话上来吧。这次谈话是我一生巨大的转折点。一开始我还没有领会弗朗西斯这一席话的真正含意。他绝不是那种不能保守机密的人，可是，这些话总该有个目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弗朗西斯紧紧盯着我的

双眼，平静地说：“喂，奥莱斯特，我向上司谈了你的情况。虽然你毫无察觉，他们已经调查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庭、你父亲的政治态度，甚至了解了你认识的所有姑娘。他们或许比你本人更了解你！他们对调查结果很满意，认为你可以同我一起工作。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干吗？”

我大吃一惊。开头，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当时我才二十岁，正是乐于冒险的年龄，并且从心底里钦佩弗朗西斯的魅力和毅力。正如任何一个英国青年都知道 MI-5[①]一样，关于第二厅的传言我早有耳闻，这个秘密组织更加挑起我的好奇心。但是现在，听到最好的朋友反复说他本人就是这个机构的成员，并且请我也加入，反而使我不寒而栗。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能回味起当时的激情。最后我才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

“你能做的远比你想到的要多，”弗朗西斯说，“你拳法娴熟，并且看来不是轻易丧失理智的人。你要知道，有时为了执行任务，我必须潜入使人望而生厌的歹徒巢穴去抓一两个人。和歹徒面对面搏斗，一般来说不成问题。但我无法防备有人从背后下手，所以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以防暗算，而你正是我理想的助手。”

我心慌意乱，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结结巴巴说了些感谢的话。

弗朗西斯继续说：

“这个工作可不容易，有时甚至很危险。你不是法国公民，一旦碰到什么麻烦无法表明正式身份，所以我们希望你宣誓效忠。这个秘密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如果你陷入困境，我们会提供一切官方保护。对于第二厅来说，你依然是个和歹徒们同流合污的狂热的外国学生。你挨的‘拳打脚踢’将比你得到的报酬还多。情况就是这样，愿意同

---

① MI-5，英国军情五处，英国著名谍报机构，1931 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局。——译者注

我们一块儿干吗？”

我再次点头同意。如果当时弗朗西斯代表第二厅派我乘下趟火车去柏林窃取战争计划的话，我会马上收拾行装，眼也不眨一眨就欣然从命的。

就这样，我进入了第二厅。在1911、1912和1913年，我陪弗朗西斯多次深入伯勒维莱、麦尼尔蒙丹特和巴黎其他地区的阴暗街道，同那些最下流的歹徒混到一起。我学会了如何潜入最肮脏的、烟雾弥漫的强盗窝里，背靠墙壁，像个十足的醉汉一样滑倒在地，而同时又注视着他们每一个可疑的动作。我学会了察觉一切预示着马上要动手的细微表情，比方说一挤眼或脸部肌肉轻轻一收缩。单凭直觉，我就能感到某个手持短刀的小子要扑向弗朗西斯，这时就准确地一拳把他打翻在地。我学会了当那些社会渣滓采用特有的最狡诈的手段时如何自卫，并且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也使用它们：用膝盖猛击对方的肾部，用手指抠对方的眼睛。我敢肯定，这些手段甚至能使大名鼎鼎的昆斯伯里侯爵[①]在坟墓里也胆战心惊。有时候我带一根橡皮管，管内有一个圆柱体铅条，用皮条拴住，皮条缠在手腕上，橡皮管藏在袖子里。只要轻轻一甩手腕，铅条就滑到手里。这件武器在格斗中是再有用不过的了。后来我还学会在打一个人的头部时打在什么地方、怎样打法才能把对手打昏而又不至于打碎他的脑壳。

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每天晚上我都是在巴黎最污秽的强盗窝里度过的，有时几个星期没有惊人的举动。就是弗朗西斯和我冒着危险去抓人的时候，好多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慑于弗朗西斯的力量和声望，罪犯不进行任何抵抗便束手就擒。当然，有时候我也帮了忙，正如前边说过的那样。也就在这段时间我参加了巴黎大学的考试。虽然忙于“其他”任务，好在成绩还算不错。我感到仿佛也从黑社会大学毕了业。

① 昆斯伯里侯爵，拳击运动规则的制定者。——译者注

1913 年夏天我返回阿姆斯特丹度假，看望父母、亲戚和朋友们。在日复一日的喝茶谈天中，长辈们、叔叔婶婶们常和我谈起选择什么职业更有前途，这使我很快学会了装出一副规规矩矩的学生样子，彬彬有礼地回答他们关于学业的问题。当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位勤奋好学的侄子除了在大学钻故纸堆颇有成绩而外，还对巴黎的黑社会了如指掌。但是，弗朗西斯早就给我灌输过，一个特工人员，绝不能因为自己头脑不清醒或别人的挑逗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即使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要恪守不渝。所以我守口如瓶，还装得对他们喋喋不休的说教颇感兴趣。

8 月 31 日是荷兰的节日，庆祝威廉敏娜女王诞辰。阿姆斯特丹全城彩旗飘扬，觥筹交错，竞相祝贺。傍晚，我漫步街头，看见两个醉醺醺的海员在调戏两个姑娘。她们惊慌失措，千方百计想摆脱那两个挡住她们去路的纠缠不休的家伙。我听到其中一个说要吻姑娘一下才放她们过去。我走上前去请他走开，话音未落这个无赖就向我扑过来。我左手虚晃一下，右手狠狠打了过去，一拳把他打得滚进路旁的排水沟里。另一个稍微稳重一点的海员觉得不该再胡闹下去，嘟嘟囔囔抱怨说姑娘们缺乏幽默感，跑过去把他的伙伴扶了起来。这时候，街上醉汉越来越多，于是我自告奋勇陪她们回去。我断定她们是在荷兰度假的英国女郎。两个人都长得相当漂亮，都能说几句简单的德语。由于刚才的遭遇她们还惊魂未定，就热情地接受了我的好意。她们还说是我使她们死里逃生，如果我晚到一步，后果便不堪设想。

在护送她们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成了朋友，并且约定第二天由我带她们参观阿姆斯特丹的几处名胜。我对学习外语很有天赋，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前，遇不到多少讲英语的人，早就想同出生在英国本土的人谈话以纠正口音。以后的几天，我成了她俩必不可少的向导。她们返回英国之后，我继续同那个我中意的姑娘通信。书信来往催开了爱情之花，在 1914 年 5 月，我第一次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们在兰

开斯特市附近的格尔沃斯结婚了。

我们首先在法国，而后在荷兰度过了漫长的蜜月。在荷兰，我把她介绍给父母和全家。那时候国际形势已经相当严重，并且日益恶化。我对德国人所说的“地理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心中有数，所以对三年前的艾加迪尔事件引起间接宣战并不感到意外。萨拉热窝的暗杀注定要产生严重的后果。表面看来，这个发生在1914年7月晴朗夏日的事件无足轻重，和平仿佛是持久的。但是，时针却在飞快地朝着战争转动。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和妻子刚刚从英国回来。不到一个月——9月初，我接到一份由弗朗西斯签署的电报。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它。电报说：“我在安特卫普，希望见你。”

除了第二厅的官员之外，谁都不知道我同这个机构有联系，甚至妻子也不了解我在巴黎的情况。而现在，我又多了一层义务：对妻子忠诚。当时，一直到后来，荷兰在世界性冲突中都保持中立。但是，出于对法国的热爱和对德国人的痛恨，由于刚刚结婚而成了一个英国家庭的成员，我的同情自然在盟国方面。所以我立刻预感到，弗朗西斯急于同我会面绝不是仅仅为了叙旧。

就这样，在不透露重要细节的情况下，我对妻子解释说，弗朗西斯是我的朋友，他和情报机关有关系，他要见我是为了商谈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还告诉她，当数以千计的英国青年志愿参军的时候，我不能保持中立。她虽然眼泪汪汪，但还是爽快地同意我起程前往。两天以后，我在安特卫普的伦敦饭店见到了弗朗西斯。过去，我们俩曾在这个饭店住过。

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万分，但我们无暇叙旧。德国军队正在入侵比利时，并且已经开到安特卫普附近。这座港口城市两天之后即陷入敌手。作为一名法国高级官员，我的朋友躲过了入侵者的追捕。鉴于当时的环境，他扼要地介绍了为我制定的计划。以前，在闲谈中我曾

提到过我的几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弗朗西斯以他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一个现在看来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十三岁，在东印度的烟草买卖中财运亨通，同德国香烟制造商有牢固的贸易关系。他深信，即使打起仗来，人们也还是要吸烟的。弗朗西斯的计划是让我表面上作为哥哥的代表驻在德国，实际上，在那里为第二厅组织一个谍报网。只要德国反间谍机构发现不了我的真正目的，持有中立国护照出入德国并不是件难事。但是，不管其国籍如何，间谍毕竟是间谍，对间谍的刑罚只有一条——处死。

在这点上，弗朗西斯并未对我强求，他反复暗示说，如果接受这项任务，一旦被德国当局抓获，法国第二厅爱莫能助。他等待我做出抉择，并且说，假使我决定不接受这项危险的工作，也不会受到指责。我新婚不久，战争并不针对我的祖国，没有任何东西强迫我把脑袋伸进狮子嘴里。

在小说里，"英雄"毫不犹豫地去冒生命危险，面带微笑，目光炯炯地投入行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每每如此。我承认，对弗朗西斯制定的计划，我反复权衡利弊，长时间举棋不定。

如果还是单身汉，我真会表现得像小说里的"英雄"。我还年轻，喜欢冒险，并且加入情报组织也是难得的机会。而现在情况变了，必须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本人和我的妻子。她会答应新婚的丈夫成年累月甚至永远不在她身边吗？转念一想，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战争中，数以千计的妇女成了寡妇，难道这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应当冒的风险吗？难道为了留在她身边，能够无视这个可以作出贡献的机会，让它从手指间滑走，在战争中对人们的痛苦无动于衷吗？

我看了弗朗西斯一眼，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是我短短的生涯中第二次同第二厅合作。

当夜，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拟定各项细节，然后弗朗西斯匆匆忙

忙返回巴黎。东方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虽然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后勤支援，比利时人的顽强抵抗未能阻止安特卫普陷入侵略者手中。几天之后，我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一个星期，由我哥哥教我做烟草买卖。幸好，我还记得这个行业的很多术语，这是几年前他和父亲谈论生意时听来的。我的记忆力极好，人们谈论什么新鲜问题的时候，只要听到，就能毫不费力地牢牢记在心中。

这样，在一星期中我懂得了如何选择样品、标价、计算扣除额和发运货物；学到的知识足以使我自如地同可能遇到的最精明的烟草商争个上下高低。哥哥对我的秘密有所了解，后来他在反间谍工作中也起过一些作用，但家庭的其他成员对我突然热衷起烟草生意的真正目的却一无所知。长辈们对这个决定交口称赞，以为一定是结婚使年轻的奥莱斯特成熟起来。这个年轻人不会考虑战争，更不会以战争为理由为其无所作为辩解，他会利用这个机会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进入商界。

我由一个叫安妮·范·姗坦的德国女郎陪同，带着大宗烟草进入德国。她以女秘书的身份出现。在不来梅建立起办事处之后，我经常来往于汉堡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两个烟草贸易中心，日复一日地同买主洽谈，介绍样品，讨价还价，商定发货办法，接收订货单。一段时间之后，我成了个干练的卖主。经过我的苦心经营，哥哥的企业飞跃发展。每隔六星期，女秘书回阿姆斯特丹一次，交订货单，带回新样品和我哥哥的指示。

读者会问：这一切同谍报工作有何相干？那好吧，我可以告诉你，谍报工作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由我牢牢控制着。我负责同四个特工人员联系：一个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本德，一个在基尔运河的码头上（他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在不来梅，一个在汉堡。

基尔运河的那个人叫鲍尔·布鲁麦，住在一个大海军基地附近，对海军舰只，特别是U型潜艇进出情况，以及它们将要进行的军事行

动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来梅和汉堡也都有海军基地，我的人从那里提供有关商船通过易北河和威悉河运送兵员的情报。威斯特伐利亚的本德是铁路枢纽，是往西线运送兵员和军火的列车的必经之地。从这个铁路中心运输量的变化能够推测出可能要发动的进攻。我的人甚至能使我掌握通过此地的列车数量和型号的任何细节。

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读者们会奇怪，在战争期间，怎么可能争取到四个冒险背叛祖国的德国人呢？回答是这样的：德皇和容克们（军队中的贵族军官）在全国不得人心。容克大部分是普鲁士人，他们骄横得令人不能忍受，而西部的德国人却保留着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古老传统，其中一些人不愿俯首逢迎那些头戴尖盔、蓄着神气的唇髭、身着军服、极力模仿弗里德里希大帝、来自德国东部的威风凛凛的容克们。

在容克们眼里，只有身带刀痕，证明自己参加过决斗的人才算男子汉。这些人把不属于他们阶层的其他德国人看得粪土不如，所以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这种怨恨在三个“自由港”——不来梅、汉堡和卢卑克表现得尤为强烈。这些地区传统上有自己独立的机构执行当地法律，不受德皇干涉。

在以往的著作中我不止一次提到过，一个间谍，或者叫特工人员，必须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进入敌国领土而不被抓获——由于持有中立国护照和商人身份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第二，把获得的情报迅速送往上级以便及时据此采取行动。此外，还有第三个问题：一旦兜捕之网开始收拢，能够逃出而不引起怀疑。一般说来，这一点就要取决于间谍本人了。

我相信很多读者从未见到过烟草样品，恕我冒昧，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样品就是运出产地的经过处理、烘干、打成小捆的烟叶。当时我哥哥经商的正是德属东印度烟草产地。根据样品，进口商从刚刚运出的一包烟草中选出两三捆，用绳子捆牢，每份样品都系上标签，

上面详细注明产地和起运包数。样品必须保持色泽新鲜、干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加工商就是根据它的质量、成色和香味决定是否订货。样品几经揉搓，失去光泽以后，就退还进口商，进口商则填写订货单，以便提供买主看中的货物。我前面已经说过，我的女秘书安妮·范·姗坦定期去阿姆斯特丹，其任务就是送回旧样品，带来新样品。

我哥哥小心翼翼取下每份样品的标签，按订货单发运货物，然后很快把标签送往英国的福克斯通——负责法国第二厅同英国情报机构联系的法国联络官在那里设有办事机构。从英国再经过一天，标签就辗转到了巴黎的第二厅手中。好一个标签旅行！这个不起眼的标签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它的背面一般有用密写药水书写的有关海军和陆军调动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来自我的四名战略特工人员。

在几乎九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工作相当顺利。每次女秘书安妮·范·珊坦去阿姆斯特丹之前，我都迅速造访我的部下，收集情报并把它牢牢记在心中。任何间谍都不应当做记录，以免被人识破。不管你的密码多么巧妙，总有被破译的危险，这样，你就可能作为嫌疑犯被捕。

为了谨慎起见，我和他们见面是不定期的，并且从不在同一地点。间谍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行动的规律性。反间谍机构发现一个行动规律的特务要比找到一个行踪不定的人容易得多。情报一到手，我就立刻做标签，重新系到样品上交给安妮。她在德国和荷兰海关从未遇到过麻烦。偶尔也碰上海关官员同她开几句玩笑，说是要没收一捆样品带回家去，茶余饭后品尝品尝。碰到这种情况，安妮不动声色，笑容满面地以开玩笑与之周旋。

虽然风平浪静，但莫名其妙的惊恐常使我心神不定。我只身在敌人国土，形影相吊。我的使命就像一把两刃钢刀，既能杀死别人，也能伤及自己。我的正式身份是致力于发展哥哥烟草贸易的精明干练的商人，主顾谈及战争及其给他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我必须深表同

情，他们咒骂凶残的法国人和英国人，说他们阻止德皇攻入比利时，我也只得洗耳恭听。

扮演这个角色非常不易，特别是对我这火气正盛，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更是困难。时间一周一周、一月一月过去了。就算自制力很强，孤单和狐疑也不免使我心乱如麻，觉得迟早会落到敌人手中。除了安妮外，我不能向任何人诉说。即使对她，也只能适可而止，只讲她非了解不可的东西。安妮知道情况越少对她本人越有利。这是因为，万一不幸遭到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她必须开口说话。我只得时时警惕，避免露出任何害怕的神情。别人提出的每一句问话都要仔细剖析，看其中是否含有某种不测，而且回答必须迅速自然。

每次同我的人会面，都要冒被捕的危险。每次会面顺利结束，都使我联想到，有一利必有一弊：工作越顺利，处境也越危险。总有一天某个酒吧的老板会对我产生怀疑，或烟草贸易界某个同行看到我在跟一个装卸工谈话,会思忖这是为什么。在德国度过的几个月里，我体验了间谍的一切惊骇疑惧。当时我尚未搞反间谍工作，这段经历对以后的反间谍生涯大有教益，它使我亲身感受到一个嫌疑犯的惊恐心情。

1915 年 6 月 5 日是个天崩地裂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刚刚回到不来梅，在房间里等一个谍报人员来访，他叫普福卢戈。下午，他气喘吁吁、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说，基尔运河的鲍尔 · 布鲁麦被保安警察逮捕，拷打之下供出了一切，包括我的名字在内。逮捕行动已经开始，我必须立刻逃离。

幸好安妮 · 范 · 姗坦已于头一天前往阿姆斯特丹履行公事，只有我一人处境危险。时间不允许整理行装，要离开德国就必须马上动身。十分钟之后,我已拿好最重要的文件上路了。时隔几年,战争结束以后，我才得知，我离开后半小时，德国警察就闯进了房间。

普福卢戈开车送我到离边界五英里的西富利锡亚。德国边境戒备

森严，他不能冒险送得更远，况且待在一个被追捕的人身边每分钟都意味着不祥。他必须尽快返回不来梅以准备应付警察的口实。我们俩都明白，我是他们四个人的唯一联系人，但被捕的鲍尔·布鲁麦肯定也知道普福卢戈，并把他供了出来。事情很清楚，普福卢戈为了保全我的脑袋而把自己的脑袋置之度外。这真是个高尚的举动。当我同他分手，看着他掉转车头，向凶多吉少的不来梅方向驶去的时候，一阵难受涌上心头。

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没有被捕。1919年，法国政府给他授勋，以表彰他的出色贡献。

天色渐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岗哨林立的边界进入荷兰逃生……自由离我只有五英里之遥，我怎能贸然行动，不对后果考虑再三呢？德国保安警察肯定估计到我越境去荷兰的企图而加强了防范。我在一条沟里一直藏到夜幕降临。好一个漫长的夏日！

入夜，下起雨来。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把我淋成了落汤鸡。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德国哨兵一定早到掩体里避雨去了。我尽力向前爬着，不时还要把脸紧紧贴到泥地上。我从一个泥坑滚到另一个泥坑，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两条腿越来越重。湿衣服箍在身上显得沉甸甸的，寒冷使上下牙不停打战，再加上一路的疲劳，行动越发困难。

五英里路竟然走了四个多小时。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走，倒不如说是本能地蠕动。身边没有指南针，满天乌云遮住了星斗，也许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能断定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向后退。其实，两头都同样危险：后方，德国警察追捕；前方，德国边防军挡路。

终于发现前面有灯光，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荷兰，是哺育了我的家乡在不远的地方向我招手。我不停地爬着，爬着。前边一道铁丝网拦住了去路，我知道，这就是边界线了。我强打精神查看一下铁丝网，生怕德国人用老一套办法，把空罐头盒拴在上边，只要企图偷越的人稍微一碰，便叮叮当当响起来报警。好在我所在的地段离岗哨很远，

他们没有发现。

我用了一刻多钟终于通过了这道著名的铁丝网。湿透的衣服被撕得支离破碎，腿上脸上鲜血淋漓。倘若这时候德国哨兵看到我在铁丝网上挣扎，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像抓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鸟一样抓到我。多亏我有造化，没有被发现。这样，我总算闯过了最后一关，踉踉跄跄，拖着疼痛难忍的双腿向前走去。还有几公里要走，但已经逃出了哨兵的视线，我晕倒了。土地，这哥罗宁根省边远角落的土地，像德国那边的土地一样潮湿寒冷。我紧紧伏在地上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深深出了一口气：终于来到自己的故乡，终于得救了！

等体力略有恢复，我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天亮。尽管我样子狼狈不堪，一个农民还是在他的马车上腾出一个地方，把我送到离边界大约二十英里的哥罗宁根城。我换了衣服，吃了点东西之后，乘火车到勒华登市，接着又到海牙，从海牙又乘船前往英国。在福克斯通，找到法国第二厅的办事机构，我的消息马上传到巴黎。很快，发来祝贺我成功出逃的嘉奖令，并给我五个月休假。

这个命令无疑是明智的，但我力表反对，因为我觉得身体毫无问题，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只是同妻子高高兴兴见面之后，她说我骨瘦如柴，简直成了一具骷髅。确实，虽说在德国的九个月饮食尚好，体重如前，但这次仓猝出逃，神经极度紧张，竟使我的体重下降了好几公斤。在这次事件中，除了染上左眼皮神经性痉挛的毛病之外，我每逢听到爆炸声就心惊肉跳。

于是，稍事准备我就去安心度假，直到 1915 年返回巴黎到第二厅接受新的任务。大概是上司相信了“以贼捉贼”的古老说法，把我从第二厅这个间谍机构调到国土安全部，即反间谍部，授命我在远离索姆边界的后方组织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审查方圆六十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嫌疑犯。

我就是这样开始了反间谍生涯。到 1948 年引退前的近三十年中，

我先后为法国第二厅、英国、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和外事警察局工作过。在此期间，对付过几千名押解到我办公桌前的男男女女。一开始，我总是先递上一支烟，提些诸如姓名、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和家庭情况之类的例行问题，然后便进入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区分真假口供的工作。其中很多人是无辜的，也有一些确实是间谍。不管哪类人，都有机会为自己的清白辩解或证实自己的供词。我掌握了如何在一瞬间捕捉突然发现死神将临的人的茫然神情。我的职业远不是惬意的，正像战争从来不是诗情画意的一样。但愿战争不要再度涂炭人类。

# 第二章　引论

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反间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七名间谍经我手被判处死刑，被判长期监禁的则更多。我写下这些案例并非为了炫耀，目的仅仅在于写一本有关谍报方面的书。本书也许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其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从反间谍机构引退之后，我曾作过一系列的报告。我的听众，不论男女老少，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反间谍人员？"

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有不少是受了一些所谓真实的，有关间谍的电影、小说或书籍的影响，被那些扣人心弦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在这类故事中，乔装打扮的特务总是在某个豪华饭店的酒吧里活动，反间谍人员坐在漂亮的汽车里，使用各种暗号和神秘的语言进行惊心动魄的追踪，而结尾总是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外国首都的阴暗角落里抓到被追踪的人。

在一名真正的反间谍人员的生活中，的确有惊心动魄甚至冒生命危险的时刻。但是，如同战场上的生活一样，在漫长的等待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惊险事件发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反间谍人员的生活。电影和小说的情节仅仅是为了吸引观众和读者，集中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略去了冗长的审讯、乏味的调查和烦琐的取证。

一个真正的反间谍人员至少要具备十项基本条件，其中七项是天生的，其余三项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大部分反间谍人员开始都不适应这一职业的要求。

下面我想谈谈，在我看来，一名真正的反间谍人员应该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要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十分重要。一个优秀的反间谍人员必须有这种能力，即在事隔多年之后，还能记得见到过的人的面貌、发生过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事情发生的地点。要善于在连续几天的审讯中不做记录。（下面我还要详细谈到审讯问题。）

反间谍人员的重要条件是能够取得怀疑对象的信任，尽可能给他以假象。如果审讯人停止审讯做记录，那么审讯的气氛就会显得紧张，受审的人就有可能不敢讲话，把口封死。

情况甚至会更糟。嫌疑犯会利用你做记录的空隙思考和编造回答。审讯人如果心平气和，宽厚仁慈，会使嫌疑犯觉得他只不过是在例行公事。有时，嫌疑犯对审讯人的信任是如此之大，以致会在不知不觉中露了马脚。

值得庆幸也罢，该受诅咒也罢，我生来就有非凡的记忆力。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三岁生日时收到的那些礼物，赠送这些礼物的人以及他们每个人到我家的时间。我甚至还记得出生之后六个月时的事情，脑海里至今保留着那些印象很深的东西：摇篮，它周围装饰的布幔。

我父亲家里装了荷兰的第一部电话机，他把一些重要的电话号码都写在电话机旁的一张纸上。虽然时隔五十多年，我至今还记得那张纸上的号码。我无意借此吹嘘，因为非凡的记忆力说不上是美德，也不是出自我的努力。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天赋，我也许不会成为一名反间谍人员。

第二条是要有巨大的耐心和洞察力。在第二部分第七章“明赫尔·德隆格尔”的故事中，我对此有简略的说明。这里，无须再强调一个反间谍人员的耐心和洞察力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为了活命，任何间谍都懂得耐心和谨慎从事。这种耐心与他性命攸关。审讯人员要获得成功，就要有超人的耐心。一个精明强干的间谍——无能的间谍

顶不住长时间的审讯——时刻都想着自己扮演的角色。审讯者想当场抓住他的破绽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知道如何巧妙地回答你的问题，并且灵活地避开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话题。一个狡猾的间谍只有在细节问题上才会露出马脚，即在某些事实上他可能会自相矛盾。

第三条是语言方面的才能。即使再高明的反间谍人员，如果事事借助翻译，那他势必处在不利的地位。他无法把一个瑞典商人同一个德国商人或是一个冒充瑞典人又讲一口流利的瑞典话的挪威人区分开来；在检查怀疑对象的物品时，由于不懂书信、文件或报纸是什么文字而束手无策。我并非炫耀，也无意炫耀，我精通荷兰语、佛拉芒语[①]、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罗马尼亚语和斯瓦希利语[②]也很好。

反间谍人员的第四个条件是精通实用心理学，他应该猜到嫌疑犯在想些什么，以便在审讯中因势利导。恐吓和粗暴的态度对某些被怀疑者的心理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亲切温和的话语往往有助于动摇敌人的顽抗。有些人的做法则完全不同，变幻无常，喜怒不定，喋喋不休，以期达到目的。审讯人如果一开始就不能把握住对手的特点，那他就是盲目的，就像一个蒙上眼睛走进赛场的角斗士一样。

第五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勇气。这样说可能有些费解。读者一定会认为审讯人用不着什么勇气，应该有勇气的是被审讯人而不是审讯人，尤其是从保命这个角度讲是如此。间谍都是些勇敢的人。他们被训练成勇敢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异国单独执行任务，没有朋友，他们的功劳也不为人所知。本书还想说明，反间谍人员本身就应具备间谍的一切条件，具有迷惑对手的高超的智慧。

凡是参加过议会辩论或是出席过僵持不下的重要审讯的人都知道，有一种“精神优势”的东西存在。这种优势不仅属于指控者，也

① 佛拉芒语，变种荷兰语，多流行于比利时。——译者注

② 斯瓦希利语，非洲一种重要的通行语。——译者注

属于被指控者。这是一种反间谍人员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嫌疑犯表明的精神上的优势。无须虐待他，但要使他明白，审讯是正义的，审讯者比对手更忠于职守。

如果审讯者能赢得这场无声的意志战，成功就近在咫尺了。

反间谍人员的第六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熟悉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不仅熟悉交通要道和重要建筑物，而且熟悉小街小巷、旅馆、饭店、当地的特点和某处到某处的距离。所有这些都应深深印在反间谍人员的脑海里，以备随时使用。(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点，即记忆力。) 我想用一次审讯做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

1942 年 3 月，汉斯（汉斯后来被开释，因此我不能说出他的真实姓名)被带进我的办公室受审。我坐下来,仔细打量这个将要受审的人。他身材瘦高，神态自若。像刷子一样剪得短短的浓密的头发、深蓝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和瘦削的面颊证明他是个德国人，虽然他右颊上没有决斗的疤痕。德国人有好有坏，我的工作就是要弄清他到底属于哪一种人。

汉斯讲得简单明白，合情合理。寥寥数语就可以看出他很有修养，聪明，性格坚强。他毫不隐讳自己是个德国人，1936 年因反纳粹主义，无法生活，财产受到威胁，不得不飞往丹麦。他在哥本哈根当代诉人，很快就积下一笔钱。1940 年，纳粹入侵丹麦，他感到威胁更大了，于是返回“狮穴”——德国，尔后穿过西班牙边境到了巴塞罗纳。这是逃亡者的必由之路。

我就他开始的叙述提了一些问题。很明显，他确实在哥本哈根住过多年，他对这个城市很熟悉。对他当代诉人的经历也不容怀疑，因为他使用的语言全是法庭上的习惯用语。有关出逃的事，他讲得真实可信，因为有些细节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讲得出来。

我点上一支烟，用德语问道：

“请告诉我，你几点钟到巴塞罗纳？”

“很晚了，大概是二十二点吧。”

“在什么地方过的夜？”

“大陆旅馆。”

“我对大陆旅馆很熟悉，你记得餐厅在几楼？”

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笑笑说：“记不得了，我到得很晚，我刚才说过，可能是二十二点。人们告诉我餐厅已经关门，我就在自己房间里随便吃了点东西。”

他回答得很得体，有条不紊。

“我明白了。那么你第二天早上呢？”

“我在自己房间里喝了咖啡，然后到英国护照办理处去了。”

“你怎么去的？坐出租汽车还是步行？”

“步行。”他回答说。

“奇怪！你不熟悉这个城市，而步行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我害怕坐出租汽车。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关系很好，盖世太保到处都有暗探。我想汽车司机也许和盖世太保有默契。再说，我的长相使我无法否认自己是个德国人。”他苦笑了一下。

他讲的有道理，我点头表示同意。

“你怎么找到路的？”

“我问了值勤的交通警察。”

“从大陆旅馆到英国护照办理处你用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二十分钟。”

沉默片刻。我拿起一支烟在香烟盒上磕了磕，然后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

“朋友，你在撒谎。毫无疑问，你是个高明的撒谎者；你不仅是个撒谎者，还可能是个德国间谍。”

汉斯的脸红了。

“你怎么能这样指控我呢？”

“别发火，”我说，“这场戏该收场了，你用不着为此羞愧。”

我平静地靠在椅子上，继续说道：“你的叙述有两点使你露了马脚。第一，大陆旅馆不像欧洲大多数饭店那样餐厅在一层。它和别的饭店不同，餐厅在最上一层。你料到了我的弦外之音，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你说什么晚上十点钟到时，餐厅已经关门了。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柏林、伦敦或哥本哈根，但你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在西班牙，正像在大多数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一样，夜生活开始得比北欧晚得多。你听说过 siesta 这个词吗？它的意思是午睡。在所有热带地区的城市里，午饭后都有睡午觉的习惯。人们在一天最凉快的时候——深夜——才出来寻欢作乐。在西班牙，电影院和剧院只是在晚上十一点以后才开门。因此，大陆旅馆的餐厅不可能在夜里十点就关门，那正是最热闹的时候。结论很简单，你没有在大陆旅馆住过。”

我看到他想说什么，于是赶紧说道：“请别打断我的话。如果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服你，我可以讲出另一点。”

我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说：“你看，照你说，你对巴塞罗纳不大了解，那么我给你画张图。比如说，大陆旅馆在这儿——兰姆波拉·卡达卢尼亚，前面不远，就是卡达卢尼亚广场，你瞧，”我一边说，一边在纸上画着，“在远远的马路的尽头，是格拉西亚街心公园，而街心公园附近，就是英国护照办理处。从大陆旅馆到英国护照办理处，步行不过五分钟的路。像英国人的口头禅那样，‘保准没错’。可你却说走了二十分钟。像你这样一个高大、健壮、精力充沛的男子汉是不可能走得那么慢的。”

我按按电铃，让人把他带走。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真在大陆旅馆住过——他肯定没有——那么从自己的房间里就能看到英国护照办理处的办公室。我不怀疑他去过英国护照办理处，因为办理处的职员证实他确曾去过那里。但是，他是如何去的呢？躲在盖世太保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吗？”

我前面提到，汉斯没有被处以对间谍采用的极刑，但是我断定他是个间谍，而且是那种最危险的间谍。在以后的战争日子里，他一直被监禁着，无法继续从事他选择的职业。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问题。许多比我精明强干的人，整小时整小时地审讯汉斯，但由于不像我那样对外国城市熟悉（比如在这件事上，不熟悉巴塞罗纳），因而就不可能抓住被审讯者露出马脚的两个小小的疏忽。

一个优秀的反间谍人员应具备的第七个条件是熟悉国际法。所有嫌疑犯,不管是哪一国的,都有某种国际法所允许的权利和特权。例如，拘留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在关押期间享有某种特殊优待，等等。国际法谴责对俘虏和嫌疑犯的任何虐待，虽然英国的司法观点对此不赞成。一个精通海牙公约细节的狡猾的间谍完全会捉弄审讯他的人，要求国际法保护。因此，审讯者必须以高超的艺术，在嫌疑犯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上压倒他。

反间谍人员应该是真正的演员，要有假装激动、和蔼可亲、焦躁不安而在任何情况下又不失去自制的本领。我谈过审讯嫌疑犯时的实用心理学，这一点可以作为它的补充。掌握了嫌疑犯的个性和决定了审讯方法后，审讯者就要善于扮演自己的角色。

当语言亲切、目光和善时，为什么还要采用粗暴、狡诈的语调呢?如果审讯者一味和气，声调用得不适当，那也会被动，因为精明的间谍会立刻觉察出审讯者的迟疑不决而马上采取自卫。反间谍人员要善于不动声色地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样嫌疑犯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疏忽。审讯者要善于利用这种疏忽，而不要让嫌疑犯发现自己的真实意图。如果审讯者的眼神或表情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被审讯者就会提高警惕。

审讯连续进行，往往变得令人生厌。如果嫌疑犯是个固执的家伙，他就会不停地老调重弹。审讯者即使厌倦了，也要保持平静和耐心。

他应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真实感情，决不让任何厌烦的表情暴露自己的想法。

反间谍人员应具备的第九个条件是分析能力。在许多方面，这表现为逻辑思维的发展，即分析因果关系，研究嫌疑犯展开链条中的每个环节。精明的间谍都会编造一个表面上合乎逻辑的故事，只有优秀的审讯者才能透过表面，用巧妙的提问弄清问题的实质。在这一点上，时间因素很重要。从理论上讲，任何诡计多端的间谍都能把自己的行为和计划说得天衣无缝，而一个诚实的人，特别是当感情处于强烈冲动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一个本来真实的故事讲得圆满。由于慌乱，一些极其重要的情节被忘掉了。据警方统计，能把一件事从头至尾井井有条讲述出来的人为数甚少。如果不是受过训练，被审讯者往往遗漏重要情节，重复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甚至把一件事讲个没完没了。同一件事的两个当事人可以讲出完全不同的情节。读者知道，一个逃出来的人，在得到自由、摆脱路途上的千辛万苦、忍饥挨饿之后，会大大松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交代往往毫无条理，因为他也许曾整夜整夜地行走在陌生的地方。嫌疑犯的交代可能很离奇或是有一些情有可原的错误，特别是在夜以继日地、有时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停地奔跑之后。他往往说不清什么时候穿过什么边界，或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城市。反间谍人员要善于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交代，什么是伪造的交代，容许记忆上的差错或是由于过分疲劳而对某些情节的重复。

本章主要谈我对口头审讯方面的看法，下一章我将详细地谈到对一些嫌疑犯的审讯方法和如何检查嫌疑犯的随身物品。这里我只想说明，嫌疑犯的任何物品，从衣服到行李，对研究决定他的申辩是否可信有着重要的意义。老练的检查人员知道什么东西有用，怎样才能从嫌疑犯的物品——信件、书籍、衣服，甚至身体的某一部分中找到真实的证据。通常说来，只有那些出色的间谍才能完全凭脑子记住发报

密码和国外通讯地址。大部分间谍都随身带有经过巧妙伪装的记事本。检查者不仅要知道在何处寻找证据，还要知道如何找到它们。本书中我详细谈了明赫尔·德隆格尔的案子，这桩奇案说明耐心寻找证据的必要性和做到心中有数的重要性。

最后，一个优秀的反间谍人员应具备的第十个条件：对谍报工作中惯用的伎俩有实践经验。密写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情报工作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刻板、墨守成规、缺乏主动精神。一种联络办法被识破，就应立即弃置不用或予以代替，可是德国人往往继续照章办事，从而把自己间谍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另一个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战火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时，谍报工作不仅是窃取情报，而且还有如何传送情报的问题。第二次大战中，由于两项最新发明和其后对它们进行的改进——无线电报和微型照相技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人们可以轻易地安装一部强大的短波发报机，而且在对方准确捕捉到它之前，又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它拆除并运往遥远的地方。微型照相机就更加精巧。我见过一架德国微型照相机，有一支钢笔那么长，三倍那么粗。这种小型器械很容易装在间谍上衣口袋和西服背心里而不为人察觉。它可以拍照文件，底片只有大头针的针头那么大。间谍只需把这种底片放在一张邮票下面，把信寄住国外就行了。信本身毫无异常。检查机构任务繁忙，没有时间去揭掉所有发走——比如说寄往里斯本——的信上的邮票，检查下面是否藏有底片。可悲的是，德国间谍不停地寄信给已被监视的嫌疑者，这种方法很快就被识破了。

第二个例子是第一次大战中的事，故事发生在1916年离法国索姆不远的地方。半个城市处在“两不管”的情况下，另半个城市在法国防线后面。在战斗间歇时，农民们以他们特有的坚韧精神试图重新

恢复公社式的朴素恬淡的生活。一个住在德占区的农妇每天都越过分界线去看望住在法占区的弟弟。经过法国人的防线时，她受到反间谍人员的搜查和盘问。跟所有穿过分界线的农民一样，她不像个危险人物。

有一天，当她从弟弟家中返回时，提着装有食品的篮子来到检查站，食品也无非是煮鸡蛋、面包、黄油之类。一个反间谍人员因为见她常来常往，就亲切地同她打招呼。他漫不经心地询问了一些惯常询问的问题，一边说话，一边翻着篮子里的东西。他拿起一只熟鸡蛋摆弄起来，把它抛到空中，然后用手接住。

他偶然看农妇一眼，惊奇地发现她满脸涨红，显得惊慌失措。他继续玩抛鸡蛋，鸡蛋抛得越高，农妇越慌张。他拿起这个鸡蛋，仔细检查，蛋壳上没有任何记号，只有一片白色的痕迹。但是，农妇的慌乱引起了他的怀疑，于是他在篮子边上敲开鸡蛋，细心地剥开，蛋清上有小小的符号和极小的字迹。放大和破译之后才知道，小小的符号是英军布防图，上面注有各师、旅的名字。农妇以间谍罪被处决。

德国人早就利用这种天才的发现：用醋酸在蛋壳上写字，等醋酸干后再煮鸡蛋，字通过蛋壳被吸收，印在煮熟的蛋清上，而蛋壳上不留任何痕迹，无论是用肉眼或精密的显微镜都看不出来。这一发现纯系偶然。我想这位反间谍人员懂得实用心理学，从农妇的紧张表情产生了怀疑。这种方法被识破后，无论它多么新奇，德国人都应当立即停止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士兵像苍蝇一样死去，但他们仍然死抱住老一套，缺乏应变精神。德国人知道这种方法已为反间谍机构所知，而且肯定通知了各下属组织，但他们仍继续使用。

我本人就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三起类似的案件被破获，而我不知道的则更多。在这些案件中，肯定有不少德国间谍因为上级的墨守成规而无谓地送了命。

上面就是反间谍人员应当具备的十个条件。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

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每个条件按十分计算，谁若能超过七十五分，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去同反间谍机构接洽，一个具有这种条件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是大有用处的。但是，我怀疑，在一千人之中能否找到一人兼备所有这些条件。我认为具备这些天赋的人干上五年，就可以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反间谍人员。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想用点笔墨谈谈战争发生之后的反间谍工作。这里只强调一点，即战争爆发后再去组织有效的反间谍系统，就为时太晚了。一般说来，挑选和训练称职的人手需要几年的时间。

现在该谈到最引起人们争论的题目了：女人在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我在谈到特工人员时，从来都用阳性词而不用阴性词。这是基于我三十年的经验而形成的个人看法，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人，不管是作为间谍或反间谍人员，一般说来都于事无宜。我不反对女性，恰恰相反，我喜欢女性。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是女人，她们才应该待在应待的地方。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德莫依赛尔医生外，没有一个女间谍和女性反间谍人员在相同情况下可以和男人相比。玛塔·哈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普遍认为她是一个妩媚动人的女间谍，但事实上她并不聪明，而且容易感情用事。倘若她不是受尽酷刑被处决，恐怕早已为人遗忘。我想用事实来说明这个意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训练一批特工人员，他们将被空降到被占领的欧洲。有几个从荷兰逃出来的女人找我，要求以志愿人员的身份参加这种危险的工作。毋庸置疑，她们都是真诚的、勇敢的爱国者。我对每个人都这样问："你打算冒什么风险呢？"

回答也很简单，没有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

"我随时准备为国牺牲。"

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一个死去的人对国家毫无用处。请告诉我，你想活下去并且随时准备献出你的身体吗？"

虽然我不想这样提问，但责任迫使我必须这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大部分女人搞谍报工作都有三个弱点。一是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和训练，比如，在需要搞到敌人的一项新发明的技术细节时，一个机械师要比一个最聪明的女人有用得多。我了解这种工作的详情，许多女人不得不从头学习发动机的结构。至于搞军事情报，能像男人那样懂得现代军队的各种编制，以及师、旅情况的女人就更少。当然，这种知识可以学到，但需要相当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学习更重要的东西。另外，女人比男人容易引人注意，很难做到来去无踪。一个衣着随便、外表粗鲁的汉子可以几个小时待在一挺机枪旁边而不引人怀疑；而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年轻标致的女人，总会引人注目，常常会引起美国人所说的“贪婪的啧啧声”,或是我们通常说的“垂涎”。男人可以走进码头旁边一家无人问津的小酒馆，而不引起注意，但女人就不行。因为她们是女人，所以行动总是受到局限。这样，她们在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就十分有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女人比男人更不易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甘冒女读者同声抗议的危险，但经验证实了我的话。我知道，曾经有过两三起这样的事，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女郎博得了敌方高级人士的好感，她们干得不错。但是后来呢？后来她们却爱上了自己的猎物而使全盘计划付诸东流。她们倒戈了，供出了知道的一切军事秘密。我也知道一些倒戈的男间谍，但从来不是因为这种儿女情长的原因。一个间谍是不能多愁善感的。

我认为，女人在为自己的国家获取军事情报时，才是有用的。她们接近敌方高级军官或有影响的人，然后讹诈他们。她们可以在这些人的上级或老婆面前指控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问自愿充当间谍的女人是否准备随时为了国家的利益，献出自己的身体。大多数女人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慎重考虑的。为了窃取情报，和一个陌生的、有时是令人作呕的男人睡觉，这种女人要有娼妓的本领，而娼妓是不值得信任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过高地估计女间谍，认为她们在反间谍工作中会有很大作用的原因。许多习惯迟归，经常受到盘问迟归原因的丈夫可能对此会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在我二十年的经历中，遇到过许多在欧洲和北美从事间谍和反间谍工作的出色人物，没有一个是女人。当然除了马德莫依赛尔医生，因为她在这两个领域里表现得都很出色。

# 第三章　审讯方法

## 一

对嫌疑分子的审讯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阐述自己用过的成功和失败的方法之前，我想首先简略地谈谈英国和其他国家使用的方法。在纳粹德国，广泛使用刑讯，其方式因审讯者的性格而异。如在无麻醉的情况下把削尖的针状物插入指心，拔掉指甲，用金属圈把骨头或头颅箍碎，有时还用牙钻钻磨牙神经。用这些刑罚可以取得一些口供。很难对苏联使用的方法做出精确的估计，因为幸存下来的政治犯为数甚少，而这些为数甚少的人也难以逃出铁幕的网眼。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俄国内务部怎样在无休止的、消耗性的，有时甚至连续三十六小时不间断的审讯中，广泛使用饥饿和药物来摧垮犯人的抵抗力。这样，犯人一回到牢房，便疲惫不堪地沉沉入睡。一小时以后，又重新被叫去审讯。这种反复中断睡眠的方法可以摧垮最健壮和最顽强的人的抵抗力。

美国使用的方法——主要指审讯——是用强光源照射被审者的眼睛。审讯人不断轮换。另外，还使用科学的手段，如所谓万无一失的"诚实剂"和"测谎器"等。我之所以说"所谓"，因为我本人并不相信这些发明的"万无一失"性。据使用这套方法的人讲，一针学名叫致幻剂的诚实注射液，能使嫌疑犯的意识进入一种假睡眠状态，但不影响其下意识的活动。这样，嫌疑犯便会不由自主地供出知道的一切。而据我个人的经验，长期的专门训练，完全能使人控制自己的

下意识，把握住自己的语言。测谎器是一种精巧的仪器，其理论根据是：一个人的代谢机能随着人的情绪而变化。这种现象在科学上是被证实了的。这一方法的发明者据此推断，认为由此可以测出一个人是否在说真话。我承认，从理论上来讲是有据可循的，但是，我怀疑它是百分之百的有效。我曾在实践中遇到过一些头脑冷静的人，他们完全可以欺骗测试器。当然，这种人是不多的，但这为数不多的人也就够了。为使证据准确无误，必须无一例外，普遍可靠。

纳粹德国、苏俄和美国所用的属于“第三类方法”。他们相信通过疲劳肉体可以取得想要得到的情报。毫无疑问，体刑可以把任何人的抵抗力降到最低限度，不管这个人在体质上和精神上是多么坚强。曾有个具有非凡勇气的人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指甲全部被拔掉，一肢折断。尽管遭到此种折磨，此人始终没说一句行刑者感兴趣的话。鉴于种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盖世太保的刽子手只得罢手。如果继续用刑，他或许能说出点什么；但因为不堪忍受重刑，他会宁肯求得速死，以免继续受折磨。

任何人都不堪长期忍受水刑。行刑时，每隔几秒钟，把一滴水滴在倒霉者的头上。我完全相信这一古代刑罚能在几分钟内把一个人的抵抗力摧垮。若持续一小时，这种折磨足以使人发狂。

好在英国法律不承认通过刑讯所得口供的真实性。体刑除了令人深恶痛绝外，还有着很大的弊病。由于剧痛，一个人可以捏造出最耸人听闻的罪名来，以便减轻痛苦。由于不堪忍受折磨，往往随便编造个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以免继续吃苦。刑讯可以使任何人招供，但决不能保证所得口供的真实性。

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执行任务的间谍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或那样的药片。第一种是迷药，可以使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失去意志；另一种叫安非他明，能使疲倦的人重新振奋精神；第三种是用于自杀的，其成分是氰化物或其他烈性药物，可使间谍立即毙命。每一种药片都

有其特殊用途，最后一种是用于那些落网后怕受刑不过而招供的人。能把化作一小小药片的死神随身携带，这无疑是些宁死不招供的勇士。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逼供用的刑讯方法。这些方法一般都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不可谓不残酷和令人深恶痛绝，特别是对那些自诩为文明之邦的民族来说。当然，其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间接地表明审讯者由于无能而不得不靠这些方法来打开被审者的口。

第二厅——法国的一个机构，相当于英国特工组织 MI–5——使用一种别出心裁，一般说来效果不错的方法。嫌疑犯面对两个审讯者：一个是彪形大汉，说话气势汹汹，指手画脚，咄咄逼人，不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另一个却心平气和，默不作声，和蔼可亲，似乎对犯人满怀同情，并千方百计地制止发火的同事。审讯进入高潮，粗暴的审讯者盛怒之下，高声叫骂，语言不堪入耳，发出可怕的恫吓。突然，彪形大汉被叫走，这场戏便戛然而止。笑容可掬的人继续进行审讯，但方式是温和的、亲切的，递上一支烟，安慰对方被另一审讯者搞得极度紧张的神经。气氛的突然转变往往产生理想的效果。神经缓和、心情平静下来的嫌疑犯终于供出知道的一切。

伦敦警察厅使用的就是这种怀柔方式。英国的特工人员很善于制造这种亲切的气氛。他们认为人总是人，而人是容易受骗的。英国的特工人员样子是和蔼的、宽容的、通情达理的，所以总能得到需要的口供。作为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荷兰人，无须像中层的英国人那样过谦，我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对嫌疑犯的怀柔方式有力地证明了英国人的两大特点：对一切人的宽容精神和向走投无路的人提供出路的善意。在英国的法庭上，采用一种不同于任何别的国家的法律程序，即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被告有权随时收回自己的口供。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从逮捕到出庭的其他环节。

有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二次大战时发生在威尔士某城的军官事件。一个纳粹飞行员在对小城进行扫射时被击落，俘虏被带到司令部。他

神情傲慢，盛气凌人。将军被他的无理态度所激怒，又加之认为他刚刚扫射过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于是就打了他一手杖。在几周后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将军由于这一不克制的举动被开除军籍。这一惩罚是太过分了，因为将军是出于义愤才揍了激怒他的人。然而，细想起来，就能看出这正是在执行上述的重要原则。

1941 年，我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只是影响要小得多。我审讯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人，在审讯中，称他为撒谎者——他是个地道的撒谎者，我使用的这一词被人听到了。于是，我受到上司的申斥，不得不到内政部去上一堂冗长的职业道德课。过去，审讯工作在内政部进行，那里有一条不公开的内部规定，即禁止称嫌疑犯为撒谎者。审讯人员必须转弯抹角地对嫌疑犯这样说："我觉得你对我刚才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完全符合事实。"或者用另外的话来表示这一意思。严禁粗暴地对可怜虫直截了当地加上这一罪名，伤害他的感情。当时，我虽为此事怏怏不乐，但后来却感到欣慰，因为这个所谓的受害者是个讨厌透顶、顽固不化的撒谎大王。细想之下，我认为这一硬性规定也有它的道理。然而，也得承认，有时我是多么想砸烂它，或者情况迫使我很难完全照它办。

荷兰解放后，我为荷兰反间谍局训练荷兰青年从事间谍工作，当时我用的名字是弗兰克·杰克逊。在本章末尾，我将引用一些我的讲演记录，这些记录主要是谈我的审讯方法，这里无须赘述。但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我的审讯方法主要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使嫌疑犯情绪激动，而且激动得越快越好。我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审讯的最后阶段，是一场智慧与冷静的较量。彼此都想压倒对方。对于审讯者来说，除了怕一无所获外，别无顾虑。即使审讯失败，对他也不是性命攸关的事。因此，他可以随意驾驭，任意决定中断或继续审讯。然而，若不能在一开始就压倒对手，审讯人将失去原有的有利条件。如果能使对手失去克制力，成功就近在咫尺了。这时，实用心

理学使用得上了。审讯者只要善于利用受审人的情绪变化，就能立即巧妙地抓住他的破绽。尽管刑讯受到谴责，反间谍局的人员仍可采用造成嫌疑犯身体上某种不适的方法以达到获取口供的目的。比如说，给他一把硬座椅，或让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站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军队的特工人员对被捕的敌方军官常玩这样的把戏：先是摆出一副十分热情的样子，递上一支烟，端上一大杯咖啡或茶，然后审讯就按上述方法开始进行，一直到可怜虫感到生理上受尽折磨，心甘情愿将重要情报和盘托出，以便尽快得到解脱。我本人认为，这是一种很缺德的方法。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体刑，但也近乎体刑的边缘了，仅差一步就越过界线了。说起来有些荒唐，我总是把自己摆在与嫌疑犯平等的位置上，他若需要一把舒适的椅子或摆出一个舒适的姿势，我从不拒绝。审讯的时间不可过长，一般从早九时至晚六时，中间有一小时吃午饭时间。另外，我尽量亲自审讯，绝不自己去休息，让旁人代劳。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我在审讯过程中从不做记录。从一开始，就要打破那种一本正经的局面，让嫌疑犯有很随便的感觉，除非此人更喜欢军队中的刻板。我总是设法使他情绪激动，以便掌握主动权。有时，一切方法都不能奏效，而且又肯定嫌疑犯是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我就让他从头到尾反复重述自己的交代，一些细节也不能遗漏，不管他把自己的经历编造得多么煞有介事。有时，这种整日整日的重复会延续几个星期，这需要双方都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很好的记忆力。如果他的交代不是真的，迟早会在某一重要情节上出现漏洞，从而把事实的大门敞开一条缝。大门一开，成功便易如反掌了。

## 二

二次大战开始时，工作条件要比第一次大战差得多。1914 年 8 月，老天作美，加之细致的调查，在战争爆发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所

有在英国的间谍便被一网打尽了。卡尔·洛迪是战争开始后第一个到达英国的德国间谍。在他到达前，早已布下罗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逮捕了。此案流传甚广，除非偶尔需要引证一下，我就无须重复了。1911 年，德国政府代表团访英。代表团中一位高级官员总爱到加里东路的一家理发店理发。这是一家很不起眼的理发店，完全不是普鲁士的高级军官应光顾的那一类。这就立即引起了反间谍局的怀疑。理发师受到监视，所有来往信件被检查，一下子便查明了理发店原来是德国间谍组织在英国的“邮局”。英国当局不动声色，对该店继续监视，并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样，战争一开始，情报局便一举把德国间谍苦心经营了三年的组织全部摧毁了。这对德国间谍机构着实是一场灾难，在以后的交战过程中，再也没能重接上这被打断的链条。这一失败完全是由一个德国高级军官选择了一家不够上流社会标准的理发店理发所造成的。

二次大战爆发时，英国反间谍机构的处境就困难得多了。通常，伦敦的外国人总是很多，这些人同敌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0 年前后，伦敦的外国人由于德国和意大利难民的涌入而大大增加了。难民中的大多数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的，是一群叛逆者。纳粹和法西斯的间谍分子也就借此机会潜入英国。另外，纳粹分子在英国还有一批政治上的同情者，而一批希望和平的人则主张迁就希特勒，避免杀戮。

根据 18–B 国家安全法，战争一开始，重大嫌疑犯便被逮捕了。然而，网再大也不能将鱼打尽。人们反抗侵略的烈火刚刚燃起，便由于人身自由的被剥夺而被首先扑灭了。这不能不算是整个战争中最具有讽刺性的悲剧。许多忠诚的爱国志士反对执行 18–B 法令。无疑，有些判决是不公正的，使不少男男女女蒙受了不白之冤。例如，第一次大战时著名的“黑色入侵者”冯·林特伦，十分憎恶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后来虽证实他是无罪的，但从 1941 年至 1942 年，他却一直

被关在切尔西。那时，我同他很熟，他始终不明白他想为之效劳的国家不利用他所掌握的对付德国间谍的丰富经验，反而如此不公正地摈弃了他。这就应了那句“有所得，必有所失”的谚语了。不打破一些常规，便不能进行战争——这便是战争最大的灾难之一。

1939 年一宣战，对来自许多国家的数以千计的德国难民需要立即进行审查，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又有十五万难民蜂拥而至，他们大都来自丹麦、荷兰、挪威、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主要是由英国远征军的撤退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入侵所引起的。难民如潮水般涌来，德国空军一轰炸，这一本来就很棘手的问题就更麻烦了。英国必须捍卫自身的安全，而难民也需要加以照顾。

安置难民的临时措施是这样的：在伦敦设置五个收容点，一个在富勒姆，一个在巴勒姆，一个在布希公园，一个在水晶宫，另一个在诺伍德。收容点是由伦敦郡议会设置的，每个点的负责人——瞧瞧有多么幼稚——由难民局的人担任。我在诺伍德待过，对那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些。那里原是所医院，全是二层楼房，没有地下室，也没有阁楼，防空掩蔽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房屋四周草草围上了一道铁丝网，由士兵把守。

每天早上都有大量难民到达。从 1941 年 6 月起，难民到达的时间总和空袭碰在一起。有时，从伦敦来的车队一次运来的难民竟达七百人之多。男男女女的难民，个个精神沮丧；饥饿，离乱，亲人下落不明，都使他们极度失望。夜间，当突如其来的德国飞机用无情的轰炸对他们表示“欢迎”时，这些刚刚到达的饥寒交迫的难民便乱作一团，有时简直成了一群惊恐万状、大喊大叫的疯子。

在黑暗中把一群外国人的秩序整顿好实在不易。但又必须尽最大努力使他们安静下来，以便一个一个验明身份。然后，每人领取一份食物和一杯热饮料，下面的问题就是给他们找被子和安排过夜的地方。

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维持好的秩序会立即被德国空军的轰炸重新打乱，惊恐又在可怜的人群中掀起轩然大波。

德国空军的飞行路线总是经过诺伍德和水晶宫。每天夜里，这两处总是要挨炸的。

天亮时，彻夜未休的各点的头目已是精疲力竭了，但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到具体的工作中去。难民洗完了澡，换上消过毒的衣服，然后由大夫逐个进行体格检查。凡是有传染病征的人，麻疹也好，疥疮也好，一律隔离。经过长途跋涉，许多人需要进行治疗。

这时，反间谍局便开始工作了。七百人左右的行李都要进行严格检查。每张纸，每页书，每件衣服——包括衣褶和衣缝——箱子和旅行包都要进行检查。这项工作不属于海关人员，必须做得一丝不苟。有的难民为了给予收容他们的国家一些帮助，随身带来了地图、照片、图片，提供德占区的详细情况。这些东西都要经过详细检查。

这些工作结束后，开始口头问话。可疑的人另行拘留，待进一步审查。

这一过程大约需要一周。在此期间，难民是被隔离的，不能接收信件，不能同外界接触，并随时准备接受反间谍局的审问。以后，他们便被送进难民局，由该局发给他们在英国“落脚”的证明。所有的嫌疑分子——其中也有无辜者——另行看守。有一份详细记载着难民情况的中央档案簿，通过这份材料，可以了解到每个难民的全部生活。即使一个对难民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只要翻开一看，他甚至可以为一个嫌疑犯进行辩护。

审查难民的这些临时措施一直使用到 1941 年 4 月份，那时我和一个同事被派往克拉彭去组织一个特殊机构，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由于积累了前面所讲述的、在同难民日日夜夜的接触中得到的经验，我和同事们终于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用此方法审查难民，大大减少了他们的麻烦，而对我们又是完

全保险的。这时，难民潮业已过去，而审查人员的数目又在继续地增加着，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对付他们。从 1941 年 4 月到 1942 年 10 月我被调到荷兰反间谍组织为止，我一直作为反间谍人员的负责人在该组织工作。在此期间，审查人员的数目从五人增加到了三十二人。

可以肯定地说，在那关键的六个月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几个间谍滑过了我们过分松弛的网眼。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很难确定这个人或那个人是否是间谍。另外，审查人员少得可怜，没受过专门训练，难民又蜂拥而至，简直没时间对他们进行详细审查。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我在伦敦审查难民的工作仍没结束。由于法国的沦陷，除葡萄牙一小段外，整个欧洲海岸线都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通往大不列颠的唯一港口是里斯本，从里斯本来的船只仍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停泊。来自里斯本的水上飞机每周有两个班机到达伯恩默恩附近的普尔，其他飞机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惠特彻奇降落。除了在伦敦的工作外，我还要带领一组审查人员去上述四个地方，对刚刚到达的人，英国人也好，其他国家的人也好，进行审查。每去一地都需要几个小时的旅行。我想，我可能是反间谍组织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直到我完全调到克拉彭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为止。那时，不管是乘飞机还是乘轮船来的人，都一律送往该校进行审查。

这就是下面我所讲的故事的背景。

反间谍局在 1940 年遇到的问题要比 1914 年复杂得多。1940 年 5 月，情报局为接待潮水般的难民所做的准备并不比陆军部队为应付德国装甲部队的进攻所做的准备少。军队需要集结，要学会如何击退德国人；反间谍组织需要苦心经营自己的队伍。稍有不慎，后果就不堪设想。最近五年，我一直在等待着德国会出版某一德国人著的《我在

英国从事间谍的岁月》一书，该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在英国愉快地度过了极其有益的五个年头的人，然而，此书至今尚未问世。如果有朝一日我在书店看到它，我丝毫也不惊奇。当然，如果这位设想中的作者仍在从事情报工作，或者根本不存在此人，那也就无从谈该书的出版了。

# 附录　审查注意事项

## 一、嫌疑犯随身物品的检查

检查嫌疑犯随身物品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审讯嫌疑犯前，对他的随身物品，特别是书籍、日记、笔记本和所有的纸张，应进行认真的检查。每一片纸都需要过目，甚至揉皱了的香烟盒也应细心检查。可疑的物品要妥善保存，待第一次审讯结束后，再决定其取舍。

所有的书籍和杂志都应认真检查，特别是脱落的书页。包书用的皮，书皮应取下。如果发现书中的某一页有记号，更应精心检查，看是否有针刺的标记。

如果嫌疑犯的随身之物中有字典，应注意察看每个更换的新字母上面或下面有无符号。

火柴盒里的火柴应取出，对盒的内部进行检查。

流体、片状或粉末状的化学物品应进行化验。

还要看嫌疑犯是否带有棉花、牙签或修指甲棒，认真察看每一张用过的复写纸和吸墨纸。这些东西均可提供确凿的证据。

## 二、第一次审讯

A 一般原则

同难民的第一次接触，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一次系统的准备。

审讯时应当语气和蔼，彬彬有礼；除了赞赏之外，审讯人决不应该表示出怀疑、惊奇或激动。

对于带有撒谎或吹牛性质的交代，也应予以鼓励，决不应一听就横加指责。审讯人的任务不是争论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交代与其同伙的交代不一致，在第一次审讯中，不应指出他们的矛盾之处。

交代越不真实或漏洞越大，越应引起审讯人的注意，但是，既不能同被审人争论，也不能指责他。否则，他会因自己的交代被怀疑而起戒心。

审讯结束，若审讯人认为交代属实，情节也平淡无奇，这时应提出种种反问，以便使事情的来龙去脉更清楚、更完整。经过澄清，证实怀疑对象是无辜的，第二次审讯就不必要了，嫌疑犯即刻释放。

B 报告

除了规定的内容外，报告中应首先包括以下几点：

（1）被审讯人之宗教信仰；

（2）是否属于某一政党或团体；

（3）懂哪些语言。

嫌疑犯交代完毕，不管对其印象如何，决不能发表什么意见；不能说“我对你的交代‘印象’好或坏”。印象会造成致命的错误。

间谍越老练，给人的印象就越好。

一个世界知名的犯罪学家曾说过，给他留下最好印象的人，是个为了得到一笔保险费而将自己所有子女毒死的女人；而给他留下最坏

印象的人，却是个慈善家。

不要对自己不满意的交代轻易下最后的结论。

对疑点和矛盾要逐一分析，如果得到一个合乎逻辑和符合事实的解释，就详细记下，并进行第二次审讯，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同另外的审讯者商榷。

第一次审讯后的检查是很必要的，它对第二次审讯往往很有帮助。

## 三、第二次审讯

如果第一次审讯是由别人进行的，第二次审讯前，要对第一次审讯的情况进行仔细而认真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要尽量保持冷静，以免有意无意地受第一次审讯的影响。

当别的审讯人员向你介绍情况时，往往出现这种现象，即一部分结论是由另一部分结论引申出来的。

审讯人总是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实详加引用，而把次要的弃之不顾。

第一个审讯者已经弄消楚的问题，第二个就无需多加考虑。

每一个因素都要进行权衡和研究。如果交代中最重要的事实被第一个审讯者当做次要的问题对待，第二个审讯者应给予最大注意。

有时，要表面上装出一副失去自我控制的样子，但决不能真正失去自我控制。

对于要害问题决不能兜圈子。

突然的提问和一针见血的结论往往会使对手落入陷阱。

这种突然的袭击尽量不用提问的方式进行，而应用毫不含糊的断言。比如，当肯定某人同德国在某地的领事接触过时，不要问："你在 × 城市去过德国领事馆吗？"而应当问："你最后一次去德国领事馆

的确切日期是哪一天？”

一个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提问，应当突如其来，单刀直入。发问时，注意被审者的反应，观察他的颈部，特别是喉头和眼皮。

如果交代中疑点很多，不要逐一涉及，而应间隔地（跳跃式地）提出，以免嫌疑犯猜到下面要提的问题。

对嫌疑犯进行盘问前，要做全面的心理分析，以便把要问的问题进行合理安排，抓住发问时机。

有的人容易屈服于粗暴，而另外的人却相反。

审讯前，应决定自己选择的方式：粗暴、嘲弄、冷漠、无动于衷、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以便充分利用嫌疑犯的感情因素。

## 四、故事中的故事

在第一次审讯中应注意的事项里，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嫌疑犯在把各种疑点澄清前溜掉。

另外，审讯人应慎重对待我称之为“故事中的故事”的现象。因为一时找不到更加适当的词，姑且这样称之。

一个老练的间谍，当他到达敌国时，在他的交代中总是暗含着一个合乎情理的故事。

试举一例：

审讯一个海员。他交代说是逃出来的，因不愿到德国海军去服役，一直躲藏了八个月。他还说曾进行过抵抗，搞过破坏，等等。后来逃到西班牙，又从西班牙来到葡萄牙。

他的交代简单明了，合情合理。讲的时候振振有词，神态自若，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奇怪的是，一个穷海员，又无工作，竟随身带着五十英镑和二百美元。

一个无工作的海员怎么可以有那么多钱?

他编造说是过去的积蓄。

当然，第一个审讯者不相信这一套。于是，把嫌疑犯关了起来，一直到疑点弄清为止。

这时，“故事中的故事”便出现了。

在强大的压力下，嫌疑犯犹豫再三，终于交代道：“好吧！我不再骗你们了。我说实话，钱是偷来的。”

于是，他就开始讲述一个长长的故事，说明他是如何偷了一个留他过夜的女人。他偷了她的珠宝，然后在黑市上变卖。

从心理上讲，我们很容易相信他的交代，特别是他的交代揭了自己的短。如果审讯人相信了第二种说法，疑点就澄清了，嫌疑犯便可释放了。

一个好的作家，当他在小说中描述派往别国的间谍时，决不会把他们写得完美无缺。

这种使英雄出丑的“故事中的故事”是经常遇到的。根据需要，间谍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扒手、杀人犯或寄生虫。

我们要认真防备这种“故事中的故事”。审讯人经过巨大努力，并确信已经摧垮了嫌疑犯的抗拒，这时犯人往往开始讲述一个损害自己形象的故事。审讯人千万不能轻信这一套；相反，应该把他当做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对待。

弗·杰克逊

1942 年 9 月 5 日



# 第二部分　难民和渗入者



# 第一章　第十三个人

## 一

故事发生在 1940 年 9 月的第一周，即英国远征军残部撤离敦刻尔克、德军开到海峡沿岸以后四个月。天气晴朗，德国兵兴高采烈地唱着《向英格兰进军》这首喜爱的歌曲，透过薄雾隐约看到了海峡对面那块使他们垂涎欲滴的猎物的轮廓。海峡很窄，一个游泳好手足可以泅渡过去。到达对岸只有一步之遥，而德军无坚不摧的坦克部队、自动武器和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群马上就要迈出这一步。对他们来说，这块土地唾手可得。希特勒本人早已审核了他的得意之作：代号为“海狮”的入侵英国的计划。

欧洲大陆谍报人员发来的和空中侦察得到的情报都证实这次入侵已经不可避免：从奥斯坦德至勒阿弗尔沿海一线部署了无数小型舰只，一百六十架轰炸机从挪威调往海峡地区，加来机场上大批轻型战斗机待命出击。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他著名的回忆录第二卷里写的：“9 月 8 日至 10 日，月光和天气对入侵东南沿海有利……”总司令部也认为进攻迫在眉睫。

我在办公室值了一夜班，破晓时起床，伸伸懒腰，打个哈欠，就去刮脸。脸还没有刮完，一个军官走进来。可以看出，他神情激动。

“你的电报。”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把电报凑到窗台旁边，借助熹微的晨光，从密码签名可以看出，是我们一位最努力、最忠诚可靠的谍报人员从欧洲大陆发来的。电文

说:“为执行与德国海狮行动有关的特殊任务，U 型潜艇一艘，载有精心挑选、特殊训练的四名间谍，今天二十一点三十分驶离泽布勒赫前往英国，将于天亮前在 432925 号地图南部海岸标明地点登陆。”

我望了军官一眼，笑着说:

“这么说，有活干了。开始吧！”

我们打开南部海岸地图。看来登陆地点经过精心选择:海滩上一个孤立的凹部被后边高高的山峰挡得严严实实，任何好奇的人都不会注意到它。这是登陆者最理想的藏身之地，但如果派人到山下埋伏起来，这个凹部也可能成为抓获他们的罗网。地图标明，这个地点呈新月形，远离任何村庄，面临大海，只有一条道路通往陆地。

我一面吸烟，一面思考行动方案，而后又同派来和我一起工作的战地保安军官——一名上尉——商量了一下。

“我看情况就是这样，”我说，“这个方案并不复杂，但在黑暗中任何轻而易举的事都会困难重重。我们只要在山脚下布置下哨兵就行了……请看地图，海滩呈漏斗状……我们两人埋伏在漏斗口上，就是这儿。这条路，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条羊肠小道，是海滩的唯一出口，要离开海滩，这是四个间谍的必经之路。”

“需要多少人？”他问道。

“十二个吧。都穿便服，以免惹人注目。”

“带武器吗，先生？”

“当然要带，但是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讲清楚:要抓活的。”

“好吧，先生。”

“每个人都带手电筒，出发前约定信号。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先生。”

“好吧，午夜进入阵地。通知全体人员七点出发，这样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从从容容到达。”

## 二

当我们朝“西大路”走去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下来。在灯火管制中，汽车指示灯微弱的亮光给人以行进在幻境中的印象。没有月光，我们像是被盖在墨水瓶里的蚂蚁一样。我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已经预感到我这个烟瘾极大的人要备受折磨：为了不让火光暴露自己，也许要连续六个小时不能吸烟。我真想在血液里多储存一些尼古丁，在黑暗中又不禁为自己的荒唐想法哑然失笑。我不时看看夜光表：很顺利，照这个速度，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到达阵地。

望着茫茫夜色，一个奇怪的想法油然而生。我脑海里浮现出那张地图和两边各五十英里的海岸轮廓。陆、海两条线汇合在孤立的漏斗形地带。在我的想象中，峻岭两旁的两条线不再是漏斗形的，而是一个张开的铁口，一俟我们进入阵地，铁口立刻合拢。我还想到乘 U 型潜艇向英国海岸驶来的四个间谍：他们是些什么人呢？是甘愿为他们的祖国赴汤蹈火的狂热的爱国者，还是仅仅受过训练、只知道下意识地执行命令的士兵呢？我又想到战地保安部队的这些人。我突然发现，这些去设陷阱的士兵加上上尉正好是十三个人。难道这是什么不祥的征兆[①]吗？

## 三

午夜，我们来到凹部后面的山脚下。我很快走到十二名士兵和上尉旁边，在黑暗中只能看到他们的轮廓。他们在山脚下埋伏好，我命令他们：不准说话；不准吸烟；除非为了自卫，不准开枪。规定的信号

① 据西方迷信说法，“13”是不祥的数字。——译者注

是一旦发现间谍，向离自己最近的同伴亮三下手电。一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开始张开罗网。万籁俱寂，只有偶尔某个士兵绊在什么东西上发出的沉闷声音。我和上尉看着士兵们一个个消失在黑暗中，把漏斗颈封锁起来。一阵脚踏潮湿沙土的声音过后，士兵们各就各位，再听不到一点动静。

寂静……除了大海拍打沙滩发出单调的低语、海浪涌上退下那特有的声音之外，死一般的寂静。从开天辟地到如今，大海就这样一成不变地、单调地涌上退下。这天夜里，时间仿佛凝固起来，每分钟都慢腾腾地走个没完没了。我觉得好像已经过了整整一夜，可远处村庄的教堂才传来一点的钟声：才刚刚一点！我竖起大衣领子，把手深深插到口袋里，双臂紧缩，以抵御海滩潮湿的冷风。不能吸烟，心里尤其难受，我情不自禁地摸摸烟盒，难忍的烟瘾使我心里为之一动。可是，不能！火柴的亮光，燃着的烟头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发现。特别是现在，我猜想那几双敏锐的眼睛正在黑暗中搜索海滩。

时钟慢腾腾地打了两点，钟声渐渐消失在夜空。然后，三点。半小时以后又看了看夜光表：刚刚三点半。我又把表拿到耳边，它分明在滴滴哒哒走着，表没有停，我太性急了。

快四点了，我转向上尉嘟嘟囔囔地说："我的上帝，我真想马上看到手电筒闪……"话未说完，只见手电筒闪了一下、两下、三下。又一个手电筒闪起来，第三个又亮了。在短促的手电光中，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人影，接着又看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影。突然，清楚地传来了格斗的声音，电筒的亮光形成了包围圈。呼喊声、格斗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响成一片。我和上尉刚刚跑到混战的中心，人群就平静下来。十二个得胜的士兵押着垂头丧气、默不作声的俘虏。我想："这太容易了！"我一数：一，二，三。容易确实容易，但少了第四个间谍。

# 四

我深信电报上说的四名间谍是准确无误的。当一个谍报人员冒着风险把一份极其重要的电报发往他国的时候，他对电文都有绝对把握。电报既然说“四个”，那就一定是四个。

但是现在，出奇制胜之后，抓到第四个就比较困难了，特别是夜幕茫茫，只好等天亮再找。也许他蹲在高山和大海之间某个地方，只有靠偶然的幸运才能发现他的藏身之地。我们的行动迅速利落，但是放跑了其中一个，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能够从我们的罗网中逃掉，说明这是个机敏、危险的间谍，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我们阻止敌人进攻的计划受挫。只有一点对我们有利：他没有走远，或许就在海滩，因为唯一的出路已被封锁。

我走到上尉旁边说：“好了，他只有一次逃脱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等到天亮，肯定能抓到他。利用这点时间来看看抓到的这几个吧！”

搜查过这三个人之后，我对德国间谍的印象略好了一点。俘虏们穿着整齐，完全是英国流行的款式；衣服肯定出自某个英国裁缝之手，并且还带有英国一家有名服装店的商标。每人都随身带一些零钱，但数目不大。甚至灰色封皮的外国人身份证也填写得十分得体，并且盖有印章。每人带一部小巧而强大的发报机。

我命令三人拉开距离，然后开始审讯。头两个都是德国人，一个叫瓦尔德伯戈，另一个叫迈厄。他们像大部分德国人那样，尽管在战斗中相当凶猛，但这时却一攻就垮，因为他们知道抗拒也无济于事。他们都勉强地，但相当详细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

还没来得及叫到第三个人，他就主动用英语对我说：“请您跟我谈谈好吗？”

我吃了一惊，随即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脸。他站得笔直，纹丝不动，

只是电筒照到他时才轻轻眨了眨眼。我仔细一看，这显然是个德国人，口音很重，神态慌张。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

他说他不是德国人，而是荷兰人，原不是间谍，能这么快被捕非常高兴，不然也要到他遇到的第一个警察所去投案自首。他机灵地骗过了德国人，假装为他们当间谍，以便来英国参加到盟军方面。说完之后，他神秘地笑了笑。

这类故事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从心里感到厌恶。我钦佩那些敢于赴汤蹈火，被捕后又能勇于承担其后果的正直间谍，而怯懦只能引起人们的鄙视：为了自己免于一死，竟然出卖自己的同伙。当然，他对我们会有些用处。

“你说你是我们这边的人，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几个人登陆的？”

“四个。”

“你敢肯定是四个吗？”

“是的，先生，我敢绝对肯定。有我、瓦尔德伯戈、迈厄和范·德·克彭，一共是四个。”

“范·德·克彭，是个德国名字。”

“不，先生，他和我一样，也是荷兰人。”

果然是四个，电报准确无误。可是，范·德·克彭在哪里呢？或许天亮了他会出来。

## 五

我们继续警戒。五点、六点，时间慢慢蠕动着：这一夜好像没有尽头。终于，一条微弱的亮光在地平线出现，慢慢向平静的海面伸展。很快，海滩上的巨石和人影已经依稀可辨，一刻钟之后，天亮得足可以开始搜索。

我们的士兵排成一行从海滩一端向另一端行进，在若明若暗的晨曦中，一英寸一英寸地搜查海滩、洞穴、坑坎和带刺的灌木丛。我和上尉走在队伍的后边。

我们搜查了这片地方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一无所获，连范·德·克彭的影子都没有。

我喊一声“立定”，叫士兵们回来。来到我们跟前，原来的队形已经有些散乱，但仍然警惕地注视着海滩。真奇怪，范·德·克彭应该在海滩上呀！莫非看到同伙被捕他游回船上去了？这不可能！除了海浪在松软的沙滩上发出单调的声音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下水的声音。莫非他爬上了陡峭的山峰？我往高处望了一眼，便打消了这个想法——就算一只山羊能爬上去，也不会不碰下一块石头或土块而暴露他的行踪。很明显，范·德·克彭就藏在海滩的什么地方。可是，他在哪里呢？

我很恼火，紧握双拳，看了士兵们一眼。天已经亮得能认出人来。我从排头看到排尾，又从排尾看到排头。突然，问题解决了，我不由自主地高声笑起来。

“好狡猾的家伙！”我说。

上尉惊异地看着我问：

“怎么啦？”

“好狡猾的家伙！”我提高嗓门重复说，“你们，士兵们，原地立定！”

全体站好，我转向上尉说：

“请你过来，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

我和上尉向士兵们走去，在每个人面前都停下来端详一下。八个、九个、十个，我们几乎来到队尾。十一个、十二个、十……我停下来，把手放在最后一个人的肩上：“你好，范·德·克彭。”他是第十三个人。

事情已经清楚，他利用当时黑暗中的混乱，插到我们的士兵当中。

如果我们停止搜查，他会留在后边，等汽车一走，就伏到一个地方隐藏起来。真是个顽固而又诡计多端的家伙！

要不是士兵人数正好是十二人，要不是出于迷信我记住了“十三”这个不祥的数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黑暗中走近队伍去默默地清点人数的。一个人的生命就悬在这么一根纤细的线上。

范·德·克彭、迈厄和瓦尔德伯戈都被判处死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时处决三个间谍的唯一案件。第四个人到大战结束一直关押在英国，战后转到荷兰监狱。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范·德·克彭为保全生命尽了一切努力。他辩解说，他是个误入歧途，被诱骗来反对自己原则的青年。他要求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参加盟军开赴前线，使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士死去，在人类、祖国和母亲面前挽回他的名声。但他的哀求毫无用处。

他是个狂热的、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在被处决前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里，请求母亲原谅他，不要为他的死而悲伤。他在信中说：“即使您不理解，我为了伟大的事业和我的元首而死也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在同时写的遗嘱中，他请求母亲卖掉他的财产、照相机、望远镜和其他物品以资助德国红十字会。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并为此被处以极刑，但同时也是一个冷酷而有才干的家伙。他之所以被抓获，只是由于搜捕者当中有一个人迷信。

# 第二章　平安到达

从 1940 年 6 月到 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反攻，英国一直与欧洲大陆隔绝。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男女穿过德国封锁线，越过海峡，到达较为安全的英国。有人是为逃命而来，因为由于种族或政治思想的原因，一旦被盖世太保抓到就会被判刑；还有一些人是受到欺凌心怀不满，等待时机报仇雪恨的爱国青年，他们准备在英国组织抵抗；另一些人是留在敦刻尔克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和其他英国军事人员，也还有一些则是混在难民当中的德国情报机构的特务。

有志者，事竟成。人们挖空心思想出各种逃跑的办法和路线，并且马上付诸实施。1940 年夏天，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法国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誓雪国耻的爱国者。

要奋斗，总有风险。虽然手头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我怀疑每十个逃离祖国的人当中是否能有一个到达英国。那些无名的男女英雄们做出的牺牲和承受的磨难很少为人所知。在和平时期离开亲人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尚且困难重重，在战时情况就更糟：人们不知道能否到达目的地，能否越过敌人设下的种种陷阱，能否对付并不总是那么仁慈的大自然。

从未做过难民的人们——但愿他们永远不做难民——应当对那些勇敢的无名英雄们表示敬意。

让我们回到本章的正题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俘虏们曾经挖很长的地道，或者跳过集中营的铁丝网，甚至穿上女人的衣服化装逃跑。依我看，这是人们想出来的最荒唐的逃跑办法。

一天下午，我刚刚从总部回到办公室，一名助手焦急地对我说：

“你可回来了。有急事等你。”

“又是什么事呀？”我问。

“两个法国人驾机在西苏塞克斯降落。”

“噢。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欧洲大陆的飞机有几千架呢！”

“这架可不一样，”他做了个鬼脸说，“报告上说是他们自己造的飞机！”

“大概他们是莱特兄弟吧。可惜他们早已不在人世，况且也不是法国人。那好吧，你带我去看看这两位勇敢的飞行员。”

“他们乘汽车来，还没有到，大概一小时之内会到的。”

不一会儿，两个人被押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同他们简单谈了一下。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身材瘦削，外表和善，浓密的黑发，蓄有当时有名的罗纳德·科尔曼式的唇髭，长得与那个电影明星有几分相像。他同我握手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想起他的名字属于法国一个古老家族，承袭子爵封号。另一个人岁数要比他大一倍，褐色皮肤，仪表大不相同：个子矮小，身体粗壮，像个地道的农民。他叫马尔赛尔，是子爵的汽车司机，对子爵毕恭毕敬，总是站在子爵后边两步远的地方。每当子爵对他讲话，他总要把头微微低下。

请他们坐下之后，我犹豫片刻，首先让子爵后面的马尔赛尔回答问题。我问了他诸如姓名、住址、宗教信仰、政治思想、所受教育、他父亲的情况等必要的问题之后，就问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当然，这个问题只有子爵才有资格回答，马尔赛尔毕恭毕敬地在后面听着。

他说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重视，1936 年还相当年轻就离开人世。那时他刚刚长大成人。他母亲有亲戚在美国，于是就去

美国探亲，住了好长时间以减轻丧夫的悲哀。一位富有的阿根廷农场主对她一见钟情，不久便向她求婚。子爵深知母亲寡居的痛苦，鼓励母亲再嫁。母亲答应了婚事，并于 1938 年婚后不久随新夫去阿根廷，把从亡夫那里继承的鲁昂和巴黎各处的产业交给独生子——子爵——经营。

战争爆发，他受命在改为坦克部队的法国骑兵部队服役。但是。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不是 1940 年 5 月德国闪电战的对手，隆美尔指挥下的德军坦克师以其高速重型坦克和精良的武器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法国人的抵抗。失败造成一片混乱，法军残部四散奔逃，溃不成军，正如子爵带有讥讽的微笑说的，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争相逃命”。他因为这次溃败心情沮丧，郁郁不乐地返回故里。

虽说法国成为共和国已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子爵的故乡依然保持着不折不扣的封建制度。德军占领当地之后，所有村民和小农场主都把他看成当然的领袖，听从他安排。德军司令科卢戈十分精明，力排众议，使子爵生活习惯免受骚扰，不准任何德军士兵去他的城堡驻扎，不准没收庄园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子爵仍然被看做是绝对的主人。德军司令科卢戈上校甚至因为对他的私人汽车——其中有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汽油供应不足深表歉意。

“你知道，”子爵说，“我没有要求任何这类优待，远非如此。德国佬对我如此敬重，不让我和我的人民同甘共苦，使我很是不快。为此，我曾向科卢戈上校抱怨过。但这位聪明过人的德国军官总是请求原谅。好在人民了解我，我们瞒着敌人把粮食分掉，每个需要的人都得到一点。可是，先生，你知道，这段经历使我困惑，使我悲观失望。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想做一点事情以减轻祖国蒙受的耻辱。可是，做什么呢？”他耸了耸肩膀。

子爵继续说，他擅长飞行，早在战前就取得了非军事飞行员证书。在 1930 年那些幸福而平静的日子里，他常常飞往里维埃拉去玩，有

时还飞往英国观看阿斯科特赛马。现在，不管德国人态度如何殷勤，他总是个阶下囚。一天上午，他垂头丧气、心事重重地向停车房走去，马尔赛尔正在那里擦那辆劳斯莱斯，气缸盖擦拭得银光锃亮。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既然有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什么不能飞往英国？这个想法近乎荒唐，可是他无法摆脱这种固执的念头。他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想法解释给马尔赛尔听，因为他知道，没有助手，孤身一人，无法担当起这样重大的工作。他让司机起誓不对任何人谈及此事。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想起往日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更醉心于实现这个疯狂的计划。他弄到一张去巴黎的通行证，以官方的身份去办公事，而实际是去购买有关制造飞机的书籍。买到书之后，他就努力钻研。一开始，他如坠五里云雾，因为他对三角和数学的知识早已忘掉大半，不得不买更多的书籍以便更好地掌握航空动力学。

他一小时一小时地在想象的世界里遨游。突然，他想到父亲生前的一位老朋友。此人是某大学的数学教授，现已退出教育界，在埃夫勒郊区安度晚年。为了解释突然好学的动机，他对教授谈了自己的打算。老教授虽然不同意子爵的计划，但还是乐于帮助老朋友的儿子。

此后，子爵每星期到埃夫勒郊区去两三次，每次都花几小时研究使人头昏脑涨的余弦、切线和其他神秘的符号。实现目的的强烈愿望使他精力高度集中，几星期之后，他已经是一名颇有造诣的数学家了。

他开始为有一天能飞起来而独立进行演算。到英国海岸的距离是二百五十公里，飞到那里至少需用五十升汽油，再加上百分之五十的备用量。他还要考虑到发动机、机身和燃料的重量以及他和马尔赛尔的体重。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马尔赛尔同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发现“大鸟”飞走，德国人必然要追查同谋。倘若马尔赛尔留下，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可以向你的助手提问题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

“请告诉我，马尔赛尔，你认为子爵的计划怎么样？当时你愿意陪他来英国吗？”

他看了主人一眼，那眼光分明是在征求主人的同意。等子爵点头应允，马尔赛尔才说：

“主人的吩咐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执行。既然主人甘冒生命危险，我怎能不舍命相随呢？”

“你盲目地相信计划会成功吗？”

“我们不是在这里吗？”他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膀说。

“回答得好。”我笑着说，“子爵先生，请你继续讲。”

子爵开始秘密设计飞机构造图，着手绘制机身和机翼的图纸，马尔赛尔则忙于寻找制造飞机的材料。他在阁楼上找到一个装饰用的旧船帆，巧妙地把它张在“家制”飞机的骨架上，还用一块旧台布制成一块盖布，从一辆弃置不用的旧汽车上卸下轮子装在飞机上。好在子爵的城堡里有各种应手的工具，德国人没有察觉他们的阴谋。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大鸟已经初具飞机的形状。他们在车库旁边一个房间里建造，任何人都看不到。除马尔赛尔之外，子爵的用人减少到三个：一个是家里用了二十年的厨师；一个是他的奶母——一个可以在整个城堡走动、成天嘟嘟囔囔埋怨他对这无数房产管理不善的老用人；第三个是年轻的勤杂工，子爵之所以收留他，与其说为了有用，倒不如说是出于怜悯。虽说所有这些人都忠臣不贰，说话不慎事情传到德国人耳朵里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就是子爵把马尔赛尔继续留在身边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他可以若无其事地出入这个房间，说是正在设法把一具煤气发生炉装在汽车上。为了显得更加逼真，他和马尔赛尔确实在往一辆旧汽车上安装

烧煤的装置。

一切都悄悄进行，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五个月后，子爵开始实施他疯狂的计划。他原先朦胧的设想已经变成一只酷似史前鸟类的飞机雏形，只等安装汽缸和油箱，这装起来并不费事。眼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弄到燃料。汽油都已被没收。只允许红十字会和消防队这类有特殊需要的单位使用。子爵不知道如何才能搞到这种必不可少的液体。

离城堡几英里有个加油站，日夜有人警卫。要买通其中的警卫人员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把他和马尔赛尔的生命交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手中；冒险闯进去，两人都会被抓住。他们必须设法避免引起任何怀疑，因为只要对他们的房间一搜查，“家制”飞机就会原形毕露。子爵也不能随便请科卢戈配给他一份汽油：上校是个老奸巨猾的人，肯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多亏埋头苦干的马尔赛尔想出了办法。他建议主人每隔一个月左右举行一次聚合，也许会有不少官员乘汽车前来参加。汽车的主人们寻欢作乐的时候，可以让司机们到用人的房间休息，再请上几个漂亮的姑娘跟司机们周旋。这时候，他——马尔赛尔——带上一只桶和一节橡皮管到汽车旁边，从每个油箱里弄出一点油来，不致引起怀疑。

开始子爵犹豫不决，他不愿意看到祖国的敌人在他的家里寻欢作乐。输掉一场争斗并不算丢脸，而同征服者合作与他的处世哲学和所受教育格格不入。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几星期过去了，仍然一筹莫展，子爵只好同意司机的建议，向科户戈及其下属发出了请帖。

聚会一次又一次地举行，马尔赛尔的汽油储存越来越多。每次从每个油箱里只取五升，大约四个月后他弄到的汽油足够飞越海峡。有一次，一个德国司机突然回来取一件忘在车上的东西，马尔赛尔险些被当场捉住。幸好德国人喝多了酒，没有理会到他蹲在一辆车后边捣鬼。

子爵也经历过千钧一发的时刻，那是在谈到发动机的时候，科卢戈上校夸奖子爵，说他有英国最好的汽车——劳斯莱斯，并且说非要见识见识不可。万幸的是他没有真去看，因为劳斯莱斯发动机已经装到了“家制”飞机上。

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冒险飞行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一个寂静的早晨，天还没亮，子爵和马尔赛尔把奇特的大鸟拉到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事先没有做过试验，要么一次成功，要么永远失败。马达启动了，几分钟才热起来。马尔赛尔先是在后边稳住摇摇晃晃的飞机，而后跳进简易座舱，坐在主人后面。飞机顺着林荫道向前滑行。发动机先是低挡转动，随后带动螺旋桨的主轴达到最大转速。小飞机在坑坑洼洼的大道上颠簸着，速度越来越快。子爵紧握住操纵杆，张起机翼。他屏住了呼吸：这只奇特的史前大鸟几乎到了临起跑道的尽头才腾空而起，轮子碰到了一个矮篱笆。

小飞机继续升高。

大鸟向英国方向飞去，飞行员把速度稳定在差不多每小时五十英里上，高度也从不超过几百英尺。子爵知道，飞得越低，被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并且，正如子爵笑着说的，飞得越高，会摔得越狠。

飞行正常。子爵自如地避开大城镇，看来没有被发现。既没有德国战斗机追击，也没有人鸣枪令其降落。小飞机在勒特波雷尔越过海岸，飞到海峡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一队英国喷火式战斗机迎面飞来。马尔赛尔赶忙掏出一块白布不停地挥动，这是他特意带来准备一旦被发现用来表示和平意图的。喷火式战斗机一直把他们押送到西苏塞克斯皇家空军基地的一条跑道，子爵熟练地驾着小飞机安全着陆。他们达到了目的，获得了自由。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这次壮举十分钦佩，第二天检查过小飞机之后就更加赞叹不已。我不是航空专家，但老实讲，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竟能使这架飞机起飞并保持五十英里的航速。喷火式战斗机的飞行

员们证实了子爵及其仆人的话。刚刚发现这架“空中割草机”（他们诙谐地给它起了这个绰号）在海峡上空摇摇晃晃飞来的时候，英国人还颇费心思，并不清楚希特勒派这么个玩意儿到英国海滩意欲何为。

子爵再次受审，这次单独进行。我几次请他讲述他几乎能够背诵的经历。我问他马尔赛尔作为机械师的才干如何，他说他的仆人在一切工作中都很能干，而且相当利落。当天下午，我请教了皇家空军一位工程技术知识渊博的同事，我知道他仔细查看过这个太古飞行器，对它的临时组装也赞叹不已。作为外行人，我向他提出了一些有关发动机及其性能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我再次同子爵见面。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心中甚是不安。”我点上一支烟说，“在你的讲述中有两三点尚待澄清。第一点，从德国人汽车的油箱里取油的问题。”

“不，”他说，“这工作一直归马尔赛尔负责，我的工作是纠缠住德国军官们。如果我离开，哪怕只离开十分钟，也显得不合情理。”

“我理解这一点。或许你能解释一下，当你和军官们周旋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停在哪里？”

“当然可以！车队先在门廊前停下，军官们下车后，由在台阶下等候的马尔赛尔引去见我，这时司机们则把车开到后院。一直到军官们离开，汽车并排停在仆人们的房子旁边。军官们要走的时候，我按电铃通知马尔赛尔，他再通知司机们把车开到门前去接主人。”

“这么说，从他们来一直到走，你从不亲自到汽车旁边去，对吗？”

“是这样。”

“谢谢你。是劳斯莱斯发动机把你们带到英国来的，你可以谈谈发动机的情况吗？是谁把它卸下来的呢？”

“发动机固定在底盘上，马尔赛尔把固定发动机的螺丝起掉，然后他又造了一个装置把它提起来。发动机太重，没有这个装置我们两

人是无法把它抬起来的。把发动机安在小飞机上以后，我帮他固定好。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马尔赛尔干的。他可真巧。要不是他，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

“你改装过这台发动机吗？”

子爵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改装？”他说，“为什么要改装呢？劳斯莱斯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发动机，这谁都知道。当然，我检查了马尔赛尔把发动机固定在飞机上的螺丝钉。我们两人的性命全靠这些螺丝钉拧得是否牢固。虽说我不怀疑马尔赛尔的才干，但把一切都交给他不够慎重。”

“这我理解！你对发动机熟悉吗？”我心平气和地问。

子爵微微一笑，耸耸肩膀：“懂一点。懂得一般原理，知道它怎样工作，还能搞点小的修理。这方面马尔赛尔是我们的专家。我懂航空动力学，他懂发动机。我们俩分开，一事无成；合到一起，就能飞到英国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谢谢你，子爵先生。我只想知道这些。”

子爵走后，我坐下来整整吸了半小时烟，一直到觉得完全可以第一次单独提审马尔赛尔，才派人把他叫来。他坐在我面前，带着法国农民见到大人物时特有的局促不安看着我。我一声不响地看了他好几分钟，才慢条斯理地开始审问：

“马尔赛尔，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做什么事了？”

“你卖身投靠德国佬，出卖自己的祖国！”

“军官先生，你搞错了，我讨厌德国佬。”

“也许是这样。但是你惜命怕死，不对吗？你欺骗了把你当做朋友和祖国的朋友的子爵。可是想骗我们，没那么容易。”

“我不懂你说的什么，先生。”他的脸变成死灰色。

“马尔赛尔，你听着，有三点使你露了马脚。第一点，发动机。

你从来不曾想到过会有人这样仔细地研究它，对吧？或许你想着陆时它会损坏。我本人在一位专家指导下研究了它。我知道，劳斯莱斯发动机的压缩比相当低，根本不能用于飞机。但是，一个好机械师用特殊的工具可以把它的压缩比提高九到十倍。这台发动机就是这样改装的，对不对？”

“也许子爵先生……”

我马上打断他的话：

“不可能，马尔赛尔。子爵先生不是机械师，对这些东西了解甚少，可是你懂。好吧，现在我们谈第二点。如果没有高辛烷汽油，就不可能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那么，是谁弄到的这种汽油呢？他——子爵——一直在上边忙于同德国军官周旋。正是你弄到的。这种汽油是你的德国朋友用他们汽车的油箱特地为你送去的。”

看来马尔赛尔想和我对视，但马上眨了眨眼，目光垂下去。

“让我们来谈谈第三点。这是一张美丽的法国地图，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路线。你飞过这里，距离一个德国基地只有几公里。然后，在勒特雷波尔，你几乎在另一个德军轰炸机基地上空飞过。在河岸，就在这里，有个高射炮群。但是你慢慢悠悠飞过所有这些地方，没有一声枪响，没有一架梅塞施密特飞机或福克·沃尔夫飞机追击你们。在到达海峡之前，被击落的危险至少出现过十二次，但你们却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德国人知道你们要经过，得到命令放你们通行。”

“德国佬为什么会放两个爱国者逃走呢？”他狡黠地问道。

“马尔赛尔，只有一个爱国者，他就是子爵先生。而另外一个，你，曾是德国佬的特务。请注意，我是说你‘曾是’，因为你得知子爵的计划之后，首先直接汇报给你的朋友们，他们命令你鼓励子爵并且帮助他。如果飞机在飞行中坠毁，那是你命运不佳。可是，如果飞行成功，那么你在英国进行间谍活动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谁会去怀疑一个历

尽艰险来到英国的人呢？对你来说，可惜他们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如此严格地控制所有刚刚到达的每一个人，一直到他证明自己的善意为止。现在，马尔赛尔，你愿意彻底招供，节省我们的时间吗？”

马尔赛尔像个农民一样沉默下来，拒绝招供。尽管证据显然对他不利，但对他的指控仅仅是对情况的推论，所以他从未在英国法庭受审。在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1945 年被送回法国。一天晚上他从监狱解往一个警察所作证，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倒，当场毙命，肇事的司机一直没有查到。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们是不会忘掉叛徒的。

至于子爵，他自愿参加了法国自由力量，在北非英勇作战，并在那里受了伤。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那架荒唐的飞机，但是这架飞机完全有资格同建造飞机并用它飞行的勇敢的先驱们的纪念品一起，在伦敦航空博物馆受到人们的尊敬。

# 第三章　情有可原

在战时进入英国，有如参加私人俱乐部一样麻烦。如果是应人之邀而来，境遇会稍好一些。所有到达英国的人都要登记入册。假如逃亡者来自阿姆斯特丹某区，我们就要查看名册。如果有来自同区的人替他说话，那么新来者获准在英国居留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但是，这并不是说朋友具保可以完全使他高枕无忧。谁能担保对朋友的秘密和内心思想知道得一清二楚呢？所以说，朋友具保对新来者固然大有帮助，但他还必须接受讯问，以便从回答中推断出他来此地的意图。

虽说我在反间谍生涯中成绩卓著，但从不敢夸口说在判断上万无一失。同人打交道不像小孩排画片游戏那么简单。审讯者必须以自己的推断能力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真相，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现实生活中，人往往玄妙莫测。看上去货真价实的懦夫偶尔也会坚强无比，勇士也有软弱的时候。当试图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证实他的动机和行为相符的时候，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下面要讲的故事是对我本人的褒贬：我竭尽全部智慧和技术知识指望弄清真相，但到头来却大错特错。

有一次，来自加拿大的一艘联合城堡公司的轮船在格拉斯哥靠岸，运来至少八百名各国难民：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甚至还有一些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将军胜利后飞往法国的共产党人。必须把他们一一甄别，以便发给他们在联合王国登岸的身份证明。用专用列车把

这些人统统送到伦敦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于是决定采取“就地受理”的办法。

为了甄别这批难民，我受命带领一个七人审查组前往格拉斯哥。这七个人都是我的学生。在我们到达之前，船员可以上岸，所有外国乘客只能待在船上，以最大的耐心等待我到来。除了守卫在舷梯和其他战略位置的军事警卫人员，任何人不得上船。

经过慢腾腾的、令人难受的战时火车旅行到达格拉斯哥之后，我在一节灯光暗淡的车厢里研究了按国籍排列的乘客名单，起草又快又保险的甄别难民的方案。我想首先应当解脱那些非嫌疑犯。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船上有一批在加拿大“荷兰自由力量”总部训练过的战士。

这批人在出示警方发的身份证，并由陪同他们的军官作证之后，就首先得以解脱。然后，我们着手处理复杂的情况。

首先要处理的是那些真正的嫌疑犯。每个从自己的国土飞来、在英国居住的自由政府臣民都带来一份敌人合作者和德国政权同情者的男女的名单。我把手头这份名单的复制件同难民名单对照，就不难查出一些人的名字，把这些人一一找出来，押送到伦敦爱国学校去根据情况处理。

最后只剩下那些我们毫不了解或了解甚少的人。前边我已经说过，对审讯者的主要要求之一是仔细检查嫌疑犯的物品，而且必须在审讯之前进行。在别国搞间谍活动一定有同派遣他的人保持联系的手段。除非像我在另一章要谈到的，在一个荒凉地点登陆的瓦尔梯之外，一般不会携带沉重的通讯设备，但可能携带配制密写药水必要的药品——如奎宁——地址本或偷拍重要文件的微型照相机。

我的七人小组一到船上，便在餐厅分头开始工作。经过检查，一批荷兰军事人员很快就拿起行李上岸了。接着，我和副手们让嫌疑犯排好队，由士兵解往伦敦。这样，在第一天午饭时分，我们已经打发走了一半乘客。

真正的工作开始了。每个审讯员坐在餐厅一张长桌旁边仔细检查留下来的乘客。他们都必须把自己所带的物品摊在桌上，接受审问并填写财物清单。如果没有发现疑点，就算通过了初步审查。我从餐厅一头跟到另一头，观察着检查和审讯的进行情况，偶尔在一张桌子前停留一会儿，看看散乱在桌子上的物品，不时听到某个审讯员提到一件可疑的东西或者因对被讯问者的回答不满意而发的议论。

我们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是行家，其中有一个年富力强、精明干练的比利时人。那天下午，我刚刚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再次研究乘客名单，在已经离去的人名字上划上记号，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我说。

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比利时审讯员里奥伯尔特（每个反间谍人员都有代号，在工作期间以代号相称至关重要。比如我的代号是弗兰克·杰克逊。用假名的目的在于，万一某个真正的间谍漏网，他就无法把审讯者的真正身份汇报给他的上司，以丰富他们的档案材料）。

我请里奥伯尔特坐下，递给他一支烟。

“有事吗？”我问，“好像你发现了什么情况，对吧？”

“对，看来是一名间谍。”

“是吗？你把情况谈谈！”

里奥伯尔特说，他刚刚审查了一个叫朱莱斯·弗拉厄斯的比利时人，四十五岁，自称是离比法边境不远的小城市库尔特雷人，职业是侍者，曾在安特卫普“至上”饭店工作。1940 年德国人征用了这家饭店，他被辞退。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里，对一个侍者来说就业机会不多。为了糊口，他几次当短工。不久，他的表兄请他参加了抵抗运动。他所在的抵抗小组由业余成员组成，在战争初期既无训练又无武器对付敌人。

弗拉厄斯带着厌恶的口吻描述秘密活动的同伴们，说他们都是拿战争开玩笑的花花公子。他们每周在一个印刷所聚会两三次（总是在

同一地点开会表明他们毫无经验，抵抗运动的人聚会必须经常变更地点），主要活动是编写并印刷传单，鼓动比利时人反抗德国人的压迫。每个成员都必须在公共场合散发一包传单，或者——这是个大胆的做法——把传单贴到德国人聚居地区附近。“整个计划非常幼稚，”弗拉厄斯说，“但是在战争进展不顺利的日子里，它有助于保持人们的斗志。”

一天晚上，他按规定八点钟同他的同志们会面（宵禁期间都必须在十点钟以前回家）。当时他正在一家酒吧当洗碗工，顾客多的时候也充任侍者。偏偏那天晚上顾客来往不断，他没能按时到会。

他走到秘密集合地点的大街上已经将近八点半钟，从很远就看到印刷厂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奔驰牌轿车和一辆装甲车，并有两名身穿军装、手持武器的士兵把守。他立刻意识到已经布下罗网，就赶紧躲到阴影里：真是吉星高照，多亏他迟到了。他慌慌张张跑回家里，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更感到后怕。

他预感到面临的危险。盖世太保逮捕了很多甚至全部同志，他们完全有办法使俘虏招供。他被供出来只不过是几小时的问题。小小的房间已经不是安全的藏身之地，敌人正步步紧逼过来，不能耽误时间，必须马上逃走。

问题是：往哪里逃？根据经验，他知道火车站一定被德国兵控制，并且可以肯定，公路已被封锁。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安特卫普，在本地没有亲戚朋友之处可以藏身。他突然想到抵抗运动小组的一个成员说过，比利时几个最优秀的爱国者曾经躲进罗马天主教修道院里，混在参加礼拜的教友之中。修道士们曾经多次帮助英国皇家空军士兵，让他们身穿教服从这个修道院转到那个修道院。盖世太保不敢闯入教堂搜捕身着神职人员衣服的人。

弗拉厄斯是经常做礼拜的天主教徒，认识库尔特雷教堂。他慌忙把必要的东西装进口袋，幸好还找到放在褥子里的一些钱，不敢带箱

子，也不敢把口袋塞得太满，以免引起德国巡逻兵的怀疑。

他用了几乎一个小时做完这些准备工作，还不到宵禁时间。他绕道大街，顺着昏暗的小胡同飞快地向修道院走去。一路上没有被人发觉，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顺利到了目的地。修道院对他不轻易相信，直到问了几个问题，确认他不是德国人派来的间谍，才答应帮助他。

据里奥伯尔特说，弗拉厄斯以后的经历很简单。他在修道院一直藏到风声平静下来，才顺利地到了法国边境，然后到达西班牙边境。修道院所属的教团沿法国公路有几处教堂，他装扮成神职人员，一路上由一两个真正的教友陪伴，安然无恙地通过了德军占领区。有一次一个兴致极好的德国军官用车捎了他们一百五十英里。路上德国军官想用蹩脚的法语同修道士们交谈，他们就用手势告诉他，他们属于沉默教团。军官笑一笑，不再打扰他们。

在西班牙边境，弗拉厄斯脱下教服，同一批难民雇了一名向导带他们穿过山区，到达葡萄牙的里斯本。几星期之后，他终于等到一艘去荷属印度群岛的货船，尔后换乘另一般轮船，同很多人一起到达美国，又换乘火车去加拿大。在加拿大一个营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一次横渡大西洋，来到格拉斯哥。

听里奥伯尔特讲完之后，我沉思了一会儿，回忆了几个情节，说：

“他讲的经历很典型，你为什么怀疑他是间谍呢？”

“我正想谈谈这点，”他回答说，“你还记得他说过在离开库尔特雷之前打过几个月短工吗？可是，除了加拿大钱之外，他还有一百五十英镑、三百美元。”

我轻轻打了声口哨，说：

“真是个难民富翁！他说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他说在‘至上’饭店当了十年侍者，从不肯花掉小费，才攒下这些钱。德国入侵比利时，他把积蓄下的所有比利时钱兑换成了英镑和美元，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要逃往国外的。”

"真有先见之明。"我说，"这不会错。一个饭店职员十年攒下二三百英镑……这笔钱足够在伦敦索霍区开个饭馆。"

"这我同意。但令我吃惊的是，我无法相信他是个侍者。"

"为什么？"

他打了个手势回答说：

"只不过是我的猜想而已。但他确实不像个侍者。一般来说，像他这样的中年侍者，多年伺候人的生活会养成根深蒂固的对人唯唯诺诺的习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当他站着的时候两只胳膊稍稍弯曲，头部微微前倾，说起话来声音很低，从不提高嗓门。可是这个弗拉厄斯却大不相同，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倒像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常常使用侍者不会用的词汇。"

毫无疑问，里奥伯尔特是位行家，他提出异议就说明此人情况确实有待进一步弄清。

"你同他的朋友们谈过吗？"我问道，"难道没有安特卫普或者库尔特雷来的人能提供一些情况吗？"

"我已经问过他，这里是否有人为他作证。他说没有。同行的人当中他不认识任何人。"

"他带的物品中除了英镑和美元之外还有其他可疑的东西吗？"

"据我看没有。"

"那好吧，我可以跟他谈谈吗？"

"当然可以。"

第二天上午，朱莱斯·弗拉厄斯被带到作为我的办公室的客舱。我请他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递给他一支烟，便开始了谈话。他对我讲述了乘船来英国的经历，谈了尚未参战的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情况。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都静静观察他。

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有四十五岁左右，身体单薄，乌黑的头发，

线条清楚，表情淡漠。虽说衣着合身，但显得有些寒促。越是研究他，越觉得坐在我面前的是个受过相当教育、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

我特别注意他的手。这双手细嫩而有力，手掌柔软，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在我看来，完全不是那种成年累月端着热盘子走来走去、在热水里泡着洗餐具的手。

我心里开始同意里奥伯尔特的印象。不管朱莱斯·弗拉厄斯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绝对不是侍者。在几乎半小时的谈话中，我从用法语转为用佛拉芒语，又从用佛拉芒语改为用法语。这两种语言都是比利时最通用的，即使一个受教育不多的比利时人也能流利地使用。弗拉厄斯就是个典型的佛拉芒族名字，而他自称工作多年的安特卫普又是个佛拉芒族城市。我原想他的佛拉芒语一定说得很好，而法语或许要差一些。

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他讲佛拉芒语的时候有点犹豫、结巴，一边说一边寻找合适的词句。很多佛拉芒族人讲法语的时候常常夹杂一些典型的佛拉芒语词汇，但弗拉厄斯从来没有这类语病。我深信不疑，他是法国人，或许是瓦隆人，而绝不像他自称的那样是佛拉芒族人。

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没有问他从比利时出逃的细节。必须在船上审理的案件很多，不能单单为一个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里奥伯尔特和我的印象足以说明弗拉厄斯绝不是他自称的那种人。于是我叫人先把他送往伦敦皇家爱国学校拘留起来，待回去之后再慢慢处理。

在格拉斯哥又用了一两天的时间才甄别完所有乘客，回到伦敦我立刻着手处理外出期间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最后才腾出手来审理朱莱斯·弗拉厄斯一案。他走进我那间没有摆设但很繁忙的办公室。在这里，不知有多少间谍听到宣布关进监狱时，立刻瘫软下来。在反间谍工作中绝不应该坚持某个结论，耐心和冷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要求永远不能忘记。我开始认为，弗拉厄斯是一名间谍。

审讯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我们谈了他在安特卫普“至上”饭店

的工作；谈了他怎样回到库尔特雷；谈了他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还谈了他如何乔装修道士从比利时逃到法国，又从法国逃到西班牙边境。他讲的几乎同初审中对里奥伯尔特讲的一模一样，我没有发现任何相悖之处，只是在某些细节上略有不同，在强调这点或那点上稍有差异。这些都毫不足怪。实际上，每次都讲得不差分毫反而使人生疑，因为这证明受审者事先经过反复演练，对自己的口供熟悉到倒背如流的地步。

我发现他对进修道院之后的情节描绘得有声有色，这使我倾向于相信他确实到过里斯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难民去里斯本，还是一个德国间谍机构的特务愚弄了修道士呢？为此，我决定专门了解他在此以前的经历。战前不久，我曾在安特卫普逗留过几天，还到“至上”饭店拜访过一位朋友。我的记忆力相当好，对这家饭店的一些情况还记得一清二楚。我问弗拉厄斯饭店的餐厅在什么地方，是旋转门还是普通门，到厨房去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还问他餐厅大概有多少张桌子，他做侍者的时候都干些什么。

弗拉厄斯回答得含糊其辞，尽量巧妙地避开我的问题。他说战争开始以来饭店变化很大，厨房又新开了一个门，桌子数目经常增减，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和一路上的艰辛使他记忆力大大减退，如此等等。我已经认定他从来没有在什么饭店当过侍者。姑且不谈他在安特卫普“至上”饭店的职业，他在库尔特雷的经历也不会是真的。他讲不清楚他所在的抵抗小组的领导人，也说不准一共有多少成员：一会儿说十二个，一会儿又说七八个。第一天的下午，我已经断定弗拉厄斯是敌人派来的间谍。审讯之前我又亲自检查过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但和里奥伯尔特一样，除了英镑和美元之外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我还是不相信这笔钱是他自己攒下的。

正如我对里奥伯尔特说过的，不少侍者攒钱准备有朝一日自己开饭馆或酒吧。可是，我根本不相传弗拉厄斯是侍者。就算他是个侍者，

一年的黄金季节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失了业，积蓄很快就会用光。我越来越强烈的印象是，弗拉厄斯的钱来自他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德国情报机构。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我抬起头来，正好和弗拉厄斯惊慌的目光相遇。

我用法语说：

“弗拉厄斯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不相信你讲的这一套。第一，我不相信你是佛拉芒人；第二，我不相信你一生中曾做过侍者；第三，我不相信你的钱是积攒下来的。这场闹剧已经耗费了我不少时间，你现在还不想讲实话吗？”

“我讲的是实话。”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可悲的是你不想变得聪明一些，不想了解我。我敢说，你还不如我更像佛拉芒人，因为你连佛拉芒语都讲不流利！我相信你曾在‘至上’饭店待过一两个晚上，但不是作为侍者，而是作为客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达十年之久的侍者能对厨房和餐厅的每一英寸都了如指掌，能回忆起某些常客喜欢的座位和两张桌子之间的距离。我很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为什么非要用这场哑剧来浪费我宝贵的时间不可呢？快说实话吧。在这个最起码的问题上，你浪费的时间够多的了。”

“我说的是实话。”他还是不改口。

谈话又进行了大约两小时。我还是敲打他经历中的不一致之处；再次指出把抵抗小组成员一会儿说成七八个，一会儿说成十二个，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又故意说佛拉芒语使他摸不着头脑；重新谈“至上”饭店的问题。我还让他用几个卡片口袋表演侍者怎样一次端三个盘子，结果口袋都从他手里滑到地上。尽管事实与他的供词差之千里，他仍然坚持说他讲的是实话。我忍无可忍，只得叫警卫把他带走。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设在伊顿广场的自由比利时政府，找到一个佛拉芒同事，请他到爱国学校找我，还请他查一查罪犯名单中是

否有叫朱莱斯·弗拉厄斯的人。这位朋友来了之后说，他没有查到有关朱莱斯·弗拉厄斯的任何材料。我让人把嫌疑犯带来，由这位朋友用佛拉芒语同他进行一次长谈，谈话以后，比利时朋友说：

“这个人绝对不是佛拉芒族，我敢发誓。”

“你当然会发誓。”我对他做了个鬼脸，然后转向嫌疑犯：

“那么，弗拉斯先生，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这位同事是佛拉芒人，他用你自称的本民族的语言同你谈了这么长时间，听了你的回答。现在他同我一样，也肯定你不是佛拉芒族人。你还有什么说的？”

弗拉厄斯仍然死不改口。我的朋友走了好久，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讲的是实话，完全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

这样又过了几天，简直是在进行一场耐性考验。他不招供我决不罢休，想方设法让他尽快开口。我们的工作开始积压，同事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我决定使一条我从未使用过的计策来突破这位可疑“侍者”的防线。

必须事先声明，这项计划未征得上司的同意。学校归内政部管辖，而内政部的官员在我看来过分宽容。在所有著作中我都明确表示，反对在审讯中采用拷打或其他使犯人身体不适的做法。我总是对嫌疑犯平等相待，请他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并且从不禁止他吸烟。我只在正常时间审讯，而从不通过使对方过度疲劳来摧毁他的意志。但是，战争毕竟不是儿童游戏，为了使某人开口，有时必须装得十分严厉，采取恐吓战术。

前边已经说过，我曾因为把一个嫌疑犯称为“说谎者”而受到内政部的严厉训斥；我还被告知，按照英国法律，被告只有被证明有罪之后才能算是被告。我争辩说，除非使用稍微激烈一些的手段，我们什么也不能证实。

在我漫长的生涯中，为了从嫌疑犯口中得到情报，偶尔也使用纳

尔逊[1]的战术。在某些情况下，唯一奏效的往往是使内政部官员们毛骨悚然的办法。

我认识一位叫弗朗苏瓦斯的比利时小伙子。鉴于他绝对诚实而被爱国学校挑选出来，第二天就要到自由比利时商船队工作。我私下向他详细交代了他应当扮演的角色，让他在审讯开始后五分钟来我办公室。

弗拉厄斯被带进来，我同他谈话消磨时间。五分钟以后有人敲门：弗朗苏瓦斯来了。他和我打过招呼，看了看我的客人说：

“是你呀，朱莱斯·弗拉厄斯？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刚刚从安特卫普德国间谍学校毕业！”

弗拉厄斯像突然受到电击，张着大嘴，两眼痴呆，简直真的疯了。他脸色铁青，大声喊道：

“你胡扯！你是谁呀？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畜牲！”

接着又转向我说：

“我的天，他怎么敢说我是间谍？”

他又回过头去，盯着还用手指着他的弗朗苏瓦斯。他怒不可遏，猛地扑过去掐他的脖子。弗朗苏瓦斯虽说比弗拉厄斯强壮，但猝不及防，被一把椅子绊倒在地。弗拉厄斯扑在他身上，又去掐他的脖子，两人一边骂一边打得难分难解。我无法把两人拉开，只得喊来两名警卫。

屋里平静下来，弗朗苏瓦斯还在摸着被对手抓伤的脖子。我对他说：

“实在对不起。请告诉我，你能在法律面前保证这个人就是弗拉厄斯并且保证他是间谍吗？”

---

① 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1798 年在阿布吉尔海湾击败了运送拿破仑在埃及登陆的海军舰队，第一次突破了海军沿用已久的直线作战战术。——译者注

“当然，先生。”弗朗苏瓦斯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很好，谢谢你的帮助。再次请你原谅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做了个手势让卫兵退出，弗朗苏瓦斯跟着他们走出去，一边走还一边摸着疼痛的脖子。

弗拉厄斯喘着粗气,刚才的愤怒和惊骇使他说不出话来。我乘机说：

“你看你的案情有多严重。原来只是我一个人怀疑你，而现在，我有证人在法律面前发誓说你是间谍。你的案子令人失望，请你回去考虑考虑怎么办。什么时候想讲实话了再来见我！”

一个小时以后，卫兵来告诉我说，弗拉厄斯想找我谈话。我马上命令把他带来。他一进屋，不等我请他坐下就赶紧说：

“我讲实话。我不叫朱莱斯·弗拉厄斯。您说得对，我不是从安特卫普来的，也不是侍者，我是职业医生，名字叫安德烈·维诺特，住在布鲁塞尔。”

我示意他坐下：

“很好，这才像实话。请继续讲下去。”

但是出乎我意料，他不再说话。

一般说来，间谍一旦屈服，总是把知道的一切一股脑儿端出来。然而这个弗拉厄斯，或者维诺特，继续沉默不语。

“说吧！”我设法鼓励他。

“我在布鲁塞尔马蒂斯大街开诊所。”他停了好长时间才说出一句话。

“好，好，讲下去。”

但是，这就是他告诉我的一切。他不再交代任何事情，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反复说他的名字、职业和在布鲁塞尔的住址。我用了两个小时催促他，鼓励他，请求他，都无济于事。他只讲了一点：他确实是难民，逃亡的经过是真实的。总之，我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只能叫人重新把他带回监狱，因为我感到自己的耐心快到尽头了。

我有绝对把握肯定弗拉厄斯是德国人派遣的间谍。他自称是医生，也许是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就用过“间谍医生”这个奇怪的名字，而这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发现以医生为职业的特务。我想，这真是个狡猾的家伙。弗拉厄斯，或者维诺特，不管他叫什么吧，如果得以漏网，特别是如果同我们某个部队发生联系，一定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医生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秘密，活动更加方便。由于职业的关系，医生总是受人尊敬，交际广泛，为人们所信任。很难想象一位医生会是间谍，但这个医生正是一名间谍，并且被我抓住了。

我再次找自由比利时领导人核对，希望他们能有安德烈·维诺特的档案，使我能在这位医生的棺材上钉上最后几颗钉子。自由比利时确实有此人的档案，但这份档案使我脸红！

维诺特被比利时警方称为“堕胎者”。他通过这种非法手术发了大财，把大部分钱存入一家瑞典银行，以备度过以后阴暗的岁月，因为医生一旦越过科学允许的高尚界限，这样的岁月迟早总会到来。果然，德国人入侵比利时之后，命令查封他的诊所，吓得他逃之夭夭。比利时警方和盖世太保都通缉过他，1940 年以来他从未露过面。

这就是我处理的安德烈·维诺特医生案件的结局。我没有理由继续扣留他，只能把他交给自由比利时政府。他们也不能逮捕他，因为在英国逗留期间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在以后几年的战争中，他们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位精明强干的医生的特长，使之为祖国服务，将功赎罪。

好在了解这次丢脸事件的同事为数不多，不至于影响我的声誉。但我本人深知这次错误，并且永志不忘。多年以后演讲的时候，我总是规劝我的学生们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推断，而我自己却曾经犯过屡次告诫别人不要犯的错误。

我曾想这是最后一次听到安德烈·维诺特这个名字了。但是，我

又错了。后来又一次同他有过联系:那是在 1952 年,我的第一本书《反间谍者》问世后几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读了我的书，非常钦佩，一直对我非常崇敬，还说他在法国南部戛纳附近买下了一个庄园，如果我和夫人能前去作客，他将不胜荣幸，云云。

可惜我不能接受他的邀请!

# 第四章　被遗弃的行李

我是荷兰人，但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英伦三岛度过的。不管我对英国的风俗如何尊重，但对某些微妙的民族特点始终无法理解，比如说纪念失败。一些民族纪念自己的胜利，尽力掩盖自己的败绩。在英伦三岛事情却恰恰相反。

所有的学龄儿童都知道征服者威廉1066年入侵英国（请注意“征服者”这个词；如果是别的民族会把威廉称之为“侵略者”或“杂种”，但在英伦三岛，却冠之以“征服者”的头衔）。翻开历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纪念日："波士顿倾茶事件"①——这是使英国人失去美洲殖民地的一系列荒唐怪诞事件的顶峰。一个世纪以后，一位诗人还以不朽的诗句赞颂那惊心动魄的、使英园人疲于奔命的巴拉克拉瓦战役②和六百人奇袭事件③。

20世纪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载入史册的五六个重大事件中，有不列颠战役、阿拉曼战役、开辟第二战线、强渡莱茵河，还有两个失败：敦刻尔克大撤退和阿纳姆战役——尤其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次

---

① 1773年，英国国会规定输入美洲的茶叶一律免付进口税，只抽取小额税项。国会认为，殖民地人民是经不起廉价茶叶的引诱的。同年12月，波士顿人民向茶船袭击，把价值一万八千英镑的茶叶倾入海底。——译者注

②③ 1853年至1856年，以英国和土耳其为一方，以俄国为另一方，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10月13日，英国以快速轻骑突破俄军的巴拉克拉瓦阵地，取得胜利，接着以六百快速轻骑发动奇袭，但这次却遭到惨败，英军死伤百分之七十。——译者注

惨重的失败。

近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年人都会清楚地记得当时一场大灾难如何近在咫尺，只是由于天气的奇迹和仓促应变的天才，二十五万英国远征军在德军闪击战之后才得以撤离大陆。但是，所有的重型装备、坦克、枪支和弹药完全丢入敌手。重新装备军队，正如英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那样，是以后的事。当时既无武器储备，也无后备兵员。

好几个星期的时间，离德国人占领的对岸最近的马加特的防务只不过是海滩上仓促架起的几道铁丝网，加上一名带手枪的中尉和六个志愿兵，其中四个有步枪和子弹，而其他两个手中唯一的武器是棍棒！这就是当时英伦三岛的形势。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防务计划才逐步实施：挖了防坦克壕沟，设置了水泥路障，恢复了海上布雷区，经过训练的部队派往各个口岸。这正是希特勒决定入侵的时刻。虽然后备兵力不足，英国的旋风式战斗驱逐机和喷火式战斗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攻击。这是1941年敦刻尔克大撤退九个月以后，英国重整防务能够进行一次像样的反攻以前的事。

后世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希特勒把“海狮行动”——入侵英国的代号——一再推迟，而选择了空袭。或许他像一个把对手逼到边线的拳击家，在最后的时刻感到无力把对手一拳击倒；或许他认为英国无力抵抗，可以迫使它投降；也可能他等待着建造中的入侵舰队。当他发现英国的防务建设得比他还快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

我个人认为，假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以后的头六个星期派出两三个师横渡狭窄的海峡，就一定能建立一个桥头堡，那么战争的天平就会倾向一边。

希特勒之所以收住脚步，既不是因为犹豫不决，也不是出于对士兵的关怀。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对克里特岛的入侵，他毫无顾忌；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登攻势都表明他对人的死活无动于衷。在我看来，

是因为希特勒没有从西班牙内战汲取经验，组织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一词出自西班牙内战。在一次攻城中一位西班牙将军说，他依靠他的四个纵队和它们的坦克、枪支和士兵，但更主要的是依靠在城内活动的“第五纵队”——他们提供可靠的情报，散布流言瓦解守城部队的士气，使他们觉得形势已毫无指望。

在1940年那些岌岌可危的日子里，尽管官方贴出告示提醒人们“粗心大意的谈话会导致死亡”，或者更空洞一些，“像圣诞老人一样，少说话”，使人忧虑的谣言还是在英国不胫而走，很多故事像干树林里的火灾一样不断蔓延。故事情节各异，但内容大致相同。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司机正安闲地驱车行驶，遇到一个修女请求搭车。司机停车让她进来。走了一会儿，司机想攀谈几句，她捂住嘴表示属于沉默教团。司机偶然看了一眼修女的脚，惊呆了：她穿一双沉重的旅行靴！他一个急刹车，修女赶忙抓住把手以免摔倒。由于动作太猛，她的袖子撕破了，露出毛茸茸的男人胳膊。倒霉的司机恍然大悟：这是个空降伞兵。如果司机采取仇视态度，也许他就完了。他吓得不敢动弹，乘“修女”心不在焉的时候，熄了火，车停了。他又装作很恼火的样子摇摇头，做个手势让“她”下车，然后把帽子往上推一推，就要修理。“修女”刚下车，司机立刻开动马达，全速飞驰，以免遭到射击——“修女”的衣服下面肯定藏着子弹上膛的袖珍手枪。

不用说，我从未遇到过有类似经历的司机，但有好几个星期，我一次又一次地听人转述这个故事，说是他“朋友的朋友”亲自碰到的。

驻扎在英国南部肯特和苏塞克斯的加拿大部队中，另一个故事广泛流传。这件事似乎发生在圣诞节前夕，士兵们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庆祝。像一切远离家园的闲少爷们一样，他们和当地姑娘们任意胡调。在布赖顿一线，所有掩体都由加拿大士兵防守。突然，一艘船在海滩靠岸，从船上走下一队德国士兵，小心翼翼地把铁丝网弄开一个缺口，穿过布雷区，不慌不忙地走到掩体里，彬彬有礼地请加拿大士兵们出

来排好队。姑娘们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谁都不敢高声呼救。挑选了一定数目的俘虏之后，德国人还是那么若无其事地回到船上，悄悄顺着海峡开走了，留下那些失恋的小伙子们去传播这个消息。

在其光辉著作《1940 年的入侵》一书中，伯特 · 福莱明先生以讽刺的笔调讲述了在英国迅速流传的这类故事，其中说得活灵活现的是，德国入侵失败，在东部或南部海岸被烧焦了的德军尸体不翼而飞。谁要想了解这些事情，或者年岁较大的人想重温这类故事，不妨读一读此书，一定会发现其中的批评语气。

总之，我可以说，不管谣言如何流传，不管“哈哈先生”们发表如何耸人听闻的言论，英国人在战争的任何时刻都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作为外国人，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内心在想什么。英国人总是举止斯文，从不轻易表露出惊恐或恼怒。也许由于过分温和，他们从来想象不到会被别人，特别是会被海峡对面的外国人打败。这种想法使他们更加相信，英国人是不可战胜的。既然近千年来他们抵挡住多次入侵，那么今后也永远不会被征服。

鉴于以上原因，虽然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早在战前就竭力网罗一个同情纳粹事业的友好阶层，虽然几个身居高位的角色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后还妄图建立英德友好关系，但是在英国从未形成一个真正的第五纵队。这也许是 18-B 国家安全法发挥了作用，这项法律规定政府有权不经正式审讯而监禁一切对纳粹制度表示同情的人。在英国，不经审讯而监禁是外人唾骂的做法，但对无望的病症只能下重药医治。

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在投靠希特勒之前是个香槟酒推销员，后来被提升到纳粹党的最高职位，战后作为战犯受审并处以极刑。他未能正确地理解英国人的特性，他对希特勒说，只要德国人一到，英国人就会像熟透了的梅子一样自己掉下来，但是，英国人的温和渐渐使他失望了。

在内阁会议讨论外国问题的时候，经常打盹的首相斯坦莱·鲍尔温先生作过一次著名的演说，他说道："炸弹不会不爆炸的！"他和总是身穿尖领衬衫、带一把雨伞以象征和平的张伯伦一样厚颜无耻地跑遍整个欧洲，同希特勒和口若悬河的墨索里尼拉关系。数以十万计的男女参加了和平信誓同盟以期建立世界和平。在新首相的摇篮牛津，这个同盟辩论过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说，它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亲王们和民族而战，最后，决议案案以压倒多数通过。有一次，丘吉尔高声喊道："他把我们的人民当成什么人了？"

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说，英伦三岛就像纸牌搭成的、行将倒塌的城堡。他这番话也无可非议，因为比他高明得多的人都错误地把宽容、冷漠同无所作为混为一谈。

我们都知道，德国间谍机构虽然没有成功，但它确实早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前就力图在伦敦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谍报中心，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就证明这一点。

请读者原谅，尽管本书的绪言已经很长，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看过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精心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反间谍者》的人，都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间谍工作都归功于一人——我。

把一个几星期处理的案件压缩成三十分钟的节目播出，势必要省略很多细节和次要的事实。也许我直接参与处理的某个案件从提审嫌疑犯到分析口供都由我一人负责，但更多的案件的侦破，特别是"被遗弃的行李"一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所做的只是进行第一次审讯，然后交给我的同事，由他们审问两三次后，案件又回到我的手里。

有时审讯人对某一案件过分熟悉，经过几小时、几天，甚至几星期的审讯，精力都集中在某个情节上，结果钻了牛角尖，不知不觉地放过了关键的一点，而另一个头脑清新的审讯者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抓

到这一点。有时审讯的战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过分坚持某一指控会引起嫌疑犯顽固的抗拒。在第二次审讯中采用更和蔼可亲的战术可能立即见效，甚至仅仅改换审讯人也可以产生较好的效果。嫌疑犯还可能对某类人有天生的反感，只要由这类人审讯，他就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回避关键问题。如果换一个审讯者，他可能会立刻改变态度。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一天，一个名叫韦尔纳·瓦尔梯的人被带到我的办公室，他在爱丁堡铁路总站被捕，有关他的报告令人震惊。

被捕的那天清早，瓦尔梯步行到班芙什阿铁路支线一个叫巴克浦的小车站，想乘车前往阿伯丁。到阿伯丁的火车刚刚开走，有人劝他到几英里外的巴基赶乘另一路火车，于是带着明显的外国人口音的瓦尔梯提着他咖啡色的大箱子和一个小旅行箱边走边打听到了巴基，赶上了十点零四分的火车到达阿伯丁，换车以后，于下午五点到达爱丁堡。在爱丁堡，他找到一个叫卡麦隆的车站人员，说他要去伦敦。

卡麦隆劝他把大箱子存放在行李寄存处，吃点东西，到市区溜达溜达，然后回来乘二十二点开往伦敦的火车（战争期间，灯火管制，又常有空袭，旅行是烦人而又不安全的）。瓦尔梯接受了他的劝告，把大箱子寄存在车站。

到这时为止，至少有四个人同瓦尔梯有过接触并看到过他的大箱子：巴克浦和巴基的警卫人员、卡麦隆和爱丁堡车站行李寄存处的职员。似乎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箱子是湿的，或者，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没有想到这个外国口音很重的带箱子的人有什么可疑之处。

看过车站的时刻表，瓦尔梯悠闲自在地走到爱丁堡中心，刮了刮脸．然后像所有消磨时光的旅客一样进了一家电影院。二十一点，他准时返回车站。

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个多事的紧张的上午。哨兵在巴基海滩巡逻，

发现离岸不远的海里漂着一只橡皮艇，这位好奇的士兵游过去把船拖到岸上。那是一只他从没有见过的折叠船：船上一根橡皮管连着一个压缩空气瓶，显然是用来为橡皮艇迅速充气的；船边还有一个放气的阀门，阀门盖已经松动，但还没有打开，看来弃船的人非常慌乱，没有发现事情没有做好——本来应当把船沉入海底，他却把它留在了水面上。这是瓦尔梯留下的第一个证据。海岸哨兵警觉起来，仔细检查小船，发现船的内侧印有一些字，估计是德文。他感到事情严重，慌忙跑回哨所，打电话通知警察。

按哨兵提供的线索，警察赶到火车站，车站卫兵说早晨来过一个外国人，但已经前往巴基。在巴基，一个军官说确实看到一个像警察说的人，但已乘车去阿伯丁。后来又从阿伯丁到了爱丁堡，这里的追捕工作由一名叫麦克内尔的警官负责。麦克内尔赶到火车站马上进行调查，开始毫无头绪，因为数以百计的人来来往往，任何人都不会引起车站人员的好奇心。麦克内尔毕竟是位老练的警官，他找到了卡麦隆，卡麦隆对他说：

“不到一刻钟以前，一位口音很重的外国人路过这里，把一个大箱子放在行李寄存处，说二十一点来取。”

麦克内尔马上赶到行李寄存处，出示了证件，取出箱子。他看到箱子还湿淋淋的，二话没说就把它撬开，里边的东西证实了警察的怀疑：一部体积很小但威力强大的收发报机、几节备用电池、电子管、一套电话设备和一部摩尔斯发报机。海水浸湿了箱子表面，里面没有受潮。除此之外，有一个用德文写的地址本和一本书，书上印有一些德文句子和密码符号，还有一大一小两张圆硬纸片，纸片四周是一系列的字母。

麦克内尔一边思考一边重新把箱子关好，他无法查遍整个爱丁堡市，去搜捕一个连长相都描绘不出来的外国人。唯一的办法是等待，因为行李寄存处说此人肯定会回来取箱子。卡麦隆也留下来，以便箱

子的主人一露面他就能认出来.

二十一点整，瓦尔梯出现了。他走到卡麦隆跟前，拿出存物证说：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休息一下吗？”

就在这时候，两名身强力壮的警察轻轻走进来，一下子拧住瓦尔梯的两只胳膊。瓦尔梯猛地挣脱右臂，把手伸向口袋，但麦克内尔马上抓住他的手，并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顶上火的自动手枪，弹夹上还有五粒子弹。

瓦尔梯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被带到一个房间搜查。从他身上搜出一百九十五英镑，几枚英国银币，一枚挪威镍币，一个指南针，一本德国翻印的十一页的英国地图，一份瑞士护照，这些东西都统统包在一个德国制的皮包里。另外，他还带有一个身份证，上面写着：

“伦敦西区　苏塞克斯公园路 23 号　韦尔纳 · 瓦尔梯”

麦克内尔正式逮捕了他，并通知说，他的一切供词都将记录在案作为证据。这时瓦尔梯喊起来：

“我不是德国人，是瑞士人！”

他以非法入境罪被带往当地警察所看管，听候审讯。

这里我必须打断一下我的故事，以便重申我曾在另一本书的前言中提到的，过分相信第三者的证词和对案件的描述的危险性。每个反间谍人员都必须写出简略的、客观的案情报告，并且在表述意见或判断时应当特别强调这仅仅是个人的看法。在实际中，做到这样完美无缺十分困难。经验最丰富的老手们也说：“学者之间也会有意见分歧。”如果把同样的材料交给两个训练有素、阅历颇深的审讯者．他们也可能想法各异。

在开始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审讯者总是下意识地根据手头的证据形成自己的看法，断定嫌疑犯有罪或无辜。当审讯者撰写报告的时候，他可能天真地、以对自己意见有利的方式陈述事实，使尚未落进自己理论框框的人信服。这绝不是说有良心的审讯员故意歪曲事实以

达到某种目的，而是因为人的本性是脆弱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看法正确。

这就是为什么审讯要由一个审判团来进行，并且由他们一起讨论决定的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每逢需要看前边审讯人员的报告，我总是把精力集中到确定了的事实上，而对任何人提出的看法都不去理会。

说到这里，读者就会理解为什么审讯如此费力劳神。对瓦尔梯不利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的。虽说嫌疑犯一直到现在尚未承认他是乘橡皮艇到达苏格兰的，但一切证据都对他不利。一个目击者在离发现橡皮艇的海滩一二英里的地点看到过他。即使他能把到巴基的理由解释得天衣无缝，任何人都会同意二加二等于四。

他也不能否认深色大箱子是他的行李，因为存取物品单上的号码同箱子上标签的号码一致。当警官麦克内尔撬开箱子的时候，有两个目击者在场亲眼看到箱内的物品，所以瓦尔梯不能声称这是预谋陷害。除了证据之外，他被捕时的反应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不会在口袋里带有子弹上膛的手枪；即便是偶然在口袋里发现手枪，也会交给他找到的第一个警察所，并且也不会试图用它拒捕。

毫无疑问，瓦尔梯有罪。但是什么罪呢？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德国空军正在退却，戈林的空军改为晚上轰炸，伦敦等工业中心已经尝到德国炸弹的滋味。必须刻不容缓地了解瓦尔梯知道的一切。在同一天，另外两名德国间谍嫌疑犯（一男一女）也在苏格兰被抓获。他们是怎么来的？是受德国谍报机构之命而来，还是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尖兵？还要弄清楚他们是头一批呢，还是有比他们更机敏更幸运的人早已破网而入了呢？……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假若瓦尔梯当初细心地打开橡皮艇放气阀的螺丝帽，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取走箱子，乘车前往伦敦而不被察觉。

我们竭力想办法让他坦率地承认是德国间谍。即便在战争最糟糕

的日子里，英国法院仍然严格要求对间谍秘密审讯之后必须由被告出庭证明自己有罪或无辜，单凭反间谍机构提出指控不足以定罪，至少要有一份被告的书面证词或供状。

这就是 1940 年那个潮湿惨淡的上午瓦尔梯被押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全部想法。瓦尔梯高矮适中，身材消瘦，面孔微黑，头发呈黑色，看上去三十来岁。

我让警卫到外边守候，请瓦尔梯坐下，递上一支烟，他慌忙拒绝了。他双肩微微前倾，神情忧虑，不像个很危险的人物。有时候间谍并没有阴险的外表，这是借以混在人群之中的特殊本领，这种本领说明他更危险。

“瓦尔梯先生，”我用德语说，“我担心你的处境很困难，很麻烦。你乘一个橡皮艇来到苏格兰，随身带有全套间谍用具和顶上火的枪支，除此之外，还有一套地图和一本密码，警察逮捕你的时候你企图拒捕。你的行为不能证明你无辜，是不是这样？除非你能说服我，证明这是虚假的表面现象，否则我就只能断定你为德国间谍。”

“你错了！”瓦尔梯喊道，“我不是敌人的间谍，我住在英国！”

“可是被捕的时候你明明说是瑞士人。”

“对，我出生在瑞士的苏黎世，但我登记的是英国国籍。没有一个德国间谍会保持英国国籍，你说不是吗？”

我不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在他皮包里的证件中寻找破绽。

“对，你确实有英国身份证。我看上边写着你住在苏塞克斯公园街。你喜欢住在那个地方吗？”

“喜欢。”他笑着说，“那地方很好！”

“你不讨厌火车的声音吗？”

瓦尔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懂你的意思。”

“瓦尔梯先生，苏塞克斯公园并不名副其实，它不是乡村街道，

而是离一个大火车站不远的街道，你能告诉我这个车站的名字吗？”

“非常抱歉，我搬到那里不久，英语说得也不好，从没有听说过这个车站。”

“好吧，让我讲给你听。火车站的名字是巴廷冬。苏塞克斯同时又是一条很长的铁路的名字，两端各有一条与它垂直的铁路。这两条平行的铁路和苏塞克斯正好形成一个‘H’字，苏塞克斯公园正好处在这个字母中间的一横上，要去苏塞克斯公园必须通过两条铁路中的一条。你能说出这两条铁路线的名字吗？”

瓦尔梯摇头说：

“不知道。”

“东边一条叫爱德维尔，西边那条叫韦斯本·太若斯。瓦尔梯先生，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清白无辜，那就太好了。现在我们仔细看看你的身份证。你看得出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

他看了看说：

“没有。”

“可是我看得出来。当然，它的颜色同外国人身份证一样——灰色，制作的材料也完全相同，可惜填写号码的人有点粗心。你看这个‘1’字，这一竖有多么长，再看这个‘7’字，中间有一小横。在欧洲大陆，人们习惯于在‘1’字上边带一小弯，并把一竖写得很长。为了避免混淆，大陆人在‘7’字的竖线上加一小横。你生在大陆，在大陆受教育，不会不了解这一点。看来你不知道在英国却不相同，我们没有把数字的一竖写那么长的习惯，当然也就用不着区分‘1’和‘7’。瓦尔梯先生，不管怎么说，你的身份证不是由英国官员填写的。”

瓦尔梯没有回答，一动不动坐在我面前，盯着桌子，眼皮抬也不抬一下，但太阳穴上的肌肉规律地颤动着。我一直以讥讽的口吻同他谈话，现在口气缓和下来，显出一点同情。已经很清楚，这是一个德国间谍，而我却对他产生一点莫名其妙的怜悯。他的处境相当困难，

性格也不那么死硬。

“瓦尔梯先生，”我和颜悦色地说，“我看你不像个不诚实的人，没有撒谎的习惯。为什么不说实话呢？说了实话也好减轻沉重的心情。”

“要是我说了实话会怎么样呢？”他考虑了一会儿问道，“能饶我一命吗？”

“在英国，不由我们决定敌国间谍的命运。只有法庭和陪审团才有权判决。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彻底招供绝不会使案情更严重，而只能使案情更简单。”

“这是什么意思？”

“证据对你不利，你带的一切东西都证明你居心不良。那些德国印制的地图、密码本、德国皮包，也都对你不利。为什么呢？如果你出庭受审，肯定被判预谋间谍罪。我什么也不能许诺你，但是如果你同我们合作，讲出一切事实真相，法庭会考虑到你的话的。”

瓦尔梯沉默了好长时间，才看了我一眼，问道：

“对间谍的惩罚是什么？”

“死刑。”

“如果同你们合作，我能保全性命吗？”

“也许。但我不能答应你任何事情。判决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职责。”

又沉默了两三分钟。看来瓦尔梯不是个乐于冒险的人，对应不应该试验一下这最后一次机会举棋不定。我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看到他干咽了一口唾沫：瓦尔梯要屈服了。

“好吧，”他话说得很快，“我什么都交代。你会看得出来，我不是英国的敌人，现在的处境是别人强加给我的。”

瓦尔梯说得又快又不连贯，很难听清。他说他原是经营羊毛的瑞士企业家，作为一个中立者，在德国人入侵比利时以后他还一直同比利时做生意。同他贸易关系密切的安特卫普一家公司的老板是两个犹太兄弟，他们对德国人的迫害胆战心惊，请求瓦尔梯帮助。

由于是外国人，瓦尔梯享有一定的优待，加之里尔河两岸有几个主顾，于是决定帮助他们逃到边境城市库尔特雷附近，当天夜里他们就能越过边界前往法国。

他返回安特卫普饭店，打开房间的门：里边竟有三名盖世太保！三个人围上来一阵拳打脚踢，说他帮助犹太叛徒，是帝国的敌人。他一下子完全明白了，两个犹太人已经被捕并且供出了他。盖世太保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威胁说要把他送到德国受审，处以极刑或长期监禁。但有一条出路：同德国人合作。

德国军队正准备入侵英国，虽然估计不会遇到多大困难，但还是设法向英国派遣谍报人员以搜集更多的情报。瓦尔梯的任务很简单：把一只箱子带往英国，在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交给指定的人，而后瓦尔梯就可以匿影藏形，等待德国军队开进英伦三岛。在此期间，他会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盖世太保一再说，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了。瓦尔梯虽不那么勇敢，也还不算愚蠢。既然任务如此易如反掌，为什么盖世太保不派自己的人去呢？盖世太保回答说，瓦尔梯没有资格争辩，要么同他们合作，要么作为帝国的敌人受审。他选择哪一条路？

瓦尔梯别无他法，只好同意前往英国，可是要求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看来他害怕是爆炸物，唯恐让他把炸药带给伦敦的破坏分子。盖世太保说箱子里没有任何危险物品，并且几天之后真的让他看了箱子里的东西。

这时候我打断他的话说：

“有一点请你讲清楚。我相信我了解这两个硬纸圆盘的用途，不过希望你证实一下我的判断。是密码，对不对？”

“对，”他说，“这个办法相当简单，但别出心裁。两个盘子中心都有一个小孔，用一根针或一个螺丝钉串起来，使小盘在大盘上转动。德国人说每天换一套新密码。比方说‘NL’，即以小盘边上的‘N’对准大盘边上的‘L’，上下两盘的其他字母都自然相应对准，只要用

大盘的字母代替小盘的相应字母就可以发报了。”

“对，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你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很高兴。请接着讲。”

瓦尔梯继续说，他曾想被捕一两天之后就会被派走，但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让他待命。有一两次他接到通知第二天出发，但最后一分钟命令又被取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心情苦闷，因为他知道，同盖世太保的说法相反，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差事，在安特卫普度过一天就是他生命延长一天，最好是发生某种不测事件无限推迟行期。

瓦尔梯答应去英国以后没有再受虐待，还住在盖世太保总部，偶尔也能出去走走，只是必须由便衣警察陪同。

有一天，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把他送到挪威的奥斯陆，那里有两个“志愿者”（一男一女）将同他结伴同行。他们在奥斯陆待了大概一个星期（因为极度恐慌他失去了时间概念），一天晚上突然通知他们立即准备，一小时以后出发。三个人被带到一个港湾，登上一架巨型水上飞机，飞机立即起飞。在空中，德国谍报机构的一名军官说，飞机上有两个橡皮艇，大的供夫妇乘坐，小的由瓦尔梯使用。如果海上风平浪静，飞机就按计划在离苏格兰海岸一两海里的水面降落，先放下大艇，后放下瓦尔梯单独乘坐的小艇。他的艇上有一对船桨和供他到达海岸的其他用具，上岸时他必须注意把橡皮艇放气，使之沉没。

飞行中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水上飞机在苏格兰海岸附近首先放下那对夫妇，一会儿又停下来让瓦尔梯带上大箱子和装有随身物品的小手提箱下去坐进橡皮艇，军官又嘟嘟囔囔重复了一遍对瓦尔梯的指示，飞机就飞离了小艇。

瓦尔梯划船前进。小艇一度失去平衡，晃动得很厉害。幸好是顺潮，瓦尔梯才能勉强向海岸靠近。不一会儿，巨型水上飞机消失在黑暗中了。

天还没亮，橡皮艇摇摇晃晃地到了海滩。船里进了水，大皮箱湿了。

瓦尔梯知道离最近的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不想把鞋也弄湿，就把船尽量划得靠近海滩，跳上岸去，用桨把船拉过来，卸下两只箱子，拧开放气螺帽。他又冷又怕，手指发抖，不想在这充满危险的荒凉海滩上过多停留，所以刚刚似乎听到气门吱吱的放气声便把小船推入水中，提起两只箱子飞快地向陆地走去。

这时我打断他的话：

“谢谢你，讲得很清楚。后来的经过我已经知道。瓦尔梯先生，请告诉我，你乘车到伦敦来的任务是什么？”

“我记得已经谈过这点。到伦敦之后到维多利亚火车站找一个人。”

“怎样认出那个人呢？”

“他穿一件灰色带红条纹的西服。”

“穿灰色西服的人太多了。”

“这个人额上有块伤疤。”

“噢。怎样对暗号呢？”

“我说‘我从格拉斯哥来’。”

“很好，谢谢你，瓦尔梯先生。我们的谈话暂时到此为止。你一定也累了，想休息一下了，咱们以后再谈。”

“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弄清问题。你看，我从不愿为敌人效力，是被迫给他们办事的。我根本就没有想把箱子交给维多利亚车站的那个人，打算把它扔掉了事。”

“我知道了。这件事很有意思，回头我们再谈。”

让人把瓦尔梯带走之后，我和同事们研究了“格拉斯哥人”的问题。根据上次审讯中瓦尔梯提供的情况，警察已严密控制维多利亚车站，但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如此，控制仍不放松。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当真相开始出现的时候，审讯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仓促行事会把线团搞乱，找不到关键的一环。弄清真相如同剥葱头一样，看上去已经剥下了最后一层，其实里面还有一层。

瓦尔梯交代的经历尚有不少模糊之处，我心里还感到某种不满足。真相大概在他的证件之中，应当仔细研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终于找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叫人把瓦尔梯带来。他坐下以后卫兵退了出去。我说：

“我们开门见山地谈吧。你说在安特卫普遭到逮捕之后被迫为敌人工作；承认自己了解箱子里装的什么；打算到伦敦以后扔掉箱子隐蔽起来，不想把它交给额上有伤疤的人。这就是你交代的大致内容，对吗？”

瓦尔梯点头同意。

“那么，瓦尔梯先生，你为什么没有把箱子扔到海里呢？或者，为什么没有把它交给警察呢？事实恰恰相反，你把它带到了爱丁堡，放在行李寄存处，后来又回去取它。这说明你的目的是把它带往伦敦。这一切都使我相信，你想把箱子交给接线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接线人的话。或者这套收发报机就是供你本人使用的，因为你说过，知道怎样使用它。”

瓦尔梯犹豫了一下说：

“我怕盖世太保报复，有人监视着我。我发誓，确实打算到伦敦之后扔掉箱子。”

“可是，如果把箱子交到最近的警察所，你就会逃出盖世太保的魔掌。盖世太保的手的确伸得很长，但也不至于长到这种程度。”

“我原来没有想到这点。”他说。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点——手枪。既然你对英国人民怀有如此良好的愿望，口袋里为什么装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呢？”

“我……我把它忘了。下飞机的时候他们才把枪交给我，在慌乱中我把它装在口袋里就忘记了，更不知道枪已经顶上火。”

“忘了？一支手枪差不多有一公斤重，在你右边口袋里装了整整

一天，走了好几英里路，你竟然发现不了？这太离奇了，瓦尔梯先生。”

“可能显得离奇，但这是真话。”他闪出一丝不信任的目光。

“好吧，就算我同意你说的把枪忘记了，那么，你怎么又想起用它拒捕呢？”

他沉默了半分钟才说：

“大概当时头脑发昏了。”

我耸了耸肩膀说：

“这令人难以置信。好吧，我们暂且不谈它。你不是说你在苏黎世住过吗？”

“对。”

“你说你是因为帮助两个犹太朋友逃跑而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捕的？”

“对。”

“我手里这份护照——瑞士护照——是你本人的？”

“是的。”

“那么请你回答：为什么这份护照——你本人的护照——上边没有进入比利时的海关印章？”

这就是瓦尔梯案件的结局。尽管他如何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否认是敌人的间谍，说是被迫为别人带东西，但对这个问题始终无法回答。我们一直没有弄清他到底是瑞士公民还是德国人，但无论如何，他讲述的漏洞百出的经历使他无法脱逃。固然橡皮艇提供了他来到苏格兰的线索而导致他被捕，但我认为，即使橡皮艇未被发现他也难逃罗网。

韦尔纳·瓦尔梯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按照对待严重间谍案的惯例，总检察长——后来成为勋爵的威廉·约维特——命令继续审判。审判进行了一天多，法庭判决“有罪”。后来瓦尔梯被处决。

# 第五章　谨慎过分

## 一

大部分德国人有“Grüundlichkeit”的癖好。这个德文词可以译作“谨慎”，或者更通俗一点，译成“面面俱到”。学者们总是说细心就是才干，可是据我的经验，过分小心可能致人死命。下边我就要讲述一个过分谨慎导致不幸的案件。

阿尔丰斯·露易丝·昂冈尼·蒂莫芒斯，比利时人。三十七岁，单身汉，鱼商。其外表也像典型的常和大海打交道的人：粗犷，健壮，蓝眼睛，头发又密又光滑，穿着简朴，双手灵巧，虽说不算十分聪明，但性格颇为诙谐。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地的码头上比比皆是。

在这乱世之秋，他的经历不比其外表更复杂。德国人占领比利时以后，他决定前往英国的布里克萨姆自由商船队工作。他穿过被占领的法国到了维希，又继续南行到达比利牛斯山脉。像所有海员一样，他善于自己照料自己，穿过山区，到达西班牙。不幸的是他在西班牙被捕入狱，在巴塞罗纳一间肮脏的牢房里关了几天，一直到比利时领事馆出面干涉，经过百般营救才获释放。他又从巴塞罗纳到里斯本，驻里斯本领事把他的名字填写在等待购买去英国船票的长长的难民名单后面。蒂莫芒斯年轻力壮，是个有用的人，所以优先得到船票。他1942年4月到达英国，被送到克拉彭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做例行审查。

蒂莫芒斯是比利时人，看来历史清白，所以由一名比利时籍安全

军官处理，而这个军官恰好是我的学生。当时我正忙于处理一个顽固的西班牙长枪党党徒的案件，这宗由干练的比利时军官处理的蒂莫芒斯的平淡无奇的案子与我无关。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非常重视难民的行李和随身携带的物品。物品检查一般在第一次审讯之后，并且常常是在清点其财物的基础上进行。即使在最清白无辜的人的物品中也可能有明信片、当地报纸和剪下的画报，他们对这些或许并不在意，但对一个训练有素的检查人员来说可能提供有趣的情报。而那些为进行间谍活动而来的人则不得不带有搜集并发出情报的物品。

当然，谨慎的间谍不会在行李里携带发报机，但可能带体积小的，诸如微型照相机之类的东西。还有，没有多少间谍能够记住接收情报者的姓名、地址——有时是外国的姓名和地址。

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有个我们称之为“解脱室”的大厅，大厅里放着一张没铺桌布的桌子，四周摆有椅子。每天上午，检查人员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满“顾客”们的物品。他们仔细检查每件东西，有时还借助放大镜观察细部：箱子、皮包、旅行袋、笔记本、信件、钢笔、眼镜盒、烟荷包、烟盒、钥匙环和难民带的其他物品，检查过的物品就放到一边。这个大厅酷似海关检查站或者慈善机关的施舍棚。

4月的一天上午，明媚的阳光洒在花园里。我正好坐在审查蒂莫芒斯的比利时军官对面，聚精会神地研究思考那个顽固的西班牙长枪党人的物品，比利时军官对我说：

“劳驾，上校，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眉头一皱，看了他一眼。我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工作。比利时人正在查看蒂莫芒斯的一个粗糙的旧钱包，在钱包里发现一个装有灰色粉末的信封。我很不高兴，嗔怪地说：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流动化验室！你把粉末送化验室，让他们尽快给你化验报告。”

我继续检查西班牙长枪党分子的物品。两三分钟之后，我听到一个胆怯的、低低的声音：

“上校，实在对不起，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我很恼火，甚至想应当开一次会，专门批评不会独立工作、总是打搅上司的不称职的年轻人。正在这时，我看到他手里的东西：一小捆桔棍——就是妇女们常用来修指甲根的那种小棍。

“我的上帝！”我叫出声来。

“怎么啦，上校？”

“没什么。你把棉花拿出来给我看！”

“棉花？”这次倒是他吃惊了。我从眼神里看得出来，他怀疑我精神失常。可是，鉴于我是他的上司，他不得不再一次去翻嫌疑犯的钱包。当他真从钱包的另一层里找到一小团棉花时，简直惊呆了。这样，又一宗德国间谍案被发现了。

## 二

鉴于新发现的案件更为重要，我请他留给我解决，让他去处理其他难民的问题。我坐下来陷入沉思，考虑使蒂莫芒斯露出马脚的德国人的“Grüundlichkeit”。派他来的德国人在细枝末节上操心过分，白白送掉一个爱国者的性命。后来我们得知，这个间谍头子住在里斯本有名的“安特 · 塞尔”公寓，他谨慎过度，仿佛是故意把蒂莫芒斯到达的消息通知我们似的。蒂莫芒斯带的是密写必不可少的东西：把粉末溶于水和酒精之中，用桔根蘸着写字，而脱脂棉则用来包住小棍一头，以免在纸上划下痕迹露出破绽。可悲的是，蒂莫芒斯完全可以在英国任何药店买到这三样东西而不致引起任何怀疑。由于过分细心，现在他不得不为携带这些东西作出解释。

# 三

根据经验，我知道这些物品证明嫌疑犯居心不良，迫使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且能在法庭上证明他有罪。

我回到办公室，请女秘书打一份蒂莫芒斯全部物品清单，嘱咐她特别小心，哪怕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也不要遗漏。这张清单在我办公桌上放了好长时间，其中有以下三件用以指控他的物品：

| | |
|---|---|
| 装有粉末状物的信封 | 1 个 |
| 桔梗 | 1 捆 |
| 棉花团 | 1 个 |

我必须把蒂莫芒斯召来让他承认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的。在我漫长的生涯中曾经遇到过——实际上也只遇到过一次——有人声称证据系伪造而否定证据本身。鉴于证据不能成立，法官不得不释放被告。既有前车之鉴，我不想重蹈覆辙。我叫人把蒂莫芒斯带来。

蒂莫芒斯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来，我请他坐下，他没有谦让。他盯着我的眼睛，自由自在地笑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在笑。我也笑着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去，深深吸了一口又回到座位上。

“很好，蒂莫芒斯，”我用佛拉芒话说，“你的案子很顺利，毫不复杂。我们研究了你的供词，认为合情合理。”

他又笑了。

“据说你同比利时自由行动[1]有关系，并且一直工作得很好。”

“是啊，确实不错。”他高兴地说。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自由比利时商船队正需要你这样诚实的人。”我看了看文件接着说，“好吧，你的一切都清楚了，没有必要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利时的一个抵抗组织，又称比利时自由行动党。——译者注

再待在这里，你本人也一定渴望恢复自由，尽快见到同事们，我告诉负责移民的官员马上放你。如果一切顺利，今天晚上即可乘火车去布里克萨姆。”

“太好了，先生！非常感谢！”他又惬意地笑了。

“但是还得履行一个小小的手续。这些是你的物品，”我指着堆在桌子上的东西说，“请查点一下是否都对，并且在清单上签字，然后便可以带上东西走了。”

蒂莫芒斯拿起清单看了一遍说：

“一切都对，先生！”

大厅里鸦雀无声，只听到笔在纸上沙沙作响，这是蒂莫芒斯在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不，事情还没有完。”我一面打开钱包，拿出包粉末的信封、桔棍和棉花团，一面紧紧盯着蒂莫芒斯。他讥讽的笑容消失了，脸变得煞白，眼皮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

“你在走之前或许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钱包里会有这些东西，你已经承认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

他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看着我手中的清单，好像是在测量距离，准备扑过来把它夺走。但他的肌肉又马上松弛下来，嘴唇上掠过一丝似有若无的微笑。

“当然可以解释，先生。刚才你突然发问使我吃了一惊，现在我清楚地记起来了。我在巴塞罗纳坐牢的时候——大概你听说过传讯我的事情——同一个西班牙共产党人住在一起。有一天清早他被带走。我们刚刚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他就把这三样东西交到我手里，说要是被搜出来他就会被枪毙。他请我代为保存。”他请求原谅似的耸耸肩膀，“可是，他再没有回来。我把这些东西放在钱包里忘得一干二净。请您相信我，先生。”

我竭力掩饰住对他机智而迅速的解释感到的敬佩，用眼睛死死盯

住他。这是个像牛皮一样坚韧、难以制服的家伙。我像刚刚看完一场恶战一样笑起来，笑得双肩上下颤动，仿佛在尽力忍住不要纵声大笑。我高兴得把头向后一扬，笑啊，笑啊，一直笑到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一生中从没有开过这么奇特的玩笑。

蒂莫芒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紧咬牙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额上青筋跳动，嘴唇毫无血色。我笑得越来越厉害，他却不停地颤抖。最后，蒂莫芒斯失去了自制力，用双手捂住耳朵，大声哀求我不要再这么神经质地笑了："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你千万别这么发疯似的笑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交代已经使真相大白，两小时以后口授并签署了一项内容完整的声明。现在，这项声明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1942 年 7 月 7 日，蒂莫芒斯在旺兹沃斯的监狱里被处绞刑。他也是"Grüundlichkeit"的牺牲品。

# 第六章　难民幽灵

## 一

索霍是皮卡迪利广场区一个奇特的地方，那里聚集着英国最好的饭馆和最坏的罪犯。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两名巡警拦住三个正在游荡的外国人，按照战时的惯例，请他们出示身份证。三个人都没有任何证件并且只会说法语，而两个巡警又只懂英语，双方自然无法交谈。两位警察以英国人特有的礼貌，依法把他们带往加农街警察所，三个人不声不响地跟随警察前往。

值班警官的法语足可以审问这三个外国人。他们讲的经历相当混乱。当时的形势是，1941 年夏末，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尚未付诸实施，但其威胁依然存在。海岸防卫很快组织就绪：一团团生锈的铁丝网运到海滩；用巨石保护英国海岸；到处都埋下地雷，车辆无法安全通行；凡是坦克能够通过的道路都用水泥路障和防坦克坑封锁。蒙哥马利在取得举世闻名的胜利之前所指挥的第十二营在入侵危险最大的西南部地区采取斯巴达战术布防。整个英国沿海严阵以待，巡逻艇在海上游弋以防敌人接近。

整天忙于这类问题的值班警官粗粗了解了一下三个乞丐的经历。他们说几天以前乘一只小船逃离法国，大白天在英国西南海岸登陆，没有受到任何人盘查，又穿过几个禁区未被察觉，一直到警察询问他们之前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两种异乎寻常的可能性引起警官的注意。如果他们讲的经历可靠，

这证明英国的防务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挡德国人入侵，如果他们讲的经历是伪造的，那么这三个人确实可疑，可能是在入侵部队之前到达英国的特务或第五纵队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或炮火响起的时候制造混乱。看来不论是哪种情况，这一案件都非同小可。他不愿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就拿起电话。

消息很快传到最高当局。国务秘书、内政部和首相温斯顿 · 丘吉尔先生本人都过问此事。上面指示立刻调查，为什么能让三个不懂英语的人大模大样地到达伦敦。MI–5 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要去仔细调查这三个人的身份。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 二

三个人从加农街警察所转到克拉彭纽特里尼蒂路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警官从如此复杂的案件中摆脱出来一定会感到如释重负，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伦敦的日常刑事案件。

开始审讯之前，我仔细研究了这三个不起眼的人物。第一个是个不过二十岁的小伙子，看上去性格柔弱，红红的脸颊充满稚气，总是目光低垂，咬着嘴唇强忍住泪水。第二个人却身强力壮，胸肌突出，俨然一副拳击运动员的架势；他长得像个混血儿，身材魁梧，但性情懦弱，眼睛不断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即使在受审的时候也滴溜溜转个不停，给人的印象是既少才智又缺机敏。

第三个无疑是他们的首领。我年轻的时候爱好打猎，有个私人动物园，这个人使我想起正在捕捉猎物的猫科动物。他像猛兽一样，动作缓慢但充满杀机，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目标。方方的脸上满是像玻璃瓶碎片留下的伤疤，嘴上的一处伤疤使上唇翘起，使那张本来就似人若鬼的脸谱显得更加可笑。他头上也满是疤痕，显然是刀或其他利器所致。他纹丝不动，吓得另外两个人噤若寒蝉，看来这两个人对他要

比对我所代表的当局更加惧怕。毫无疑问，马吉斯——警察已经查出了他的名字——应当严加看管。这位马吉斯简单告诉我，他们如何逃出法国，并在东北海岸登陆。他说话的时候，另外两个人乖乖地听着，没有任何插嘴的机会，所以我决定分头单独审讯。

## 三

首先我把“娃娃”叫来——就是那个一直很少说话、满脸孩子气的人。他心情太紧张，我不得不先和他谈些家常让他平静下来。他不停地窝着手指，斜眼看着门口，生怕首领也会进来，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镇静下来，恢复了常态。

“喂，年轻人，我已经用法语——看来你只懂法语——告诉过你，我只不过是履行手续，以便给上级写报告。我们对你大胆出逃深为感动，希望你谈得更详细一点，比方说，你们是几点钟登陆的？上午，下午，还是晚上？”

“我觉得好像是下午两点钟的样子，先生。”

“很好。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乘的是什么类型的船：舢板，或者……也许你们有运气搞到一只机动船？”

“是条帆船。要是没有风，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很好。那么，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登陆的？是石岸还是海滩？”

“是沙滩，很潮湿的沙滩。”

“不错，这类地方比较方便，对吧？船没有被石头撞坏的危险。船是什么颜色的？”

小伙子犹豫片刻说：

“灰色的。”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这样问话的人不是什么七头怪兽吧？”

“不，先生。”他勉强露出一丝怯懦的笑容后走出去。

我沉思了一会儿，令人把那个眼睛滴溜溜转、像个混血儿的人叫来。

## 四

审讯以同样方式进行。我让客人随便一些，请他原谅我要提几个问题，然后漫不经心地说：

“喂，老兄，你还记得起来你们三个人是在什么时间登陆的吗？”

被审问者装出一副集中全部记忆力思考的样子，用粗糙的手托住下巴，得意地回答说：

“好，你让我想一想。大概是上午九点半左右。我们仅有的一块表坏了，根据当时太阳的位置大概是这个时间。”

“谢谢你。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怎样弄到的通过海峡所需要的汽油？我很想了解你们用什么办法瞒过了盖世太保，你们的办法或许对其他难民有用处。你们怎样做的？请你讲详细点。”

“当然可以！能帮助其他难民我很高兴。这非常容易。在布列塔尼，我的一位朋友是渔民，他在花园里埋着好多加仑汽油。我们利用晚上时间把它刨出来了。”

“真机灵。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登陆的？没有碰到问题吗？是陡壁、石岸还是海滩？”

“嗯，不能算海滩，那地方有点陡，我们不得不抓着一些灌木才上去。是一些小树，好像是松树。”

“船怎么样了？”

“我们只好把船扔了，上岸的地方没法拴船。”

“好吧，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哦，船是什么颜色的？”

“暗褐色的。”

我随便地笑了笑对他表示感谢，他就离开了房间。

我早已命令把三个人分别看管，以免他们交谈。

## 五

“请进，马吉斯先生。”我说，“请坐，随便点。”

他马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以主人的姿态环视一下四周。

“我要向你提几个问题，这纯粹是例行手续。你知道，情报人员不得不向上司汇报点什么。我总得要填写表格，写些情况，好让他们传阅。”

马吉斯同意我的话，他对这类事情当然了如指掌。

“很好，你们几点钟在英国登陆的？我必须汇报你们到达的时间。”

“那当然啦！”马吉斯用食指摸了摸脸上的一块伤疤，摇头晃脑地说：“大概下午六点左右。”

接着，他又补充说：

“对，大概是六点钟的样子，前后差不了半小时。”

“谢谢。你们登陆的地点肯定不太好，或许是石岸，大概不会很容易。遇到什么问题吗？登陆困难吗？”

“可真不容易！当时我想怎么也到不了啦！小船就要撞碎啦！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发现了那个小港湾？”

马吉斯脸上掠过一丝惊奇的表情：

“对，是我们交了好运，正好海上风平浪静，我们的船到了那里。下船上岸再顺利不过了，但那条船……”

我心不在焉地耸了耸肩膀：

“别想那条船了，那种船成千上万。请让我看看你的手，可以吗？”

马吉斯诧异地问：

“为什么要看我的手呢？”

但他还是把手伸过来。

我狐疑地摇摇头：

“我真不明白，你的两位朋友说你们的船既无发动机又无船帆，只有一对桨。这就是说，你们足足划了四天四夜，可是你的手上没有一点痕迹。坦率地说，我真不明白。”

马吉斯立刻回答说：

“哦，你可能觉得奇怪，可是说起来也很简单。你摸摸我的手，很硬，不容易起泡，并且不是由我一个人划，而是三个人轮流划。还有，大部分时间用不着船桨，有时一连几小时顺着海流漂行。现在明白了吧？”

我又耸了耸肩膀：

“可能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我想不通你们为什么不把小船改改颜色，你不担心德国巡逻人员甚至离很远就能发现它吗？这种鲜红的颜色即使对呆头呆脑的人也太扎眼了。”

“你说得对，”马吉斯立刻表示同意，“我们必须起程，时间太紧迫，并且，我们从哪儿能很快找到所需要的材料呢？”

“你别问我，我从来没有当过油漆匠。”

“还有什么要问吗，先生？我很高兴为你效劳。”

“谢谢，马吉斯先生，暂时没有了。我叫你的朋友来四个人一块儿谈谈。”

过了几分钟，另外两个被押进来。我请他们坐下，依次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小孩”两眼死死盯住地板，“运动员”除了自己的眼睛之外什么都瞧，唯有马吉斯——小集团的首领——还是那么冷漠地同我对视。

“好吧，”我说，“我面前的三个人都是说谎者，三个谎话大王。就连儿童们玩捉强盗游戏也讲究把话说得一致，而你们这几个聪明老练的汉子却犯了如此幼稚的错误。”我指着最年轻的那个说，“你说下午两点在英国登陆。而你呢？”我指着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的人说，“却

说是上午九点。而你，马吉斯，又说是下午六点。船是同一条，却在三个不同时间靠岸。这条船还有个奇怪的特性：像变色龙一样改变颜色，开始是灰色，一会儿又成了深褐色，后来变成了鲜红色。更为奇怪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也不断变化：原来是帆船，到了远海成了机动船，用的是布列塔尼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渔民藏起来的汽油，而据马吉斯说，虽然他手掌上没有任何痕迹，你们划桨还是费了不少力气。这些弥天大谎都是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这还不够，连登陆地点也随着你们的到来而变化无穷：起初是潮湿的沙滩，后来又莫名其妙地不知从哪儿冒出了沙丘和松树，但你马吉斯来到的时候又突然出现了岩石。难道你们把我当成白痴了吗？”

谁也不回答，一个个像粘在椅子上一样。

“只有一种解释，”我继续说，“那就是这条船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什么登陆地点。你们如何到达英国，我暂时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像你们讲的那么荒唐。现在我要知道事实真相，你们到底怎样来的？”

屋里鸦雀无声。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但三个人都避开我的目光。后来马吉斯打破沉寂，竟然大胆地说，他讲的每个细节都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只有他讲的才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信不信与他无关。

“这样讲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的朋友，”我说，“与你有关，关系重大！不管你们怎么说，你们讲的经历站不住脚。如果你们确实是老实人，真正的难民，为什么说这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事实上你们不是什么难民。既然不是难民，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答案很简单：你们三个是间谍。你们知道我们如何处理落网的间谍吗？清早，给他们送上一顿丰盛的早餐——我怀疑他们能咽得下去，然后请他们溜达到绞刑架下，往脖子上套上绳子，把他们绞死。”

我又依次看了看这三个人，特别看了看他们的脖子。两个人偷偷

看着小集团的头目，有时“小孩”还伸出舌头舔舔嘴唇，像是想说点什么，但到头来谁也没有吱声。显然，他们怕马吉斯比怕绞刑架更甚。

或许时间和思考会改变这些人的固执，我叫卫兵把他们带走。

## 六

拳师们说，对手越重，他摔得越狠。在审讯中我多次发现，人越是坚强，垮下去就越快。一个表面上强壮的人的躯壳有时比看上去纤弱的人更不堪一击，于是我决定集中力量对付马吉斯。我命令把他从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转到切尔西一座充满严肃军事气氛的监狱，在那里他又多次受审。他屡次重复他的经历，这使证据越来越无足轻重。审讯人员不断提醒他等待一个战争期间被捕的间谍的命运是什么。

他对自己的供词只字不改，每次被提审总是重复说，他讲的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不是他的罪过。仿佛不是他，而是我们反而成了罪人。他的两个朋友同他讲的有出入，这很容易解释。他们两个是智能低下的可怜虫，这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记忆力还不如土拨鼠，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编造了那套根本不存在的荒诞无稽的故事。谁都可能设下圈套陷害别人，你们为什么不重新提审他们？他们已经有充分的时间形成自己的意见，或许现在已经考虑成熟了。

我命令把两个人叫来，果然他们逐条肯定了马吉斯的说法，承认他们原来讲错了。当时，经过一天的折磨，他们神经尚未平静下来，并且又极度疲乏。经过仔细考虑，现在觉得是马吉斯说得对，是他们自己搞错了。对，确实是马吉斯说得对：船是红色的，登陆地点的确很陡峭；不，既没有船帆也没有发动机，真的是一条舢板……如此等等。

从这次审讯我只得到一个结果：它证实我的印象是正确的。两个人对马吉斯怕得要死，为了支持马吉斯的荒唐说法，他们不惜冒上绞

刑架的危险。这次审讯使我更加肯定这两个人绝非间谍。在三十年反间谍经历中，我同不计其数的间谍打过交道，但这两位同任何间谍都毫无共同之处：既不聪明又少机敏。德国人可能有疏漏之处，但不至于愚蠢到这般地步。

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德国人绝不会派这么一对“业余”间谍到他们行将入侵的国家。职业间谍的第一个条件是坚持自己编造的故事情节，而总是否定任何相反的说法。马吉斯或许是个职业间谍，但我可以用自己的声誉打赌，这两个人无论如何不是。那么，这三个不懂英语的人怎么会沆瀣一气呢?

时间在流逝，最高当局一再催促，急于得到结果。不管我如何费尽心机，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完全相信马吉斯是他们的首领，应当集中力量对付。他是“黄莺”，应当叫他“歌唱”。可是，怎么办呢?

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这是不求助于拷打而又能使他开口的唯一办法，因为拷打是违反我的原则的。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学校两名军官合作。对一切新奇事物都着迷的反间谍科长立刻跃跃欲试，还鼓动别人支持我，甚至一向比较拘谨的行动科长也同意我的计划。

第一步是把马吉斯转到一间黑牢里关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把他押到一个大厅，让他站在一张铺着讲究的绿色桌布的大桌子前面。桌子两边坐着学校的军官，个个身着军服，纽扣锃亮，腰扎皮带，头顶钢盔，每个军官面前放一把手枪，一片严肃的法庭气氛。我作为军事法庭庭长坐在长桌中间。

这个审判团足以使人胆寒，特别是对一个刚刚单独在黑暗中关过二十四小时、只有自己的思想做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马吉斯由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押到我们面前，我发现他轻轻眨了一下眼睛。一两分钟大厅鸦雀无声，以便让他体会这庄严的气氛。慢慢的，他特有的蛮勇开始消退。

我用法语对他说：

“犯人，你知道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你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吗？”

“知道，先生，在一间黑牢房里。”

“知道那是什么牢房吗？”

“不知道，先生。”他显出一点惊讶和痴呆。

“那是死牢。走进这间牢房的人就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不再说话，寂静又一次笼罩整个大厅，只能听到犯人急促的呼吸声。

我继续说：

“犯人，你在伦敦被捕之后有一切机会向军事当局招认你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但你却编造荒诞的经历，提供虚假的情节。尽管一切事实都对你不利，你还一口咬定你的供词属实。你如此坚持说谎只能表明你是敌人派遣的间谍。在战争期间，对这种冒犯行为的惩罚是处死！你现在出席的正是为审判你而组成的军事法庭。只能有一个判决，即你‘有罪’。虽然你顽固不化，谎话连篇，我们还准备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把手表取下来放到绿桌布上。

“给你整整两分钟时间让你考虑决定：愿意从实招供，还是嘴唇上带着谎言走上绞刑架。请你好好考虑，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现在开始计时。”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手表滴滴答答的金属响声特别清脆，一秒一秒地把马吉斯推向死亡。罪犯死死盯住地板，仿佛故意屏住呼吸。城里的嘈杂声隐隐传到这里，不知哪位性急的司机在恼火地按喇叭，声音长时间在这奇异的气氛中回荡。秒针已经走了整整一圈，马吉斯依然低头不语，没有表现出一点内心慌乱。押送他的一个士兵用一只脚轻轻蹭了蹭另一只脚，这点微弱的动静在凝固了的空气中却像雷鸣一样在大厅回响。

两分钟过去了，我拿起手表，看了马吉斯一眼：

“犯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马吉斯盯着我的眼睛说：

“没有！”

“这是你的最后回答？”

“是！”

我慢慢站起来：

“你刚刚为自己作了判决。我现在宣读判决书。”

我庄重地宣布每个被判死刑的囚犯都要听到的话：

“本高级军事法庭判决你在指定服刑地点处以绞刑，尸体埋葬在服刑之前关押地点……愿上帝可怜你的灵魂。”

我重新坐下，看着犯人，脑海里闪过一线他能打破缄默、讲出真话的希望。可是，他还是一言不发，纹丝不动，死死盯住地板。当命令士兵把他带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他早已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幕喜剧。门刚刚关上，渐渐离去的脚步声还依稀可辨，我听到陪我表演的军官们都深深吁了一口气，放松一直紧张的神经。

但是，使人难堪的寂静依然笼罩着大厅，大家都看着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我清了清嗓子，磕磕巴巴地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一般说来，我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在这种情况下，坦率地说，我感到被羞辱和慌乱所征服。我“高明”的主意以彻底失败告终，犯人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好在他没有嘲笑我们刚刚演出的这场哑剧。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果就是彻底埋葬了我原来的希望。我们都受到了嘲弄，特别是我——荒唐计划的作者——更是如此。我用尽仅剩的一点气力说：

“先生们，你们能稍等片刻吗？或许犯人经过考虑会返回来。”

我的语调显然毫无自信，大家也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押送马吉斯的士兵走进来说：

“先生，犯人有话跟你说。”

我收敛起几乎涌到嘴边的笑容，忍住到舌尖的“他说了什么？”回答说：

“可以让他进来！”

马吉斯走了进来。

我故作严厉，对他说：

“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脸上由伤疤构成的一成不变的难看的笑容更明显了：

“好吧，我要走了，但我想带着干干净净的灵魂离开人世。”

我难以忍住内心的惊讶和激动——马吉斯用的是英语，而他一直自称不懂这种语言。口音是大洋彼岸的。

“很好，”我说，“最好带着干净的灵魂离去。你是加拿大人，对吧？”

“对，先生，加拿大籍法国人。”

就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了：马吉斯和他的两个伙伴是驻英国的加拿大武装部队的逃兵。

但是，一个新的、更大更复杂的问题出现了。

## 七

马吉斯还没有从神经紧张状态恢复过来之前，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有两点使我迷惑不解：第一，为什么一直到被判极刑还如此坚持他荒诞的经历？第二，表明士兵身份的仅有的证物——军装和军人身份证——到哪里去了？离开军队之后，马吉斯和他的同伙靠什么生活？他们从哪里弄到钱呢？

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合情合理的。马吉斯先后已经开过八次小差，最后一次抓回以后被警告说，如果再犯，就要在沃尔德肖特的葛拉斯豪斯关他两年（不管他说的是否可信，葛拉斯豪斯确实是士兵

们谈虎色变的军人监狱）。为了不到那个地狱里去度过两年难熬的岁月，他宁愿冒一切风险，甚至甘冒生命危险。

至于军装和军人证，他说离开兵营时烧掉了。还说索霍区遇到一个人，要了他的一身旧军装，给了他一件西服上衣和一些钱。他不知道那个“仙人”叫什么名字，更不了解他那种堂吉诃德式做法的动机。

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怀疑。我根本不相信他说的什么把军人身份证烧毁了。对于一个逃兵来说，更可能是把它扔掉了。这特别是因为，一旦遇到逮捕而受审讯，身上没有军人证警方就难以确定他的身份。烧毁一件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物件的说法太过分了。更合乎逻辑的是马吉斯和他的伙伴把军人身份证连同军装一起卖掉了。而买这些东西的人很可能不是一般估衣买主，而是第五纵队狡诈的特务。为了实现一再推迟的入侵，希特勒能使出任何花招。他已经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试验过他的战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过后，地面一片惊慌混乱，逃难的人群晕头转向，聚集在公路上使部队无法行动。在这关键时刻，第五纵队分子火上加油，散布谣言，破坏军事公报的信誉。在人群拥挤的时候，两三个身着军服的人站到十字路口，让向各方向开进的部队走错路线，或者混入平民当中，劝他们逃离家园，造成更大的混乱。加拿大部队集结在英国西南部极易遭到攻击的地区，莫非这就是有人急于买到加拿大军服的原因？买主到底是谁呢？

我重新审讯了另外两个逃兵。从我的话里他们察觉到马吉斯已经招供，但他们提供不出什么新情况。马吉斯是“首领”，他的话就是“禁令”。他们二人只是证实了军人证并没有烧毁，而是和军装在一起。鉴于他们再也供不出什么新东西，我把他俩送回原单位上级处理，同时请求把马吉斯留在 MI–5 继续审讯。加拿大当局很快同意了我的意见，内政部得知可疑登陆案件的真相之后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我看来，这第二个问题更加困难。如果有第五纵队进行破坏，必须不失时机地予以清除。但这项工作超出了我的权限，于是我

前往伦敦警察厅同特务处一位警官联系。一开始他不相信、不同意，甚至不能设想让 MI–5 的“业余”人员到他的地盘去侦查，特别是听说在索霍区——伦敦的犯罪中心——各种事件都轻而易举地发生，警察当局竟茫然无知，他的职业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我们终于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我离开的时候，他慷慨地同意警察厅特别处派两辆警车和几名警察交我使用三个星期，在索霍区进行夜间行动。

## 八

后来，我又和马吉斯接连谈了几次。他有说有笑地承认，烧军人身份证的事是他又一次撒了谎。慢慢地他软了下来，相信同我们合作会减轻他的处分，于是千方百计帮助我们。但正如他已经说过的，他只见到过买军装的人一两次，加上灯火管制期间索霍区的街道总是黑咕隆咚,并且酒吧里挤满了生人,他无法描绘出买主的相貌。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对这个面目丑陋、善于撒弥天大谎的马吉斯产生了一些好感。他总是情绪饱满，按自己的风格行事。虽然我们双方都知道谈话不再有什么成效，我还是喜欢跟马吉斯谈。看来他已经没有什么用途，几天之后，我觉得必须采取其他办法。

马吉斯肯定了解或预感到我的意图。既然无法再帮我什么忙，他决心使谈话更加生动。有一天，我刚刚要开始审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刮脸刀片，不等我想出该怎么办，他就把刀片放进嘴里嚼起来，后来竟然把刀片咽了下去，接着得意洋洋地张开嘴，表示嘴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好像为了使表演更加动人，他拿出一块玻璃瓶碎片，放入嘴里嚼起来，一直到嚼成碎末，又和咽刀片一样吞了下去。我曾听说过吃刀片咽玻璃的人，但距离这么近亲眼目睹倒是第一次。我以为会看到他

嘴唇上会有血口子，可是他若无其事。

“你在搞什么鬼？”我问道。

马吉斯好像被这个问话所污辱。

“我只不过表演了一场。”他说，“我就靠这个生活。”

“生活？”我迷惑不解地问道，“靠吃玻璃生活？”

“正是这样。我到过加拿大和美国的好多市场，观众们看了我的表演都笑得前仰后合。我初到伦敦的时候就这样弄到一些钱。”

我恍然大悟，正因为“魔术家”同“马吉斯”谐音，他才取了这个名字。他这套本领或许对我们有用。

我的计划很简单：我和马吉斯晚上去索霍区转一转，必要的时候让马吉斯表演一场，由一名警察跟随，这样迟早会抓到马吉斯的“朋友”。

我把主意讲给他听，问他：

“你同意这个计划吗？”

“同意。只要能走出那间小牢房，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什么都愿意干。可是，谁付酒钱呢？”

“政府陛下付。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场闹剧，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计划。任何一个可疑的手势或动作都会使你获咎，让你去葛拉斯豪斯监狱度过余生。懂吗？”

## 九

执行计划的头一天晚上毫无成果。我们刚到索霍区就响起了防空警报。几分钟之后，德国轰炸机不规律地呼啸而过，巨大的探照灯光柱刺向夜空，防空炮火声和炸弹爆炸声响成一团，炸弹碎片像白色水珠撒在街上，索霍区狭小的街道空空如也。所有的人——不分良莠——都一块儿挤进了防空掩体。我们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一无所获。

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乎走到猎场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空袭，好在

这次时间很短。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进一家酒吧，而后又走进另一家。到处浓烟弥漫,眼睛难以观察。我和马吉斯找了一个有利地点，要了英国人称之为“啤酒”的那种度数不高的黄色饮料。酒吧人声嘈杂，南腔北调。马吉斯眼睛通过酒杯上方观察，从无数肤色不同、体型各异的人当中寻找他的“朋友”。最后，他摇头向我发出信号。我们又稍停片刻，悄悄离开乱哄哄的人群，向另一个酒吧走去。

我们等尾随的士兵跟上来，就在另一个酒吧里重新开始同样的把戏。

时间飞快地过去，我们仍然两手空空，我不耐烦起来。酒吧污浊的空气和连续喝下去的黄色饮料使胃和头都感到难受，我已经不再那么相信这越来越像猎鸭子的把戏会取得成功。

脑海中出现的舒适的被褥和柔软的枕头对我的诱惑力越来越大。正当我准备中止这场狩猎活动的时候，一个幸运的机会向我微笑了。我和马吉斯来到夏洛特街一家不那么拥挤的酒吧。当我向柜台走去的时候，突然发现马吉斯和一个皮肤微黑的青年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这足够了。青年把酒一饮而尽，不再看马古斯，悄悄向门口走去。我向随同我们的警卫发出约好的暗号，他马上跟踪出去。

“就是这个人，对吗？”

马吉斯点头承认。

“你为什么不说明？为什么不去找他谈话呢？你还想骗我们吗？”

从认识马吉斯以来我第一次从他眼里看到一点慌乱的神色。我听到他嘟囔了些什么，发现他们的条律有如此大的约束力——马吉斯看到应当揭发的人那一瞬间，他的一切诚意化作了烟云。

## 十

晚上的气力没有白费，警察带回来大批情报。收买赃物者是个裁

缝的助手，法国人，没有犯罪记录，也查不到有损名声的可疑之处，从哪方面看都是个完美无缺的公民。但是，这太凑巧了，我们在寻找军装，而他正是以缝衣为生。于是他马上被捕并受审。裁缝助手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供出链条另一环的地址。

被裁缝助手供出的人自称是体育教练，但他提供的情况与体育风马牛不相及，对我们毫无用处。但他供出了另一个地址，在索霍区罗米里街。听到这个地址，对本地区了如指掌的警察都会意地点点头。住在那里的是个绰号叫“恐怖”、做过三十多起贩卖麻醉剂和暴力抢劫案的惯犯。现在我们才找到了真正的线索。

当天夜里，我们来到罗米里街一栋房子的三层楼上。敲敲门，没人回答。再敲敲，还是毫无动静。推一推：房门反锁着。

“唯一的办法是把门撞开。”

撞开一扇门对身强力壮、训练有素的警察来说简直如同儿戏。几秒钟的工夫，门上的合叶断了，我们闯了进去。屋内毫无动静。我们在卧室的双人床上发现一个酣睡的女人，沉重的呼吸声说明她受了强度麻醉，几小时之内还会处于毒品的效力之下。

一名穿制服的警察低声说：

“我认识她，她是‘恐怖’的情妇，有名的可卡因吸毒者。”

旁边枕头上还可以看出沉睡女人的伴侣睡过的头印。我用手摸摸一动不动的女人躯体旁边的褥子，尚能感到刚刚睡过的人留下的余温。一定有人，也许就是“恐怖”，刚才还在和这个女人同榻而眠。我们踮起脚看看阁楼，里边很脏，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搜到：房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隙。

正是在那儿我们发现“恐怖”只穿一件薄薄的睡衣蹲在烟囱后面冻得发抖，显出一副奴才相。他毫不抵抗，束手就擒。像他的很多同类一样，索霍区的“恐怖”与其说使人恐怖倒不如说他本人更恐怖。

他穿衣服的时候我们搜查了房间，找到大批可卡因和淫秽的小册

子，但没有什么军装或军人身份证。在审讯中，“恐怖”知道如果不同我们合作，已发现的证据足以使他锒铛入狱，过多年囚徒生活。他胆怯了，马吉斯前一天晚上遵守了的不法分子的条律对他丝毫没有约束力。结束审问，我已经对这个屡屡犯罪、为了活命不惜出卖自己亲生母亲的家伙厌恶之极。“恐怖”供出了知道的一切，揭发了军服工厂的头目们，说出了他们的地址。我马上打电话把以上情况通知伦敦警察厅。第二天天亮之前，所有干这行买卖的人悉数落入警察手中，这个财源茂盛的行业立刻被取缔。

“恐怖”提供的最有趣的情报为这种奇怪的勾当作出了解释：不像原来猜想的那样是第五纵队所为。我很快发现，索霍区的罪犯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润和自身安全，他们没有把祖国出卖给敌人的狂热和情感——虽说是他们的第二祖国。军装买主不是间谍而是胆小鬼。索霍区阴暗狭窄的街道酷似大城市中的小村镇，难得有身着制服的警察光临。为了逃避征兵，很多服役年龄的人付巨款购买军装和军人身份证，这样他们可以不履行宣誓仪式，不进行体格检查，不用服兵役而成为军人。这套把戏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警察忙于抓没有军服的逃兵，而对胸前挂满勋章、看上去好像因功度假的“英雄”们不感兴趣。

破获倒卖军服和军人证件的集团之后，伦敦警察厅特别处马上开始搜捕数以百计的不穿军服的逃兵和穿军服的骗子。由于军警合作，不断追捕，这项工作颇有成效。

马吉斯被交给加拿大当局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他。如果他服刑期满转入现役，大概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士兵。他勇敢、机灵，不是那种和平时期军队的装饰品。至于“恐怖”对我们也很有用，但不是在需要勇气的工作上。对他说来，通往善良的道路太狭窄了。后来我听说他因为暴力抢劫被判处强迫劳动四年，正在服刑。

# 第七章　耐心是美德

## 一

不管德国人有过多少次失误，他们确实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对细枝末节的敏感。

法国失败和荷兰沦陷以后危机四伏的几个月里，数以千计的难民利用混乱局面逃到英国。一些人从挪威和布列塔尼之间某个荒无人烟的海港乘船到达，另一些人则往南去西班牙边境，躲过佛朗哥的警察抵达葡萄牙，再从葡萄牙乘轮船或飞机前往。

随着盖世太保和德国军警封锁了几百英里海岸，难民人数逐渐稀少。逃亡者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必须具有丰富的海洋知识和航海知识，才能乘不安全的小船穿过海峡。德国战斗机很容易发现挤满难民的小艇，用机关枪向目标准确地扫射。强大的巡逻艇在海上游弋，不论是帆船还是舢板都无法幸免。在海上被德国人抓获意味着当场淹死、带回去立即处死或者长期关进集中营。同敦刻尔克以后的狂涛巨浪相比，1941 年和 1942 年出逃的难民只不过是涓涓细流。

但是，德国人马上就发现，阻止被占领欧洲的居民逃往英国就无法得到这个国家的情报。被关进牢房的人固然与世隔绝，但同时世界也与他隔绝。德国人迫切需要有关英国的情报：敦刻尔克失败以后它怎样在轰炸下恢复？它的战争计划、兵力部署以及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设想怎样？

空中侦察和摄影得来的情报不够完整，数目也不够准确。

德国人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发现有人准备逃往英国，佯装对逃亡者的密谋一无所知，派间谍打入其中。混在逃亡者中间的间谍很容易蒙混过关，因为他的同伴们——无疑都是好人——不会怀疑他的意图。在准备逃亡的过程中，他也积极活动。打进来的间谍虽然有同伙暗中保护，也要和普通难民冒同样的风险。

对德国人来说，这个办法还有其方便之处：间谍取道葡萄牙充其量用几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英国。间谍知道其中奥妙，可以毫不费力地抵达里斯本。在里斯本，他混到等待签证和船票的各国难民当中。轮船载客数量有限，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不能出示什么证件来提前行期，只能耐心等待。

到达英国之后，即便能安然无恙地通过审讯，他仍然面临不得不彻底改变原计划的危险，因为受命侦察的情况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如果无法接到新的指令——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就会徒劳无益地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从另一方面来看，横渡海峡充其量不过几天的时间。如果间谍得以通过反间谍机构的网眼，就能马上开始工作。德国人的这个计划是可行的：虽说损失相当可观，但在他们看来，没有牺牲就谈不到胜利。

英国人也很快发现，他们得到的最宝贵的情报来自从大陆逃来的难民。首先是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处把审问难民得到的有军事价值的情报供给轰炸机和战斗机指挥部，使之立即根据情报采取行动。难民能提供最新的情报，甚至是二十四小时以前的情报，指明德国部队集结地和秘密军备工厂的位置，甚至能提供敌人最高统帅部要员们在隐蔽地点举行军事会议的情况。

诚然，皇家空军的情报官员个个精明强干，可是他们的目的仅仅限于猎取与空军有关的情报，没有反间谍的任务，所以把处理间谍的工作交给反间谍机构。

1942 年的一天上午，我在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办公室的电话玎玲玎玲响起来。对方是我的老朋友，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处的一名军官。

听口气他很焦急，说刚刚审完三个在东南海岸登陆的荷兰人，其中两人的回答没有破绽，而第三个却极不正常，由于得以脱逃高兴得语无伦次，时而绝望地痛哭，时而歇斯底里地嚷叫，或者哼起赞颂上帝的牧歌。他自称是荷兰人，名叫德隆格尔，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的朋友请我处理这个案件。

几小时以后我开始审讯明赫尔·德隆格尔。他高高的个子，身材消瘦，一头白发，带棱角的脸上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看上去属于那种诚实、自爱、对自己心满意足的典型的小职员。皇家空军军官们没有言过其实：德隆格尔确实处于不正常状态。他像个苦行僧似的踉踉跄跄走进我的办公室，挥舞着胳膊从这边跃到那边，尖声尖气地唱着一首古老的荷兰爱国歌曲，然后又热情奔放地拥抱我，和我用力握手，简直要把我的手捏碎，一会儿又鹦鹉学舌似的唱起赞美诗来，感谢上帝保佑他。

我终于使他稍微平静了一点。可是，我刚一祝贺他出逃成功，他马上又开始祈祷。看到一位可敬的年迈人举止如同小丑，实在使人感到心情压抑。于是我毫不客气地说：

“够了！你可以庆幸自己得救，我们也同样为你高兴，可是你的喜剧越来越幼稚可笑，甚至自私自利！想想那些不幸的同胞们，他们还没有逃出德国人的魔掌。你镇静点，告诉我你怎样组织的这次出逃，你的方法或许对其他人有用处。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懂吗？”

他点点头，慢慢安静下来，像个散了架的木偶坐在我的面前。经过刚才一阵剧烈的发作，他变得呆若木鸡。

他说他二十五年前结婚，膝下无儿无女，住在海牙一小套房间里。他在邮局工作，工资微薄，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精打细算。1940 年德国人占领荷兰之后，他的景况更加糟糕。物价飞涨，生活难以维持，

经济拮据，简直是一场噩梦。眼看着妻子一天天消瘦下去，他感到走投无路。为了拯救家庭，他开始做黑市买卖。说到这里他脸红了——搞黑市买卖可不是正经人干的事，但他别无他法。

他的生意很快兴隆起来，钱财源源流进，贫穷已经成为往事！乐极生悲，财源茂盛不会经久不衰，早晚会有倒霉的一天。但由于一切如意，他把“谨慎”二字忘得一干二净。1月份的一天晚上大祸从天而降。一位朋友说，盖世太保正在查访他，德国人正在缉拿黑市集团和非法交易，认为这些有碍他们建立起来的秩序。德隆格尔已经被人告密或供出，盖世太保掌握了他的线索。

对黑市商人要处以死刑，这一点德隆格尔和他的妻子都清楚。那位好心的朋友劝他赶快逃往英国，因为逃走是唯一的生路。他对妻子说，他必须出逃，盖世太保肯定不会来折磨她，因为他的商业活动从未在家中进行过，并且当时在荷兰的德国人还算“规矩”，不会把一个无辜的妻子当做人质。

那位无与伦比的朋友劝他去鹿特丹一家有名的咖啡馆——阿特兰达咖啡馆，那里肯定有人能帮助他。

他讲到这里我点了点头，我还记得阿特兰达咖啡馆。

德隆格尔继续讲述他的经历。虽说有时不免离题万里，甚至前后矛盾，但他的故事仿佛并不复杂。第二天他到了鹿特丹，找到了那家咖啡馆。运气还不错，他同一位名叫汉斯的人攀谈起来。他告诉汉斯，盖世太保正在追捕他，来鹿特丹是为了找一条船去英国。

汉斯启齿一笑，说这个决定再好不过了。他——汉斯，为一位供给进港轮船食品的老板工作，老板恰好有一条足以横渡海峡的小船。既然德隆格尔走投无路，也为了给盖世太保一点颜色看看，汉斯愿意把小艇卖给他。他们像所有精明的荷兰商人一样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以四十英镑成交——德隆格尔也付不起再高的价钱。

他们商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汉斯为横渡海峡提供充足的燃

料——这一点毫无困难，他可以弄到汽油而不引起任何怀疑；把德隆格尔藏在甲板下面开出港口。所有的哨兵都认识汉斯，对他开船进进出出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他还有进出港口的特别通行证。船开出哨兵警戒范围之后，汉斯在南边一个地点上岸，这时德隆格尔就可以接过船舵向西航行，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感谢上帝保佑，虽然一路上曾遇到过几乎使我发疯的危险，总算来到这里。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也想来英国，我答应了。他的一个朋友也想一块来，这却使我有点为难，因为船小，第三个人总得占地方，可是我还是答应下来。我们三个人摞在船舱里，气味难闻得不堪忍受。我觉得船开出港口用的时间太长了，只有汉斯同哨兵们打诨说笑的时候我们才敢大声呼吸。后来马达声越来越响，小船越开越快，颠簸得也越来越厉害。开到大海以后，船兜了一圈，靠了岸，我付给汉斯四十英镑，衷心感谢他救了我的命。四十英镑可不算多。"

我点了点头，点上一支烟。德隆格尔很难控制情感，两眼泪水汪汪。

"我几乎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们和我都不算好水手，一开始小船就搁浅在沙滩上，用了几个小时才开出来。探照灯不断搜索海面，我们没有被发现可真是个奇迹。"

德隆格尔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突然站起来，又开始一边疯疯癫癫地跳舞一边喊：

"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我平平安安到了英国，再也用不着烦恼了！"

我把烟丢进烟缸里说：

"德隆格尔，依我看你的烦恼从现在开始。"

## 二

长时间的沉寂。他坐下来看着我，我盯着他。

“先生，请原谅，我好像没有听懂你的意思。”

“德隆格尔，”我说，“我刚才讲得相当清楚，依我看你的烦恼从现在开始。你讲的有趣的故事使我想起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如果你记得起来，会知道他写过一本叫《神秘和想象》的书。你的故事和他的故事同样神秘，何其相似！如果我想得不错的话，你的经历也是想象的产物。时至今日，你为什么还不说实话呢？”

得隆格尔看了我一眼，舔了舔下嘴唇，突然由沉静转为愤怒：

“请原谅，先生，你胆敢说我是撒谎者，这简直是胡扯！你不能这样欺侮人！”

我靠在椅子背上，不动声色地说：

“德隆格尔，请告诉我，你的朋友汉斯为什么要自杀呢？”

他显然吃惊了，说：

“自杀？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鹿特丹那个商人——小船的主人——不知道汉斯到哪里去了，对吧？德国哨兵会说汉斯把船开走了。现在汉斯又回去了，而小船不见了。这不太离奇了吗？商人对丢船这件事不会好眼相看，特别是战争时期再买一条船谈何容易。他一定会去报告盖世太保，那么汉斯在盖世太保面前如何自圆其说呢？和盖世太保是不能开玩笑的，对吧？”

德隆格尔死死地盯着我。

“是你从未考虑过这些，还是汉斯真的自己找死？——只是为了区区四十英镑！”

“我的上帝，”他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些。”

“还有，”我说，“到鹿特丹去找一条秘密前往英国的小船的人绝

不会去一个唯一未遭轰炸的高级咖啡馆，而你为什么却这样做呢？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肯定没有海员光顾的鹿特丹最豪华的咖啡馆呢？港口、码头上的小酒馆总是挤满了水手，你为什么偏偏不到那里去找呢？”

德隆格尔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接着说，“有时实话太离奇，超越了理智的界限。你如何解释在全荷兰最豪华、最兴隆，也许是唯一的咖啡馆里遇到了你要找的人？并且，你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不是冒险吗？他很可能是盖世太保的间谍……还有，像汉斯这样的人怎么会为了区区四十英镑，甘冒被捕、受刑、处死的危险？如果你能圆满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或许我能相信你的话。”

德隆格尔叹了一口气：

“我只能说我说的是实话。”

我怀疑地摇摇头：

“德隆格尔，我清楚地知道你是什么人，一个撒谎者！我还知道是谁派你来的：德国情报局的施特劳赫先生！对不对？我再给你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让你好好考虑，明天这个时间你再来这里，或许那时你能讲实话。”

“我已经说了实话，先生。”

我命令把他押下去，又不无钦佩地看了他一眼。他的顽固超出我的想象，他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如此深信不疑，以至我有时几乎要相信他的话。但是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想法。德隆格尔是间谍，到头来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正要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德隆格尔又回过头来想争辩一番，说要

写信给最高当局，告诉他们一个新的希姆莱[1]正以他们的名义为非作歹（他后来确实写了信，一封给威廉敏娜女王，一封给英国女王，一封给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但三封信都未能发往这些尊贵的收信人）。

他走后我关上门，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又回忆了一通刚才听到的故事。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德隆格尔撒了一系列谎，他确实是一名间谍。我断定他到头来不得不如实招供，但万万没有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竟花掉整整十三个日日夜夜。

## 三

我前边已经提到过检查难民随身携带物品的重要性，例如，若不是搜出使之原形毕露的三样物品，蒂莫芒斯绝不会落网。亲身经验使我坚信，每个间谍都有使之服罪的某件东西，要么在他身上，要么在他的行李中。这件东西可能平淡无奇，只有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才能发现，但绝不会没有。一般说来间谍要执行两项任务，即搜集情报和送出情报。为此往往需要有帮助记忆的手段：获得的情报的简单记录，或者接收情报的外国地址，而且往往是二者兼而有之。当然也可能带有某种工具，比方说微型照相机。

如果间谍受过充分训练并且性格倔犟，人们无法使他招供，只有动刑才能从他嘴里掏出几个字来。但我已经说过，英国反间谍机构不采用动刑的办法。于是审讯德隆格尔越来越千篇一律：每天听他讲同样情节的故事，指出故事中的不合情理之处，然后听他自鸣钟似的回答：

"我已经说了实话，先生。"

这几乎耗费了我的全部时间，越来越多的案件等待我处理。一天天过去了，我抽不出时间仔细检查德隆格尔的物品。为了完成任务，

[1] 希姆莱，即海因里希·希姆莱，盖世太保头子。——译者注

只得每天晚上把部分物品带回我在切尔西的寓所。晚饭之后防空警报常常发出悲惨的叫声，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却俯身在带回来的物品上检查寻找，一直工作到天亮。强聚光灯照着不铺桌布、摆满东西的桌子，我全神贯注地一样一样察看。

首先检查银表和表链。我用放大镜一节一节检查表链，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把表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端详，看完这边又看那边，齿轮、发条和钻石都用放大镜照过，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接着我拿起折叠刀，长时间盯着刀身，一毫米一毫米察看，而后卸下所有的螺丝钉，把刀和刀把拆开，还是一无所获。

接着是一包“北国”牌廉价荷兰香烟。我把烟一支一支拿出来，仔细察看卷烟纸：上面可能有密写情报。从里到外检查一遍，仍然找不到任何东西。我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哈欠，眼睛疼痛难忍，决定停止检查，睡上几个小时。

第二天重新审讯。和前几次一样，没有从既顽固又委屈的德隆格尔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于是我想试验一个新方法。

两个同他一起逃来的人虽然供词差异很大，但看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其中一个说自己原是海牙的邮差，当然也就是德隆格尔的同事了。这个人身板单薄，嗓子里好像总是有痰，呼噜呼噜响个不停，大概是个肺结核患者。尽管其貌不扬，这架可怜的骷髅却闪烁着精神的光辉：他最大的愿望是参加自由荷兰部队。另一个是马来亚—荷兰混血儿，虽然说起话来言过其实，添油加醋，但却是个无害的人。

我把多嘴的混血儿传来，等他和德隆格尔在我办公室见面之后，我请求原谅，借故出去。我跑到隔壁房间，通过巧妙地安装在台灯上的窃听器听他们的谈话。德隆格尔对混血儿的话总是用单音节词和哼哼哈哈回答，听不出任何破绽。十分钟以后，估计不会得到什么结果，我返回办公室，让混血儿回去，重新开始审讯德隆格尔。又一次毫无结果。不管我怎样追问，他总是重复那句单调的回答：

“我已经说了实话，先生。”

就这样一天天、一夜夜白白过去了。白天审讯德隆格尔，晚上检查他的东西——现在轮到他带来的报纸和地图。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在灯下度过，借助于放大镜和化学试剂耐心地从报纸和地图的这一边检查到那一边，每一英寸都不放过。每当我感到这是在白费气力的时候，就再点上一支烟，呷一口咖啡。我对自己的结论已经失望，甚至想或许德隆格尔真的无辜，我过分热衷此案就像在松树上找针一样。我本人经常提醒同事们不要单凭直观印象办事，莫非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第二天上午，我又一次对付德隆格尔，指责他是间谍、祖国的叛徒。他的回答脱口而出，像回音一样在我耳边响起来。

“我已经说了实话，先生。”他有气无力、忍气吞声地说。我们俩谁也不想再看对方一眼。

“喂，德隆格尔，你太固执了。我对你坚不可摧的顽强精神表示祝贺，但你认为它能救你的命吗？难道你还不了解你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吗？你是间谍，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可以用比你回答问话更长的时间讯问你，迟早你会招供。可是你为什么非延长自己的痛苦不可呢？为什么还不承认事实，结束这无止无休的审讯呢？”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有人在楼道轻轻走过和远处市区传来的似有若无、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德隆格尔慢慢腾腾站起来，两眼盯着我，神态庄重地抬起右手指着天花板。虽说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内心感到一阵奇异的激情：莫非他真的要供出我期待已久的关键问题？

“先生，”德隆格尔说，“以我崇拜、尊敬的上帝的名义，以我亲爱的、在天堂的已故的父亲的名义，我庄严起誓：我忠于我的祖国，忠于荷兰王室，不是间谍！”

我全身瘫软，靠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德隆格尔猛地倒在椅子上抽噎起来，伤心地哭了大约十五分钟。我木然地看着他，直到逐渐恢复常态。

“无论如何，德隆格尔，你是间谍，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 四

第十二天晚上，嫌疑犯的物品中只剩下一本厚厚的英文—荷兰文字典，书皮和书页都有被海水湿过的痕迹。或许在这七百页当中隐藏着谜底，或许十五天的辛劳只不过是以虚幻的想象去指控一个无辜者。字典放在我的桌子上，旁边烟灰缸里的烟灰满得快要掉出来。窗外空袭像可怕的雷声闪电打破寂静，防空炮火噼啪炸响，炸弹爆炸声此伏彼起。

我点上一支烟，呷一口咖啡，查看了这本厚字典的外部，拆开书背，取下书皮，什么都没有发现。现在只剩最后一步了。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拿起放大镜，开始了一行一行地检查这本七百页的厚书的艰巨任务。

我一页一页地检查，每个字都不放过。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突然响起警笛声，宵禁时间到了。我关上灯，拉上灯火管制用的黑色厚窗帘，闭上疼痛的双眼。

好几处大火和晨曦把天空照得通红，一个哨兵迈着疲惫的步子在街上很慢地走着，脸被烟熏得黑乎乎的，艰难地穿过一片瓦砾。我喝了一口冰水，又回到字典旁边。

我继续一页一页地检查，仍然一无所获。现在只不过是在排除证明德隆格尔是间谍的最后一个可能性。

突然，在四百三十二页上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谜底：大写字母“F”下面有个小小的记号。可以肯定，还有另外一些记号标明其他字母。幸好作记号的字母按顺序排列，无须我做一次

颠倒字母的游戏。有记号的字母连起来组成两个人名和两个地址，显然就是德隆格尔情报接收者的姓名地址了。第一个在斯德哥尔摩：福洛肯·阿尼特，伊沙莱·哥列夫马格尼卡唐街 13–V。另一个在里斯本：费尔南多 · 劳雷罗，索隆 · 马丁大街。

我为圆满解开了多日的疑团而高兴，同时也由于一场拼命的争斗突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而头晕目眩——当我们达到愿望的最高峰时差不多总是这样。我一连休息了几小时。

回到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我派人把德隆格尔叫来。他弯腰驼背，显得更加衰老不堪，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冷冷地望着我。他一定和我同样心绪不佳，只是他不明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从口袋里掏出写有两名接收情报者姓名地址的那张纸。

“德隆格尔，”我说，“我第一百次问你，承认自己是间谍吗？”

他像有人按了一下电钮似的回答：

“我已经对你说了实话，先生。”

我把纸翻过来，让德隆格尔看清上面的字。在寂静的气氛中，我压低声音说道：

“德隆格尔，你生在荷兰，是荷兰人，但你要作为荷兰的叛徒死去！你念念这两行字！现在你招认是间谍吗？”

这就是案件的尾声。

德隆格尔看到他的喜剧已经演到尽头，顽固的堤坝一下子被冲垮了。

他确实是间谍，由经常光顾鹿特丹阿特兰达咖啡馆的德国谍报机关头子施特劳赫先生派遣而来。汉斯是德国人的同伙。其他两个人是清白无辜的，只不过在德隆格尔的虚幻故事中起了旁白的作用。

德隆格尔的供词由女秘书速记下来，几分钟之后打印完毕，由罪犯签字，这个案件结束了。

从职业角度来看，我对德隆格尔已毫无兴趣，但从个人角度，我

倒想了解主要是什么原因把这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推上了叛徒的道路。

“请告诉我，德隆格尔，你为什么成了间谍呢？为什么像你这样忠厚的人会犯下不可饶恕的叛国罪呢？”

他像一块一撕就碎的破布，慢慢腾腾，一字一磕巴地讲起来。这个未老先衰的人一生从没有什么乐趣，他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无私甚至可以说崇高的愿望：爱他的妻子。为了她，他什么都干过，正如他说的，甚至搞过黑市买卖。他到处碰壁，被贫穷和饥饿逼得走投无路。他什么都能忍受，唯独不能让妻子同样受苦，于是下了最大决心，同意为德国人充当间谍，为此德国人答应在三个月内每月付给他妻子十五英镑。等他回去后——如果能回去的话——给他一个年薪二百英镑的工作，但他必须自己设法回去，德国人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

他满怀希望离开荷兰仅十五天之后就被抓住了。他气喘吁吁地说，冒这一切风险都是为了妻子。我相信这一点。在这十三天中，德隆格尔第一次说出了值得我相信的话。

## 五

1942 年 11 月 13、16、17 日，德隆格尔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由贾斯蒂斯·罗茨利审判，被判死刑。

12 月 14 日，德隆格尔提出上诉，被检察官驳回。1943 年元旦，在旺兹沃斯监狱被处绞刑。

# 第八章　盖世太保中的君子

## 一

我的办公室在伊顿广场一座漂亮的大楼里。一天早晨，我正在翻阅外事警察的报告，看到一个单页，上面写有我当天要审查的第一个人的材料。他叫特尔·海特，四十八岁，已婚，有两个孩子，逃来之前是巴黎一家商行的秘书。由于持有外交护照，他没有费多少周折就得以入境（当然，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不会对持有外交护照的人严格审讯，而是交总部反间谍人员处理）。以审查特尔·海特开始一天的工作并不使我感到不快，但万万没有料到，面临的是我整个反间谍生涯中最众说纷纭的一宗奇案。

我拿起电话请人把特尔·海特带来。

他进来之后，我请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地足足观察了他好几秒钟。这是个难以言状的人，无论在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纽约的第五大街、巴黎的爱丽舍田园大街还是柏林的菩提树大街，海特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目。同其他人的唯一不同之点正是他与众人无异。他是个普通的人，浅褐色的头发，中等个子，身材适中，不蓄胡须，模样无任何特殊之处。尽管我记忆力超出常人，对见到的人过目不忘，但要描绘他的尊容却无能为力。十年之后，我还会把他同任何一座大城市街道上和砖头、灰浆、水泥、沥青打交道的不起眼的人混同。

我几乎立刻领悟到，混杂到人群当中而不引人注意的本领是间谍

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位蓄有惹人注目的唇髭、面目和善的人或者一个过分肥胖的人不会不为人察觉，但是一个毫无特征、给人留不下任何印象、不为人注目的人却非常危险。我对特尔·海特先生颇感兴趣。

“请你把知道的一切都讲给我听。”我说，“为什么离开法国，怎样逃出来的，走的那条路线……总之，你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切！请慢慢回答，不用着急。”

特尔·海特的声音酷似其人：既不尖又不粗，甚至有点单调。虽然身为高级职员——一家荷兰商业机构的秘书，他说他一直想为当前折磨着整个世界的问题——战争——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所以加入了巴黎至第戎之间的志愿队。

我必须对出逃的线路作一番说明，这对特尔·海特的故事极为有用。逃出荷兰，通过比利时和法国，穿越西班牙边界到达葡萄牙，有好几条路可走。每条路线都被分为若干小段，每小段都由一个志愿人员或志愿人员小组帮助难民通过。对于难民来说，公路实际上成了出逃的工具：从某个地下室到二十英里外的公共汽车停车站以后，有人再把他们安排到链条的另一环上。虽说把路线分为若干段会带来某些困难，增加被发现的危险，采取这套办法最主要的好处是，即使盖世太保抓获其中一个人严刑拷打，他也只能供出链条相邻的环节：送来逃亡者和准备接待逃亡者的人。

罗马天主教修道院对通过被占领的法国的逃亡路线提供了最大的方便。修道士们自愿收留难民，甚至送给他们教服化装，让真正的修道士把他们从一个修道院送到另一个修道院，一直送到法国南部[①]。倘若有人写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关难民逃跑的书——这个主题会非常有趣——读者们就会看到比利时和法国的修道院院长们所起的积极作用。

---

① 见第二部分第三章弗拉厄斯的故事。——作者注

让我们回到特尔·海待的故事上来。

他接着说，荷兰难民一到巴黎，就用经常变换的简单暗语打电话到他所在的机构通知他。他亲自负责把难民在巴黎隐藏几天，待路途安全时又亲自把他们送到巴黎的里昂车站，那里已有转运者买好车票，送他们前往第戎。

“几个月里一切顺利。”特尔·海特以毫无特色的语调说（口音和所用词汇反映了他的性格，既不粗俗浅薄也不温文尔雅；从所用句子来看，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单调的言谈中既无生动的比喻又无能使这令人厌倦的场面略增光彩的突然停顿）。不久之后他开始感到害怕，送出的人接二连三被盖世太保抓获。每送走一批人他都提心吊胆等待他们平安到达第戎后用暗语发来的消息，但总是杳无音信，因为谁都没有打电话的勇气。他心情坦然的时候越来越少，而神经紧张与日俱增。每次电话铃响，街上有任何动静或每逢有人敲门，他都不寒而栗，唯恐这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盖世太保逮捕、拷打他的先声。他坦率地说，他也不愿意为公司造成损失，因为一旦发现它雇用的职员同抵抗运动有联系，公司就会被封闭。除此之外，他是已婚的人，不得不想到妻子和两个孩子。如果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自卫？虽然他们清白无辜，会不会被当做人质、作为他的同谋受到惩处呢？

我满怀同情倾听他的谈话。平心静气地听取一个对神经失去控制的人的证词是件容易事，但是对一个有家庭拖累、无亲无友、孤身一人住在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执行一项危险任务却不那么简单，稍有闪失就会身陷囹圄，命丧黄泉，累及妻子儿女。况且特尔·海特成为违法分子不是出于任何人的胁迫，而是自愿为荷兰做点事。

现在，他觉得心力已经用尽。

“所以，”他说，“我决定结束活动，洗手不干。”一个星期过后，盖世太保的影子不再打扰他的生活，他开始能自由地呼吸，安静地睡眠。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临。

某天上午，一个自称叫皮埃特斯的人来找他，说几个持有重要情报的荷兰人急于前往英国，携带的文件至关重要，如能及时送到，完全可能改变战争的进程。他们只能指望特尔·海特，只有他才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提供帮助。

海特能最后一次为这些人逃跑提供方便吗？他摇了摇头：这太危险了。盖世太保已经在第戎捉住了他的几个同谋，发现了线索。不，不能再冒这么大的风险。

皮埃特斯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坚持要他帮忙。他乞求、央告，说这并不费事，盖世太保没有理由怀疑他特尔·海特，不会有任何危险，并且这是最后一次。完成这项任务之后，他会为尽到了爱国主义义务而心安理得，成败在此一举。皮埃特斯一边说一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批驳着海特苍白无力的论点和表示的歉意。终于，他脆弱的性格软下来，防波堤崩塌了。皮埃特斯马上利用打开的缺口要求赶快解决。他说，机不可失，特尔·海特动作越快，越能更早恢复他荷兰商人恬静的隐匿生活。

长时间犹豫之后，海特终于同意打开逃亡的闸门。当难民聚集在他办公室的时候，他看到这批人竟达十六个，不免大吃一惊。原来想大概十二个左右，因为人数越多，引起盖世太保注意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现在他已经骑虎难下，只得让他们第二天火车开前一小时在指定的咖啡馆集合。他强调说，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到达集合地点，不准互相交谈，人到齐以后他站起来付账作为出发信号，这时十六个人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地出去，随他到里昂车站，那里向导已经买好车票等他们。他——特尔·海特——同向导交谈几句以便大家认识他，然后他们分头找向导拿车票并跟他上车。

等大家都明白了他的规定，海特站起来告别，并再次讲明要求，请他们第二天务必准时到达集合地点。

他回到家里，忧心忡忡，迟迟不能入睡，唯恐会出什么事。想到

自己如此脆弱，轻易被说服重新拿脑袋去冒险，他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第二天上午，他很早就到了咖啡馆，要了一杯热饮料，神经极度紧张地等待着。人们开始陆续来到，一个个神态安详地走进咖啡馆。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人，习惯于避开公众的注意。已经来了七个人，然后九个，十个，十二个。几分钟之后第十三个人安闲自在地走进来坐下。又过了一会儿，第十四个出现了，接着第十五个走了进来。特尔·海特看了看手表，还不见第十六个人的踪影。又过了一刻钟，仍不见最后一名出现。特尔·海特为这无法解释的拖延焦急起来，额上沁出了汗珠，没有勇气动一动。第十六个人是迟到了还是走错了路？他也不敢久等，拖延时间对大家都有危险，并且开往第戎的火车准时发车，乘客必须准时进站。时间一分钟一分钟飞快地过去，他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看着空杯子以掩饰过分紧张的神经，避免频繁地朝咖啡馆门口张望。他伤心地低着头，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不祥的征兆。他从没有转运过这么大批的人，也从没有一个逃亡者让人如此久等。

最后，他们等得要发狂的时候，时间到了，必须立刻动身，不然就要误车。特尔·海特走到车站，把这批人介绍给向导，并通知他还少一个人，然后慢慢腾腾、心惊胆战地回到办公室。他说，后来整整一夜都在惊魂不定中度过，他的担心甚至在肉体上都有感觉。第十六个人到底出了什么事？莫非遭到盖世太保逮捕？他此时此刻是否正在受刑，呼号着供出一切？

特尔·海特心烦意乱，无计可施。假若尚未被人供出，他也必须设法逃跑。第二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尽量不理会自己麻木的下意识，以同样的效率处理日常工作。他觉得自己像掉进捕鼠器里的一只小老鼠，不由自主地去猜想没有到来的那个人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时，电话铃响了。

一个生疏的声音说：

“请你下午三点到马莱尔布大街地铁车站外边等我。”

特尔·海特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谁呀？”

只听对方回答说：

“我就是昨天没有到的那个人，有紧急情报要告诉你，请不要忘记按规定时间到马莱尔布大街车站，事情至关重要！”

电话里再没有声音。

海特下意识地擦擦额上冒出的汗珠，困窘已极，不知如何是好。头脑慢慢恢复活动之后，他考虑了好长时间。莫非那个电话是个圈套？但如果不去指定地点，可能失去或许能使他从现在的可怕境遇中挣脱出来的说明。去还是不去，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这个抉择很可能与他性命攸关。他考虑再三，认为“去”不会使他失掉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打电话的人是敌人的特务，说明他早已被列入黑名单，当然德国人已经了解前一天他曾帮助难民出逃，也就能通过电话号码查到他的地址，即使他不去指定地点，敌人也能找到他；但是如果来电话者确实真心实意给他送信，可能间接拯救他的性命。他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从感情上，他不想去；从逻辑上，他又不得不去。

最后，虽说有点勉强，他还是决定前往。他乘地铁到了马莱尔布大街，走出车站，约莫下午三点钟的光景。他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正是头一天难民中没有到的那个人，但是已经变了装束：现在第十六个人身着深色制服，脚穿皮靴，腰系黑色皮带，皮带上挂着手枪，制服上缀着“卐”字符号——盖世太保上尉！

特尔·海特感到自己像一只被毒蛇吓昏了的小兔，钉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当他清醒过来，意识到面临的危险的时候，才用眼光寻找脱逃的办法。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企图，微微一笑，威严地举起手枪说：

“你休想逃掉。”

盖世太保拉住他的胳膊，将他带到地铁进口处一个人少的地方说：

“你因为帮助政权的敌人逃跑而被捕。事实无法否认，你知道，前天你布置出逃计划的时候我本人在场。由于你透露的情况，十五个难民到达第戎后立刻被捕，现在正在狱中等候受审。”

特尔·海特想抗议，但说不出话来。他落入了圈套，无法脱逃。

盖世太保和气地说：

“虽然我说一口地道的荷兰语，但你听得出来，我是德国人。皮埃特斯，就是三天前找你联系的那个人，是荷兰良民，热爱祖国，为祖国竭尽全力，在我手下工作。”

一阵短暂的沉寂使特尔·海特能对自己的处境稍加思考。

盖世太保接着说：

“可是，你看，今天下午天气多好，没有必要马上把你带往总部。正式逮捕你之前我们一起散散步，在树下找个凳子坐一会儿，我想听你谈谈自己的情况。我很想知道像你这样一位仪表堂堂的先生为什么会干这种背叛祖国利益的勾当。”

于是，特尔·海特和盖世太保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走到大街上，找一条凳子坐下来。据特尔·海特说，盖世太保上尉向他提了几个问题，问了他的工作、他的案子、家庭和其他私人情况。上尉说话时一直心平气和，因为如果他语气生硬，海特由绝望激起的勇气驱使，什么都不会讲。但是，谈话慢条斯理地进行，宛如两位朋友促膝谈心，受害者就自然地回答了一切。他谈到自己的妻子，以慈父天生的自豪谈到两个小儿子，还谈到他在巴黎住的小小的一套房间，那里是他真正的家。

盖世太保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提出一两个问题，对海特的健谈非常高兴。后来，海特又对德国人讲了他为什么愿意为难民服务，讲了自己能为荷兰贡献一点力量感到如何幸福，等等。

大概半小时后，盖世太保打断他的话说：

“我很有眼光，了解人的本性。通过长谈中对你仔细观察，发现

你不是我要捉拿的那类罪犯。你讲的一切使我深受感动。你的行为举止表明你是一个为了你所理解的义务竭尽努力的人。如果我处于你的地位，也许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特尔·海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盖世太保继续说：

“我叫……（说到这里，特尔·海特中断了他的故事说：‘我不能说出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其原因下边我要谈到。’）你要对我保证永远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我打算给你十分钟让你逃走。当然，多给一点时间更好，但这不可能，因为皮埃特斯跟着我们。你知道，他是我的同伙，按照我们的规矩，他要向上司汇报我做的一切，正像我要汇报他的一切行动一样。他随时可能来，你马上走吧，乘第一趟往南开的火车……祝你运气好！”

他轻轻推了特尔·海特一把，仿佛为他指明路途。

可怜的海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担心这又是一个圈套——当他逃跑的时候，盖世太保会从背后向他开枪。但看德国人话语诚恳、笑容可掬，海特结结巴巴道声感谢就走了。

他直接回到家里，很快同妻子和孩子们吃了告别饭，拿了几件日用的东西和一些食品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家。多亏他了解情况，在巴黎北站乘火车南下，穿过西班牙边界，克服了一些不太大的困难到达葡萄牙，找到荷兰驻里斯本大使馆，和其他难民等了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到了联合王国。

这就是他的全部经历。

## 二

我看了他一会儿，深深吁了一口气，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是嘘声。我说：

“真有意思！我听难民讲过的故事数不胜数，有的饶有风趣，有的平淡无奇，但你讲的故事应当受到嘉奖，最有才华的幻想小说作家也会自叹弗如！”

特尔·海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来他毫无恶意，但面有愠色。

“这是什么意思？”他有点惊讶地问。

“让我考虑考虑你讲的这一切。”我扳着指头历数他讲过的事件，“第一，你做过难民转送者；第二,一个难民没有按规定集合；第三，第二天有人打电话约你在某处会面；第四，和你会面的是盖世太保特务,他把你逮捕;第五,盖世太保放了你,请你不要暴露他的姓名;第六，他给你十分钟时间逃跑，但你没有利用这十分钟脱逃，反而回到家里，不慌不忙地同夫人和孩子们一起进餐，然后才去车站。这一切简直是荒唐透顶！”

特尔·海特忍住愤怒说；

“可是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真实……”我说，“都说真实比虚构更离奇，而你的真实离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你讲的故事中起码有三点无法令人接受。首先，盖世太保的特务们——众所周知——是从最冷酷的虐待狂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当做满足其虐待癖的工具，个个残酷无情、恶劣透顶，对任何善意的表示都无动于衷。尽管如此，盖世太保的这位君子却对你大发慈悲。你的经历感动了他，以至他为了你不惜冒生命危险。请不要忘记他本人也说过，皮埃特斯正在跟着他。如果皮埃特斯知道使人垂涎的鸟已经高飞，你的盖世太保朋友会落个什么下场呢？”

特尔·海特一声不吭，我更加铿锵有力地说：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位罕见的盖世太保怪物。你讲的故事实在令人神往，可是他完全没有理由向你透露他的姓名，再让你答应永不披露。这是为什么？我要问，这是为什么？既然他不愿意让

自己的姓名张扬出去，为什么还要告诉你呢？莫非认为他的姓名会对你有什么用途？显然不是！假如你遭到逮捕，受刑不过，被迫招供的话，至少会使他获咎。但你不失为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一个真正的间谍，你向祖国的敌人作了保证之后，不会收回这一保证吧？”

“不会。”特尔·海特从牙缝里哼出这两个字。

“终于，”我说，“我们接近故事最奇特的情节。你有十分钟时间可以逃走，这是救你一命的珍贵的十分钟。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像后面有魔鬼追来一样跑掉。但你却不同于任何人，没有这样做。你返回家里——盖世太保能找到你的唯一地点，不慌不忙地吃过饭，和特尔·海特夫人及孩子们互相拥抱，垂泪话别，然后又不慌不忙地准备做一次舒适的旅行。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认为像我这样一个致力于这类工作多年的人会相信你的胡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先生，你也太小看我了！”

“看起来是可笑，”特尔·海特说，“这我承认。可是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

“我非常怀疑。”我说，“在同一个逃亡的故事中有一个漏洞还可以轻信，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两个不可能的事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出现三处谬误就实在难以令人置信了。我只想弄清真相，并不急于求成，可以日复一日地听你讲述。你马上就可以重新讲一通你的经历，重复你对我讲过的所有细节。我想再一次听听所有的，哪怕是最无足轻重的事实——或者虚构。”

在反间谍工作中弄清真相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嫌疑犯多次重复他的经历。如果他的故事是虚构的，每次讲述都不免有些小的变更。只有具有惊人记忆力的人才能想起他向一个耐心而又沉默不语的反间谍人员第一次讲述的经历的所有细节。不断重复一个虚假的故事也还常常对嫌疑犯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时间一久，不断重复讲述的情节开始显得虚弱而不现实，甚至讲述者也开始怀疑他本人的说法，这

就使反问有懈可击。

根据这条原则，我让海特多次重复他的经历，而不采用肉刑或其他暴力手段。前面已经谈过，我本人对任何属于拷打或造成肉体不适的办法都深恶痛绝，英国法律对此也严格禁止。

任何被告只要能证明供词是审讯者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他就可以声明供词无效，从而有可能免除对他的一切指控。且不谈伦理和道德方面，肉刑本身也不是弄清嫌疑犯真相的万无一失的办法，很多不法分子在肉刑之下都会供出极其不合逻辑的事情。犯人会给自己乱加罪名企图免受折磨，如果已濒临死亡，他会胡乱招供以求速死，结束难以忍受的苦痛。

在一个阳光充足的房间里，特尔·海特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受审。审讯按时中断以便进餐，下午的审讯准时结束，留待第二天继续进行。我们不采用苏联内务部使用的，一直到第二次审讯不准嫌疑犯睡觉的可恶办法。他们的审讯人员不断轮换，使嫌疑犯在经过充分休息的诡计多端的审讯人员一连串问题的追问下头昏脑胀。如果想在伦理和法律的严格界限之内对待特尔·海特，我必须以同样严格的方式行事。毫无疑问，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之中谁具有更强的记忆力和意志力。

每当特尔·海特重复他的经历，我都耐心倾听，总想抓住一些哪怕是很小的破绽。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他总是重复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细节，甚至强调之处也完全相同。每次谈完之后他都垂头丧气地问：

“我还要把我的经历重复多少时间呢？上帝知道我不是撒谎者。我承认我的经历不同寻常，然而它是真实的。莫非你非让我编造一个更容易接受的不成？那时候你就会相信？”

我对特尔·海特的尊敬与日俱增。如果他确实是间谍——我对此几乎深信不疑——那么他肯定比其平庸的外表精明强干得多。

一开始我曾断定他会玩我已经解释过的"故事中的故事"的把戏[1]。

敌人的间谍都备有一旦被捕就马上讲述的"第一套故事"，例如特尔·海特在其第一套故事中就企图凿凿有据地解释他所进行的活动和出逃的原因。但是，如果第一套故事出现矛盾之处，受到诘问而又不能自圆其说，就需要讲另外一套故事。比如说，为了给自己携带大量现金到达英国辩解，狡猾的间谍会声称是当地抵抗小组的司库，突然被迫逃命，没有把保存的款项交回。无疑，对他来说这件事不够光彩，因为作为替抵抗运动保存巨额现款的司库携款出逃，辜负了人们对一个爱国者的信任。可以设想，某个精明的反间谍人员完全能够推翻这一点，使嫌疑犯知道他这样胡扯无济于事。如果间谍早有准备，就开始讲述另一套经历，即所谓"故事中的故事"。他大概会这样说：

"很遗憾，先生，看来我无法瞒过你这样机敏的人。我曾想取得你的信任，但未能得逞。我讲的经历不大真实，现在向你彻底交代。我确实是抵抗运动的成员，但地位低下，当然不会被认为有能力担当司库的重任。当盖世太保发现我们的线索时，我不得不同其他人一起逃跑。我到了……（这时他会说出一个小村庄的名字）我筋疲力尽，饥饿、疲劳和孤单成了我仅有的伴侣。几个村妇觉得我有些迷人之处（他莞尔一笑），其中一个老太婆怜悯我，给我吃的，供给我住处。我承认我本人软弱，但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她的好意，于是就在她家住下了。除了住处而外，我还得到她已去世的丈夫的几件衣服，还有食品和零用钱。这样过了一两个星期。可是她对我肉体上要求太多，使我筋疲力尽。从年龄上看，她甚至可以当我的母亲，并且即使年轻的时候她也没有什么姿色。最后我实在无法忍受，就乘她一天早上还在熟睡，拿了她藏在地板下面的一些钱逃了出来。我知道这样做不会给人

[1] 请看第一部分第三章附录。——作者注

留下好印象，但当时只能如此。这是实话。也许你现在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一直隐瞒出逃的真正原因。”

当然，这个嫌疑犯事实上是领取德国人津贴的间谍，但他这套“故事中的故事”战术足以使最精明的审讯者上当。很奇怪，我们都更倾向于相信别人说的我们朋友的坏话而不易相信对他的赞美。讲一个自己丢脸的故事更不会使人生疑，因为一般来说撒谎者总爱往自己脸上贴金。总之，一个有能力推翻第一套经历的审讯者完全可能以为在第二套经历中抓到了事实真相而沾沾自喜。

讲了这些题外话之后，让我们再回到特尔·海特的案件上。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对第一套经历讲得厌倦，最终搬出第二套，但是他不屈不挠，总是坚持讲同一个经历，同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经历。每次重复他都神经极度紧张，有时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同时我也心情烦躁，几乎歇斯底里起来。如果再听一次盖世太保君子的美好故事，我真会发疯的。

于是我决定改变战术，集中力量设法了解盖世太保上尉的姓名。一开始，特尔·海特遵守他决不透露的诺言，这使我失去自制力，大声咆哮、辱骂，用尽丰富的语汇称呼他，指责他宁愿遵守一个被迫许下的诺言也不想为祖国效劳。显然是我的盛怒动摇了海特的决心，一刻钟之后，他屈服了：

“那个盖世太保的名字叫冯·温特菲尔德上尉。”

我马上追问他经历的其他部分，但一无所获。他固执地坚持说已经交代了一切真实情况，不更动其中的任何一个字。我好说歹劝，仍然无济于事。特尔·海特绝望了，泪水涌出了双眼，像疯子一样不断重复说，不管他的故事多么不可思议，他讲的是实话。海特几乎成了白痴，我也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就这样，两个中年男子谁都不想再看对方一眼，怒气冲冲地结束了一天。

第二天上午，一切重新开始。他再次讲述经历，我再次指出其中

不可信之处。十五天里，海特整整讲了十二遍，从未遗漏过任何细节！如果说一开始我们俩都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那么十五天之后两个汉子都成了一摊稀泥，不管是我还是他都想把对方撕成碎片。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又渐渐相信他的故事是真的。或许他说的是实话，因为一个真正的间谍会把事情说得更易为人接受。嫌疑犯即便安然度过几次审讯，只要一次引起怀疑也要被列入黑名单，被预防性拘留，或者能够自由行动，但经常被监视。特尔·海特这类间谍都知道，像他这样做，会使他无法进行任何间谍活动。

在第二次受审的时候，特尔·海特本来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坚持可信部分而把其余部分掩盖起来。他可以承认组织过出逃（这一点可以由好几个到达英国的难民证明），说盖世太保怀疑到他的时候，他就决定按他为其他难民安排的路线逃走。类似的故事加上当时的细节很容易被人轻信。假设他确系间谍，那么为什么又讲出“多愁善感”的冯·温特菲尔德上尉，供出答应这个人不泄露其姓名，交代出给他的十分钟（实际上是几小时）呢？——除非他确实是个非凡的人，除非他讲的故事真实可信。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对他有利。任何一个来到生疏的国度的特务都要随身携带通讯工具以便把搜集到的情报发出去，或许还带有情报接收者的地址。例如，可能在行李中藏有底片只有大头针针头一样大小的微型照相机，体积很小但发射能力强大的发报机或者密写药品，也许还有用密码书写或用记号标在书报的字母上的一两个在中立国的地址。被派往国外进行活动的间谍分子肯定带有显示其罪行的细微之物，这几乎是一条定律。但是，我亲自仔细检查了特尔·海特的行李，撕下了箱子的衬布，起下了手表上所有的螺丝，一节一节地检查了表带，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物。

经过十五天的审讯，我认定任何其他方法都不会奏效。他的神经深受刺激，甚至不能连贯地回答问题，说话结结巴巴，别人稍一插话

就惊慌失措，样子甚是可怜。我几乎深信不疑他是无辜的，但无权释放他，只能让他处于监视之下。

难于接受也不易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经过反复审讯证明无罪的人还要像囚犯一样受监视？

回答很简单。和平时期，提出有罪证据的责任几乎完全在检察官，但即使证据对被告不利，只要它不是在所有细节上都十分完整，任何一个英国陪审团或法官都不会判处被告有罪。并且，在和平时期，人身保护法规定对被告的拘留不得超过必要的时间。甚至在指控可信的情况下，被告一直到审讯结束之前都享有交保释放的权利，除非指控他的罪行十分严重或者警察当局认为有理由不能保释。在重视个人自由权利的国家里都是这样：宁肯让几百名罪犯逍遥法外，也不让一个无辜者含冤服刑。

战争时期的情况却迥然不同，最有讽刺意味的方面之一就是人身自由。一个未被证实有罪而享有自由的间谍足可以毁灭给予他自由的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战争时期，宁肯在没有解除怀疑之前让一百个无辜者身陷囹圄，也不能任一名间谍逍遥法外。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之奋斗牺牲的保护人身自由的法律如此猝然颠倒，只能增加战争带来的恐怖和疯狂。那些一时无法令人满意地证明自己无辜，根据战时规定尝过铁窗滋味的善良人应当把这段遭遇看做战争的后果。对于像我这样对他们被判刑负有责任的人聊以自慰的是，他们同那些落入盖世太保魔爪的人不同，受到良好的对待，并且最后安然无恙地获得释放，没有遭到由于战争失去生命或终身残废的那些人如此巨大的不幸。

特尔·海特被囚禁仅仅一个星期之后，从里斯本传来一个奇怪的消息：他的妻子遭到德国保安警察逮捕。被捕之前她曾对邻居说，曾帮助她丈夫逃走的一个盖世太保来过她家，对她说根据她丈夫的意思，应该把保存的四十万法郎交给这位军官作为帮助海特逃走的酬

谢。海特太太反驳说，她家没有保存如此巨额款项的安全之处，况且生活简朴，并不阔绰。军官草草搜查了一下就相信了海特太大的话。临走之前，军官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读者们完全可以猜到，是冯·温特菲尔德上尉。这次，他好像对自己的身份未采取任何预防性保密措施。

根据我的命令，特尔·海特立即被释放。假使他是间谍，他的妻子肯定不会遭到德国人逮捕，并且，妻子和他讲得完全吻合。很快，特尔·海特在荷兰流亡政府得到一个显赫的职位，然后又在难民部工作得很出色。好在他没有因为我坚持对他审讯而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对我耿耿于怀，因为他知道我只不过是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我可以高兴地告诉读者，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不了解更多的详情，只希望特尔·海特夫人在被德国人监禁期间没有受苦，希望现在她、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团圆，幸福。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想回过头来交代一下故事开头的几件事。

后来我才得知，参加特尔·海特最后一次行动的人在第戎被捕，可能被盖世太保处决，但其中一个人逃了出来，成了一个名记者和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以其出众的才华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他的名字叫瓦兹·边亚斯。

皮埃特斯——盖世太保军官的同伙、诱使特尔·海特组织最后一次逃亡的人——后来被查出是个卖国贼，有名的荷兰纳粹分子，战前曾在阿姆斯特丹开过雪茄烟店。除此之外，对他一无所知。他和他的许多同类一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没留下任何痕迹。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本故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盖世太保上尉冯·温特菲尔德。是他主动给他的猎物第二次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没有恫吓别人而悄然离去。我始终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对特尔·海特如此慷慨：是为他的经历所感动呢，还是为了牟利？我想实际上可能是后者。因为特尔·海特并不富足，在他们两人唯一的一次单独会面

中没有订下什么付款协议，他前往海特家中只不过是碰碰运气的做法，但未能如愿。

冯·温特菲尔德是命运的牺牲品，虽然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点。当他的野蛮残忍的同伙们通过特尔·海特夫人得知他如此慷慨大方的时候，肯定不会长期容忍这种奇怪的现象——盖世太保中的君子。

# 第三部分　为“抵抗运动”效劳

# 第一章　考核间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体格健壮、仪表英俊而不穿军服的小伙子，常常会遭到妇女的质问和白眼。这种举动是不难理解的。一个青年人干吗不上前线和大伙儿一起战斗？怕当兵吗？休假期间不着军服的军人，或者仪表堂堂但却有内病如心脏病或其他缺陷的人，当众受辱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可恶的风气在第二次大战中幸而没有重现。当时，大家对不穿军装的人没有那种歧视，军人也好，平民也好，大家都置身于战争之中。空袭一来，轰炸机一到，人人都可能立即丧命。说来似乎荒唐，其实，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居民死亡的危险性，较之驻扎在中东及其他战略要地身着军服的士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然而，旧习惯是不易改变的。亲生儿子在前线日夜遭受死亡威胁的母亲们，对那些住在豪华的公寓里、不为战争出力的“花花公子”，是决不会好眼相看的。毫无疑问，逃兵和佯称有病的人是有的，但毕竟为数不多。某些住在豪华公寓里、表面上懒懒散散的青年人，有时会突然失踪，一去永不复返。他们并非人们常说的“浪荡公子”，而是不辞辛劳的谍报人员。

这种人令我钦佩。作为一个间谍，不论是维护或反对某个国家，毕竟是个勇敢的、有胆量的人。在朋友面前表现勇敢是一回事；在外人中间，包括在敌人面前也能表现勇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一个间谍，要时刻保持警惕，对周围的人要有戒心，有时甚至会因一句梦呓暴露自己而被识破。那些不了解“这一行”的人，或者和谍报人

员没有密切交往的人，无法想象他们经常所处的紧张状态——谁也无从了解亲切地拍着你的肩膀的人究竟是朋友呢，还是敌人。

英国政府的谍报人员，大多数是健壮而英俊的年轻人。他们表面上悠闲自在，蒙受着外人投来的嘲弄的眼光。他们经常采取的到达目的地的办法是跳伞。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身体已不那么灵活，很难夜间在崎岖地带降落，也经受不起着陆时的剧烈震动。英国的谍报人员中，大多数是外国人，他们一般被空投到故乡的土地上，有的甚至要落在自己家门口。为了不让亲人和朋友辨认出来，其中很多人经过外科整容变得面目全非。谍报人员中也有英国人，但他们对欧洲大陆和异国的风土人情及其语言了如指掌，完全像个当地出生的人。

在派出执行任务之前，这些人要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包括跳伞和各种爆破技术，他们住在远离城市的特种学校里，课程有：乔装术、无声暗杀法、设置诱饵、收发报、摄影、密写、熟悉所去地区的自然环境等。智力和体力训练的标准都很高，只有第一阶段测验合格的人才准许继续学习。纪律很严，不得酗酒，不得有情人，谈情说爱常常使间谍送命，因为感情是难以控制的。

经过训练后，体力和智力都达到高标准的青年才可以派去执行艰巨的任务。尽管经过精心的训练，他们的死亡率仍然是惊人的。有一次，一批英勇精干的荷兰青年被盖世太保一网打尽，原来，一个早已混进来的奸细告了密。有时候，间谍落到敌人手里，纯粹是由于自己无能。这不仅意味着我们长期训练不甚见效或有关我们训练方法的宝贵资料落到了敌人手里，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领导对谍报工作的看法有问题。让一个勇敢的人去执行一项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只占十分之一，这是一码事；但如果让一个人去完成一项使命，成功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或者根本没有可能，那么，这等于让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去白白送命。

在这种情况下，在执行某项任务之前有的领导便决定派出在反间

谍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官员对这些刚刚训练出来的新手进行一次考核。如果考核通过，他就可以相信自己能对付盖世太保了；如果考试失败，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而是要接受不再重犯同样错误的教训。这项决定付诸实施后，我奉命去考核即将离开英国的一批间谍。考试很严，除了肉刑之外，我用了盖世太保惯用的一切手段。

几天之后，我接待了三个青年人——三个英姿飒爽的男子汉。个个目光炯炯、健壮、干练，而且和蔼可亲、机智、聪明。

陪同来的教官显得矜持而自信，我问他：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后天。”他回答说。

“他们怎么样？”

“很好，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

我把三个青年又打量了一番。他们服装整洁，不新也不旧，确像三个去做生意的比利时商人。我走到离我最近的那个青年面前，把手伸进他的西装背心里，拉出他的领带，翻过来一看：伦敦，西一区，牛津街，舍尔弗雷捷斯大百货公司。

“把他们带回去！”我对陪来的教官说，他显得颇为尴尬，“如此说来，无需再提别的问题了！”

我回身倒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幸好还没有派出去。”我暗自思索着。让那几个勇敢的小伙子不明不白地去死，这是犯罪。我简直不理解，花了这么大力气，对他们进行了智力和体力训练之后，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疏忽。我伤心地摇了摇头，想到：就是这些不该有的粗心大意，断送了多少宝贵生命，浪费了多少钱财。

六天以后，我又受命去考核一个去比利时的青年，他将要跳伞着陆。这一回，他们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发现任何足以暴露身份的东西。

我对他说：一旦你被盖世太保抓获，你怎样对他们讲“自己的来

历”，而且要讲得合情合理。现在先讲给我听听。下面就是他给我讲的“来历”。

“德国入侵比利时后，我逃到了法国南部的尼斯，在一个花圃找到了工作，当了八个月的花匠。后来，我听说比利时的情况有所好转，就决定回布鲁塞尔。”他站在那儿，说得活灵活现。

“你在花圃干什么活？”我用佛拉芒语问他。

“翻地，先生！”

“把你的手伸给我看看！”

他伸出双手，让我察看。手指细嫩，没有老趼，也不粗糙；指甲光滑，没有一丝裂纹，也没有变色。翻了八个月的地，谁还能长着一双像坐办公室的人那样柔软的手呢！

我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出于怜悯，也出于恼怒。

“很好。再讲一点你在花圃里的事，都种些什么花？”

“玫瑰和（他停了一会儿）……丁香。”

沉默片刻。

“倒挂金钟呢？”

“不，不种倒挂金钟。”

“立金花呢？”

“嗯，对，种立金花。”

“啊！在地中海沿岸种立金花？我的年轻人！你可要记住，你应当是个种花的行家，我是把你当做在花圃里干过八个月的人啊！回到你教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也是在拿你的生命去做无谓的冒险。”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采取了“第二个来历”——或者说“故事中的故事”——的战术。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附录中讲训练间谍方法时已提到过。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对那些讲述者本人来说是丢脸的事，往往置信不疑，而对他光彩的事，却不肯相信。

特别是盖世太保的审讯人，由于职业关系，他们总是傲慢地揭别人的短处，甘愿接受表示可疑分子弱点的供状。这个青年，除了作为花匠的“来历”外，还有“第二个来历”。盖世太保一定会怀疑他开头讲的那个“来历”的真实性，于是，他就遭到毒打。他屈服了，讲道：“看在上帝的面上，住手吧！我说，我知道的都说，我受不了啦！我没有在尼斯住八个月，也从来没有见过花圃。在尼斯，我才住了几天，我身无分文，只得求人行好。有一个女人，大约五十来岁，染了头发的，把我带到她家里。没过几天，我就受不了啦，她的美意对我来说代价太大了。懂得我说的意思吗？像我这样一个饿汉，当时别无选择，但是，我再也不能跟她同床了，实在受不了。几天之后，我就溜了，还拿了她的一些钱和首饰作为告别礼物。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躲着警察。幸好找到了一个‘偷渡船工’，给了他一笔小费，我才来到了比利时。”

这类故事，盖世太保最乐意听。打那以后，凡是派去执行任务的间谍，都精心编造一个“故事中的故事”，以应付意外。无疑，这种“来历”保住了不少人的性命。

经我考试过的男男女女中间，只有一个人称得上神态自若、毫无破绽可寻。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间谍，他在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最危险的心脏地带活动，从没有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

当有人通知我吉恩·杜弗先生要来见我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也是个健壮、聪明的青年人。然而，门一打开，我不禁目瞪口呆，站在我面前的，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一幅漫画。这“家伙”真像个十足的乡下白痴。不光模样吓人，下颌骨比一般人的大出三倍，他那暗淡的、深深下陷的蓝眼睛毫无表情，没有一丝聪慧的光彩。他的嘴唇又厚又湿，口水从嘴角的一边直往下流。他斜眼看看我，做了个鬼脸，便放声大笑起来。

“怎么回事？”我生气了，“你笑我吗？”

陪他来的教官微笑着说：

“这位是吉恩·杜弗先生，如果他能在你这里考试通过，就去给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谍报人员送经费。”

“从外表看，他不需要反间谍人员来考试。我想，精神病专家也许对他更为有用。不管怎么说，考一考吧！”

我转向这个怪人，他又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起来，用又粗又脏的手指指着我桌子上的墨水瓶，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然后，又看了我一下，眨眨眼，刹那间，一丝智慧的微光从他眼里闪过。

“多大岁数了，杜弗？”我猛然用佛拉芒语问他。

“我多大岁数？”他边笑边拍着我的肩膀，“哦，我的老头，我多大岁数？我怎么能知道？”杜弗把头往后一仰，又放声大笑起来。

我又追问了他几个问题，在哪儿出生，住在哪儿？

“我，我哪儿也不住。”他继续大笑着。

我瞪了他一眼。

“够了，别耍花招了，你应该有个住处！”我发火了。

我的暴怒没能吓倒他，他仍然大笑着，往旁边啐了一口唾沫，说：

“我住在比利时的大街上、公路上，睡在树丛里、田地里、干草堆上。”

“你父亲靠什么生活？”

他搔了搔蓬乱的头发，笑得更凶了，唾沫星子喷在我的桌子上和衣服上。

“我告诉你，我的老头，我父亲是个疯子。”

指控自己的父亲是疯子，这狂人准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因为老疯子爱干活。”

“你不想干活？”

杜弗拍了一下胸口，表示赞同。

“嗨，我干吗要干活？天是房顶地是床，我总是伴着‘星星’睡觉。

我和王子一样。哪儿有农场，哪儿就有奶牛；哪儿有奶牛，只要挤奶人看不见，牛奶对我来讲就是便宜货。鸡肉可是嫩东西，有时候，我抓住一只鸡的脖子，往锅上一放，得啦，甭再为晚饭发愁啦！”他摸了摸肚皮．得意洋洋地回味着他的美餐。

在他简短的叙述中，有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笑了笑，然后问他上过学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带着某种骄傲的神气说，“我会写自己的名字。”

“那好，我们看你写。”

他很快抓起我的钢笔，显得有点害怕，好像钢笔会咬他似的。他挽起袖子，像一个音乐家准备演奏贝多芬的一支曲子时握住琴弓一样，俯身在纸上，低垂着脑袋，伸出半截舌头，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

“好了。”他得意洋洋地说，“吉恩·杜弗，你的仆人。”

我又审问了一小时，最后，我认输了，整个时间里，没有问出三个有用的字。

“把他带去吧！”我对陪他来的人说，“把他派到比利时，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行，盖世太保决不会抓他的。还没抓到他，他们都该疯了。比利时的警察局抓他一百次，也还得放他出来。那些警察，一看见他，就该吓跑了。这真是一个吓人的天才！”

陪他来的教官微微一笑，说：“他很快就动身。伦敦的警察已经被他搞得很头痛了，在爱德华街，给了他一套很漂亮的房子，但他不去住，每天晚上露宿在海德公园。”

杜弗也向我告了别，带着他的狂笑声一起离开了办公室。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我一直非常关心他的活动。他第一次被空投到比利时，给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谍报员送去了四百英镑。不到四十八小时，来电说：“任务完成。”以后，多次派他去执行任务，总是圆满无误地完成。不管“约会”地点离盖世太保有多么近，他从不

失约。他给在比利时活动的谍报员送去的经费，先后共达几千英镑，分文不差。

这个表面上看来像个疯子，而且目不识丁的流浪汉，是个杰出的间谍，他完成了别人难以完成的使命，尽管那些人的体力和智力也许都比他强。这位不免令人作呕的、又丑又怪的人物，为英国情报处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我很想再见见他。到那时，我将请他到伦敦最高级的餐厅，向他献上一只世界上最好的嫩鸡——不是“抓”的，而是买的。

# 第二章　天网恢恢

当敦刻尔克战役刚一结束，英国军队返回大陆之可能还十分渺茫的时候，丘吉尔首相给白厅政府各部发了一个戏剧性的电报："让战火在欧洲燃烧。"

丘吉尔先生认为，由于法国的失守，荷兰、比利时和挪威的沦陷，英国远征军的失利和撤退，欧洲大陆的朋友们早已心绪不宁。丘吉尔首相深知大不列颠要击退敌人，尚需多年。虽然大陆迟早总要收复，但只要战争还在继续，这一天就不会不到来。迫在眉睫的是必须了解德国方面的行动和计划。另外，还应使那些丧失信心的人重新振奋精神。为此，需要组织各种抵抗小组，并将分布在大陆各地的核心小组武装起来。

为了贯彻丘吉尔先生的命令，经济作战部长建立了一个特别机构，即特种战役执行部。此外，在文职人员领导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大陆敌占区事务的处，由精通有关国家语言、了解这些国家情况的人员负责管理这些部门。他们首先是招收志愿人员，可以是外国人、被占领国的难民或英国本国人，这些人需要回到本国去组织各种抵抗小组。在录取之前，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包括有关国家的语言、地理、风土人情和传统习惯等。换言之，被选中的人应当是在有关地区生活过几年、精通当地语言、完全像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从书本上学到的语言是不够用的；应该懂得"黑话和行话"，而且是眼下所流行的，因为群众的口头语和粗鲁话是经常变的；使用过时的语言会使人丧命。

其次，志愿人员应当是年富力强的人，在同敌人长期共处中，能够抑制得住感情冲动。有时，盖世太保特工人员无意的举动会使人如坐针毡；有时，需要长时间地忍受饥饿与颠沛流离。总之，他们与她们——有一些妇女在特务工作中可与男人媲美——应该具有那种难以描述的所谓“精神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勇往直前——这是谍报人员的首要座右铭。在录取的人员中，真正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的人为数不多。良莠不齐是不足为怪的。这种基本上按照正统的方式进行的挑选，符合当时战争的格局。当然，挑选过程中富有魅力的细节是不曾——也永远不可能——披露的。

除了负责向荷兰空投特务的特种战役执行部外，设在伦敦的荷兰自由政府还组织了一个叫外事警察局的机构。在英国，如前所述，军警和民警是分家的，而外事警察局则把两者的职能结合起来，既负责在英国的荷兰自由力量的治安，也负责从本国流亡到英国的荷兰公民的治安。

1942 年 10 月，在伊顿广场，外事警察局召见了我，接待我的一位局级官员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对我这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老手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知道我原籍荷兰，并对我进行了秘密审查；他们对我在两次大战中的反间谍活动，特别是对我目前的审查大陆难民和逃亡者的各项工作都很了解，还知道 1939 年被判决的许多间谍都是我亲手处理的。

为此，他向我提出了邀请，我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最初三年，我的工作是一项很愉快的差使，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成了例行公事，如果接受这项新任务，我会遇到许多新问题，一旦反攻开始，我将面临新的前景。当然，如果真的当了荷兰反间谍局的领导——在邀请中已包含这一层意思——我倒可以更有所作为。但离开我的同事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忍痛的事。三年来，他们工作得都很出色，我喜欢他们，尊重他们。然而，考虑再三，我终于接受了。

我在新的环境中一切安置妥帖之后，第一件事是审查准备空投到欧洲敌占区去的谍报人员。按照“以贼捉贼”的原则，领导决定对每一个派出的间谍都必须进行一次落入德国魔掌后的模拟审讯。当然，我们决不采取盖世太保用钳子拔指甲的魔鬼手段。我的任务是检验间谍人员在紧张的模拟审讯中所学到的交代方式。

除了考核选拔出来的间谍人员外，我的第二项任务是挑选志愿人员。我们不能派不可靠的人，否则会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威胁。派一个并非训练有素的人、一个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的人，无论对盟国的事业还是对本国的利益，都是极不慎重的。

在战时，我们往往认为某一类人最适合于完成艰险的使命，如突击队、特种空军部队或外事警察局。这些人内心深处感到自身并不安全，但仍热衷于接受惊天地、泣鬼神的考验。他们偶尔也能在最后的考核中表现得很出色；但是，一般说来，到了关键时刻，往往要失败。胆量是头等重要的素质，可惜胆量不能如泉涌，我们谁也不具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时能满足需要的胆量的源泉。我对人类心理学还算博闻，这是因为我在反间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根据这一点，我逐一地对志愿人员进行考试，记录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对所去国家的常识。

1942 年底的一天，一位仪表堂堂的青年来找我。他叫简·李贝克，大约二十五岁左右，体格健壮而又和蔼可亲。当时他在伦敦的自由荷兰政府办公室做辅助工作，曾受过一些间谍训练。他是个孤儿。1940 年，当德国坦克部队占领荷兰，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整个乌德勒支市时，他正在该市上大学，寄居在开设旅馆的叔叔家。他熬了差不多两年，后来实在无法忍受，便逃到了英国。经过我们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的详细盘问，确认他是难民无疑。现在，他打算回国。

整个上午，我都用来盘问简·李贝克，以便弄清他是否是真正的

爱国者，能否为报国冒一切风险。李贝克坐在我的对面，活像个高压下一触即发的弹簧。他的双手紧按着我的办公桌沿，由于过分用力，手指变得苍白，毫无血色。简·李贝克俯着身子，好像准备与对手击剑。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回答得十分敏捷，简直有些仓促。

急躁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品质。我们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善于克制、遇事不慌和随机应变的人；需要既能忍受痛苦又能忍受长期的孤寂、对周围的人保持戒心、对机密守口如瓶的人。我对他进行的两次考核，证明他确实具备上述条件。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回荷兰去？”

如果他这样回答“为了去经受考验”，我会立即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正如我在本章所说，人要有自知之明。在敌后工作，其重要意义远非只是个人接受考验而已。然而，简·李贝克却是这样回答的：

“我会比别人干得更好。”

“怎么解释？”

“是这样的。我刚才已说过，我叔叔在乌德勒支开旅馆。两年前，德国人征用了那家旅馆，并在那儿设立了司令部。至少在几个月以前，司令部还在那里，我想，情况不会有多大变化。我叔叔还在负责采购工作。派一个间谍打入敌国司令部，不是很有意义吗？”

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我立即又想到另外一点：

“是的，你的想法很有意思；但是，要不了十分钟，你就会被识破。你在乌德勒支生活了很久，离开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回去，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再说，在你离开之前就去到那儿的德国人，有的可能至今还在。实际上，你是去自投罗网。”

简·李贝克沉默了一会儿，说：

“听说你们有整容的办法，能使人完全改变面貌，这事我还不很清楚。听说整形外科能使一个人变得连亲生母亲都认不出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不妨试试。”

有道理。有些整形外科专家确曾给回本上去活动的间谍做了非常成功的手术。把鼻子缩短或弄弯，让下巴突出，把腹部的脂肪纤维移植到面颊，使脸部变得更为丰满。这样彻底改变人的模样，实在令人惊叹不已。但也有例外，有的人整形之后，过一些日子就产生反应，多余的脂肪被自己的身体吸收，面貌恢复原样。不过，现在整形外科的效果是持久的，常常是经久不变的。经过整容，一旦一个可亲的人变成了可憎的人，就很难复原了。

“这种方法会破坏你俊秀的仪表，”我说，“你长得不难看，可是整容以后就不再是你现在这面貌了。你愿意一辈子当丑八怪吗？”

“没有关系，”简·李贝克略带痛苦地说，“漂亮的外表并没使我走运。”

我没再反驳，没作任何评论，我想他可能是指某次失恋的事。不过，我把他的这种看法记在了脑子里，也许对我以后判断问题有用，证明他不是一个按古代情场失意者的格式行事的情痴。在和平的年代里，为了医治失恋的创伤，有些男子去非洲兜捕狮子，然而，现在决不是招募想用战争来慰藉心灵创伤的人员的时候。

我对他的第二项考试更为严格。

我装作要打电话，让简·李贝克稍候片刻。我请他到另外一个办公室去，那里有我局的一位妩媚动人的女秘书。我把他留在那儿，自己悠闲自得吸烟去了。我吸了两支烟，等着看我的测验结果。如果简·李贝克和姑娘攀谈，企图挑逗她或与她约会，那么，他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不错，间谍也是人，不仅必须尽量回避媚人的姑娘，而且要保持沉默寡言。在抗战工作中——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冷淡的男子总是难以接近的。

我按了按电钮，请姑娘进来，她叫维拉。

“他干了些什么？”她一进来，我便问道。

姑娘摸了摸头上的发卡，调皮地说：

“别为他担心，他一声也没吭，只是傻瓜似的瞧着我，好像我是一件什么家什。谁也没理会谁。”

就这样，简·李贝克通过了两次考验。他给我的印象确实很好。我认为他坚定、有自制力，更重要的是对面临的任务满腔热情。我推荐他作为特等间谍加以训练。

他在学习中很快学会了操纵各种无线电设备，使用微型照相机，从编制、队形和徽章上识别德国的各种部队。他对德国各部队、指挥系统以及作战方式都一清二楚，还学会了赤手搏斗和快速无声暗杀和使用各种自动武器等。学制缩短了，因为反间谍局迫切希望荷兰间谍网迅速得到补充。李贝克本人也有些沉不住气，渴望早日结业，所以经常加班学习。

出于对培养间谍一事的关心，我经常与教官保持接触，以便掌握我所挑选的男女学员的学习进度，以及学习结束后能否成为顶用的间谍。这对我的理论和他们的能力来说都是一种检验，以便对一旦开始工作能否成功地活动作出正确的估价。我听说李贝克很顺利地学完了课程，并有消息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生。1943 年 3 月底，我获悉他已进入特种医院进行整容。

手术分几个阶段,共进行了大半个月时间。拆线以后,我去看望他，说实在的，真认不出他来了。在他身上，再也看不见那位不久以前曾在我办公室待过的可爱青年的样子。多年的工作已使我变得冷酷无情，不轻易激动，但是，说实话，一看到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的这种可怕的骗人术，我不禁产生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李贝克变得鼻子扁塌，唇部肉皮收缩，整个下颚向上翘起，眉毛也被巧妙地改了样。他那曾是坦率、开朗的目光，在重新缝合的睫毛下变得迟钝、阴郁。为了全人类，他变成了一个既可怕又可笑的畸形怪物。

我见到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我为他的可悲的外貌而遗憾。李贝克看到我很激动，上前一步说：

“这不是很好吗？”为了表现一下自己，他把脸紧皱了一下，显得越发可怕，“你不认为手术很成功吗？”

“当然，你已面貌全非了。”我迟疑地说。

“我变样了？我自己也觉得变了。医生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是的。你不为失去英俊的仪表而后悔吗？”

他做了一个难看的鬼脸说：

“我那漂亮的外表对我毫无意义，实在毫无意义！我唯一的殷切愿望是离开这儿，开始我的工作。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走？”

“这得由医生决定。我想你的伤疤还得过些日子才能消失。你已卧床几个星期了，也该活动活动肌肉。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过久地留你，我们急需去那边工作的人。”

听到我的这一番话，他很高兴，像得到新玩具的孩子那样笑了起来，这使我看到他的才能的另一个侧面。他在荷兰做了两双鞋，已暗中进行了改装，穿上它，走起路来就像个瘸子。鞋的左后跟是特制的，穿上后，左腿显得比右腿短，这一分外的措施，不仅为了乔装，而且也可以免服兵役。因为德国方面当时缺乏人力，正在到处抓丁。李贝克作为一个残废，也就不在被抓之列了。

5 月初，他出院了。几天之后，他在莱顿跳伞。一周之内，音讯杳然。后来，来自荷兰的电报说“条约已签订”，指的是有名的“乌德勒支条约”。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李贝克已在该市与他叔叔接上了头。在偶尔的片刻休息中，我想象着一个面貌怪诞和身体残废的不速之客要说服叔叔相信他就是一度失踪的可爱侄子，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们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颇有价值的情报，包括乌德勒支市德军司令员的名字，各主要军官的姓名以及他们所指挥的部队的人数、番号等。李贝克为盟国做着难以估价的贡献。

大约两个月以后，区督察局的一位官员来找我。我偶然见过他一两次，他叫詹金斯。

我递过一支烟，彬彬有礼地向他躬了躬身，半开玩笑地问道：

“这次来有何贵干，检察官先生？是来检查我们的灯火管制的吗？”

詹金斯严肃地看了我一眼：

“恐怕不是，事情比这要严重得多。我正在调查一个女人被暗杀的案件，告诉我，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送给我一张照片，我看后，摇摇头。照片很像动手术前的李贝克。

“请问，”我说，“此人与我局有何相干？我们的工作是地下的，就是说，绝密的；如果我们的工作被区里人知道，那我们只得彻底改组。”

“你别担心，”他这时才露出笑容，“你的组织绝无薄弱环节。我们怀疑凶手是个外国人，因此，到伦敦各外国使馆进行了调查。最后，我们求助于自由荷兰办事处，经过多方询问，用了各种计策，他们才让我来找你。我们可以遵愿严守秘密。”

“好极了，只要你能保证就行。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詹金斯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有两个小孩在一个坑里玩捉迷藏，突然发现一具女尸半埋在碎石堆里。看来被害已经多日了，法医验尸说是掐死的。在战争年代，一个人在伦敦突然失踪后，警察局对此要作各种调查和旷日持久的研究。后来，知道被害者在出事现场附近居民区租过一间小屋，是邻近一家小商店的售货员，有时候，为了挣点外快，在附近一家酒吧当女招待。

由于她失踪多日．又无人来通知，房东把那间屋租给了新房客，把失踪者的用品存放在阁楼里，以备她一旦回来索取。警察检查了遗物，在箱子里发现了一张刚才给我看的照片，上面的签名是：“永远属于你的约翰尼。”还发现一本日记，其中提到约翰尼，说他醋意很浓。

邻居们都说贝蒂——被害女人的名字——十分“放荡”。据当地一个送奶工人说，她经常和小伙子们一起寻欢作乐。另一个街坊说贝蒂有个常来的情人，长得很漂亮，头发浓密，有点像外国人。还说他们俩常吵架，有一次，在楼梯口碰上她，发现她一只眼睛被打伤了。“一

个不正派的女人”，那位街坊最后这样描述他。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逮捕这个凶手。”检察官詹金斯用手指弹了一下照片，说，“为了配合我们的调查。”

“检察官先生，你说得很明了。如果他真是凶手被捕归案，我很高兴。”

“好，现在该谈正题了。事情很清楚，对吗？外国人，忌妒，反复无常的青年，经常吵架，于是，演出最后一幕：某个晚上，实在忍无可忍，便掐住她的脖子，结果了她的性命；事后害怕了，便把尸体弄到几米以外的炸弹坑里，用破瓦片埋起来。以后的事就不用说了。”

“是的。可是，这场戏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如何解释？”

“好。线索表明这位姑娘有许多男朋友。其中某一个在盛怒之下把她杀了，甚至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干的。邻居都说她风流、轻佻，或许更有甚者，说不定她跟一个完全陌生的家伙混了几个钟头之后，把他带到自己房里了，最后因为价格发生争吵，他一时头脑发昏，把她掐死了，这不可能吗？”

检察官詹金斯摇摇头，表示不可信：

“我不信有这等事。如果凶手是外地人，干吗要把尸体弄到炸弹坑里去埋起来？可以把她扔在屋里，一走了事。妓女谋杀案的经验表明，凶手总是把尸体留在作案地点的，也就是姑娘的屋里。如果她真是妓女，饶舌的邻居中还没有一个说过她以此为生，这一点，你得相信。此外，这个叫约翰尼的人还说过贝蒂走了。”

“不明白你说的话。”我说。

“很遗憾，让我来解释一下吧！被害者的近邻——就是那位传说过他俩常吵架的邻居——在最后一次见到贝蒂以后的一两个星期，到附近郊区买东西的时候，曾经碰上约翰尼，并问他贝蒂出了什么事。从他那里才知道贝蒂忽然上北方去了——邻居以为他说的是纽卡斯尔

那个地方，但也没有把握。他说贝蒂的母亲得了重病，要女儿去照顾。这位邻居很觉诧异，因为她知道贝蒂的全部衣服还留在房里，而且从来也不曾听她说过英国北方有个家。那么，如果这位约翰尼是无罪的，为什么他要编造一个母亲病重的故事呢？”

检察官的看法确实是合情合理的。他继续说：

“你现在该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找他谈话。如果此人能证明自己无罪，那么对他本人也有好处，我们可以把他从名单上勾销而另找线索。顺便问一下，你是否听说过他体力过人？”

我想起了李贝克宽大的肩膀，手腕和前臂上隆起的肌肉，说：“是的，你问这个干吗？”

“从尸体上的痕迹以及他曾搬动过一根建筑用的沉重梁木这一事实来看，医生断定罪犯是个体力非凡的人。”

“有时候，恐怖和惊慌能使弱者变强。”我说。

“是的，”他表示同意，“此外，贝蒂是个高大的女人。如果是在她房里作案的话，要把她的尸体拖下楼去扔进炸弹坑该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案子上，可以作出数不清的设想，检察官先生。假设她在自己房里被害了，假设当晚曾经发生口角，假设凶手是个能够搬走女尸的大力士，如此等等。难道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吗？”

“也许没有。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见见这位叫约翰尼的人。不管他是否有罪，见见他对我们的调查都是有益的。可以找他来吗？我就在这儿等候。”

“检察官，你得等很长时间。”

“我不明白。”他双眉紧锁。

“请你注意，我所讲的都是十分机密的，涉及此事的任何消息都要严守秘密，你明白吗？”

检察官冷冷地说：

“我们所做的调查都属机密。在这间屋里所说的一切，绝‘透’

不出去。”

“我没有说会‘透’出去。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一情况，只限与此案直接有关的官员本人可以知道：几个星期以前，李贝克被空投到荷兰去了。他是我们派往敌后工作的最优秀的特种间谍之一。”

“可以把他带到这儿来吗？”

“也许可以，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检察官怒视着我：

“我想你还没有懂得我刚才说的话，我觉得你在有意阻挠我执行任务。”

“请等一等，检察官先生，让我们都明智一些。为了调查案情，你需要这个人，不管他有罪无罪。但是，即使把他带来，也不能使不幸的姑娘复活。我不能把细节都对你讲清楚，你知道我们在荷兰遭到了惨败，而我们的间谍网刚刚开始工作。最近几周内派去的每一个间谍，对我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李贝克，他目前的工作至关重要。如果他是无辜的，当然更好，如果他是凶手，那么，他正在将功赎罪。我是这样看问题的，你明白吗？”

“你说的对你固然都很重要，”他很不自然地说，“你有你的任务，我也有我的任务。现在我的任务是抓获他，李贝克，这就是我要做的。”

“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反驳他说，“如果你的上级能使我的上级命令此人返回英国，我服从命令。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我可以拿自己一个月的香烟定量和你一张废邮票打赌，他们绝不可能下这种命令。我刚才说了，你得等很久，也许一直等到战争结束。”

检察官走了。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没有接到任何召回李贝克的命令。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特别是当我收到来自乌德勒支的重要情报时，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此案。我回想起李贝克急待结束学习返回荷兰的焦躁神态，又想到他谈到生活中不幸事时的苦楚表情，

以及他在我们婀娜多姿的女秘书面前冷若冰霜的反应。这些互相关联的事很能说明问题。我内心深处确实认为李贝克就是凶手，但是，让他为盟国工作总比把他关在牢里等候判决要好很多。

1944 年初夏，反攻即将开始，李贝克忽然无声无息了。他每周向乌德勒支的谍报员提供情报的惯例中断了，我们再也得不到关于德国驻荷兰军队调动情况的重要情报了。在荷兰的其他谍报员奉命探听他的情况，但得不到任何肯定的答复。一个大胆的谍报员化装成卖花人，到李贝克居住的旅馆去察看，只打听到他当时不在。

也许他出了岔子，让德国人抓走了；也许他担心英国人不久进入荷兰后会把他捉拿归案而悄悄地溜了。又过了几个星期，李贝克仍然毫无音讯。关于李贝克活动情况的卷宗一直搁着，没增加任何新材料。警察局对李贝克的调查可能还在继续，但也不会有什么进展。检察官詹金斯已调动工作，他的一个同僚不断来问我何时可将李贝克交法庭审讯。李贝克本人也成了有待解决的悬案了。詹金斯的同僚最后一次来访时，我不得不通知他：我们已与李贝克失去联系，目前对他一无所知。

1944 年 7 月，我被任命为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所属的荷兰反间谍局的首席审讯官。我挑选的八个助手和我一起参加了诺曼底战役。乌德勒支是 1945 年 4 月解放的。不久，我有机会见到了李贝克的叔叔，当时加拿大军司令部设在他的旅馆里。

对于侄子的失踪，叔叔也迷惑不解。他说，李贝克当初是趁德国哨兵不注意通过暗道逃跑的。初回来时，叔叔怎么也不相信这个魔鬼是他的侄子。后来，谈了一些只有亲人才知道的家庭私事，又亮出腿上小时候留下的伤疤，李贝克才证明了自己确是侄子。

叔叔让李贝克在旅馆经理部当助理会计。晚上，又悄悄地叫他给旅馆中的德国军官警备队当服务员。他似乎觉察到简在做抗敌工作，但从未问及过此事。即使是假日的晚上，简也总要出去，直到天亮才

回来。在被占领的荷兰，像大陆其他沦陷区一样，打听不该知道的事是不慎重的。不当知情人，祸事不登门。

十个月或十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下午，简说要出去找个朋友，但没说朋友的名字，叔叔出于伦理道德，也不打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可怜的叔叔得不到侄子的任何消息，他感到事情不妙。简如果外出，即使不说去何处，也该跟叔叔打个招呼。如果盖世太保把他抓获，一定要来旅馆搜查。有一次，一个德国军官曾以开玩笑的口气问起那个令人作呕的可怕的服务员哪儿去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人再来询问和调查。“就这样，”叔叔悲伤地说,“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总也不见简回来。”

由于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我不能为这个失踪的间谍分心。我感谢他的叔叔所做的工作，并请他一旦得到侄子的消息立即通知我。以后的几个月中，我常常想起这个谜来。简·李贝克已经彻底改变了模样，他为什么还要躲藏起来，难道他害怕英国的法律竟然甚于德国人的监视?

当这个谜解开的时候——谜往往是这样解开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天下午，我和一位朋友喝咖啡，他曾经是希尔维瑟姆抵抗小组的杰出领导人。我们在闲聊中谈到战争期间需要当机立断而又无法考虑后果的一些事，他深感内疚地说：

“有一回，出于仓促从事，我犯了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我们发觉小组里隐藏着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叛徒，等我们要去抓他时，他已飞往乌德勒支去了。”

此事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必须立即动手，否则叛徒会把我们统统出卖给盖世太保。于是，我们找了一个叛徒所不认识的人去暗中追踪，伺机除掉他。我们向这个追捕者详尽地描述了叛徒的各种特征，说他过去是个职业拳

击手，中等个子，鼻子扁塌，嘴边有个疤。”

对这一切，我心里已十分清楚。原来，整容外科医生把李贝克变成了与希尔维瑟姆小组中的叛徒完全相像的人。

“这么说来，那个追捕者到了乌德勒支杀了个不该杀的人。”我说。

“是啊，你怎么知道？”他惊讶地问。

“战争中，差错是很多的。后来抓住叛徒了吗？”

“是的，第二次才抓住他。可是，错杀了无辜，多么可怕。”

“说他无辜，这得看怎么解释了。”我说。

# 第三章　父子何其相似

人们常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一个人要在生活中有所前进，在童年时代就该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并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英国牛津大学首屈一指的学者、赫赫有名的弗赖伊，却不仅爱打高尔夫球，获得过世界冠军，而且是个杰出的足球运动员，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把王位让给了他。今天，他已不在人世，安然长眠于地下了。希腊人认为人应该接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并不失时机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他们的抱负，正如他们的语言一样，已经落后了，至少我认为如此。

我也许是历史的见证人，一个太平岁月多于战乱时代的见证人。我决无让人家把我尊为贵人的奢望，但是，我具有语言方面的天赋，爱好外国语。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精通六国语言，对另外七种外语也略知一二。我善于识别和思考，还获得过业余拳击和射击的国际冠军。当心境平静时，我可以信心十足地和任何一个对手打桥牌。我还是个出名的动物学家。回顾过去，我看到，如果只专心从事一项事业，我的生活会非常贫乏，当然，对某项专业可能会有更深的造诣，但也会失去许多东西。

但是，在战争期间，不管有什么样的个人兴趣，我们都必须专业化。当前战争问题的复杂性剥夺了人们自由思维的可能。一个人参军之后，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一个射手或是一个工兵，他必须接受上级的指示。在军事生涯中，他也可能从一个部门调往另一个部门，去掌握新本领，

人们总是在自己所擅长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才能。然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荒谬的事情却层出不穷。

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人，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本人同一个法国女子结了婚，1939 年以前，一直住在巴黎，是一家大汽车公司的经理。英语和法语讲得都很流利，对自己的专业——汽车，尤其精通。战争爆发后，他放弃了工作，卖掉了房子，为保卫祖国参了军。他多才多艺，作为志愿兵，加入了英国军队。他想，如果可能，他可以担任为英法两国海军部队做联络工作的特殊使命，和英国远征军一起重返法国。

当时，找不出三个像他那样适合于填补这一空缺的人了。但是，他却突然被任命为一个青年营的见习军官！法国已经沦陷，他三番五次地去找英国陆军部，希望能调他去做自己所期待的工作。当时，他整天忙于对新入伍的步兵进行基本训练，并纠缠在他十分生疏的问题之中。

为盟国服务的反间谍处各个部门，总的说来，情况还比较好。一般地说，懂得某国语言或掌握某项专业的人，都能用其所长，人尽其才。但是，大家也都听说过反间谍局有一个军曹，经过几年刻苦学习，到 1941 年，掌握了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俄语，最后，在牛津一位教授举办的俄语班结业。由于各科考试成绩优异，作为合格人选被推荐去英国驻莫斯科军事部工作。几天之后，他被调走了，但没调往莫斯科，而是去非洲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里通用的是斯瓦希利语。幸而这种事例是个别的。

战时，反间谍局各部门的专业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然而，有一次，却挑选了一个对反间谍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去干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懂得，一个反间谍人员决不能去做间谍。为了做好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有相当的实践和经验。当一个人在某项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时，他的上级是不会轻易放走他的。一个人的洞察力和智力，有时

一下子就能表现出来，有时需要逐步加以考察。有些天赋在某种工作中可能有所作为，而在另一种工作中可能一无可取。一个审讯人员能识破被审讯者交代中的一切非真实情节，并抓住其真实部分，但他本人并不一定能迅速编造出一个“交代”来。有时候需要分析能力，有时候却全凭直觉。

此外，只有言行谨慎的人才可以被委派去从事间谍工作。喜欢传播谣言的人，多嘴饶舌的人，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同事都是一种威胁。幸而，这种人很易辨认。一个特工人员，应该善守机密，就是对最亲密的朋友乃至自己的妻子也不应轻易信任，稍一不慎，就会断送性命。应当慎于言，严于行，即使在同僚面前，也要守口如瓶，除非对某一机密必须共同研究。

在基层，这一点执行得不错。但是，我常常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间谍局的工作应该有更高的水平，它应该摘录所有的材料和情报。毫无疑问，一切活动都应有文字记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我可以举法国为例。由于它战略地位的重要，德国军队对它严加控制，那里的间谍工作十分困难。英国在该国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隶属于特种战役执行部法国处。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另外有一个间谍网，完全独立于特战部。1942 年，美军到达后，它的海外战略处很快又成立了自己的特工组织。这样，处理一个案件，审讯便需要进行两次甚至三次；而审讯结果又很少互相交流，各行其是，互不通气。有时候，派出一个间谍冒着生命危险去搞情报，而答案却早已沉睡在白厅某“竞争”组织的抽屉或档案柜里。

我有意用“竞争”这个词，因为我有过惨痛的教训。盟国某一成员国的反间谍组织好像进行着两面战争——一方面对德国人，另一方面对盟国的其他同类组织。在战争中，民族自豪感固然值得称颂，但决不可为此而置别人的生命于危险境地或造成时间上的浪费。

有两次，我分别被英国反间谍局和荷兰抵抗小组请去解决各自提出的问题。我在本章所要讲述的事就发生在第二次。

1942 年夏季某一天的清早，我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一拿起听筒，我预感到事情可能相当严重。一个熟悉的声音不甚客气地劈头就说：

“今晚你在办公室吗？我有急事要找你谈。”

“什么事？”我问他。

“那边（指荷兰）出事了。听说过加百利的事吗？”

我含糊地说听说过。

“……今天清早，天刚亮，一艘鱼雷快艇在荷兰海岸附近把他接来了。下午到伦敦后，直接到你那儿去，他一切都会对你说的；事情很重要，头等重要。那边出了事故，严重的事故，只有你能解决，行吗？”

“好！”我回答说。我知道通话者是谁，所以无须作多余的询问。可是，一挂上电话，我不禁再三寻思起来。问题肯定相当严重，不然，当局不会派出全副武装的鱼雷艇穿过北海去接一位“应邀来喝午茶的荷兰客人”。到荷兰海岸去接人是十分冒险的事，那里是拥有高速飞机和装备精良的鱼雷艇的德国巡逻队严加监视的地段。总之，这是一件十分紧急的事件。否则，派个潜水艇去沿海接他，会安全得多，但时间就长了。

我虽未见过加百利，却听说过这个名字。加百利是一位老海员的化名，两年来，他一直在海上护送荷兰逃亡者，在战争中，这是要冒大风险的事。海岸线二十四小时都在戒严，不仅有地面巡逻队到各个海角进行搜索，而且有配备快速鱼雷艇的海军巡逻队定期在海上巡航。此外，德军控制着所有的港口与船厂，机动船无法得到燃料，所有的小船一律检查登记。尽管如此，两年来，加百利小组还是设法送走了上百名荷兰难民。

加百利年轻时在一家造船厂当过徒工，这一点，德国人不知道。他在自己的掩蔽所里，把被扔掉的破船修好，还利用一些木板和他的小组从别的船厂偷来的部件，造出了一条新船。他的小组成员，多数是在海上生活过的，一旦派出执行任务，都能驾起一叶扁舟，穿过基尔运河。他们是盟国的好帮手，可是，现在出事了。

我还听说过加百利是个狂热的教徒，年轻时，一心想当教会代表，但是，由于文化低，加之要靠船厂的工作收入帮助家庭勉强维持生计，所以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信神，不喝酒，不抽烟，随身带着一本圣经，反复阅读，有些段落已能背诵。听说他讲起话来还经常夹杂圣经中的警句。

他给自己选定了加百利这个名字（即借用了天使长的圣名[1]），并非想要损害他人的尊严，而是打算以他那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作为一把利剑直刺德国人。

由于这一切在我都还是耳闻，因而渴望亲自结识这位关键性人物。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局的一辆灰色汽车驶进了停车场（过去是儿童游艺场），从车后跳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荷兰自由力量的副官，另一个是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大概就是“不屈的”加百利了。

几分钟之后，他们坐在了我的对面。我们三人用荷兰语交谈着。后来，我和军官还在寒暄，加百利坐在椅子边沿，似乎急于要谈正事。

我打量着他，尽量不让他觉察。加百利身穿一套沾满油污、大得出奇的旧西服，上衣里面是一件水手们常穿的蓝色旧衬衫，斑白的头发像一团乱麻，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肌肉不停地抽动着，组成了一幅线条纵横的地图。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他那疲惫的脸上显得分外引人注目。这是一双明亮、清澈、孩子似的眼睛，然而，在他坚定的蓝色双眸里，却流露着一种任何孩子都没有的残酷

---

① 加百利是圣经中天使长的名字，被称为“天之骄子”。——译者注

和仇恨的表情。我下意识地感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固执而坚定的人。

“好，”我说，“我们谁也不会长途跋涉去讨论关于未来世界的问题，你要谈什么事？”

“同杰克逊上校谈吧！”陪同加百利前来的副官说。（应当说明，为了安全，我们都用假名而不用真名，比如说，我的假名是弗兰克·杰克逊。）

加百利看着我，眼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色，然后，用同他的矮小身材极不相称的洪亮声音，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所讲的同我所听过的许多故事相仿，细节稍有出入。他曾组织过一个小组，包括他在内，一共十人，以后也从未超过十二人。根据这个数字以及小组领导人的宗教信仰，一个诙谐的成员给小组起了个绰号，叫“圣徒[①]”，大家也都同意。尽管加百利曾经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擅用圣名是一种罪过，但仍然沿用下来了。小组里十一个成员都是他绝对信任的老朋友、老相识推荐，由他亲自选定的。

头两年，“圣徒”遭到了一些挫折：一个组员沉沦了，另一个由于长期在北海上风吹雨打得了肺病，第三个在德国的两个布雷区中间的运河上被水雷炸死了。挑选是极其严格的，一个海员仅仅因为有酗酒之好而未被吸收，酒后“失言”是很危险的。

由于他的工作方法严格，所以小组活动卓有成效。他们跟德国人有过一些小小的遭遇战，由于善于兜圈子，见机行事，所以没有碰到大的麻烦。

三个星期之前的一个晚上，一艘满载流亡者的小船正准备离开一个十分隐蔽的小码头，突然，一只小汽艇的探照灯射向他们，接着，响起一阵警告的枪声，一支德国巡逻队包围了小船。

所有的人全部被捕，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当时负责指挥小船通过

---

① 耶稣有十二个圣徒。——译者注

布雷区，单独先走了。其他两个组员被抓，捆绑在桅杆上，另一名小组的成员被迫驾驶小船,驶回荷兰。逃出的是个健壮的年轻人,叫洛伊，他父亲也是小组十二成员之一。洛伊是个杰出的游泳健将，他沿海岸差不多游了一英里。后来，他确信德国巡逻艇已押着俘虏走远，才游回岸上。

失败是惨重的。几个星期后，情况每况愈下了。又有一只满载的小船离开了距海岸几英里的一个海角，小船穿过布雷区，安然无恙地进入了深海。当小船行驶到离一只停泊的德国军舰右侧一英里的地方时，军舰上所有探照灯的光柱立即射向小船，几艘快艇包围上来，一阵机枪扫射，船上的人员统统被消灭，一个也没剩下。两个组员和十七名流亡者全部牺牲。

“起初,我们认为这是天数,”加百利说,“几个月来,我们都很走运，不能指望上帝只保护我们。可是，上星期，又遭到一次失败。我们花了半年时间，用一只破旧沉船上的残存零件，修好了一只渔船，从一位老朋友那里借了一个因搞不到汽油而弃之不用的马达。小组的两位造船工程师负责把马达装到渔船上。我们搞到了一点汽油，用它穿过北海是不成问题的。出发之前，需要先试航。我驾着船，范·伦当副手，还有两位负责发动机。夜色漆黑，没有月光。我们用桨划了一两英里，怕马达声惊动德国人，引来巡逻队。出了危险区后，我命令开动马达。一个机械师刚过去，立即响起一声剧烈的爆炸。船尾飞向天空，两个靠近马达的人归天了。上帝保佑，范·伦和我总算幸免，我们在后边，只是被抛进了水里。船沉没了，我们只好游回来。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你认为有人破坏？”我的问话里肯定的话气甚于疑问。

“还能是什么呢？”他问道，“安装马达的两个人都是专家。即使马达本身出了问题，也不会引起这般剧烈的爆炸：摧毁船尾，炸死二人。肯定事先有人安上了导火线。所以马达一发动，立即爆炸了。”

“是的，不可能做别的解释，”我表示同意，“会不会是德国人干的？”

“他们干吗要干这个？”他反驳说，“如果他们发现了小船，可以把它毁掉；或者设下埋伏，等小组出航后，一网打尽。盖世太保愿意抓活的，那些‘魔王的崽子’知道怎样从一个活人嘴里掏出口供，让他出卖伙伴。”

我认为他的分析很明智。

“我们先不说盖世太保，接二连三的失败也能说明小组里有奸细，你同意吗？”

他伤心地摇摇头：

“我不想这么说，可是叫我怎么说呢？”他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奈何，“头两次失败，可能是运气不好，而第三次就难以解释。把三次惨败连起来看，我不得不承认有奸细。一个老朋友，一个和我们共同战斗、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人，竟然会是个犹大，我感到很痛心，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现在我几乎知道了谁是奸细！”

“几乎知道了？”我惊奇地问。

“是的。船沉以后，范·伦和我游到岸上，那儿离我家不远，就一起到了我家。范·伦需要把衣服烤干，否则，一个人穿着湿衣服在路上走，巡逻队看见了会起疑心的，况且爆炸声可能已经引起了德国哨兵的警觉。我们围坐在火边，交谈起来。小组原有十二人，现在只剩下七个。奸细肯定是在活着的几个人中间，因为在谋害别人时，一般说来，奸细自己是不会死的。我自己不是奸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范·伦也不是。他可能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我们决定先把友情撇开，努力寻找是谁出卖了他人。这样做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我们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找到怀疑对象。最后，决定放线钓鱼。第二天下午，我通知所有的幸存者天黑以后到我家开会。会上，我说小船出了事故，沉没了，范·伦和我并不怀疑任何人。我说我们必须立即再搞一条船，因为过几天还要护送一批逃亡者。我透露了准备到德国

海军那里去偷一只小船的计划，并说第二天晚上，我和范·伦就去偷。当时，大家都自告奋勇要一起去，我拒绝了。我说这件事只能由两个人去办，人多了反而碍事。我强调说小船出事是我们两人粗心造成的，所以我们应该另搞一条来补偿。大家对我的说法不很满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判断：奸细不会在大白天去与德国人接触，而我们第二天晚上就要行动，所以会一结束，奸细必然立即去找他的上级。洛伊父子两人住在北城，其他三人住在码头南边。散会时大约十点钟，大家一一离去。范·伦和我已经对大家说过，会后要到码头区去侦察，所以也和大家一起出去了。其实，我们并没去码头。范·伦跟着三个人往南走，我追踪洛伊父子。在黑暗中，他们很快在我视线中消失了。但是，我并不担心。盖世太保司令官的家在一个高处，离洛伊家只有半英里，它的前门和后门各有一个岗哨。我想奸细一定会从后门进去，所以就躲在不远处一间无人住的旧房子里。后门的灯光暗淡，不过，我带着夜光镜，估计能够辨认清楚从后门溜进去的人的面貌或身影。我在那间空屋的楼上正要找个合适的位置，还没来得及调好望远镜，就看到后门的岗哨让一个人悄悄地进去了。我想，他既然进去了，总还得出来。我耐心地等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后门。差不多过了半小时，我冷得浑身抖索。这时候，门开了，我看到一个高个子，没戴帽，浅色头发，穿一件夹克。此人一闪而过，消失在黑暗中。我仅仅在一瞬间，甚至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晃见了他一下。”

“认出来了吗？”我好奇地问。

“马马虎虎。”

“怎么，马马虎虎？”

“是啊，”他冷冷地说，“盖世太保的指挥官总是挑选比一般人高的人当自己的门徒，因为高个子给人印象深刻。而那一闪而过的身影比岗哨的个子还高。我们小组剩下的七个人中，范·伦是高个子，其他三个中等身材，老洛伊一米八，他儿子比他稍高一点。父亲是白头发，

儿子的浅色头发在灯光下也几乎呈白色，两个人都穿夹克。”

“就是说，父子都可疑，但又没有绝对把握。”我说。

加百利摇摇头，表示没有把握。

“会不会是巧合？”我问他，“说来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怪事是很多的。我是说，会不会那天晚上，盖世太保约见了一个密探，也是一个留着浓密的头发、穿夹克的高个子。像你所描述的嫌疑犯，在荷兰可以找到很多。”

“上帝保佑，但愿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是巧合。”他庄重地说，“可是，第二天晚上，范·伦和我到了海军区，看到岗哨增加了一倍，部分哨兵埋伏在小型船只停泊处附近，等着我们啦。如果我们不加提防，会白白落入圈套。范·伦曾对我说过，那天一散会，他跟踪的三个人都各自回了家，所以，一定是洛伊父子中的一个去通知了盖世太保。这事千真万确，正像上帝要在‘末日’对我进行审判一样。”

“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没有？”

“我想只有一个办法，”他痛快地说，“把两个都杀死。圣经上写着：上帝说，复仇之事，只属于我。当然，两个当中，有一人是无辜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把一条命的价值同死去的五人以及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逃出盖世太保魔掌的人相比较。但是，范·伦比我高明，他有另一个方案。正是为了这个方案，我才来找你。”

“什么方案？”

“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免得遭受更大的损失。我回去以后打算再去偷盖世太保的一只船，这事不难办。然后，我同洛伊父子约定运一批人来英国：十或十二人。等到出发的晚上，谁也不去。于是，我命令洛伊父子来英国，必要时，用枪逼着他们。奸细看到自己也参加这次活动，决不会去报告盖世太保，或想别的办法让小船到达英国之前

不发生麻烦。如果敌人击沉小船，那好，我们就算摆脱了奸细。如果小船平安到达英国，那我们就要揭露他了。你看怎样？”

“这个方案很好，我很满意。但是，奸细要是知道你这次来英国的目的，他不会起疑心？”

“他不会知道的。”加百利回答说，“我在鹿特丹有个年老的婶母，几个星期以前，她得了重病。我公开说前天晚上到鹿特丹，住两三天回去。发电报要求你们派鱼雷艇来接我的报务员只有我和范·伦认识。”

“你干得很好。”我说，“要想知道两个嫌疑犯中谁是奸细，这事不很容易，但是，我们尽力而为。不管怎么说，这个方案能使奸细在战争结束前无法再进行活动。”

他表示同意。

“战争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判决之日总会到来。如果奸细返回荷兰，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他。”

最后这句直言不讳的话如果从另一个人口中说出，就会显得有点戏剧性。但是，我看到他那充满着仇和恨的冷酷的蓝眼睛，心中产生了某种感觉。坦白地说，我不愿意见到加百利复仇的场面。

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然后祝他一路顺风，安全归去。这时，陪同他来的、一直沉默不语的军官建议我们约定一个暗号，供报务员在加百利到达荷兰后使用。加百利毫不迟疑地说：“迁徙十四[①]。”当他发觉我们惊愕的表情时，颇为伤感地提醒我们说，“出埃及记”描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安然地在红海中前进，海水在摩西的神鞭下让出了走道，埃及的骑兵追踪上来时，海水重新会合，把骑兵全部淹死。这个戏剧性的故事说明：信神者，神保护；不信神者，神摈弃。于是，我明白了加百利为什么要用这个暗语。

当天晚上，加百利乘车到海边，然后乘鱼雷快艇返回荷兰。两天

① 指圣经第二卷第十四章“出埃及记”。——译者注

以后，报务员从无线电中收到“迁徙”这个暗语，说明加百利已经到达荷兰，正准备设置圈套对付那害死五个战友的家伙。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音讯，又过了五天，还是不见动静……第十三天的早上，有人来报告说，一支载有两个荷兰人的小船停泊在霍伊克南部几英里的一个荒凉的船坞。两个人都病得很重，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两三天后，他们可以继续航行，直达伦敦。有人看守他们，没有进行审讯。报告还说两人个子都很高，而且长得很相像。

毫无疑问，洛伊父子已经到了。我命令先不要审问，把洛伊父子隔离开，特别是身体恢复以后。为了隔离一事不致引起他们的怀疑，需要想出一个可以取得他们谅解的理由。我还安排，谁身体先恢复，就让谁先来伦敦。加百利说对洛伊父子非常了解，但他忽略的一个细节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深信两者之中必有一人是叛徒，而不会两者都是。如果两者都是叛徒，那么，他们一定事先编造了一个交代。但我绝不让他们有机会以“清醒的头脑”去揣摩细节。

小洛伊的名字叫简，他充满青春活力，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到达英国的第三天，他被押送到伦敦，然后被带到我这里来等候审讯。

我自己比一般人要高，但这个金黄头发、面颊消瘦的高个子和我握手的时候，我不得不抬起头来看他。由于长期日晒风吹，他那浓密的头发几乎变成了白色。他的确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他的体重该是相当可观的。他全身的肌肉结实，是个力大无比的人物。他有一双典型的北欧人的明澈的眼睛和一副希特勒欣赏的外表，就是所谓的雅利安脸型。

我虽听说过关于他和加百利小组的一些事，但对北海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一开始就请他谈谈他们横渡北海的活动。简说，在和平时期，他和父亲曾有过一艘渔船。战争爆发后不久，渔船被没收了。从那以后，他和父亲就在沿海打短工谋生，整天提心吊胆，怕被德国人抓去做苦工。

他父亲是个鳏夫，父子两人住在船厂北边的一间小屋里。

德军占领荷兰后不久，一个叫范·伦的人来找他们，请他们参加由一位化名叫加百利的熟人领导的抵抗小组。父子二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反正一无所有，就决定参加小组。当时一共有十个人。他们负责护送难民离开荷兰，事情一直很顺利。可是最近开始倒霉了。

他继续讲述着难民逃亡的经历。有一次，一只难民船正要起航，突然被抓获了，他自己只好泅水，躲过德国人，才逃命出来。他还讲到加百利、范·伦和另外两个人在试用一只小船时被炸沉一事。他用荷兰话对我说，他会讲点英语。

“有一次，我和一位被击落后隐藏下来的英国飞行员闲谈，他说在皇家空军里，人们都相信一种叫‘破坏飞行的小妖精’，这些小妖精能使马达和方向盘突然失灵。我完全相信，现在小妖精离开了皇家空军,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开头一帆风顺,后来十二人中损失了五个。看样子我们要收场了。出发那天晚上，除了我们爷儿俩，谁也没有去。我们等了一个小时，加百利决定不等了，让我们两人出发。现在我们小组只剩下六个人。一两个月以后，我们要彻底垮台了。”

“你这次是怎么渡过北海的？”

“这次出航，‘小妖精’也一直跟着我们，”他苦笑了一下说，“我们的马达原是完好无缺的，可是航行了一半，马达坏了。接着，可怕的风暴袭来，黑云遮住了星星，我们无法继续航行。倒霉的舵又折了，真是雪上加霜。我只好把舵固定在一个位置，把父亲绑在桅杆上，然后把自己也绑上，要不然，我们早被凶猛的浪涛掷进大海。幸好刮的是东南风,把我们吹向英国海岸。否则,我们不是淹死,就是飘回荷兰。”

我盘问了他半个小时，没有对他进行认真的、有逻辑连贯性的盘问，而是漫无边际、跳跃式地随便发问。有时候，问一些童年琐事，他刚一答，我又突然问到加百利小组里的活动。这种方法有时很顶用，特别对一些不甚老练的嫌疑犯是有效的，他会手足无措，从而不假思

索地脱口说出自己不想说的话，有时还能供出一些重要事实。而对于思路敏捷，懂得这一套并有所提防的人，这种方法很少奏效。除非他很自信，以至于忽视这样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的这一手对洛伊没起到任何作用，虽然他的思维并不敏捷，而且在回答问题前常常犹豫再三，有时还要求我重述一下。然而，他的回答都是合乎逻辑的，毫无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这样缓慢回答问题对他是有利的，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需要匆忙行事，对待这种人必须要有耐心。特别像他这样刚刚经历过严峻的北风的吹打的人，如果信口开河，反而容易引起怀疑。

最后，我终于把关键问题端了出来。

“这几个星期，”我说，“十二个人损失了五个，四个死了，一个被捕；还有十多个流亡者被抓走，丢了三条船。而两年来，小组并没有大损失。对于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吃惊地问。

“我的意思是：这几次损失可能出于事故，也可能是人为的，你觉得怎样？”我紧紧盯着他。

嫌疑犯瞪大眼睛：

“你认为我们中间（他迟疑了一下）有人向敌人出卖了小组？”

“我怎么想无关紧要，我要知道你怎么想。”我重申。

洛伊停顿了一下，搔了搔金黄色的头发，说：

“我不信有这等事。我们当中谁能干出这种事来？我们都是老朋友。不，这不可能！我们当中谁也不可能是叛徒。”他又停了一会，灵机一动，说，“你不能，不能怀疑我是叛徒，如果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是游泳从德国人那里逃命出来的。一个叛徒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你认为怎样？”

“我并没有指控你，”我镇静地说，“只是在寻求答案。”

“请你相信我，先生，这是不可能的，我决不允许有这种设想。当然，

你可以指控我父亲，也可以指控我。我父亲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

他这么晚才问起父亲，使我感到惊讶。但是，我没有发表评论，回答说：

“你父亲很好，只是精神还不佳。虽然他身体也很结实，但毕竟要比你大一倍，上了年纪的人是不能和小伙子相比的。只要他能会客，就可以去看他。”

“什么时候？”

“这得由医生决定，也许一两天以后。”

我和简·洛伊第一次的会见就这样结束。

他被押走以后，我一连抽了三支烟，苦苦思索着。最后，我认为应该通知皇家海军当局，洛伊父子乘坐来的小船在他们手里，请他们把船里所有的东西以及两位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开一个清单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在电话里向我报告说，在船里凳子底下发现一条被水泡湿的面包，此外别无他物。看来，其他一切都被海浪卷走了。面包经过切片化验，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两人随身用品的清单对我也毫无用处。父亲有一个烟袋，烟已湿透，经过化验，无任何有价值的发现。还有一个旧手电筒，一个袖珍指南针，一个水手用的小刀、几个硬币，一条手帕，一张防水纸。墨水把最后一个字迹也覆盖了，但一个符号表明，这可能是一张荷兰的地雷分布图。

儿子身上也带着一把水手用的小刀，一条手帕和几个硬币。同父亲不同的是，在内衣口袋里有一个十分讲究的皮夹，根据清单，皮夹里面装着三个姑娘的照片，长得都很漂亮，每张上面都有温情脉脉的赠言。皮夹里面没有身份证，但有两封情书，是两个女子写的。情书的言词热烈，表明寄信人与小洛伊的关系十分亲密。我一边看清单一边想，这家伙可能很相信命运。

一个朦胧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初步形成，但是，我有意不把它当做最后的结论。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我要先审问父亲。

两天后，当老洛伊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不禁为父子两人如此相像而感到惊愕，难怪加百利夜间未能把他们辨认出来。父亲可能比儿子矮一厘米，外貌一模一样，消瘦，胸部宽厚，手臂很长，头发几乎全白了，但仍和青年人的头发一样浓密。

我还没有开始审问，就是说，他还没有在我对面坐下，他就先问我：

“我的儿子简在哪儿？到这儿以后我还没见过他。你们总说他很好，可是，我一说要见他，就请我原谅。对我实说吧！他还活着吗？请告诉我，我要弄清楚。”

我轻轻地抚摸着这位不安的老人的胳臂，像抚摸一匹受了惊的马的脖子：

“你的儿子当然活着，而且一切都很好。三天以前，就在这儿，我和他谈过话。”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见他？”

“是啊，他比你恢复得快。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先找他谈了，他提供的情况也许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为了例行公事，把你们暂时分开，并把向他提出的问题也问你一遍。不过，你放心，很快就可以见到他。”

老洛伊略为平静一些，一下子倒坐在椅子上。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坚实的拳头放在膝盖上，微微颤抖着，看样子并不是由于害怕。

我把问他儿子的同样问题，问了他一遍，他的回答也与儿子的一致。我又一次听到他们如何接近范·论，开头如何一帆风顺，后来如何不断遭殃等。可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回答却不一样了。

“洛伊先生，你说，你们开头一帆风顺，后来变得困难重重，你不觉得突然吗？”

“是的，”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很奇怪。”

“你想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他继续泰然而敏捷地说，“我看我们是被出卖了。”

“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事情很明白，不是吗？我们彼此都很了解，也很信任加百利，他不是个不负责任、甘冒无谓的风险的孩子。要想欺骗德国人，即使不冒风险，也是危险的。加百利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的人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碰头的地点也经常变换。一次被抓，可能是运气不好；两次被抓，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月之中竟然发生三次甚至四次！要说是运气不好，就讲不通了。肯定是有内奸作怪。”

“是的。假定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你们当中谁是内奸？”

老洛伊一下子脸色刷白，然后，耸耸肩膀，说：

“不知道。第二次事故后，我想这事可能是个内奸干的。我起了疑心，然而，我把这种怀疑深深埋在心里。不能去问老朋友，他们是否与敌人有勾结。”

他咬紧牙关，淡然一笑，笑容里没有丝毫喜悦。

“当然啰，”我说，“但是，总会有一些事引起了你的注意，一个手势或者一个眼色。加百利会是内奸吗？”

“不，他不会的。”

“范·伦呢？”

“他也不会，我可以拿自己的生命为他担保。”

“那么，是你，或者是你的儿子？”

老洛伊蓦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刹那间，我以为他要用伸出的双手来掐我的喉咙。

“你怎么敢，”他暴跳如雷，“你怎么敢指控我的简？如果要指控，那就指控我。我可以为自己辩护，但是，你不能指控我儿子。这是不可能的，简绝不会出卖他的父亲和朋友。”

老洛伊的衬衫敞着，当他猛然站起来时，我隐约看到他脖子上有一条项链。我赔礼说：

“我没有指控任何人，我只是要弄清真相。顺便问一下，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老洛伊把一只大手伸进衬衫开口处，拉出一个拴在项链上的小口袋，把项链从头上取下来，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说：

“你自己看吧！”

我抓起小口袋，把里边的东西全部倒在桌子上：一个结婚金戒指，一绺用线扎好的头发和一个身份证。

“干吗把这个带在身上？”我指着身份证问他。

“说不定用得着它。”

“这里的当局会发给你一个新的、在盟国通用的身份证。”

“我不打算待在这儿。”老洛伊回答说，“我要回荷兰去，我的工作在那儿。”

“你想回去？去送命？去受刑？”

“我没有说‘想’回去，我的任务是去那儿。”

我突然转变话题。

“洛伊先生，你会发动马达吗？”

“当然会啰！打仗以前，我有一条机动船。”

“那么，你儿子呢？他也会吗？”

“他怎么不会？”他骄傲地说，“我儿子这个海员比我强。”

谈话到此结束，再也没有可问的了。我让他回去休息休息。他又问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儿子，我含糊其辞地说很快就可以见到。老洛伊从桌上抓起小口袋，重新挂在脖子上，离去之前，又以熊一般的力气和我握了握手。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点起一支烟思考着。究竟谁是叛徒呢？父亲，还是儿子？两者都有可能向德国当局传递情报，他们对出逃方案十分了解，而且父子都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加百利小组。两人当中有一人在船上安装了导火线。老洛伊说，两人都会开发动机。

从对儿子有利的方面看：在第一次事件发生时，他本人也在船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游回来，保住了性命。一个奸细是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的，除非是预谋。加百利说过，德国人没开枪，抓走了全部乘客和一名船员。也许是有意让小洛伊在船沉之后游水逃回去。

从对父亲有利的方面看：他随身带着身份证，而儿子却没有带。父亲说要回荷兰去，所以带着身份证。看来儿子是不打算回去了，他已脱离了小组。但是，父亲打算返回荷兰的用心是为了继续反对德国人，还是跟他们合作反对抵抗小组呢？也许儿子是奸细，他已经感到厌倦，想找个安乐窝，借北海来把自己和复仇心切的加百利遥遥隔开。也许父亲这个顽固的奸细决心干到底，带着身份证可以两边通行无阻？

我把审讯结果又重温了一遍，两人的回答几乎一样，然而，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却截然不同：当我问小洛伊对突如其来的挫折的看法时，青年人面色立时变得苍白；当我说到小组里有奸细时，他表示很意外。但是，当我向老洛伊问及这一切时，他毫不含糊地说“肯定有奸细”。是不是儿子非常诚实，他意想不到朋友中间会有奸细，或者说，他的反应仅仅是迷惑审讯人的诡计？

是否父亲更老实，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既不害怕，也没有别的用心；或者说，他是更狡猾的敌人，善于伪装，手段更高明？

他们两人还有一点不同。审讯中，一接触奸细问题，小洛伊就气愤地问我是否怀疑他，老洛伊也因为我怀疑他儿子而火冒三丈。父亲是公开为儿子辩护呢，还是通过假装为儿子辩护而转移视线呢？

最后，在他们各自的态度上，还有一点不同：小洛伊直到审讯结束时才问起父亲，而父亲一开始就打听儿子。显然，父爱子远远超过子爱父。难道是这种深沉的父爱使他变节？为了儿子安然无恙而亲自与盖世太保搞交易？

我开始对各种促成叛变的原因逐一加以思索。有时候，对某个人、某个组织或国家的仇恨，会使一个人产生复仇的愿望，从而去反对所仇恨的对象。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为了爱。由于爱上了敌方的一个女人，堕入情网的男人会出卖密码。再一种情况是受贿。在第一次大战中，奥地利反间谍组织的首领莱德尔上校，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由于有同性恋之癖，被收买了，把自己国家的军事机密出卖给了俄国人。胆小怕事导致叛变是最常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我无权指责一个落到凶恶的敌人手里，受尽折磨之后，供出所知道的一切的人。只有那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经受暴行而不吭一声的非凡人物，才有资格指责别人。我们都坚信自己能够经受得住痛苦的、漫长的折磨而不屈服，幸而真正经受这种考验的人是不多的。

有的人出于个人利益。不少职业间谍，“谁出钱多”就把情报卖给谁，不管是哪个国家。有一个荷兰老叛徒德隆格尔（他的案情我在前面已有叙述）在英国给德国人当间谍，为的是贫穷的妻子可以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一笔微薄的报酬。可怜的德隆格尔为了爱妻子，出卖了自己，没有好下场。当德国“商人”得悉德隆格尔被处决，就停止给他妻子付报酬。

除了德隆格尔和其他少数为了爱情而叛变的可怜虫外，对于多数叛徒来说，有一个共同原因：自私心。庸懦小人，贪吃、放荡以及受尽下等待遇的人，最容易被收买。我没有学过心理学，但是我见过各种人，为了弄清某些人的行为的动机，我不得不分析他们的人品。在叛徒身上，我常常发现他们深受压抑，极端自私。一个男人或女人，如果心中只有“我”，那么，他必然是脆弱的，容易被收买的。

经过这么一番思索之后，我决定重新审问小洛伊。我让他随便坐在一个舒适的靠背椅上，聊了五分钟的琐事，然后问他：

“洛伊先生，你该是位了不起的游泳健将吧！”

他谦恭地回答说：

“说实话，游得还可以。”

“你太谦虚了。请你告诉我，第一次出事的时候，你们刚出发，德国人就发现了小船，那次你逃出来，该是游了很长一段路吧，是不是？”

“差不多有三英里。”

“我个人认为那一次干得非常出色。我很想听你谈谈详细经过，就是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能给我讲得详细点吗？”

“当然可以。那一次，我们两人负责驾船来英国，一个是我，另一个叫菲利浦。我们把船弄到海边，我在船头把船稳住，菲利浦在另一头帮助人们上船，并清点人数。忽然，在五十米以外的地方，探照灯亮了，光柱直向我们射来，接着，另一边的灯也亮了。在两边光柱照射下，我们被逮住了。我听到有人大声下命令，知道德国人来了。船上的人便起身往水里跳。大家都向一边挤，船倾斜了，几乎要翻了。有的人在绝望中挣扎，推开别人，打算逃走，乱作一团。我想，一切都完了，现在只好各自保命了。如果我留在那儿，也会和大家一样被捕。一会儿，安全吃水线上升了，船头露出水面三四米。我躲到一个暗角里，潜到水下，一口气游了二十米。第二次钻进水里，一直游到我感觉肺快炸了才露出水面来。这时，听到海边还有人声。上帝保佑，没有探照灯搜索海面。我慢慢地游着，离开了小船。这就是全部经过。”

“很好，”我夸奖他说，“这样逃跑，无可指责。古语说得好，‘大难不死，东山再起’，如果你被德国人抓走，对加百利来说，你也就一文不值了。我记不清你刚才说在游泳时是否脱了靴子……”

“我没有穿长靴，”他不假思索地说，“我穿的是拖鞋。”

这是我设的一个计。

“真的吗？”我说，“这倒很有意思，一个海员穿着拖鞋，乘敞篷船和一批难民一起横渡北海去英国。这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到海边去遛个弯，而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长途涉水。你可别忘了，船是

敞篷的，海浪打在船头上，海水会浸没船底。你竟会穿着拖鞋去参加这次危险的航行，精明的水手！……要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要穿拖鞋吗？因为你事先知道小船绝不会出海！你已与德国人合计好了，知道是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水澡，所以穿上拖鞋，脱起来方便。”

“你说得不对，”他大声吼叫着，“我……”

“我说得不对吗？”我打断了他，“不见得吧！计划是精心安排的。如果是你策划的话，我佩服你的精明能干。加百利小组第一次被出卖时，你这个嫌疑最小的人差一点被捕。不！仔细一想，我就怀疑你有这样的才能，能单独一个人策划出这个方案来。看来，很像出自我的老朋友——德国在荷兰的特务头子吉斯凯先生之手。不是他的主意吗？”

小洛伊掩饰不住自己的慌乱，剧烈地摇晃着脑袋，叫喊着：

“我不明白你的话，你说的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不是奸细。”

“你肯定是，”我反驳他，“我要让你供认，哪怕在这儿一直把你审到战争结束！”

但是，简·洛伊一直没有招供，他比我强，而且考虑得很周到。我审了他整整一个星期，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不断地重复着拖鞋的事。我笑他，我发誓，好言相劝，都无济于事。我甚至说，加百利已经断定他是奸细，因为那天晚上看到他从德国司令官家里出来。我设了种种圈套，但是，他太机警了，一次也没有上当。

有一次，我把他带到一间屋里，让他和父亲见面，那里暗放着一个窃听器。事先关照了他父亲，告诉他情况对儿子很不利。但是，即使对自己的父亲，简也没有说出任何可以定罪的话。他斩钉截铁地说：“那天晚上穿拖鞋只是为了图舒服，长筒靴在船头凳子底下放着，一到远海就要换上。”

我把此案转给律师委员会的一位法官，结论是：材料不足以进行正式审判。船已被德国人抢去，他所说的靴子在船头凳子下面一事，

没有人证，无法肯定或否定，也不能指望父亲出庭作证。小洛伊紧紧抓住自己的说法不放，免遭任何危险。

他这样安然度日，直到战争结束。小洛伊回荷兰后是否一切顺利，我就无从知道了。加百利曾经说过“我要报仇”，他早晚会遇到机会。

小洛伊在英国被监禁了三年。他可能知道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根据法律，我们无法对他进行审判。他父亲到英国半年后就去世了。官方的结论是：一路上受太阳暴晒，无法恢复健康。可是，我认为是儿子的行为撕碎了老人的心。简的暴露比太阳暴晒更能置他于死地。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老洛伊心里明白，他如此心爱的儿子被当做了奸细。

# 第四部分　休假中的反间谍人员



# 第一章 “贵宾”

1942 年的头几个月里，我开始感到头昏脑涨，精疲力竭。战争进行了两年半，我一直忙于甄别难民和审查成千上万逃到英国来的人的身份，从 1939 年 9 月起，就没有休过假。我最大的愿望是到远离伦敦的乡间住些时候，听不到炸弹的爆炸声，不谈论安全问题，让肌肉松弛一下，无忧无虑地听鸟儿歌唱。只要有这种机会，我就抓着不放。

一天上午，我接到里斯本的通知说，一位化名艾伯特的荷兰抵抗运动的知名领袖几天之前到达那里。一两周前，他通过一条秘密渠道从荷兰逃出来，定于当天乘坐一架伪装过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前来英国。飞机将于下午在英国南部某机场降落。

艾伯特刚刚离开荷兰，带有最新情报，必须立刻会见他，以便把情报不失时机地向英国方面转达。这只能由一个能讲荷兰语的人去做。

这项工作自然落在我的身上。我那些多疑的同事被告知说，整个组织中，只有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荷兰话，当然，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荷兰语是我的母语。

我匆匆吃过午饭，坐上一辆由军人开的汽车，前去会见艾伯特。我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习习的春风吹拂着我那习惯于伦敦办公室严肃气氛的面颊。不知为什么，军队里的司机都那么多话，我半闭着眼睛，听着他那枯燥乏味的饶舌，时而哼一声，表示并未睡着。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机场，从酒吧到机场入口都有检查站。一名值勤哨兵检查了我们的通行证，我对他的内行表示赞赏。

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陌生人拿着阿道夫·希特勒签署的通行证居然进入了我们的军事区！一家报社故意让自己的人穿一身地地道道的纳粹士兵服装，在白厅前游来荡去，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几个士兵还向他致敬，以为他是休假的法国军官呢！保安工作从来不是英国的骄傲。

汽车在停机坪旁一所漂亮的、舒适的平房前停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跑道扩建后才修了这所房子，司令部占用了它。年轻的、初出茅庐的飞行员们住在更安全的地方。

为了保险，我在飞机到达前半小时来到机场。我把司机打发走，让他二十五分钟后再来，就走进室内求见基地司令。他正在等我，我受到亲切的接待。刚一坐下，就端上了英国人在任何场合都必不可少的茶。这种款待决不是出于习惯。反间谍机构的人带着“行囊”登门拜访是件大事，一名重要的难民到达机场也非同寻常。

为了验明身份，反间谍组织讯问外国人是常有的事。谈了不到五分钟，我就知道了基地司令的主要特点。看上去他不过四十来岁，头发稀疏，嘴角和眼睛周围已布满了深深的鱼尾纹。除了左边衣袋上佩着一个鹰形飞行员徽章外，连一枚勋章也没有。打了三年仗，一名作战飞行员没有获得空军大十字勋章，是很难当上基地司令的。我想他大概是空军的一名平庸的军官，战争爆发时年龄太大，不能驾机作战，只好改做行政工作。

皇家空军有个制度，经常保持一名值班人员，以应付紧急情况。值班人员的职责包括机场安全、飞机维修和管理作战中队。空军和陆军之间偶尔发生争执，基地司令总能轻易平息，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两个部队之间维持风纪。要完成这项使命，需要相当圆滑。有时候，误会发生在火气都很盛的年轻人之间，这些年轻人的军阶比基地司令还高，他们背地里都叫他是“长翅膀不会飞的老企鹅”。

我的印象是基地司令力不胜任。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性情

急躁，不停地抱怨年轻的飞行员们深夜胡闹。在他那个时候，年轻的飞行员在吃饭时，除非上司问话，一律不准闲谈。现在，有人一下子就成了正式飞行员，转眼间又升为中队长。昔日——他差一点要说“那美好的昔日”——升一级得熬多少年啊！我委婉地向他说明，现在晋升快是因为机会来得快，谁也不能阻挡该提升的年轻人晋级。基地司令对我的理论不以为然，显得相当激动。

我们谈话时，他踱来踱去，东张西望，焦急地等着来自里斯本的飞机到达。他不停地看表，两次和指挥塔联系，询问是否有飞机到达的消息，他这样心神不定实在令人同情。当指挥塔报告飞机正在降落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乘客们在远处下了飞机。一辆汽车开过去，接我的“客人”。我和基地司令到外面等汽车开过来，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汽车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除司机外，从车里走出四名乘客。

头一个下车的像是一名外交官，作出这种判断并不困难，因为他戴一顶安东尼·艾登式黑色“瓜型”帽，这是内政部官员们的标志，并且手上还拎着一个公文皮包。他用手扶住车门，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跟着走下来。随后是一位年纪比她大得多、仪表堂堂的绅士。他用手搀扶着女郎，像是在保护她一样。最后走下车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胸前抱着一个棕色的纸袋，这无疑就是艾伯特了。

我一边走上前去，一边情不自禁地望望这年龄悬殊的一对。一个年轻风流，另一个老态龙钟。绅士的面孔对我并不陌生，如果不是见过他本人，就是见过他的照片，总之我见过他。他大概是个公爵，无论从风度或行装都可以看出来他出身名门。我的大脑迅速搜索着，终于想了起来。在战前幸福的日子里，我曾在阿斯科特“王家禁地”见过他的照片，在宫廷会议上也见到过他本人。公爵家世显赫，富可敌国。考虑到他的名声，这里我姑且称他为蒙毛斯公爵。

我一边问候艾伯特，一边在想，一位如此美貌的妙龄女郎怎么会

陪伴一位尽管出身富贵，但却老态龙钟的人呢？或许她是他的侄女？尽人皆知，战争期间，“贵宾”们外出执行任务，常由年轻姑娘陪同。但是，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公爵亲昵的态度，他很随便地挽起姑娘的胳膊，这使我觉得他们之间绝不仅是亲戚关系。公爵素以风流和追逐女性著称，年轻时曾在两次轰动一时的社交丑闻中大出风头。现在虽然年事渐高，但作为积习已重的“征服者”的名声仍然不减当年。不过，他的行为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的任务是接待艾伯特。

一辆停在我的车旁的官方黑色轿车接走了外交官。基地司令走上去向公爵和他的女伴自我介绍，我走上前去和艾伯特握手。我和艾伯特离开纷扰的机场，朝基地司令为我们安排的前厅走去。作为例行公事，我查验了艾伯特的证件，包括我国驻里斯本大使的亲笔信，提了几个重要的问题。他很快作了回答，以证明他的身份。我们开始谈起荷兰的形势，处在德军后方的各抵抗组织的斗志。艾伯特带有重要的情报，但初次交谈，并无多少认真的话题。他提供的情报对完善我们的体制和改进反间谍工作遵循的某些理论都可能有用，情况基本如此。

这时，有人敲门。一名皇家空军的勤务兵走进来，说了声“请原谅”，然后说，基地司令有急事要和我谈，希望我马上去一趟。我有点恼火，继续和艾伯特谈话。过一会儿，我只好请艾伯特原谅，跟着勤务兵来到基地司令办公室。一进门，就发现一场激烈的争吵正处在白热化阶段，坐在桌子旁边的公爵击败了可怜的基地司令。他像个胆小的侏儒一样坐在椅子上，在口若悬河的对手面前手足无措。漂亮的金发女郎站在窗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看到有人进来，公爵火气更盛了。

“真荒唐，”他指手画脚，敲着桌子说，“居然怀疑我说的话。我再说一遍，迪克特拉小姐是我家的故交，我的私人朋友。而我，”他捶着胸脯，强调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她的诚意。你听清楚我说的话吗？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如果你不马上放我们走，你会知道我不是好惹

的！”

“怎么回事？”我问。

基地司令向暴怒的绅士怯生生地道声歉，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走廊上。一关上门，他就靠在墙上，擦着从额头流下的汗。

“上帝！”他喃喃地说，“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发誓说这姑娘是他家的故交，可是我看，她准是公爵在里斯本弄来的小妞儿。但愿他幸福，可是我不能让他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带到这儿来。怎么办？她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护照，什么也没有。对我来说，她也许是出名的女间谍奥尔加·波拉斯基。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让她走，如果她是国家的敌人或是间谍，那我就要受军法处治。要是把他们扣在这儿太久，又找不到指控他们的理由，公爵会把我生吃了！”

“你问过她吗？”

“问过。可她只会讲荷兰话，我又不懂。这种情况飞行手册上可没有讲！”

我暗暗可怜基地司令，事情的确令人为难。由于我对艾伯特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了，便自告奋勇帮助他。

“你想继续下去吗？我会说荷兰话，而且我的职业正好是审查到这个国家来的外国人。”

“要是你愿意帮助我，我当然感谢。看在上帝面上，你要果断些。这个家伙威胁说要给他的朋友温斯顿·丘吉尔或别的什么人打电话。再和他纠缠下去，我要中风啦！”

我走进去，向公爵自我介绍。我拿出官员护照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告诉他，我必须讯问一下他的女伴。公爵一听就火了，疯狂地转向我，好像要估量一下面前这个对手是个什么人物。他也许认为我是个爱出风头的、无聊的文牍主义者。他说，他对迪克特拉小姐负责，如果他这样说还不够，他知道该怎么办，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站在那儿，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些劈头盖脑朝我发来的滔滔议论。别人用这种口气

对我说话还是头一回。

但是，再凶的对手在弹药用尽的时候也会后退，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据以自卫了。

过了好一会儿，公爵才稍微平静下来。我趁机说出了我的想法。我一再说明，我们现在是在陆军部的地盘之内，我只不过是个执行任务的普通官员。迪克特拉小姐被询问之前，谁也别想离开机场，他的咒骂时间越长，浪费的时间就越多。公爵如果想控告我，我乐于提供必要的方便，即：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是，在询问之前，我们谁也别想离开机场。

我望望公爵，当真以为他要昏倒了。他面红耳赤，额头青筋暴出，再次向我咆哮起来。他对我的家世和先人肆意诋毁，预卜着种种厄运。后来，他累了，突然停下来说，他愿意等五分钟，五分钟足够我询问迪克特拉小姐了。但是，又要我和基地司令对所发生的事公开道歉，承认我们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示意基地司令把公爵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足够的白兰地在等着他，去安抚他那受伤的自尊心。

我回到艾伯特那里，他正耐心等着我。我为自己因一件急事耽搁他表示歉意，随后让人端来茶和点心，然后写张便条，说明艾伯特的事不急于办理，交给皇家空军的女电话员，让她用电话通知伦敦。

现在我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迪克特拉小姐的案子了。我匆匆回到基地司令的办公室，命令卫兵走开，让姑娘坐在桌子旁边，自己则坐在司令官的办公桌前。

迪克特拉小姐确实很漂亮。北欧女人通常都有冷若冰霜的线条美，而她的面孔即使在安静中也显得生动活泼。我不禁暗暗佩服公爵的眼力。我坐下来，递给她一支香烟，开始用荷兰语同她交谈起来，虽然我确信她的英语讲得很好，绝不像她装的那样。

在反间谍工作中，绝不可以貌取人。据我所知，有的人面目可憎，

但高尚正直；而最奸诈的家伙往往生就一双无邪的眼睛和天使般的神情。无论如何，迪克特拉小姐身上有什么东西令我怀疑。她修饰打扮得有点过分，完全不像她说的那样是个不幸的落难女子。

我知道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我详细讯问迪克特拉小姐，因此，简单寒暄之后，就请她讲讲自己的经历。她讲得简明扼要。

她原在阿姆斯特丹工作，是一位进出口贸易商的秘书。由于德国入侵荷兰，业务实际上停止了。部分原因是由于爱国主义，另外也是出于报复，她的上司加入了亲抵抗运动的组织。当时她年仅十九岁，不怕德国人，喜欢自己的上司。再说，这种冒险带有刺激性，很浪漫。后来，她逐渐成了阿姆斯特丹抵抗运动两部分之间的联系人，其中一部分就是由她的上司直接领导的。她喜欢干这种事，它就像常看的侦探小说那样惊险。

德国人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只留下一些供德国军人娱乐。她能歌善舞，每个星期总要在这个那个女友陪同下，去那么两三次。她们坐在桌子旁，等人来邀请。

她每次去跳舞，都从上司那里了解当晚的暗语。暗语通常都是一句简单的话，经过巧妙选择，不引人注意。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舞伴是不是抵抗小组的人，直到对方偶尔说出暗语，她才把上司的口信转达给他。迪克特拉小姐说，在抵抗运动中，彼此不该了解太多。这样，当一个人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就供不出多少东西。

在十八个月里，她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是，盖世太保渐渐侦查到抵抗小组的活动，而她的领导和小组的成员对此却毫无觉察。时机一到，盖世太保就动手了。

一天上午，她正准备出去，听到有人敲门。门打开后，外面站着一个人，神态十分慌张。她知道此人名叫安东，是她上司的朋友，抵抗小组的活跃分子。安东说，他们的头头和其余的人都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幸好他当夜没在家睡，得以脱逃。可是，迟早会有人招供的，

那么她就将卷进去。她必须马上离开，此刻就走，不能考虑收拾行装和到处告别。安东说，他早已对此有所准备，事先已经和另一个人商定好了逃跑的办法。他们必须马上走，先到一个朋友告诉他的地方去。

她抓起手提箱，没敢耽搁，丢下心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们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地方——一个废弃的仓库，在那儿，见到了另一个人。据安东说，他叫比利，也是小组的成员，和抵抗运动以及她的上司关系密切。由于他们小组遭到挫折，另一小组也立即疏散，看来短期内无法活动，只有等到风声稍微平静之后再说。到时，他们将重整旗鼓，就像一条被斩断的爬虫那样，重新连接起来需要时间。

可是比利接到了不同的命令。他必须离开荷兰（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到英国去。没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安东和迪克特拉小姐与他同行。

当天晚上，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先是被交给一个向导，后来又被交给另一个向导。就这样，途经布鲁塞尔到了巴黎。他们坐火车到里昂，停了几天就乘汽车南下，然后步行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在那儿，他们找到一个巴斯克人，此人熟悉所有的山间小道。在巴斯克人的帮助和指引下，他们穿过大雪封锁的、严寒的峡谷，最后越过边界到达西班牙境内。

至此为止，迪克特拉小姐讲述的故事完全真实可信。我通过别的渠道得知，由于她的上司在阿姆斯特丹领导的小组被盖世太保破坏了，安东和比利通过一条渠道离开了荷兰。直到里昂，他们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可是，所有的情报都没有提到过有一位姑娘和他们同行。但，这并不能说明迪克特拉小姐讲的不是实话。密码传送的电报通常略去细节，有关迪克特拉小姐的事也许被略去了。

于是，我开始详细讯问有关出逃路线的细节和沿途向导的情况。迪克特拉小姐对所有问题都回答得肯定而且令人信服。但是，当她提供的情况逐渐形成完整的印象时，我脑子里忽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所有逃亡的通道以及通道上的特工人员，不久前都遭到德国人的搜查，

里昂小组也在迪克特拉小姐通过之后一两天被破获。敌人的这些行动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迪克特拉小姐也许从来就没有走过那条路，也许盖世太保在抓到从这条路上逃跑的不幸者之后中止了搜查。

在提出新问题之前，我的思绪被重重的敲门声所打断。基地司令把头从门外伸进来，狼狈地问我是否能立即和他谈谈。我叹了口气，不高兴地站起来。这样不停地被打断，讯问如何能进行下去？基地司令是个神经质的急性子，甚至看到自己的影子也会吓一跳。他要是多少能克制点自己，我也许会很欣赏他。

我关上门，见他正神情不安地走来走去。他求我快点结束对迪克特拉小姐的讯问，因为公爵又发作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和空军部通电话，用最粗暴的言词威胁说要对他和他的旅伴在机场受到的侮辱性对待提出控告！

他绝望地说："看在上帝面上，尽快把这件公案了结了吧！如果不在几分钟内把这一对打发走，我们将承担最坏的后果。你只是在执行临时的任务，而我要保住终生的饭碗，得想到妻子和两个孩子。"

"你听我说，我很同情你的处境，可是你必须把那个固执的家伙再缠一会儿。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两句简单的话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不能中断讯问。"

"你看还要多久可以结束？"

"很难说。你知道有一次讯问用了三个半星期才解决吗？"

"主啊！"基地司令无可奈何地喊道，他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擦着从脸上流下的汗水，"我对公爵怎么交代呢？"

基地司令的样子实在令人可怜，他转身回到公爵所在的房间。等他走开，我忍不住笑了。回到房间，我请迪克特拉小姐原谅并请她继续讲述被打断的故事。她刚才讲到她和她的同伴到了西班牙境内。

故事差不多讲完了。她说，他们继续向南，向着西班牙和自由前进。西班牙尽管保持中立，但还是令人生畏，因为政府当局同情希特

勒政权，德国特工人员遍布全国。他们知道闻名的米兰达·埃布罗集中营里关押着许多政治犯，不少人从那里永远消失了。为了避免被抓住，他们夜晚赶路，白天睡觉。有一段，他们偷到了自行车，三人轮流骑上三四十公里。

“你的同伴呢？安东和比利留在里斯本了吗？”

“不，”她说，“他们没有能到达那里，真可怜！”

“为什么？”

“出了岔子。再有两三天我们就安全通过葡萄牙边界了。正如我对你说的，我们夜里走路。有一天，在黑暗中迷了路。太不谨慎了，本来应该等到天亮再说，但是我们过分自信，已经走了那么远都没出什么问题……”

“什么意思？”我问。

“是这样，我们迷了路，安东决定去敲一家的门问问。他多少能讲几句西班牙语。比利不同意，但安东说服了他。我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只好在篱笆外等候。偏偏这是当地唯一的一所由民团占用的房子。安东一开口问去葡萄牙的路,开门的人就怀疑了,他喊来了同伙，把我的两个朋友抓起来。我听到枪声和嘈杂声，但是束手无策。我要是去救他们，也会被捕。我在篱笆外躲了差不多一小时，只好一个人离开了。可怜的朋友们！已经安然无恙地走了这么远，却突然被捕了。我真后悔在安东走近那所房子的时候没有阻止他。”

迪克特拉小姐望着我，那双美丽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我暗自想，这些精疲力竭的人干了多么不可原谅的蠢事！出于过分自信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但是，两个抵抗组织的一向谨小慎微的人在接近目的地时迷了路，又去敲一家不认识的人的门，这不能不令人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对她的话我不能多加怀疑，再说，时间也不允许。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迪克特拉小姐沉思片刻，然后说：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我完全失去了准确的时间概念。让我想想，今天是十四号，对吗？那么，有九天或十天了。”

“你什么时候到里斯本？”

“三天之后，距今正好一个星期。”

“而这些呢？”我指着她身上的漂亮衣服和头上那华贵的帽子，“你一路上都带着而且穿着这些衣服吗？”

“当然不是，”她红着脸说，“我到的时候衣服都破了。我立即去找自由荷兰当局。我到的第二天，同公爵偶然相遇，他是我家的老朋友。我狼狈的样子使他大为感动，走了那么多路，鞋子磨得都像纸一样薄了，他慷慨地为我置了新装。”

“很慷慨，”我小声说，“准确地讲，你是怎样‘碰’到他的？”

“在阿维斯旅馆的大厅里，我在那个旅馆里有个房间。我正准备出去的时候，碰到了他。”

阿维斯旅馆是里斯本最豪华的旅馆之一，接待成双结对的人，但是，却不“适宜”接待难民。德国炸弹的民主影响也无法使伦敦的时髦东西普及。像伦敦和平时期一样，里斯本的社交生活是等级森严的。我十分怀疑，一个衣着不雅又如此落魄的年轻女子会被这样的旅馆接待。一位一文不名的落难女子住在这样豪华的旅馆里，目的究竟何在呢？

我正要讯问这个问题，又有人敲门了。这一回基地司令派了个勤务兵来，说命令我去一趟。唉，这件事要由基地司令本人处理，不知会多么荒唐！这样不停地进进出出，打断我的讯问，实在令人泄气。

我愤怒地走出去，但是，当我看到倒霉的基地司令绝望的样子，本来准备对他发泄的粗鲁话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对我说，公爵又大发雷霆了。司令无法掩饰自己的沮丧。他说公爵再次和白厅通话，对他们在机场的羁绊大为不满。在电话里，他大声喊叫，以致在隔壁房间的基地司令断断续续听到这样的活：“值班的是些蠢驴”，“高等

畜牲”，如此等等。我也不断听到“应当伸出手来挨板子”之类的话。当霍金斯司令看我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像他那样失魂落魄。他说：

“朋友，我受不了啦！你讯问这个姑娘半小时了，一定已经有些眉目。如果她是个间谍，不可能和公爵在一起，为什么不可以另找时间审讯他们呢？如果我们不马上放了他们，最好别等人家撵，我和你都卷起铺盖滚蛋。”

“发生这种事，我实在遗憾，但是，我必须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位姑娘讲的情况不十分清楚。”

“但是……还没有弄清疑点吗？”

“不，还没有！”

“看在上帝面上，你快点问吧！坦率地说，我真不知道你今天怎么偏偏到这儿来。”

“你要我提醒你我为什么在这儿吗？”我提高声音说，“是你自己求我帮忙的。我们越是像两个学生那样讨论不休，公爵等的时间就越长。”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听到中间房里传出一阵怒吼，像野兽的咆哮，这是极度恼怒的公爵又一次发作了。基地司令像一只被追捕的兔子，一溜烟跑掉了。我猛然转过身子，不小心绊在一个灭火器上。我诅咒着，突然一个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回到屋内，坐在迪克特拉小姐面前，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句话也不说。然后，我突然说：

“我们摊开说吧！你说差不多两个月以前越过西班牙国境的，对吗？”

“是的。”

“还说在六个星期后到达里斯本，对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说六个星期走了一千公里，每星期平均走五十多公里，对吗？”

“是的，我已经说过，我们偷过自行车，一直把它们骑坏为止。”

“对。”我说，“但是，即使这样，你们还是步行了差不多全部旅程，是吗？”

“是的。”

“好，脱掉你的鞋子。”我命令她。

迪克特拉小姐十分吃惊，机械地服从了我的命令

我迅速说一声“对不起”，就弯下身子，透过薄薄的丝袜摸了摸她的脚底板。迪克特拉小姐目瞪口呆地瞧着我，以为我发疯了。

我严厉地对她说：

“你的脚不像是在六个星期里走了差不多一千公里，鞋底差不多磨得像纸那么薄的人的脚，相反，却细嫩得像婴儿的脚一样。小姐，你不是用这双细嫩的脚，而是坐在德国汽车里，舒舒服服到里斯本的吧？”

迪克特拉小姐被打垮了，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还想说什么，但是我默不作声地、带着嘲弄的神情望着丝袜里那双小巧的脚。

她最后供出了实情。她爱上了一位德军中尉，答应为他们工作，德国人已经知道蒙毛斯公爵要飞往里斯本执行国际红十字会的一项使命，而且知道他在女性方面的弱点以及战前他在荷兰有不少贵族朋友。得如这些细节之后，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十分精密的计划，为迪克特拉小姐和他的邂逅做了安排，而这位小姐又说同公爵的一位朋友早有交往。

不久前，逃亡的通道遭到破坏，安东和比利在里昂以南被捕。迪克特拉小姐说她在通过荷兰时一直陪着这两个人，掌握有德国情报局的情况，她就得到了公爵的好感。一旦在英国受到盘问，还准备好了说词。德国情报局估计到公爵会为她作保，讯问必然会不了了之。假

如运气稍微好一点，完全可以实现其狡诈的计划。

我让人把公爵和基地司令叫来。公爵来到时还在指手画脚，十分激动。我打断了他的话：

“你的同伴，你家的世交，刚刚供认她是为德国人效劳的。她必须在这儿写下供词，再签上字才能离开。阁下可能被指控为同谋，但我不想拘留你。你可以走，不过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直到事情完全弄清为止。你的护照被扣留了，未经允许，你不能离开伦敦。”

房间里出现了炸弹要爆炸的紧张气氛，但是，炸弹终于没有爆炸。公爵羞愧地离开了，他已经知道，爱莫能助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迪克特拉小姐没有受审，法律上对她的起诉不值得渲染。也许有影响的人士认为，把一个贵族成员牵进一桩间谍案中不大合适。迪克特拉小姐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被隔离，战后才被遣送回荷兰，因叛国罪而受审。

公爵本身是完全无辜的，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帮助一名间谍，像许多人那样，他被一个“漂亮的小脸蛋”和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弄得神魂颠倒。不过，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当我同抵抗运动的领袖艾伯特准备离开机场时，基地司令一再向他道歉，说耽搁他太久了。

基地司令最后说：

“嗯，我现在才知道 VIP 是什么意思了——非常轻率。”[1]

---

① VIP 是英文 Very Important Person（贵宾）的缩写。这里，基地司令含有讽刺意味地把它说成是 Very imprudent（非常轻率）的缩写。——译者注

# 第二章　一位飞行员

1943 年秋，我刚从 MI-5 调到自由荷兰政府的外事警察局几个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我突然接到使馆空军武官的一个奇怪的电话，要我马上前往英国北部的皇家空军轰炸机机场并说半小时之内有汽车来接我。我问什么事如此紧急，他含含糊糊地说到时候自然会告诉我，总之事情紧急，大使阁下对此事甚为关心，立等一份完整的报告。

有好几分钟时间，我坐着抽烟，揣摩着电话的意思。在长期工作中，我知道大人物对些寻常小事往往言过其实。但是空军武官是个出色的飞行员，对积习深重的官僚作风轻易不会苟同。如果他也认为事情相当重要，十分紧迫，那么一定相当重要，十分紧迫。虽然如此，我还是想知道得详细一些，以便为处理这个问题做好准备。

幸好当天我没有别的事，就打电话告诉助手，说我要外出，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会打电话通知他。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打电话到皇家空军机场找我。

秋日的上午晴空万里，汽车行驶在埃塞克斯公路上十分惬意。两排亭亭如盖的绿树一直沿公路伸展到英国农村的中心地带。白云不断变幻的苍穹下，横亘着“东英吉利”连绵不断的牧场，使我不禁想起了故乡荷兰。我回忆着自己的童年，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架从附近机场起飞的飞机的轰鸣声把我从昏昏欲睡中惊醒。不一会儿，汽车就来到由皇家空军卫兵把守的横在公路上的路障前。

路障两侧是围绕机场的铁蒺藜网。我们出示了通行证，木栅门打

开了。再往前走，汽车停在一所灰色的大石头房子前面，石头房子的四周是农舍。这里原来是一所乡间别墅，现在成了机场司令部和管理处所在。

我向基地的一位副官简单谈了到这儿来的原因，看来，他们正等我的到来。当我进一步追问时，他赶忙说这不关他的事，只有基地司令才清楚，他只知道是一件有关驻在该机场的自由荷兰空军中队的事，中队长也许能提供详细的情况。他说，已为我专门打扫好了一套房间，需要什么饮料和饭菜，会立即送来的。他告诫我对自己的到来最好不要声张。我惊奇地望着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命令就是命令，有什么好说的！”

勤务兵陪我到了房间，在那儿待了十来分钟。真有意思！我，一名在保安部门相当有身份的军官，只身一人待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对为什么待在这儿竟毫无所知。战争期间,各车站码头到处都有“你的旅行是必要的吗？”的标语，现在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义。这件事使我想到一个患有迫害狂的人，被囚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着人人皆知而唯独他被蒙在鼓里的情况时常常有的那种胡思乱想。

终于有人敲门了，两个青年人走进来。他们都穿着皇家空军制服，佩带着自由荷兰空军的徽章。其中一位佩带空军中校的肩章，另一位肩上有两条杠杠，表明是个中尉飞行员。年纪稍大的一位自我介绍说，他叫邓克尔，他的同事叫伯杰恩。我们闲扯了一会儿，勤务兵端来了咖啡。两人的英语讲得都不错，但是，当我开始讲荷兰话时，他们很高兴地也讲起自己的母语。

我们谈论生活琐事，谈论战争和配给制度，然后，我直截了当地谈到我来此地的问题。

“两位公务一定很忙，我在伦敦也有不少事等着做。我匆忙赶到这里，看来大家对一件严重的事都很了解，我却一无所知。如果能有所裨益，我将尽力而为，但我需要了解情况。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

邓克尔中校忧郁地笑了笑——这使他显得更加年轻了，说：

“很抱歉，先生，我应该对这一切显得如此神秘而请你原谅。伯杰恩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的。问题相当严重，会使我们大家都很难堪。鉴于这件丑闻迅速扩张会使我们空军的名誉受到牵连，所以我对伦敦的武官只讲了不得不讲的话并请他保密。我请求派一名精干的军官来调查此事，并且告诉他，最好先征求一下这位军官的意见。如果我的怀疑可以成立，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办，希望你尽可能谨慎从事。如果我们的怀疑不能成立，那当然用不着再去做什么了。”

“什么怀疑？”

“好吧，伯杰恩中尉会向你解释的，这事与他有直接关系。”

两人中年轻的一位，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四五岁，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轰炸机中队是由皇家空军里的荷兰人指挥的，我是一架轰炸机的驾驶员和机长。除我之外，机组还有四个人：领航员，同时也是确定轰炸地点的人；报务员和两名炮手，一个在尾部，一个在机舱中部。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彼此照应，互相信任。我们原来的领航员在自由荷兰空军干过，他对我们就像长辈一样。我头一次飞行时，他教我避免了由于缺乏经验可能干出的不少蠢事。两三个月以前，他完成了第二期任务——三十次飞行算一期——尽管他一再要求继续飞行，可还是接到了休假的命令。他就是这么个人。

“来替他的人叫范·沃尔，像我们原来的领航员一样，他比我们年纪都大，而且有几千小时的飞行经验。他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当过民航机驾驶员，刚刚参加自由荷兰空军，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新飞行员。”

我已猜到了事情的大概，但什么也没说。我请中尉继续讲下去。

“你一定知道一个新手代替老手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几乎是一种憎恶的感觉。但是，我们尽力使范·沃尔感到随便。不过，好心没有得到好报。范·沃尔性情

古怪，从不同我们一起娱乐，虽然他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加起来还多。他总是独来独往，驾驶一辆漂亮的汽车，掏出钱包时，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钞票。皇家航空公司的驾驶员待遇一定非常优厚。”

“并非那么优厚，”我插嘴道，“我弄不准他们到底挣多少钱，但我相信不会比别人多。不管怎样，离开了航空公司，加入空军，也就挣不到那么多钱了。”

伯杰恩中尉继续说：“范·沃尔不仅怪僻，对整个机组人员还有一种令人怀疑的影响，他对德国空军夜袭的赞扬激怒了同事们。他说：‘有戈林指挥，德国人在作战方面就是真正的行家。’其他小队的人都嘲笑他，说他的幽默有点荒诞。特别是德国人两次夜袭失败之后，大家更感到他的话纯粹是胡说八道。

“后来，无法解释的事故接二连三发生。有两起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和其余的事联系起来看，就大有问题了。”

伯杰恩还讲了下述情况。

在一次轰炸中，范·沃尔领航严重错误，不仅没有击中目标，而且还因燃料不够无法返回基地，不得不在哥斯达的一个机场迫降。那之后，又有一次空袭。在轰炸荷兰北部的一条铁路时，作为投弹手和领航员的范·沃尔声称投弹装置“卡住”了，而没有投放炸弹，飞机只好带着炸弹返航。伯杰恩不愿冒带炸弹着陆的危险，在飞到北海上空的时候，就让一位对制电系统内行的炮手去看看范·沃尔中校说的毛病究竟在哪儿。炮手接替了范·沃尔，按了按发射装置前的电钮，炸弹毫无困难地掉了下去。

后来的两次袭击——这是上个星期的事——也是在荷兰上空执行任务。他们钻进浓密的云层，为了避开探照灯和密集的防空炮火.不得不忽而俯冲，忽而拉起。当防空炮火稍微停下之后，又遭到一个德国飞行小队的攻击。机舱中部的炮手受了轻伤，伯杰恩命令范·沃尔代替他。

战斗在激烈进行，伯杰恩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感觉不到机舱中部有重机枪发射时引起的震动。他奇怪为什么机枪对敌人的进攻不予还击，于是命令后炮手去看看，他还以为范·沃尔受了伤呢。后炮手回来告诉他说，他当场碰到范·沃尔企图打开紧急出口！很明显，他试图逃跑。但是，重重的一拳使他回到了现实中。

飞机降落后，伯杰恩向上级指控范·沃尔企图临阵脱逃，但是，范·沃尔断然否认。他争辩说，一阵剧烈的震动使他失去平衡，未等走到中间炮位就被摔倒在出口处。他说，这种指控是诬陷，扬言要对任何对他强加罪名的人予以反击。

"怎么办？"伯杰恩焦急地说，"我不怀疑炮手的话，我知道应该相信谁。但是，当时情况混乱，四面遭到攻击，炮手搞错了也是可能的。不过，仔细考虑一下事情的前前后后，我认为总的来说对范·沃尔是不利的。"

"当时他立即把我叫去，"一直在一旁聚精会神听着的邓克尔中校说，"一开始，我对范·沃尔就没有好印象，本来想派他去搞些无关紧要的地勤工作，远离飞行小队。但又考虑到我们需要熟练的飞行员，如果他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不使用他也不公正。如果他真的被怀疑不仅仅是胆小的问题，那派他干别的工作也是不慎重的。我们该怎么办？"他望着我说。

"你刚才说，如果他真的被怀疑不仅仅是胆小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邓克尔中校迟疑了一下，说：

"这要由你来解决了。作为反间谍人员，你是这方面的内行，可我不是。我只觉得这件事所包含的后果远比我们想的严重，不止是一时冲动的问题。请你来前，我对范·沃尔的过去进行了调查。他来自鹿特丹一个贫寒之家，年轻时在皇家航空公司做学徒工，后来参加考试，取得晋升证书，当上了飞伦敦班机的领航员。当我国遭到入侵时，他正在伦敦，于是他被转到飞里斯本的航线上，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自

愿参加空军。”

“里斯本？”我说，“这倒有意思。范·沃尔没有私人收入，只靠在航空公司挣钱……又相当富裕，你不这样认为吗？”

中校点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这和其他的事故……”他迟迟疑疑地说。

“正如伯杰恩中尉开始讲的，这很容易解释。一个人可能犯飞行上的错误，至于制电系统，也会突然发生故障。”我说。

“这问题要由你来解决。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们。”基地司令说。

“首先，我要见见范·沃尔。”

范·沃尔令我十分反感，我一生中从来没遇到过像他这样令人讨厌的人物。当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忽地站了起来。（请读者注意，我一向是善于控制自己的。）

范·沃尔中等或者说中下等身材。他趾高气扬地走进来，显出某种盛气凌人的神情，那又窄又长的脸使人想起一只狐狸，稀疏髭须像是用笔描上去的，没等我请他，就大模大样地坐下，翘起二郎腿，斜眼瞧着我。

为了不致引起怀疑，我自称是新闻部派来的记者。我开始巧妙地讲述有关邓克尔和伯杰恩的故事，并且说也听说过他范·沃尔的英雄事迹，很高兴见到他。我说，他虽然在皇家航空公司工作三十年，还是放弃了这个职业，参加了自由荷兰空军，我想写一篇有关他的报导，如果他同意，不妨通过这次私人采访收集一些素材。

范·沃尔受宠若惊，一下子就上了钩。

他带着令人作呕的、虚伪的谦逊对我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迅速升为飞行员的经过。他认为机组的其他人不那么尊敬他，是因为他们都比较守旧，不喜欢像他那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当然，他们都是同志。但是嫉妒也是人的天性，不是吗？”他说。

我对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相信他会阻止炮手投弹的，说

他范·沃尔阻止袭击目标简直是岂有此理。

范·沃尔赶紧说，他希望我的这种看法不要发表，因为他无论如何不想让广大读者对自由荷兰空军的高昂斗志发生怀疑。他说，他要是早点离开皇家航空公司就好了，那样会对情况更熟悉，说不定也当上了基地司令或飞行军官，那么他就可以把自己的作战方法向全部队推广了。“请相信我，”他喊道，“谁也不应该轻视德国人。他们百折不挠，在作战方面是行家。德国人像别人一样讲究民主，在战争中需要领袖。希特勒不是疯子，戈林也不滑稽可笑。嘲笑戈林肥胖、喜欢穿军装是荒唐的，应该看到他是如何组织夜间防卫的。这没有什么可笑，绝对没有什么可笑。”

范·沃尔没完没了地唠叨着，我仔细观察他。他不停地抽着烈性高级香烟，但从想不到让让别人。他从精致的金烟盒里取出烟，用一个同样漂亮的金质打火机点上。当他伸手取另一支香烟时，我发现他手腕上戴着一块贵重的金表，宽宽的表带也是金质的。他左手上戴着一枚镶有稀有的大宝石的戒指。

在皇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薪水中扣除战争税之后，还买得起这些贵重东西是不可能的。而据伯杰恩说，范·沃尔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在半个小时里，我一直听范·沃尔自吹自擂。然后，我中断了这次会见，假称在伦敦还有别的事情。我说，等文章初稿写成之后，很乐意再来求教。范·沃尔欣然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就此分手。

我已胸有成竹，一到伦敦，就开始对这些情况反复研究。随后，我请皇家航空公司提供一份近三年里飞里斯本的各次航班机组和乘客的名单，他们立即慷慨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查找这一张张名单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我终于发现了要找的东西。

名单中，范·沃尔的名字多次出现，尽管每次机组人员都有变化，但一个叫拉赛尔的机上服务员的名字多数情况下总是和他在一起。

我通知自由荷兰空军基地，我要在两天之内再见见范·沃尔。我

到机场五分钟后就见到了他。我事先已同邓克尔司令约好，会面时也请他在场，这使范·沃尔有点吃惊。等他一坐下，我就解释说：

"部长决定我的文章提前发表，考虑到需要中校和你签字，为了节省时间，我冒昧也把他请了来。"

范·沃尔表示同意，脸上怀疑的表情消失了。

"我只带一份底稿，"我说，"如果二位不介意，我就大声念一通。文章很短，但我相信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文章如下。"

我轻轻咳嗽了一下，开始读道：

"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值得敬佩的人：勇敢的人、智慧超群的人、博学多才的人，但很少遇到过能和我们光荣的空军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军官相匹敌的人。当这位青年军官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也许希望略去自己的名字，但我还是愿意让大家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我高兴地告诉读者，他就是空军军官范·沃尔。"

读到这里，我插了一句："让我们准确地写出你的教名吧？噢，那就留待后面再说吧！我念到哪儿啦？噢，对了，念到'他就是空军军官范·沃尔'。"

我继续读道："这位青年出身寒微，战前在自己的故乡荷兰勤奋学习，通过考试，开始危险的民航机飞行员的生涯。后来，他成了一家著名的航空公司的领航员，对数百名旅客的生命和安全负责。就在此时，他毅然放弃了民航驾驶员的职业，作为飞行员参加了我们的空军。

"我不禁要问：是什么促使他牺牲丰厚的报酬和大有希望的前程，踏入充满危险而又毫无把握的生活道路呢？是爱国主义精神？是想和别的人同甘共苦？是冒险精神？对范·沃尔来说，这一切毫无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威廉·拉赛尔说的，威廉·拉赛尔和范·沃尔多次一起飞行。范·沃尔先生为什么要匆匆退职呢？因为他在里斯本搞工业用钻石的走私运气不大妙了！"

当我念这一句时，我紧紧地盯着范·沃尔，基地司令也死死地望

着他。

这一套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其中提到可怜的拉赛尔的名字。听到这些，范 · 沃尔眨眨眼睛，好像呆了一样。他满脸通红，力图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站起来要争辩，我打断了他的话："你听着，范·沃尔，我们知道你是何许人，你用不着否认。我有一切确凿的证据，包括拉赛尔亲笔口供。他帮了我们的大忙，拉赛尔甚至还保存着你搞钻石走私时用的小铁盒子。这个——"我指着桌上放的一张照片。"就是盒子的照片。多承他的美意，交给了我。仔细看看，你还能看出钻石和金属摩擦留下的痕迹。"

照片当然是假的。这是一个普通的盒子，上面也没有什么擦痕，但它却击中了目标。范 · 沃尔像被磁石吸引着一样，抓起照片仔细地研究起来。

还没等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我接着说：

"这是一桩挺有意思的买卖，对吗？至少你干的时候是挺有意思的。你在伦敦以每克拉两先令六便士买进工业钻石，在里斯本以平均三十先令一克拉卖出，利润竟达百分之一千二百，还不用花运费。你把它们装在一个香烟盒里，每次带三百克拉左右的工业钻石，纯收入三百五十英镑。这一切都是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干的！你不顾自己是一家著名航空公司的代表，也不考虑这些钻石会直接落到敌人手里，帮助他们去打对你盛情接待的国家。实际上，这大概正中你的下怀，如果你曾经想到过这一点的话。你说过，你敬佩希特勒和戈林的所作所为，你乐于同他们合作——同他们合作自然比同他们斗争更使你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投弹装置出了毛病而不想把炸弹扔到荷兰国土上的原因。你急不可待地想和他们同流合污。好啦，朋友，这一回你可要久等啦！要是遇上个宽宏大量的法官，你起码也得再等上五年，当你获得自由的时候，希特勒和戈林也许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范 · 沃尔咽了一口唾沫，甚至没有对不明不白的证据加以反驳，

在五分钟内就匆匆写出了交代，包括他在伦敦和里斯本的同谋，还提供了别的有价值的情况。

范·沃尔受到军法审判，被可耻地从自由荷兰空军开除出去。他因走私受到刑事法庭的起诉和审判。但是，指控他同敌人合作，由于难以证明工业钻石是否运到了德国而放弃了。范·沃尔被判四年监禁，如果他是英国人，我相信法官不会那么宽宏大量，那我上面的预言就有幸言中了。

这个故事的结尾令人伤感。

范·沃尔供认自己是个走私犯和叛徒，在铁窗下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年月。伯杰恩和他的机组却并不幸运。

几个星期之后，他们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空袭，正要在自己的基地着陆时，遭到一架敌机的突然进攻。发动机已经关闭，飞机离地面只有几英尺。敌机向他们猛烈开火，炮弹倾泻下来。他们的飞机在跑道上被击中起火，机上人员全部丧生。

“即使世界毁灭，正义也要得到伸张”——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门上的那句话，用拉丁语只能这样翻译。

苍穹下失去了一盏明灯，正义并没有到来。

# 第三章　似曾相识

四月的一个少有的、晴朗的上午，我漫步在皮卡迪利大街，无所事事地东瞧西望。到处都很干净，清爽宜人，最粗俗的东西仿佛也罩上了某种光彩。格林公园更加显得郁郁葱葱，皇家艺术学会那阴沉沉的水泥建筑被造物主洗刷得面目一新。熙来攘往的人也像被到处洋溢的欢乐气氛所感染。空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的消息日益鼓舞人心。北非的英美军队正在撤回突尼斯；在东线，德国人云集斯大林格勒城下，即将遭到惨重的失败。战局完全变了，轰炸机开始把炸弹倾泻到敌人国土上。戈林的狂言——盟国的炸弹永远不会落在德国土地上——已经灰飞烟灭。

有的行人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们目不斜视，机械地走着，专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事，仅仅注意不和行人或什么东西相撞。我却不然，我把问题留待适当的时候去考虑，在街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细心观察，一边下意识地进行推理。根据陌生人的面貌去分析他的特点、个性、生活方式等。这是我三十年来的职业。由于习惯成自然，即使在公余时间，也摆脱不了长期训练养成的职业积习。

这天上午，我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怪癖。

这时，一位身穿戎装的荷兰军官向我走来，两个荷兰人的目光突然相遇。我立即想起，似乎在一个什么不愉快的场所见过此人。他从我面前走过，走得很慢。于是我又走到他前边，以便他能再次从我身边经过。我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观看路旁书店的橱窗。

经过年复一年的训练，我的记忆极其敏锐，能够“分门别类贮藏”，即把不同的事情分别贮存在脑子里。形象地说，只要我从头脑的档案里取出某个卷宗，打开它，材料就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我扫了一眼这位穿军衣的陌生人，断定先前曾经见过他，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过呢？

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我仔细回想着。他是荷兰人，那我很可能是在荷兰见过他。可是，战争开始后我就离开了荷兰，所以应该是在1939年之前见过。他看上去四十岁左右，所以，离别时他应该是二十岁上下。按照这样的推算，我开始回忆1922年到1939年之间发生的主要事件。

我默默地考虑着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把他的面孔同某个悲剧性的事件联系起来呢？看到他穿荷兰军服，为什么我感到那么惊讶呢？我肯定把他同与德国人有关的什么事联到一起了。循着这条思路，我的推测终于达到了目的。记忆的大门打开了，许多事情一拥而出。

十一年前，1932年，我也是在街上碰到过这个陌生人，那是在阿姆斯特丹。他胸前佩戴着“崩得”（Bond）——刚刚组织起来的纳粹组织——的徽章。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的这一次偶然相见，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怀疑产生了，必须尽快对此人进行调查。

我立即向设在伦敦的荷兰总司令部了解有关这位军官的情况。

他的经历毫无奇特之处。此人叫范·杰尔德，和一名记者靠一张智利驻荷兰领事维加先生签发的集体签证逃出荷兰，途经法国和西班牙到了葡萄牙。在葡萄牙，由于等乘飞机的旅客太多，他们就乘船到了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从那儿又到了美国和加拿大。从1940年起，荷兰总司令部就设在加拿大，当时的朱莉安娜公主（当今的女王）和伯哈德亲王也住在加拿大的王家公馆，直到1944年6月6日盟军反攻为止。

荷兰当局说，范·杰尔德战前是王家禁卫军军官，后来突然被转到军队。到加拿大后，他接受了军官训练，并被擢升为军官，后来随一支突击队到了英国和日益强大的荷兰解放力量汇合。由于他总是穿军装，随士兵行动，所以从没有受过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特工人员的检查。荷兰当局提醒我说，不管怎样，这套手续是应该履行的。

他已受过三次审查：一次在西班牙，一次在荷属西印度群岛，一次在加拿大，三次都顺利通过。在伦敦荷兰总司令部，他被认为是一名可靠的爱国者和优秀军官。

范·杰尔德的经历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他已受过三次审查，每次都毫不费力地通过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关于范·杰尔德，总像有什么事使我心神不宁，他十一年前佩戴的纳粹荷兰徽章的影子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或许是出于年轻人一时冲动加入了“崩得”组织，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这件事也可能正好说明了他的本质。我必须把真相弄个水落石出。我给司令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见见范·杰尔德中尉。

在皮卡迪利大街见到杰尔德几天之后，他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拜访。

我请他坐下，解释说，这次会面仅仅是履行公事，对打搅他深感抱歉。

杰尔德中等身材，肌肉发达，已开始有点发胖。他肤色微黑，头发稀疏，髭须修剪得十分整齐。满是汗毛的手很粗糙，粗大的手指显得很有力。虽然受过教育而且很聪明，外表倒还健壮，却显得有点粗俗。回答问题时很生硬，看起来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坐享清福。（后来我才知道，下属因为他心地狭窄，不通情理，对他无不痛恨。）

这里，我想扯得远一点。

在审讯之前，我通常总是先了解嫌疑犯以往的各种生活细节，这一点很重要。在我担任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审讯组长以及后来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荷兰反间谍处工作时，我曾把这一点向下属传授

过，要他们在每次审讯前先制定出一个方案，把预审和提问方式都写在一张固定规格的卡片上：

1. 嫌疑犯的年龄、姓名、出生地点和时间。

2. 嫌疑犯所有直系亲属的情况，诸如父母、兄弟、姐妹等。

3. 如果嫌疑犯已婚，其妻子未婚时的姓名、出生地点、日期，其本人和父母的国籍。

5. 嫌疑犯懂得哪些语言及其文化程度。

6. 从学校毕业后的就职情况，因公或休假到过哪些国家和城市，本人有何技术专长。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参加过何种运动和政治团体？"

这样开始提问有两个目的：系统了解嫌疑犯的生活经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如果嫌疑犯持有伪造证件，他一般不会使用"Passe[①]"这个词。伪造身份的人，不管他编得多么天衣无缝，都心虚胆怯，而且往往因为没有好的记忆力而对上述年代日期说不清楚。综合一看，就会发现破绽，其身份也就随之真相大白。

从范·杰尔德对这些基本提问的回答，我知道他是犹太人的后裔，后来同一位出身高贵、世代书香的比利时姑娘结婚，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战前，他是一家美国大电影公司在荷兰分公司的经理，还当过荷兰王家禁卫军的中尉。对其他的问题，他也作了明确的回答。当我最后问到他是否参加过何种政治运动时，他断然回答说：

"没有，先生。"

对此，我未加评论，就把话题转到战时他离开荷兰的旅行上。

我说："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还记得穿过荷兰和比利时边界的日期和时间？"

"很遗憾，先生。我们从没有穿过什么比利时边界。"

① 葡萄牙文：通行证。——译者注

“怎么会没有呢？”

“没有，先生。我们首先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然后到瑞士和法国南部，最后到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真是奇妙的旅行，”我说，“请讲一下你是如何通过德国的。任何有幸从欧洲堡垒中出来的人都是通过最短的途径被送出来的。德国人还没有疯到允许难民有机会看到盟国轰炸的后果和获取并传播德国军事努力的地步。”

杰尔德大笑起来，这笑声有点像讨好，又有点像得意。

“好吧，我谈谈。我和我的朋友持有智利领事的正式签证，德国人态度很好，他们尊重这类官方证件。”

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这些鬼话，但什么也没有说。即使德国人尊重签证，也没有理由让杰尔德和他的记者朋友绕道而行。更重要的是他的种族，他是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子孙。对盖世太保来说，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杰尔德是否皈依了别的宗教都无关紧要。即使同一位贵族基督徒结婚能使他免受集中营之苦，他也无法摆脱经常的监视和定期的传讯。在盖世太保眼里，一切犹太人——富有的、贫穷的、可疑的或无辜的、男人或女人——统统都是邪恶的东西。杰尔德绝无可能有他说的那种特权获准离开德国，除非他和他的同伴对德国事业有某种用处。

我步步紧逼，严厉地审讯了他两个小时之久．他傲慢的神情渐渐消失，露出胆怯的原形。他承认，他们没有经过法兰克福，而是由一名德国军官引导，不能随心所欲，一切都由德国官方安排。

我突然中断审讯，把杰尔德打发走，他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我告诉他四十八小时后继续谈话。

我认为已经摸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于是立即同英国反间谍组织联系，请他们派两名官员同我一起参加下次对杰尔德的审讯。审讯定于星期六上午十点。

两名英国官员准时来到我的办公室。当杰尔德被带进来的时候，我没有介绍他们，对他们为什么在场一事也只字不提。杰尔德似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即他们是旁听者。我把问过的问题又重新提了一遍，最后问道："你曾参加过什么运动或政党吗？"

杰尔德望着我的眼睛说：

"没有，先生！"

我看着他的眼睛，再次问道：

"杰尔德中尉，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问话，能保证如实回答吗？"

"当然，先生。"他说。

"你曾参加过什么运动或政党吗？"

"没有，先生！"他再次肯定地回答。

"请看着我的眼睛，杰尔德。请不要忘记你保证以军官的名义如实回答。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问你：你是否——哪怕只有几天！——参加过什么运动或政党？回答之前，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杰尔德皱起前额像在回忆，最后摇摇头说：

"没有，先生。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你要我讲真话，我就讲真话，这就是我的真话。"

我默不作声，紧张地思考着。我断定杰尔德在撒谎，但又难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仅仅凭记忆而无任何证据，也许我弄错了。匆匆回顾十一年前的事是完全可能弄错的，特别是这期间世界上大故迭起，令人目不暇顾。

我决定再来一次，这次的圈套如果失败的活，我对杰尔德的审查就彻底告终了。

我挺直身子，严厉地望着他说：

"杰尔德中尉，我三次向你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三次都声称你说真话，固执地否认曾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你说谎！要我告诉你吗？你的两位颇有地位、非常诚实的同乡发誓证明你战前曾是'国家社会

主义联盟’的成员。朋友，我这里有他们的书面证词。”

我那个装有各类打字文件的皮包正好在面前的桌子上，这番话在杰尔德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脸涨得通红，喃喃地说：

“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我为了取悦岳父才参加了它。我从来都不想参加什么违背自己心愿的组织。”

这真是千金一刻的良机，绝不能放过。在十分钟里，我向他发起连续猛烈的进攻。

“你怎敢当面撒谎？”我愤怒地喊道，“你以军官的名义担保说要讲实话，可三次都重复同样的谎话！不是一次，而是三次！事实证明你有罪的时候，你只会脸红。说什么受了你岳父的引诱，想必他是个很可怕的人，否则不会把你这样一个男子汉吓得像小孩一样俯首帖耳。你就为这个加入反对自己国家的组织吗？可是，你还说‘这有什么关系’！背叛国家，撒谎还没关系？我告诉你，中尉，这一切的后果对你来说是大有关系的。你愿意让自己的名字被勾掉吗？作为一个无耻之辈被开除吗？作为一名叛徒被逮捕甚至被杀头吗？可你还说这不算什么！”

杰尔德开始认输了：

“没有说出心里话，我很遗憾。请你相信我，那时我还年轻，刚刚结婚。岳父强迫我参加‘崩得’,而我……也想讨他的喜欢。‘崩得’对我毫无意义，参加‘崩得’就像参加一个俱乐部一样，那完全是个形式，甚至我都忘记了自己曾是它的成员。经你提醒，我才想起有这回事。”

一种痛苦的心情在折磨着他，样子十分可怜。我一言不发，继续望着他。两位旁听者满怀狐疑地退了出去。

“你不要以为你的话会使我感动，中尉。你是一个受过教育、聪明的人，头脑并不简单。我三次对你提出一个相当清楚的问题，每次都给你思考和回忆的机会。一个人是不会忘记参加过像‘国家社会主

义联盟’这样的组织的。它有要遵守的规定，要履行的誓言，要佩戴的徽章和标志。不，中尉，不会那么轻易忘记‘崩得’的。你在存心撒谎。为什么呢？你还有什么要隐瞒吗？是让我迫使你讲出来还是你自己把实情讲清楚？”

“我发誓，先生，”他喊道，“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没有！”

“半小时内，你三次食言，任凭你再发什么誓，我也不会相信了。”

圈套成功了。

杰尔德是这样一种人，正像我估计的那样，称心如意的时候就得意忘形，一旦遇到困难就张皇失措，胆战心惊。他十分沮丧，全部威严就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消融了，羞惭和崩溃的自尊心使他眼中涌出泪水。

我进一步追问他从荷兰出走的情况，这次，他主动回答，尽量争取我的同情。他说，他和那位记者朋友乘一辆德国人的汽车到达法兰克福，在那里接受了德国当局给的一大笔金钱——有葡萄牙埃斯库多、荷兰盾和美元。德国军官护送他们穿过瑞士、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一直到离葡萄牙边界半英里的地方。杰尔德最后还供认，在整个旅途中，他妻子一直陪伴着他。

我锲而不舍，步步紧逼。

“杰尔德中尉，”我有意激他，“尽管你的话不那么首尾一致，你仍不失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战前，你一帆风顺，在一家美国公司里担任显要的职务——美国人通常只相信那些有才干的人。你是一个有勇气、有才干的人。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

杰尔德受宠若惊地回答说：

“是这样的！”

“很好，我们的看法一致。现在我要问你，一个犹太人，受到德国人如此器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据我所知，德国人仇恨犹太人，进行野蛮的人种选择，以折磨和虐待犹太人为乐，不管这个犹太人多

么无辜。他们视犹太人如粪土，当然不屑于与犹太人为伍。可你说，他们对你并非如此，而是待如上宾。他们不惜金钱为你们安排旅行，还让你的妻子陪你同行。为什么会有这种异乎寻常的优待呢？难道你没有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现在才看到这一点。不过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出于尊敬。”

“好了，杰尔德，别装得那么天真。正如你自己讲的，你并不那么单纯。对于德国人，你应该是相当敏感的。你明白，任何微小的闪失都可能毁掉你的自由以至生命。安排这次旅行时，你就应该想到其中定有原因，不是吗？”

“对，噢，是的，不。”他语无伦次地回答。

“杰尔德中尉，我们还是严肃地谈谈吧！你注意到这其中有什么反常吗？难道你会没有注意到？”

他想了想，十分平静地说：

“注意到了。”

“嗯，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不讲出来呢？从荷兰出来之后，你受过三次审查：在葡萄牙、荷属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你有三次机会讲出自己的问题，但却守口如瓶，使我不得不从你口里掏出你知道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杰尔德试图躲闪，但我穷追不舍。他终于供出了实情。

他从荷兰一出来，就被柯勒尔先生带到一边，对他说：

“你从德国走，会耳闻目睹许多事情。你不要忘记，如果你在我们没有占领的地方漏出一句你耳闻目睹的或是你同伴的情况，德国情报机构就会找你算账。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有办法收拾你。”

我说：“这样说来，你和你妻子被允许从荷兰出走，只是为了掩护一名德国间谍，你所谓的记者朋友。你明白这一切，对吗？”

“不，先生，”他惊慌失措地回答，“我的朋友是个正派的荷兰人，我敢肯定，我可以为他起誓。”

“对你本人和你的誓言我已有所了解，你敢肯定的事，恕我不敢完全相信。”我说，“如果你的朋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我只能认为你是德国特务啦，不是吗？”

“噢，不，先生，我不是特务。”

“好啦，让我们回到事实上来吧！你，一个犹太人，和你的妻子被选中去陪同一名记者，经过德国，然后到葡萄牙。你的朋友从德国人手里接受了大量的金钱，你们都被视如上宾。德国情报局在荷兰的头目又威胁你不要对自己的经历漏出一个字。你也承认这一切十分离奇。你肯定知道这一切的目的：掩护一名德国间谍。”

“是的，这是真的！我承认我有过这种怀疑。”

“好,我们现在才算谈到了正题。那么当时你对这一切都有怀疑吗？”

“是的，我当时很怀疑，但是，没有证据。战争期间，会发生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也许这件事可以这样来解释。”

“这正是我要知道的。你的朋友是个被收买的间谍，而你们是无辜的——也许是有罪的。胁从分子也是有罪的，你知道这一点吗？”

杰尔德犹豫了，他使劲咬着厚厚的下嘴唇。停了一会儿，才含含糊糊地说：

“是的，先生。但是，请你相信，我完全是无辜的。”

“无辜自然好了！我现在要你回答另一个问题。在里斯本、库拉索岛和加拿大，你都被单独审查过，本应该说出实情……那么你朋友的间谍活动就会被斩草除根，而你却保持沉默，这是为什么？”

“我害怕讲出来！”

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的军装，说：

“可你是个军人！穿着一身狮皮。难道你是一个伪装成狮子的虫豸，被远在荷兰的一个德国人吓唬一声就缩回舌头吗？就这样自始至终充当间谍的帮凶吗？”

杰尔德几乎崩溃了。他显得更加渺小，军装像不着身体似的摆动

着，刚才走进办公室时的那副昂首挺胸、坚定果敢的神气已荡然无存。

“我本想说出实情，但我不敢。”他轻声说。

“在法律面前，一个间谍和间谍的同谋是一码事，你懂吗？”

杰尔德舔舔干裂的嘴唇，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我不懂，先生。”

我决定再开一炮，于是冷冷地说：“柯勒尔临行时给你的一小瓶匹拉米洞[①]是干什么用的？”

杰尔德惊恐地说：“我没有接到什么小瓶，我发誓。”停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的朋友有两个装有白色粉末的小瓶子。”

这句话已足以结束这宗案件了。反间谍局的两位列席者已经有足够的证据逮捕杰尔德。但是，我请求他们在逮捕杰尔德之前，让他先在我手中待二十四小时，作为请他们参加这次审讯的报酬，理由是我不想让荷兰军队因自己内部出了间谍的同谋者蒙受污点。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立即和顶头上司——设在伦敦的荷兰政府的司法大臣和国防大臣——接触。在迅速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介绍了情况，要求把杰尔德解职。紧急军事法庭当天开庭，杰尔德正式被解职并可耻地被开除军籍。第二天，他不是作为杰尔德中尉，而是作为一个平民被逮捕。

他被关在英国反间谍局的萨里监狱，战争结束后将被递解到荷兰，由荷兰当局审判。

让他继续自由未免太危险了。但是，杰尔德没有活到受审。在他被捕大约一年以后，萨里遭到空袭，一两枚炸弹落在房子附近。杰尔德可能是因为神经受到刺激引起心脏病发作而猝然死去。正像我前面提到的，他不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

杰尔德被捕后，他们打电报通知在加拿大的荷兰当局，建议逮捕

① Piramido（匹拉米洞），也称氨基比林，药名，当时德国间谍常用此作为密写药水。——译者注

那位记者。“某记者”——下面我将谈到这样称呼他的理由——被捕并押解到联合王国，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后来，又被递解到荷兰，听候审判。

这项工作得到的酬谢令人高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收到荷兰司法大臣的一封公函，对我审查杰尔德及其旅伴的“灵活方式”表示祝贺。皇家海军的工作经常被人们称为是“无声无息”的工作，我想反间谍工作也应得到这一称号。反间谍人员极少受到官方的嘉奖，他们执行任务，把网撒下，围捕间谍而得不到任何酬劳或官方的感谢。我像普通人一样，对最高当局给予的破例嘉奖当然感到自豪。

这里，我想讲几句题外话。

在间谍案中，也同所有轰动社会的其他案件一样，我们不禁想到被告人的双亲，他们常常无辜地承受公众舆论散布的无情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不应该蒙受这种耻辱，有时，审判已经过去多年，这些不幸者仍被人冷眼相看。有些人嘀嘀咕咕地说：“那不是某某吗？你还记得十年前某某的案子吗？咳！……”于是，恶言恶语到处传开了。

不幸的杰尔德太太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杰尔德太太是一位出身名门、有教养、很有魅力的女人，本人享有女伯爵的头衔。她丈夫参加了在加拿大的荷兰部队，后来被调到英国。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杰尔德太太未能陪同丈夫前往。为了生活，她到了阿根廷。

当她丈夫死去和某记者被捕的消息在当地荷兰人居住区传开之后，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开始散布流言飞语。有人说，杰尔德先生不是自然死亡，是作为间谍在“伦敦塔”上给处死的。当时，杰尔德夫人在当地荷兰人居住区颇有声望，因为她待人和气，很有修养，是社交界的佼佼者。突然间，她被排除到社交活动之外，谁也不敢再和她来往。神秘地、不明不白地失去丈夫，已使她不胜悲切，现在又无故遭人误解，生活对杰尔德太太已变得不堪忍受。她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连一个诉说苦衷的女友都没有。

战争一结束，杰尔德太太就回到荷兰。她亲自拜访了几位地方官员，但得到的都是些毫无根据的传闻。荷兰当局自己也说不清杰尔德先生是如何在英国死的。一位官方人士告诉她，应该找我，只有我才了解她丈夫的案件。但是，由于我忙于重要事务，直到1945年才与她会面。

她要弄清死去的丈夫的真实情况的请求使我深为感动。战争使真实情况隐藏了两年之久。即使这样，我还无法讲清楚，因为某记者还在等候审判，牵涉她丈夫的这一案件还在“待审”之中。我告诉她，她可以对任何说她丈夫是间谍或称她丈夫是作为间谍处死的人提出控告。杰尔德从未因这一罪名被判刑，他的死纯系自然死亡。用这些可怜的宽慰之词，我告别了她，结束了杰尔德的案子。我不能不感到遗憾，一个巧妙地获得自由的人却掩护了一名祖国的敌人。我对这位无辜的遗孀表示无限的同情，她现在正勇敢地为死去的丈夫恢复名誉。对我来说，范·杰尔德一案已经结束，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错了！1949年，我收到一封字体陌生的信，是杰尔德夫人寄来的。信中说，某记者受到法院的审讯，被无罪开释。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信，以便弄清是否看花了眼。

法律的磨转得太慢了，从第一次审讯某记者，六年的时间过去了。从他被递解到荷兰待审也已四年有余。

我放声大笑，拿起笔写道：

“如果某某无罪——既然他已受审并被释放，那当然是无罪的——那么，你丈夫自然也是无罪的，因为在这件事中，他仅仅是个次要角色，你有充分的自由控告任何指控杰尔德先生是间谍的人。显然，洗去他间谍的罪名，你心中的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在签名之前，我拿着笔，沉思地点上一支香烟。这中间肯定是谁搞错了。杰尔德无辜还是有罪？在我看来，在那些反间谍人员看来，杰尔德是个叛徒，是一个间谍的同谋。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荷兰法庭看

来，某记者——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和间谍——反倒成了真正的爱国者，否则他们不会释放他。如果某记者无辜，那么杰尔德自然也无罪。对“朋友还是敌人”这样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我们又有了一个重要的案例。

这桩案件有两个方面。每当我想起杰尔德一案时，我总对应该正视的一面表示怀疑。

# 第五部分　为谁搞情报？



# 第一章　双面间谍

本章不是一篇有关双面间谍的枯燥乏味的研究。有关这类间谍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本来可以写一本完整的书。如果没有“国家机密保密法”，这类书甚至会堆满人们的书架。

双面间谍，不论男女，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既为这个国家搞情报，又为另一个国家搞情报。这种间谍难以捉摸，是最危险、破坏性最大，往往也是最有用的一类间谍。一切都取决于他个人的信念如何。

反间谍机构应该研究具体案情，得出答案。为了弄清一个间谍到底是在为自己工作还是为别人工作，反间谍人员就要有出色的心理学方面的修养，以便由表及里，挖掘他的心理活动，弄清他的基本情感和信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被盟军抓获的德国间谍发誓说，他是被迫执行任务的，他的真实愿望是和盟军合作，为他们搜集情报，反对自己先前的主子。令人吃惊的是，他这样说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约翰逊博士说，使人恢复理智莫过于比“明天早上就让你上绞架”更为有效了。任何间谍，当发现只有交代才能逃脱死刑的时候，都会发誓永远忠于逮捕他的人。在被处决的前夕，一个人可能会说出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感情。当然，也有的间谍在被捕后会说出自己的真实信念，尽力像自己想的那样做，承认自己在为对方搞情报。弄清真相是这个问题中最困难的部分。

面对一个双面间谍，不应匆忙作任何结论。审讯人员必须对其人做到确有把握，即使有一点怀疑，嫌疑犯也应被视为最危险的分子。

其罪行如果可以由法庭审判，就应立即予以判决。倘若对其罪行一时无法完全搞清，在敌对状态结束前，应予关押。双面间谍永远不应该再遇到曾抓到过他的人。

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那些少犯错误的人。轻信一个未弄清身份的双面间谍会犯极大的错误，其后果不堪设想。

对这种间谍进行初步审查自然需要时间和很大精力，有时需要几天甚至几星期才能弄清他的真面目。一切都要仔细研究，当然就花费时间。

审讯者要研究嫌疑犯的心理活动，掌握其真实思想，就需要整天整夜地对他的一举一动进行观察，不管他是醒着还是睡着。审讯者要像他的影子一样，寸步不离地不间断地监视他的细微动作。这是一项需要熟悉人的本性及其各种反应的工作。

下面，我讲两个有关双面间谍的故事，它们比有关这类间谍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应该强调指出，双面间谍不仅是个对敌人有害对我方有利的问题，他们往往对战争中的各种事件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1941 年，住在英国、渴望为被德国人蹂躏的祖国作点贡献的优秀的荷兰人为数不少，他们知道解放力量要进入欧洲大陆还需时日，不能袖手等待。为此，不少人自愿报名受训，随后被秘密派往荷兰，充当间谍、破坏者或抵抗运动的秘密交通。

这些志愿人员必须年轻、身强力壮、机警而有胆识。间谍要有一种特殊的勇气。英雄们的勇敢，某些人的奋不顾身精神，是他们的独特品质。这些在间谍身上非但无用，反而有害，甚至会成为他成功的障碍。间谍需要的勇气是成年累月地过着独往独来的生活，时刻警惕不要碰上冤家对头。只身一人，没有朋友。他要善于控制感情，训练自己的肌肉、话语、思想，以便永远不使自己露出破绽。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必须能控制自己的神经。这种勇气并不是经常能在年轻的志愿人员身上找到的。

他们学习专门课程、进行严格训练、学习夜间跳伞、学会使用各种武器，而且还要做到枪法娴熟。此外，还要学会使用发报机、徒手格斗、熟悉世界地理，以便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活动。他们需要经受各种考验，不够条件者应断然予以淘汰，只留那些确实合格的人。

从 1941 年 11 月 8 日到 1943 年 4 月 21 日，五十二名特工人员先后被空投到荷兰，只有一人是乘一艘特殊的小船在荷兰海岸登陆。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全被德国人抓获。四十七人受审并被处决，五人被关押，德国人想使他们开口。其中一人是个“斯芬克司[①]”。

就这样，经过千辛万苦，还未采取任何行动，这批间谍就被一网打尽了。五十二名中，有四十七名体智都很优秀的儿女痛苦地死去，他们知道自己是彻底失败了。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个同德国人有联系的“双面间谍”。这家伙通过了各种考查，混到无辜者中间，后来就出卖了同伴。德国情报局在荷兰的首脑施莱德先生，即本书第五部分第三章中提到的那个施莱德，把这次打击称为 Englandspiel——英国奇闻。当然，对德国人来说是奇闻，可是对失去了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工人员，在荷兰的反间谍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盟国来说，实在是一场灾难。可以自慰的是，这位叛徒在战后受到了审判并被处死。

另一例子完全不同。

“袋鼠”——由于他十分像一只袋鼠，我才给他起了这么个化名——是位捷克难民，1940 年初到英国。到达时，理所当然地受到反间谍机构的审查。审查时，他主动讲了自己奇怪的经历。

他说，他先前曾自愿加入过占领捷克的德国军队，为他们充当间谍。经过详细审讯，德国人对他的交代和他对纳粹事业的信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让他参加了一个谍报训练班，后来把他派到了英国。

① 斯芬克司（Sphinx），希腊神话中的人面狮身怪。——译者注

“袋鼠”说，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发誓说自己一向站在盟国一边，捉弄了德国人。他接受为德国人在英国搞情报的工作，目的就在于为真正的朋友效劳。

在这次惊人的自供之后，他又进一步谈了各种细节。他告诉了我们在里斯本准备接收情报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并且说，德国佬委托里斯本一家银行每月为他提供五十英镑的活动经费。他说，由于他受过教育，先前曾是捷克斯洛伐克预备役军官，德国人指示他到英国之后，立即参加法国自由力量。一旦达到目的，就设法打入英国情报机构或法国反间谍组织，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些十分机密的、对德国人十分有用的军事情报。

最后，“袋鼠”详细地讲述了他学到的密写方法。他谈吐自如，几乎无须追问。他有时也稍有停顿，在谈到他怎样突然中断为德国人捞取情报的详细情况时才沉思一会儿。

当然，他谈得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对“袋鼠”的真实感情还没有确实把握，不知道他这样讲是出于真心还是由于害怕。看起来，他态度诚恳，属于那种一有危险就不知所措的人。

三个星期之后，我和 MI–5 的一位同事审讯了“袋鼠”，详细地盘问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时的生活情形、他的经历和职业。对他讲的，我们进行了重点审问，以便弄清他的政治信仰。我们问他为什么喜欢英国人而不喜欢德国人？和民主相比，他对纳粹主义有何看法？读过《我的奋斗》没有？关于苏台德区问题有何看法？对贝奈斯总统和捷克驻英国大使马萨里克都知道些什么？他是否感到被慕尼黑条约出卖了？等等，等等。

在三个星期里，我们不断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我和我的同事对审讯进行了全面分析，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他和他讲的情况是可信的。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考查。我和我的同事在切尔西共住的一套房间

里还可以再住一个人，于是我们邀请“袋鼠”和我们同住几天。尽管我们相信他的诚意，但要利用他，却还有点犹豫不决。密切相处能帮助我们对“袋鼠”的人品有更详细的了解。这期间，我们从不让他单独留在房间，总有一人陪着他，观察他，和他聊天，研究他的一举一动。经过一段考察，我们对“袋鼠”的诚意和他对盟国事业的热诚都深信不疑。

于是我们开始了这个案件最具有戏剧性的部分。按照我们的指示，“袋鼠”给里斯本的联络点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简单明白，十分亲切。信中说，他安全到达，正在英国尽情享乐，祝收信人身体健康。但是，用密写药水写在同一张纸上的“信”却说，经过极严格的审查，未引起任何怀疑，已顺利通过 MI-5 这一关。随信还送去了一些当时仍属机密的情报——自然这些情报是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的。信的结尾请求给予新的指示。

读者也许有兴趣了解一点有关密写的情况，其实很简单，任何人都能学会。在间谍使用的诸方法中，密写是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一种传递情报的手段。那些最复杂的方法反而容易遭到令人痛心的失败。当然还有不少更巧妙的方法。我这里提到的这种密写方法有两大优点：简便，不易被发现；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要是间谍随身带一支密写钢笔，受审查搜身时就无法否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如果他使用简便的方法，即用任何药店都可以买到的药品配制密写药水，那就无须担惊受怕。他可以坦然地等待审讯，坐等顺利过关之后再去药店买需要的药品。

密写药水可以用热退药品溶于百分之五十的酒精里配成（比例可事先确定）。最好的“笔”是牙签或修指甲用的小棒，一小团棉花包在笔尖上，以免在纸上划出痕迹。

具体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用一张不透明的纸（纸面不透明是极为重要的），从中间折起，让折的缝在左边，用普通笔和墨水把信写

在第一页和第三页上。这样第二页和第四页即为空白，可以用来书写密信。

第二种方法也是用一张不透明的纸，但不折叠，用普通墨水写信时，行与行之间留下足够的空隙，密信用药水写在信的行与行之间。药水应按规定的配方配制，信纸均匀加热后即可显示出来。加热也很简单，用一只普通熨斗熨一下信纸，加热引起的化学反应就使药水书写部分呈现暗红色并且不再褪色。

我们再回到“袋鼠”的故事上来。

在他给里斯本写第一封信时，我们让他写下一个只有我和我的同事才知道的回信地址，以便我们先看到回信。“袋鼠”写好信，我亲自把它发出去。这样做未免有点奇怪，但对双面间谍来说，无论怎样谨慎也不为过分。

很快就来了回信。表面上，这是一封普通的信，讲的都是些言不及义的话。我们毫无兴致地看完信，然后用一只热的铁熨斗熨一下那封似乎平常的信。我们三个人，“袋鼠”、我的同事和我，好奇地看着信纸，上面什么也没有出现。我们再用力熨，一些小小的符号清晰地出现了。信很干脆，只说收到了“袋鼠”发去的情报，对某些具体问题要求进一步说明：第一次空袭给英国造成的伤亡和物质损失情况，皇家海军的部署和实力，英国东南部的军力配备以及英国飞机制造能力，等等。

考虑到对方的胃口很大，这些情报又极端重要，一旦传出去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一致认为付给“袋鼠”的活动经费实在并不算多。这里要提一下，德国人尽管很小气，但付钱总是很准时的。两天之后又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张五十英镑的汇票。

我们有意拖了几天才回信，借口搜集所要的情报需要时间，然后就精心编造了一封不露破绽的信。我们尽情地捉弄“袋鼠”的上司，设法不让假情报接近真实情况。

自此，他们每个月都寄来五十英镑，非常准时。“袋鼠”总是照收不误，尽情花掉。我不想用更多的篇幅来详细叙述我们给德国人发去的假情报。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忙于策划代号为“海狮行动”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为此，他们要“袋鼠”提供朴茨茅斯港口的布雷图，这一要求使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根据真正的布雷图，我们精心绘制了一张完全相反的图，把布雷的航道画成自由通道。我们借口“袋鼠”在提供准确情报方面遇到了困难，有意让他拖了几个星期，才把假的布雷图画在一张白纸上寄出。

谢天谢地，入侵英国的行动未能发生，但有时候，我也因未能看到希特勒的入侵舰队陷入布雷区而感到惋惜。

在其后的两个月里，通信继续进行，后来就突然中断，汇款也随之停止。也许德国人闻到气味不对，也许谍报计划有了改变。遵照我们的建议，“袋鼠”又写了一两封信，请求指示，但都没有回答。“袋鼠”行动就此结束。

我们无从得知德国人因为这些假情报受到了什么损失，他们肯定是哑巴吃黄连，吞下了这些假情报。也许是在敦刻尔克之后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德国人了解到英国人的抵抗情况，为此最高统帅部放弃了入侵计划。如果是这样（这并非不可能，因为他是当时在英国活动的为数不多的间谍），那么，“袋鼠”就证明了双面间谍的真正价值。

“袋鼠”同我们的合作结束后，就自愿加入了自由法国军队。他很快被提升为军官，直到战争结束表现都很出色。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袋鼠”的情况，我衷心希望他仍然待在“铁幕”后的某个地方。我不希望一个像他那样出色的人物回到他的故乡——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袋鼠”能看到这篇文章，希望他同我会面。

昔日我们三人像考试前的中学生那样伏在上面研究问题的破桌子，依然摆在原来的地方，作为对那些难忘的不眠之夜的纪念。

这短短的一章仅仅在于说明双面间谍的严重性。我再次强调，这类间谍是最危险的、最可怕的、危害性最大的间谍。他们可能对盟国有极大的用处，但一切都取决于他固有的信念以及他如何实现这些信念。这是反间谍工作中最棘手的问题。要弄清一个双面间谍是“英国奇闻”中的“斯芬克司”，还是欺骗了德国人几个月的“袋鼠”，这才是真正困难的问题！

# 第二章　绶带还是卐?

## 一

阅历深的反间谍人员能很快弄清楚对方的间谍人数，他往往通过和“另一方”有接触的人或第五纵队提供的情报而得知。对敌人使用的各种名称、手法和伎俩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据此筹划自己的防卫和对敌人的各种诡计有所防范。有时候，反间谍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就能得知敌人的计划，施特劳赫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我想先谈谈他的情况，因为他的经历确实值得研究。

施特劳赫先生是德国公民，从1924年到1940年中，一直侨居荷兰。他是一家从事荷属印度群岛烟草贸易的德国公司经理，因为业务关系，经常来往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烟草市场，公司的产品主要在这两地销售。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常常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界。他在阿姆斯特丹有一套豪华的房间，在达官显贵们聚集的赞德沃特有一座漂亮的海滨别墅。施特劳赫先生不像廉价小说中飞扬跋扈的大亨们那样对人冷若冰霜，他和蔼可亲，性格豪爽，不仅对朋友，而且对所有接触的人都慷慨大方。他心地善良、殷勤好客，常常拉什么人去“喝一杯”或吃顿饭。烟草市场上只要围着一堆人，里面准会有施特劳赫先生。他爽朗地笑着，不时拍拍别人的肩膀。他总是兴致勃勃，像一名地道的运动员。和一些爱穿深色衣服的朋友不同，施特劳赫先生总是身穿运动衫，以此表明自己对外界生活的热爱。他深孚众望，被同行和同事们当做“朋友”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他却是盖世太保的间谍。1940 年 5 月，荷兰遭到德国入侵，这只狼就脱下了羊皮，成了德国在荷兰情报局的头目，直到战争结束一直都担任这个角色。此人在伪装方面有着不容争辩的才能，可是在训练特务、为特务编造一旦被捕时要讲的假经历方面却很不高明。

我前面说过，假经历对间谍的生死存亡极其重要。间谍迟早都会遇到讯问，假经历编得不能自圆其说，对他非但无用，而且往往会给使用它的人招来麻烦。所以假经历务必简单、可信、尽可能接近真实。

施特劳赫有两个弱点，其中之一是典型的德国风格：他为自己的特务编造的所有假经历不但千篇一律、荒诞不经，而且总有那么一两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施特劳赫从来没能编造过适合角色的故事，而总是弄巧成拙。我们身处英国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哪个嫌疑犯是经他手训练出来的特务，好像他编的假履历都带有他的签名一样。

明赫尔·德隆格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3 年以难民身份到达英国的老德隆格尔本人并无过错，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自始至终都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错误不在他，而在施特劳赫先生。德隆格尔如果能讲述一个可信的故事，也许不会引起对他的怀疑以至丧命。施特劳赫还训练过两兄弟，这两个青年乘一艘小船从荷兰到达英国南部海岸。他们未受到什么压力就供认是德国派来的间谍，并说他们的目的是想参加自由荷兰军队。经过仔细盘问，证明他们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两兄弟的“梦想”实现了。

当他们讲述自己的假经历时，我说：“不必再讲了，我已经知道是谁教给你们的这套把戏！”

两兄弟大惊失色。我说：“我提议，这儿有两张纸，”我把一张递给他们，自己留下一张，“你们之中的一位写下这位先生的名字，我也写上我的意见，让我们来对一对。”

两兄弟中的一个毫不犹豫地和我在各自的纸上写好，放在桌子上。

两张纸上写着同一个名字：施特劳赫。

两兄弟看了一眼桌上的纸，禁不住大为惊奇。他们以为我“无所不知”，其实事情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天真。我对施特劳赫这一套了如指掌，当然不会看不透这种显而易见的把戏。这个例子可以使读者对反间谍工作有个较清楚的看法。反间谍人员常常通过审讯和研究下属呈报的案件了解敌人的动态。

关于施特劳赫先生，我还想补充一句。不知他现在是否尚在人世，如果他还健在，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愿借此机会衷心感谢他的间接合作，这种合作对我的甄别工作帮过很大的忙。

在反间谍工作中，办案人员如果不同嫌疑犯通过审讯正面交锋，往往不能了解他的真实能量。在我任职期间，曾遇到过一件奇特的案子，这是我审理过的最令人迷惑不解、最复杂的案件之一。

1942 年初，一条逃亡船离开荷兰，在离英国五海里的地方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发现后拖进了港口。所有的乘客——他们也是船员——都是荷兰人，其中十四人生长在荷属东印度群岛。

像一切在英国登陆的难民一样，他们被送往伦敦中心的专门机构——设在旺兹沃斯的皇家爱国学校——接受甄别。我和一位同事创建的这个专门机构主要是审查来到英国的盟国难民。通过逐个审查，证明十四人都是真正的逃亡者，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摆脱德国的奴役，参加现役部队，同万恶的侵略者作战。

对他们首先提出的问题自然是：他们是如何逃出来的？所有人讲的都一样，计划出自一名叫波尔霍夫的青年。波尔霍夫属于中产阶级，是荷兰人通常称之为“卡京”的混血儿，父亲是住在荷属东印度的荷兰人，母亲是马来血统人。（当时住在荷属东印度的几乎所有荷兰人都是上层人物：政府的官员、军官、工程师、医生、律师或其他专门人才。这些人和马来女人结婚所生的孩子一般总是受父亲的影响，有一定的文化教养，波尔霍夫也不例外。）

荷兰没有肤色偏见，很多“卡京”离开深造机会有限的荷属东印度，到荷兰本土上大学。1940 年德国侵入荷兰时，波尔霍夫还是一名大学生。他的朋友都是像他一样的大学生，而且大多是“卡京”或是定居在东印度的荷兰人的后裔。

德国人需要能干的青年人合作来对荷兰进行有效管理，为他们提供诸如在鹿特丹食品配给站工作这样较好的职业，波尔霍夫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当时，他才二十一岁，十八个月之后，就从地位低下的打杂升为副主任。在他手下工作的有七十二人，有些人的年纪足可作为他的父辈。波尔霍夫无疑是个能干的青年……他的一位在东印度时就交往甚密的朋友告诉我，波尔霍夫十七岁就获得助理律师的职位，换句话说，在东印度群岛就是正式律师，这使我对他的才干更为赞叹。他的这位朋友还告诉我，波尔霍夫十六岁时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在东印度的发起人和领袖，我愈加吃惊了。他的管理才干给我的印象很深，也引起了我的怀疑。波尔霍夫发起的运动和纳粹分子秘密资助的、在德国成立的“纳粹青年运动”十分相似。

把十四名难民的叙述联起来看，我终于弄清了他们逃出来的经过。计划是周密的：首先弄到一条机帆船，利用职权之便搞到燃料、食品等航海所需要的东西。出发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尔霍夫一个个把他们领到船上，而这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乘一辆官方旅游车干的！乘客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了船。要么波尔霍夫有过人的胆识，要么就是他根本不用担心德国人（因为他同德国保安警察有默契）。

在这里，我要再次为我的怀疑论辩护了。我一贯认为，在反间谍工作中，对怀疑对象必须从最坏处考虑，直到最终证明他是无辜的。读者会说，波尔霍夫这时还不是一个嫌疑犯，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青年，被德国人委任一定的工作，但却怀有保卫祖国、帮助同胞逃出纳粹魔掌的崇高的意愿。十四名荷兰真正的爱国者得以逃生就是证明。

但是，在反间谍工作中，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波尔霍夫也许

在开辟一条逃亡之路，但这中间也可能另有文章。如果他同德国人有勾结——他对纳粹事业的同情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他显然是企图建立一种信任的气氛，先组织一批能证明他诚意的正直的荷兰人逃出来，然后伺机安插一名叛徒或间谍。我设法悄悄地观察明赫尔·波尔霍夫的活动。

## 二

三个月之后，即1942年初春，波尔霍夫组织的又一批逃亡者到达英国海岸。船上有十二人，像上次一样，全部是男人，其中两名“卡京”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属于被打散的荷兰空军，其余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在分别进行的审查中，他们谈的有关出逃的细节全都一样，一切都是波尔霍夫组织的，准备工作都由他负责。他们再次谈到这样的怪事：波尔霍夫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食品配给站的汽车把他们送到船上。这批人受到了详细的讯问，证明都是真正的难民。

话不烦叙。从1942年5月到1944年2月先后共有六条船到达英国，共运了八十七名难民，全部是男人。他们讲的逃亡经过也一模一样，这些优秀的爱国者不清楚波尔霍夫同德国人是否真有勾结。

后来，应伦敦荷兰政府的请求，我从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调到伦敦荷兰反间谍总部领导所有技术性工作。这件事与我的同胞有关，搞清楚的希望令人神往，所以我一直挂在心上。

波尔霍夫如果同德国人有勾结，那么他为什么花费漫长的两年时间组织一批又一批爱国者出逃，而没有塞进一名间谍或奸细呢？战争时期，虽说各种计划实施起来都颇费时日，但是，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仅仅为了取得信任而不急于在难民中塞进一名特务，那么，恐怕这个计划刚迈出头一步，战争或许就要结束了。

另外，波尔霍夫既然如此容易把人送出荷兰，而逍遥法外，那他

为什么不送出一些真正有用的人呢？众所周知，伦敦急需高级人才。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也急于知道他们领导的运动的具体情况，获得详细情况的方法自然是通过人事接触，因此，这些人到伦敦来非常重要。有些荷兰政治家在国内受到限制,如果他们逃出来,将会十分有用。有影响的政治家们要么因为无法表明反纳粹的思想，要么因为是犹太人而隐姓埋名。这些人一旦落入盖世太保手中，就会被处死或关进集中营，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这些经常处于威胁中的政治家解救出来。

但是，波尔霍夫组织的潜逃船中没有这类人，而都是他的朋友和熟人。当然，他们都是正直的人，也是战争所需的人才，但对世界性的事业，这些人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唯一例外的情况是一位律师，他后来曾一度担任设在伦敦的、短命的荷兰政府的部长。但是，就其重要性来讲，是难以和上述谈到的那些杰出人物相比的。奇怪的是，这位律师是唯一对波尔霍夫有好感的人。一般说来，我们总是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怀有感激之情，然而波尔霍夫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说他虚荣、霸道，有人甚至称他为独裁者，因为登船时对他们态度粗暴。对乘官方汽车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鹿特丹大街他们也强烈反对。对一个曾帮助自己获得自由的人，竟如此牢骚满腹，实在令人吃惊。

我认为，波尔霍夫的傲慢和他的身世有关。许多“卡京”都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这种下意识的心理走向反面，走向极端，就成了武断和盛气凌人。为这些不理解他的人的自由，他需要做很多事情，尽管别人认为他傲慢，我却理解他的做法。然而，德国人的做法就莫名其妙了。战争期间，保密极端重要，特别是事关逃跑的计划，人们总是慎之又慎。波尔霍夫一向精明干练，为什么要在德国保安警察面前如此暴露自己呢？为什么被他救出来的人几乎都不相信他呢？这些“为什么”意味深长，需要弄个水落石出。

波尔霍夫事件情节复杂，引起了我的兴趣。通过 1944 年初春到达的最后一批逃亡者知道，波尔霍夫将乘下艘船到达。他们说，波尔

霍夫急于到英国来和情报机构接触，然后再返回荷兰继续同德国人战斗。这些人告诉我说，除了已经到达的六只船外，还曾经有两只船因为中途发生故障，不得不返回荷兰。

这两次流产的逃亡计划有点离奇。

波尔霍夫为第七只逃亡船做好了准备。按照事先的安排，船要在一个黑夜里从斯赫维宁根和荷兰湾之间的一个静谧的码头起航。万籁俱寂,船已准备就绪。像先前几次一样,似乎一切都会顺利进行。但是，一开始发动机就出了毛病，机组人员全力抢修，仍然无济于事。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帆上，但风浪突起，狂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们。由于航海知识不足，不得不返回海岸。这时，风急浪涌，船失去控制，只好随波逐流。驾驶人员毫无办法，失去了逃走的信心。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即使返回后由行刑队处决，也不能让海吞没。

经过一夜的狂风，机帆船严重损坏。失败的逃亡者把船弄进了码头。正巧，一艘大型德国民用船经过一夜搏斗也刚刚在港口抛锚。天已大亮，码头上熙来攘往，逃亡者不可能不引起注意。他们把船泊好，系上缆绳，走下船去，以为会立即遭到德国警察的逮捕，但是，出乎意料，居然毫无动静。他们被这种咄咄怪事弄得目瞪口呆，于是匆匆离去。非但没有人向他们开枪，而且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德国人把他们当成了一群下班的搬运工，而没想到会是一帮企图从被占领的欧洲沿海最繁忙的、检查最严的港口逃跑的人。

在单独审查中，我没有发现这些人中后来有谁受过盖世太保的造访或遇到过其他麻烦。

对这件怪事只有一个解释。德国当局不会松懈或蠢笨到在那儿打瞌睡。波尔霍夫显然同德国人暗中有勾结，这只船的出海是预先策划好的。为了避免麻烦，德国人宁可对此视而不见。

这一看法为另一批逃亡者的供词所证实。两个月之后，波尔霍夫对不久前的失败不作任何解释，再次组织逃跑。这次，他打算让船从

北荷兰省的洪茨傅斯切－泽韦林一带出发。可是又不走运，船被抛回离出发点不远的海边，德国海岸巡逻兵在他们上岸时逮捕了他们。他们受到盖世太保的审讯，有几个人还受了刑。有一个人因受不了折磨，供出了这个计划。在盖世太保的压力下，这个倒霉的家伙还供出了波尔霍夫的名字，说他是逃跑的组织者，并供出了他的住址。

盖世太保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它还是一支精干的力量。按理说，他们会立即逮捕波尔霍夫并怀着魔鬼一样的兴致把一个多次欺骗他们的人活活折磨死。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想到按地址去找他。波尔霍夫也安然无事，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从这两件事中可以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其实从第一次流产的潜逃中已露出端倪，波尔霍夫和盖世太保有联系，他是在盖世太保的同意下才组织这两次出逃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们逮捕并审讯逃亡者，但是，一听到波尔霍夫的名字，调查就立即停止了。波尔霍夫显然对他们十分有用，他明目张胆破坏他们的保安工作，甚至出了麻烦时，仍能逍遥法外。

这个情况更加激起我弄清他真面目的愿望，看他如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问题。我耐心地等着会见这位 20 世纪的冒险家。

## 三

1944 年春末，一只小船从荷兰出发，星夜向西驶去。第二天清晨，英国皇家海军的巡逻艇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它，并把它拖进码头。所有的人，波尔霍夫在内，从船上下来，吃过饭，稍事休息之后，就被送往旺兹沃斯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接受例行的审查。波尔霍夫及其同伴受到 MI－5 工作人员的详细盘问，对他本人的盘问更加严厉和仔细。波尔霍夫在那里待了十多天，比一般人长得多。他通过了审查，并根据我在有关特尔·海特一章中讲的规定被直接送往设在伊

顿广场附近的荷兰保安总部。这样，他的案子就正式转到我的手上。

顺便说一下，这里讲的情况决不是想给 MI–5 的工作人员及其方法抹黑。我同他们共事多年，MI–5 是个精干的机构，对它我深为敬佩。但是在同我的同胞打交道方面，我有两点比他们优越：荷兰人同荷兰人讲话，总是随便得多；从敌占区逃出来的人，精神紧张，身处异国，顾虑重重，对讯问的方法也惴惴不安。当然，他们会回答一切问题，但常常有所保留，只提供自己认为非说不可的情况。可是，在自己同胞面前，这种拘谨就会消失。带着特殊味道的本国语言、地方方言、市井俚语都会在人们内心深处引起共鸣，消除恐惧，使人畅所欲言。

我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了那两次失败的逃亡计划，曾想把这份宝贵的情报告诉英国同事。但是，连波尔霍夫自己都不知道他到达的准确日子，我当然更不清楚他何日能来，所以没有告诉 MI–5。当我可以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已不需要了。英国情报局也许根本不知道曾有两只逃亡者的船以及它们失败的离奇情节，因此，不能指责 MI–5 放过了波尔霍夫，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有关情报。

1944 年夏初，反攻前几个星期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第一次见到波尔霍夫。这样，我再次碰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件。

波尔霍夫是个典型的“卡京”，有着欧洲人的外形，头发像墨玉一样黑，黑黑的眼睛和棕色的皮肤表明他母亲的马来人血统。他手脚都很小巧，中下等身材，很瘦，像所有土著人一样，牙齿结实而洁白。我虽然知道波尔霍夫是个聪明人，但对付这样一位从面部表情到一举一动都显出头脑机敏的人，还是准备不足。在一分钟之内，我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狡猾的人。正如他的熟人所说的那样，他高傲，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发现在横蛮的外表下，隐藏着某种稚气。不管表面上看多么奇怪，波尔霍夫并不使人讨厌。他有一种魅力，是个危险的人物。

我一直审讯了他几天，反复审查他先前的经历，让他一再重复自己的交代。在关键问题上，我不反驳他，也不指责他，恰恰相反，尽力鼓励和暗示他，注意他讲的话是否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训练无素的间谍常常遗忘一些前次审讯中谈过的细节。不断的重复，使他在不知不觉中稍稍改动一些地方。比如，他说自己在一个夜里从某地逃出来；那天天气晴朗，繁星密布。在另一次审讯中却说，那天晚上天气很坏，下着雨等。) 大部分嫌疑犯都会漏掉某些细节，但波尔霍夫从来没有弄错过任何细节。

在得到所需要的情况之后，我用两天时间整理分析，然后，再次把他叫来。波尔霍夫走进我的办公室，笑了笑，就坐在我对面。他泰然自若，毫无惊恐的神色，显得很轻松，只是眼睛里流露出某种不安。

我说:"波尔霍夫先生，我研究了你的说明，许多情况我都能理解。但有几点——共有九点——我还没弄明白，希望你能对此加以说明，如果你能够的话！"

"当然！"波尔霍夫说。

"首先，你几年前还是东印度群岛'国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也许是主要领导人，但你说，你是一贯爱国的，这如何解释呢？"

"这很容易解释。当时，我还是个少年，以为这个运动是爱国性的，所有青年都以能加入它而感到骄傲。先生，请你不要忘记，成千上万正直的荷兰人都怀有这种感情，只是到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看清了他们是多么虚伪。我一度为他们的虚假言辞所蒙蔽，这就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我组织潜逃计划的原因之一：报复他们对我干的坏事。"

波尔霍夫的回答是清楚的，可能符合真实情况。诚如他说，许多青年曾响应过德国宣传机器发出的号召。战前，"国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确乎是一个光荣的童子军运动，具有健康的乡土气息。黑暗面

被遮盖起来，感情冲动的年轻人对其真实目的一无所知。我同意波尔霍夫的解释。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点。你很年轻，按德国人的观点，不属于雅利安人的上等阶层，可是你却在鹿特丹的‘食品配给站’找到了工作，并从一个跑腿的升为副主任，而这一切发生在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内。几十人在你手下工作，有些人的年龄大可成为你的父辈，你对此如何解释？”

波尔霍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这也很简单。首先,无需过谦,我有管理才能。此外,我顽强工作,在食品供应和组织方面出了不少力。你简直不知道他们开始工作时‘配给站’是多么混乱不堪。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不是办公室主任L先生,我也不会升得那么快。L先生是个出类拔萃的好人，总是向着自己的同胞，尽力欺骗德国人。他知道我和他一样仇恨德国人，也知道我组织的出逃计划。在实现这些爱国计划方面，他全力帮助我。他提拔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权力在握，工作起来会更方便。”

波尔霍夫又一次回答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我从官方得知，他谈的关于L先生的情况是真实的。L先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为了帮助自己的人民，他接受了“食品配给站”主任的职务。波尔霍夫相当聪明，决不会夸大他同L先生的友谊。如果他夸大了，他知道我迟早总会弄清真相的。因此，我不得不接受波尔霍夫的解释。

“很好！现在我们谈第三个问题。你帮助八十七人逃脱了德国的暴政。如果一个人救了我的命，我将永远感激他。但是，你救出来的人大部分对你没有好感，他们对你很不信任，这是为什么？”

波尔霍夫苦笑着说：

“我相信你对人的本性深为了解，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忘恩负义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事吗？我承认对人态度有点粗暴，使他们觉得我傲慢。我尽了最大努力，仍改不了这种脾气。人们在受过别人帮助之

后，往往很敏感。就我本人来说，如果我帮助过的这些人不忘恩负义，反过来感谢我，我倒会感到奇怪。”

波尔霍夫巧妙地避开了我的问题。我不能不承认他的回答是合乎逻辑的。“做了好事，丢了朋友”也许是个扫兴的谚语，但也包含某种真理。我决定用下一个问题迫使他就范。

“我们一向尊重事实，”我说，“我同意你的回答。现在谈第四个问题。你智力过人，一定考虑过秘密工作是多么危险。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冒更大的风险，让装满准备逃跑的人的官方汽车在鹿特丹大街上驶过呢？而且是一辆德国的官方汽车？”

这个问题丝毫没有使他乱方寸。

“难道真的那么危险吗？我总认为，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越是公开干的事，引起怀疑的危险越小。你记得埃德加·爱伦·坡的著名故事‘The Purloined Letter’（被偷的信）吗？侦探们采用万无一失的方法，从上到下翻遍了每个角落，殊不知那封有名的信就在他们鼻子底下，在一个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地方放着。德国情报局永远不会想到我竟会用一辆他们的车运送荷兰逃亡者。这是对心理学巧妙的运用！能够欺骗这些笨蛋并在他们眼皮底下运送逃亡者，我感到一种报仇雪恨的痛快。”

听波尔霍夫讲述这些，我开始感到自己像是在无饵垂钓。我只好再次承认他讲的符合情理。我非但没有抓住他什么破绽，反而不得不承认他的回答逻辑性很强。施加压力毫无结果，只好转入下一个问题。

我需要先解释一下第五个问题的背景。审讯开始后，无论是在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还是在保安总部，波尔霍夫都曾明确表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同在伦敦的荷兰政府接触，接受指示，了解对荷兰最有用的秘密活动。一旦受到指示，他就跳伞回荷兰领导这些活动。

当时，到达联合王国并热望回国的难民都理所当然地受到怀疑，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回国后愿意同抵抗运动合作。但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他可能是伪装的间谍，目的是混入荷兰或英国的秘密组织，获取重要情报，送给德国人。只有最新的情报才具有重大价值，所以对那些急于回国的人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除非最终查明他渴望回国的愿望是真诚的。对波尔霍夫就更有怀疑的理由。首先，他是一个混血儿，很容易辨认；第二，直到他失踪前，一直在德国人那里担任要职。

出于这些考虑，我问他：

“现在，看你能否回答第五个问题。你急于回到荷兰为盟国从事重要的工作，对吗？”

波尔霍夫点点头。

“好。如果满足你的愿望，那么还要在这里待上三个月，以便学会使用降落伞和各种武器，尔后空投到荷兰。鉴于你的外貌与众不同，鹿特丹街上的行人很容易把你认出来，德国人也一定想知道，你为什么未经批准就离职三个月，而今又突然出现。你想到过对此你难以自圆其说吗？”

“没有。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些。首先，我想空投特务都在夜间，在夜幕掩护下，有足够的时间到一位属于组织的人家里，当然是一位信得过的人家里。到了这位朋友家——如果我被空投回去的话——我就藏起来，白天不出门。我有很多朋友，都是些诚实、勇敢、富于主动精神的人。他们可以传达我在英国接受的指示，而我可以从躲藏的地方领导他们的活动。对组织和领导这类工作，我已有些经验，用不着自己出头露面。这种解释回答了你的问题吗，先生？”

我未置可否，但内心里承认这是一种回答，不管这是否是他回荷兰的本意，但是，在法庭上，它会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辩护。我的责任不仅是对波尔霍夫一案做到个人满意——证明他无辜还是有罪，还需要提供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材料。至此为止，我没有抓到任何材料，但是，我把王牌留到最后，并准备打出第一张王牌。

“现在，”我继续说道，“让我们回到你先前的活动上来。你先后为我们送来八十七个青年。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荷兰青年。你也知道，他们是战争所需的人才。但是，你弄错了，在荷兰，有很多有身份的人：政治家、抵抗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一些对英国大有用处的人。你为什么只挑选那些虽然正直，但对世界性的事业毫无价值的青年，而不包括更有身份的人呢？”

波尔霍夫考虑一下，说：

“你问得有道理。对此可以这样回答：首先，我并不认为政治家特别重要。诚如你所说，我送来的人对战争有用。在战争中，士兵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有用。政治家们侃侃而谈，彼此钩心斗角。当他们单枪匹马，没有行政机构或国家归他们领导时，他们真的有什么用吗？我承认自己偏爱我的同龄人，尽管他们到英国以后，没有表现出我对他们表现的那种友情。（想到自己帮助过的人都对他不信任，波尔霍夫苦笑了一下。）难道因为偏爱同龄人——有些是像我一样的混血儿——我真的应该受到责难吗？另外有一点很重要，我组织的潜逃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没有冒不必要的风险。我已经解释了乘官方汽车驶过鹿特丹大街的原因。除了这种故弄玄虚之外——这种故弄玄虚有其道理——为了使逃亡者安全到达目的地，我还是十分谨慎的。如果我送出几个知名人物，那势必会引起德国警察注意，他们会立即跟踪我。偷偷把一些显赫的人物弄走会引起轰动，那么，我的整个计划就会受到威胁。虽然德国人有时也干蠢事，但他们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时，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到那时，他们不一网打尽是不肯罢手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我开始对波尔霍夫感到一种由衷的敬佩。对我提出的问题，他都回答得毫不含糊，顺理成章，既不慌乱，也不像嫌疑犯通常那样慢慢腾腾，装腔作势，以便争取时间编造口供。波尔霍夫要么是心中坦然，要么就是个撒谎能手。我认为他的解释入情入理。我把最严厉的考验

留到最后，心想，看你如何跳出这个陷阱。

“好吧，波尔霍夫先生，你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现在我希望你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从你的朋友和你本人得知，在不久前的一次潜逃中发生了一件怪事。一条装有发动机的帆船离开荷兰，对吗？我们假设这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每小时航行五到十海里。天亮时，船开出了马斯河河口，被担任警戒的德国巡逻队发现。德国巡逻队发出警告信号，命令停船检查，可是，你无视警告，继续航行，对吗？”

波尔霍夫点点头。

“根据国际航海法，海岸巡逻队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就向船只开火，如果还不停下，就立即击沉它。海岸巡逻队有快艇，有重武器，而且是德国人指挥的。而你们船上没有武器，像一只水鸭子，毫无防御能力。然而，根据你讲的，海岸巡逻队却袖手旁观，听任你们把船开走。发了一两次警告也是事实，但你们不听警告，海岸巡逻队也就不再感兴趣了，这岂非咄咄怪事？你对此如何解释？德国人是毫不含糊的，一般说来，是不允许别人触犯他们的法律的，再说，他们也乐于击沉一条欺骗他们的荷兰蚱蜢船。但他们却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听任你们把船开走，这是为什么？”

“我恐怕也无法比你解释得更好。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啦！面对这种情况，也怪不得你。你认为这是一种预谋的把戏，我同德国人有勾结,他们故意让我们把船开走。换句话说,我是德国间谍。我知道，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但事实不是这样。侥幸的是那天巡逻队的船由一伙疲疲塌塌的家伙驾驶。我发誓，我从来不是，永远也不想当德国间谍。但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回答，我只能重复一句古老的谚语：‘事实往往比杜撰更离奇’。”

他终于撞到网上了，只好用这种比喻来搪塞。他没有把球踢回来，而是撞到网上了！即使这样，波尔霍夫仍然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性命和自由全靠能否回答我的问题。他失败了，震

动了，感到处境不妙。但是，他仍然冷漠地看着我，不动声色。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下，再抛出一个诱饵。

“这些出逃的船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我说，“让我们再谈谈船的问题。有一条船特别使我感兴趣。我从多方面得知，在你来英国之前六个月，你组织的一条逃亡船未能到达目的地。据说他们在一天夜里从斯赫维宁根和荷兰湾之间开出，发动机出了毛病。当时，狂风大作，海上波涛汹涌，而机组又不会开船。结果，船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又回到了荷兰海岸，在光天化日之下进了荷兰湾港口。可以想见，港口上到处是海岸巡逻队、港务官员、警察、检进人员。这一切好像都不存在，载有荷兰公民的船竟然大摇大摆地靠了岸，乘客下了船，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朝家走去，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们！没有人询问他们！没有人对这只载有奇怪乘客的小船有所怀疑！战争时期，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这不能不算是一桩怪事。更怪的是谁也不理睬它。我真想知道你对此如何解释？”

波尔霍夫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问题本身的确难以解释。按说，所有乘客一登陆就会马上被逮捕，但庆幸的是他们下了船，回了家，未受任何阻挠。不，我不知如何解释，虽然我希望自己能够解释。我能说的还是那句话：‘事实往往比杜撰更离奇’，这也许又是一个例子。”

“也许有一个解释，”我说，“那就是德国人对此心中有数，因为你事先告诉了他们。他们知道船是头天晚上开出的，返回时，他们认为最好还是让这帮人自由上岸，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而你是德国人的朋友，不是这样吗？”

波尔霍夫冷冷一笑，回答说：

“如果我是德国人的朋友，事情也许会是这样。但是，我已多次说过，我从前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德国人的朋友！对我讲的，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我讲的是事实……”

"'而事实往往比杜撰更离奇'，我好像听你这么说过。好吧！我们不谈这个，谈谈第九个问题。这是我要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听到这个你一定会松一口气。让我们再稍微谈谈这些出逃的船。

"你们变得越来越精明了。在那件怪事发生两个月之后，你又组织了一次出逃。这次船从洪茨博斯切－泽韦林离开荷兰海岸，像前次一样，船出了毛病，不得不返回海岸。这一回，乘客们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他们立即遭到逮捕并受到德国当局的仔细审讯。其中一人受不了长时间的审讯和拷打，供出了出逃计划的详情，供出了作为计划组织者的波尔霍夫先生的名字和住址。一般说，德国人怀疑谁，就会立即把他抓起来，一旦受到指控，被怀疑者的生命就分文不值。但你却照样逍遥自在，盖世太保对找你毫无兴趣，为什么？我要问，这是为什么？"

波尔霍夫仍然镇定自若：

"这件事的确令人费解，但这一切也许有其原因。盖世太保或许想对我监视，以便将来一网打尽。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不相信这种事会是一个人干的，于是装聋作哑，好把整个秘密组织查清破获。"

"嗯，这种解释倒也说得过去。但是，照理说，如果德国人严密地监视你，那他们应该知道，几个月后你将组织一次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潜逃。他们绝不会坐待主要的嫌疑犯从手中溜掉，而会在你逃跑前就逮捕你。但是，你现在却坐在这儿。唯一的结论是，他们根本没有监视你。"

第二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几天之后，我再次提出后三个问题。除非波尔霍夫有德国当局的庇护，否则无论如何无法解释这些问题。波尔霍夫一直没有失去冷静。他自己也承认，对德国人奇迹般的做法感到吃惊，但从未流露过任何能表明自己是德国间谍的迹象。我停止了审讯，告诉他很快就可以通知他审讯的结论。

## 四

前面曾提到过，作为伦敦荷兰政府属下的外事警察局的首席专家，我是唯一可以事先得知反间谍机构工作情况的官员。交我办的案子，我的决定就是定案，都会得到荷兰司法部的全力支持。

我的责任重大，案情清楚时是如此，案情不清楚，需要重新研究时，更是如此。我的一句话就能保住波尔霍夫的命，保住他的自由和尊严。不能让一个无辜者因我的错误而被治罪。当然，我也不愿承担放走一个罪人的责任，因为这样的人一旦自由，就会继续为德国人效劳。无需再次提醒读者，作为首席专家，这类案件成了压在我肩头的沉重包袱。

为处理波尔霍夫的案子，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圆满地回答了我提出的六个问题，对其余的三个未能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事实上，至今也没有解决）。唯一可能的推论是，波尔霍夫是德国间谍，所以才没有遭到通常对企图逃跑的人的惩罚。可是，如果波尔霍夫真是个间谍，那么对他的利用实在拖得太久了。从第一条船到英国，两年时间过去了。后来，又有五条船到达，总共送来八十七名逃亡者，还不算同波尔霍夫一起到达的这些人。德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会拖到 1944 年，他们在此之前就应当指望波尔霍夫效劳。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波尔霍夫的行动是受德国人指使的。从我对德国情报工作的经验看，他们没有理由在开动一部机器之前悉心维护它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他确是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劳的间谍，人们就会提出疑问，当一个受他保护的人受不了拷打而出卖他时，为什么他被放过了？为了消除人们的怀疑，盖世太保至少会来一次假逮捕和假审讯。他们会安排他“逃跑”，这样来到英国，岂不更能给人留下正直的印象？先是不顾生命危险组织潜逃，随后又从盖世太保的魔掌中逃出来。

另外，我有一种“Hunch”（预感）也许更符合逻辑。有经验的反间谍人员都承认，天长日久，他们产生了一种第六感觉。虽然对此很难描述，但它常常使人对嫌疑犯的无辜还是有罪产生一种直觉。当然，不能仅仅依靠直觉。可是有时候，它对解决一个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起相当的作用，使问题通过推演迎刃而解。

对波尔霍夫的案子，我就有这么一种直觉，认为他是无罪的。我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特别是他对我提出的后三个问题始终未能解答。但是，他的神态，那种诚实的、冷漠的态度中流露出的某种东西唤起我对他的信任。我说过，波尔霍夫是个具有非凡才智的青年，善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行动上。他不仅善于思考，而且还是个精明的实践家。我想，一个如此有才智的人，不会像那些德国间谍那样，在自己的交代中留下三个漏洞。他一定会估计到，有经验的反间谍人员会问他这三种有隙可乘的问题，事先就准备好适当的回答。他没有完满地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更使他显得无辜。多数情况下，自相矛盾的回答往往使嫌疑犯处境更加困难。波尔霍夫却没有这样做。

就这样，对波尔霍夫的情况反反复复研究几天之后，我个人的结论是：他是无罪的。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没有东西证明他有罪，也没有东西证明他无罪，不论是我还是别人，都无法证明这两点中的一点。

我坐下来，给荷兰司法部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叙述了全部经过，在有关结论的段落里，列举了所有对波尔霍夫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最后说，我本人相信他的诚意，认为应该释放他。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他清白无辜，我建议在敌对状态未结束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离开联合王国。我还建议在伦敦的荷兰政府里给他一个行政管理职务，使他的非凡才能得以发挥，也便于对他监督。他在联合王国的行动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强调这句话，我重复了一遍，并用了斜体字），在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都不能让他离开英国。

正如预料的那样，我的报告立即被司法部批准了。波尔霍夫释放后，很快被安排在行政部门，我一直同他保持直接联系。波尔霍夫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感到“十分称心”。那时已开辟了第二战线，我被任命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属下的荷兰反间谍处处长，前往欧洲大陆就任新职。

在离开伦敦之前，我重新翻阅了所有的档案，认为没有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我审查波尔霍夫的卷宗时，重新看了材料，在上面批道：此案已结。但是，我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 五

大约九个月之后，1945 年 4 月，我的总部移到荷兰的布雷达市。被打垮的德军向东溃退。除了在少数地区的死硬纳粹分子在一些忠于他们的部队帮助下继续顽抗之外，有组织的抵抗已如日薄西山，接近尾声。荷兰北方各省终于从统治它们五年之久的德国奴役下解放出来。德国人撤得如此之快，以致许多保密文件都来不及带走而丢弃在兵营里。德国人曾企图销毁这些重要文件，但由于过分小心谨慎而未能实现。文件太多，文件副本更是数不胜数，要全部销毁这些材料确需时日。在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追击下的德国头目们没有时间多加考虑，只有仓皇逃命。

在邻城恩斯切德，德国人不久前设立了代号为 306 安全办公室的反间谍总部。很自然，我渴望知道他们采用的方法，于是命令把所有缴获的文件立即送我过目。在一间堆满卷宗的大房间里，我和助手经过初步挑选分类，把最重要的放在一边，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统统销毁。留下的文件已足够我研究好些天。我的时间不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调去处理更急迫、更重要的工作。于是，我决定从末尾开始，一旦被调走，也略知其大概。

研究这些文件实在令人入迷。德国反间谍组织了解那么多情况，留下那么多线索，我整小时整小时地阅读这些奇妙的文件。突然，我的眼睛停在一份打印得密密麻麻的有七页之多的文件上，文件上赫然写着：奥·平托少校，化名：弗兰克·杰克逊。我不禁一愣，拿着香烟正往嘴边送的手停在空中。出乎意料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一份文件上，使我心头微微一颤。看到我的名字和只有少数英国情报人员才知道的我的化名赫然出现在德国机密文件上，确实令我惊诧。

我以极大的兴趣开始阅读这份文件。文件的题目是：

间谍"包比"（真名安东·波尔霍夫）的报告和全部交代

1945 年 2 月 22 日

乌尔隆

我十分激动。我规定在战争结束前不许离开伦敦的波尔霍夫竟然到了荷兰并被德国人抓获，作了"全部交代"，而且还提到我的名字。这份文件对我太有用了。

交代说，1944 年夏天，两名美国海外战略处的成员曾同他接触，要他加入他们的组织。他同意后，就到伦敦美军伞兵学校去进行初步训练，学习徒手格斗，接受短期射击训练。然后又到英国陆军空降学校，学习跳伞。然后，又进了美国海军在伦敦主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在圆满结束这些课程之后，被提升为美国陆军战略处的上尉。交代还说，他是第一个被该处留用并授予军衔的荷兰人，在此以前，该处只接受过能为它工作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籍德国人。

海外战略处给他的任务是空降到荷兰并在荷兰北部组织一个情报站，同渔业和农业部的人士接触，在他们之间网罗间谍。口供还说，他不得同当地的抵抗运动或当地的任何英国间谍进行合作。（即使在

战争最激烈的岁月，海外战略处和它的英国同盟者之间似乎也存在着竞争，他们对制造轰动的奇迹比对为盟国的整体利益作侦查更为关心。)

波尔霍夫接到严格的命令，不许卷入破坏活动和对德国人的积极抵抗。他的任务是搜集尽可能多的情报送往伦敦总部，这些情报包括德国的最新军事行动的确切情况，美国轰炸机每天对该地区轰炸产生的效果以及连续失败对德军士气造成的影响等。波尔霍夫的任务是坚持四到五个月，然后通过已解放的荷兰南部返回英国。

口供说，波尔霍夫于1944年11月10日跳伞到哥罗宁根省，到达之后立即开始了工作，没遇到任何麻烦。三个月后，1945年2月，德国警察有所察觉，对他们的藏身之地进行了一次搜查，波尔霍夫被捕。关押几个星期之后，波尔霍夫作为首要分子受到德国保安警察和被占领的荷兰保安司令部的审讯。1945年3月22日，司令官向范·费尔德曼少校——306安全办公室主任——送去了波尔霍夫供词的副本。

文件还提供波尔霍夫供出的其他情况，包括他如何到达英国，如何受审查等。在供词中，他始终没有忘记提到我的名字！他供出了美国战略处的活动情况和他认识的军官们的化名，他如何受训以及开始工作前接受的各项指示。波尔霍夫的供词还有在英国和已解放的荷兰土地上的荷兰秘密组织的情况（他又提到我的真名及化名）。

好像德国人捞的情报还不够多似的，波尔霍夫绞尽脑汁把英国情报处的组织详情也包括进了他的交代。他甚至还就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缴获的V-I炸弹的性能谈了“个人意见”。他谈到英国皇家空军的现况，最后还就入侵荷兰北部的可能性谈了自己的看法。

看到这密密麻麻的七页纸，我感到喉头发干，怅惘若失。波尔霍夫是祖国的最可恶的叛徒。他不仅欺骗了我，更使我担心的是他通过荷兰政府和美国的联系钻进了海外战略处，窃取了一些机密情报，匆匆送给德国人。他的供词表明这些交代都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下自

觉自愿地、一股脑儿讲出来的。我必须抓住这个可恶的、笑容可掬的叛徒。但又伤心地想到，他肯定随同自己的主子跑到德国去了。即使他还留在荷兰，在混乱的万人丛中找到他也是不可能的。我气得咬牙切齿，想到此生也许再也见不到波尔霍夫啦！但是，我又一次证明自己是个不高明的预言家！

## 六

1945 年 5 月初，整个荷兰北部都落入盟国手中。德国在当地的监狱全部被打开，所有犯人在释放或遣送回国前受到迅速的审查。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这不过是履行一下手续，因为大部分犯人都是平民、抵抗运动的成员和劫后余生的特工人员。但是需要弄清是否有德国间谍混入其中，把受德国人保护的内奸分离出来。

在等待审查的人中，有波尔霍夫！

有好几秒钟，我们冷冷地对望着。一般说，在反间谍工作中，我总能把个人感情撇在一边，尽量做到就事论事，像一位外科医生面对一次困难的手术那样。同情或厌恶的感情永远不应当搅到案件中去，因为它们会影响公正的判断。但是，我承认，当看到面前的波尔霍夫时，我深深感到憎恶和巨大的不信任。我决定揭穿他的叛国行为，即使为此需要进行多少小时或多少天的审讯。

“怎么样，波尔霍夫先生，或是我应该用你的化名包比来称呼你？”我说，“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上次见面后，你到底还是溜掉了。你用漂亮的言词欺骗了我，这是去年的事。但是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用手指敲着放在面前桌子上的文件。）你对敌人讲的和对我讲的可大不一样呢。你如何解释你自愿向敌人作的口供？”

波尔霍夫以同样严厉的目光瞧着我，嘴角上露出令人捉摸不定的微笑。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朋友，而不是在干坏事时被当场抓住的叛

徒。波尔霍夫说：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能提两个问题吗？”

“请吧，”我没好气地说，“但是，你别以为你可以再次推迟我的决定。战争就要结束了，我有的是时间。”

“我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波尔霍夫说，“因此，我想直截了当地讲。第一个问题，你面前的我这份供词里，你能够指出哪怕一点点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吗？”

这问题有点难以回答。我知道德国人对盟国的活动了如指掌，这些情报他们通过别的途径早已得到。例如，在波尔霍夫供出之前，敌人已知道了我的化名——弗兰克·杰克逊。只是我不知道波尔霍夫已经知道，并向敌人提供了第二手的情报。既然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当然会就此立即反驳。无论如何，我并不满意。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我说，“我同意你说的，你提供的是第二手材料，但这并不能使我认为你是清白的。你供出了你所能供出的一切，提供过时的情报并不能改变你企图帮助敌人的性质。”

“请你原谅，”波尔霍夫像平时一样不动声色地说，“我认为能改变！这就是我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离开伦敦前，我得到一些到荷兰后应该与之会见的特工人员的名字和住址。如果我是叛徒或双面间谍，为什么我不一见到德国人就出卖他们呢？那么，这些在荷兰的特工人员今天就会统统被杀或者被捕，不是吗？当然是！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请你再看一下这份供词，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我的助手或是与外界接触的情况？”

这回真的到结束波尔霍夫一案的时候了。对在反间谍工作中有经验的审讯人员来说，对此也没有反驳的余地。波尔霍夫没有出卖一个抵抗运动的朋友，也没有出卖一个特工人员。他以光彩照人的智慧救了别人和自己的性命。他几乎是本能地、机智地对付了敌人严厉的审讯。我不了解他在海外战略处的活动，因而不知道他走过的路正是我

可能向他指出的路。

我向在敌占区活动的许多间谍和破坏者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受到严厉的审问，切记要供出具体的情报，避免用生硬的对抗给自己招来麻烦，因为敌人会很快弄清你提供的情报是真是假。被盖世太保抓到，你主动招供，就可能免于受刑。这样，你就可以保住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否则，他们迟早会通过长时间的用刑弄到这些情报。所有的人，不管他多么坚强和有自制力，总有个忍耐的限度，除非上苍慈悲，使他至死都是一个疯子。

波尔霍夫本能地走了这样一条既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同志的捷径。德国人对他提供的大量情报甚为满意，他们认为他讲了所知道的一切。审讯军官毫不犹豫地在供词上签了名，呈送给了范·费尔德曼少校，对自己干了一件出色的工作沾沾自喜。

我认为，波尔霍夫保存了他在情报圈子里的同事的名字和地址一事充分证明了他的耿耿忠心。对他来说，出卖朋友，逃避受刑，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波尔霍夫选择了最艰苦、最危险的道路。尽管初看起来会以为他是个自掘坟墓的叛徒，但我相信，他的口供就是他诚意的最有力的证据。

这就是安东·波尔霍夫——海外战略处的朋友称为包比——的故事，一个具有非凡才智，为盟国事业斗争的混血儿的故事。对他，我长期犹豫不决，不知道他到底是“朋友或是敌人”，最后，我终于相信他是一个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真正朋友。

我不知道波尔霍夫后来的情况如何，我确信他是一个在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没有获得光荣和勋章的无名英雄。波尔霍夫是那种为国冒过生命危险，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得到的人。没有比这更能证明一个人的爱国主义和无私精神了。

# 第三章　女性

## 一

我不太相信女人当间谍的能力，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叱咤风云的“医生小姐”[1]是个例外。在三十年反间谍的经历中，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完美的女性间谍。在拙著《反间谍者》一书中表明这种观点以后，我受到妇女界舆论的严厉批评，她们对我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的观点甚为愤慨。令人尊敬的侦探小说家南希·斯帕茵小姐是这种抗议的代言人。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我重申，尽管女人在许多方面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在反间谍或从事间谍活动方面从来都比男人略逊一筹。

女人除了天生的不利条件之外——这使她们不能出入酒馆或是一些令人望而却步的孳生罪恶的阴暗角落，她们永远无法做到不引人注意。不管她生得美与丑，见到她的人总留下某种印象。

间谍工作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它要求完全控制在焦虑和期待中随时可能溢于言表的感情。一个女间谍或是一个女性反间谍人员，不管多么冷静勇敢，她永远不能去单独和人格斗。间谍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印象、希望、恐惧和秘密向人透露。不管白天或黑夜，都要保持若无其事的样子，虽然对周围的一切时刻都要警惕。听到敲门或是身后有脚步声，他要想到可能会立即被捕。充当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女间谍。——译者注

间谍，尤其在战争期间充当间谍，是一项十分危险、十分寂寞的工作，精神之紧张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压力使人透不过气来，常常忍不住想找人一吐为快，就像迈得斯王[①]的理发师忍不住要向主人讲一讲竖琴的秘密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审讯之后，有些间谍由于吐露出自己的秘密而感到轻松的原因。交代之后，心理上和感情上会感到如释重负。

对这个问题我虽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相信克劳斯·福克斯[②]所说的事实。福克斯说他忍受不住了，需要有人分担他的重负。罗马天主教就采用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心理学的传统方式，因为它一贯认为忏悔对灵魂是必不可少的。

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女间谍，常常会让感情战胜理智。男人习惯于成年累月地把事业和爱情分开，女人则做不到这一点。能够控制性冲动的男人用不着在这方面多费心思，他可以尽情胡调而不动感情。可是女人不能，只有妓女能做到这一点——而妓女声名狼藉，根本无法唤起人们对女间谍所要求的信任。女人容易感情冲动，即使爱的是敌人也在所不惜。一旦陷入情网，她就会把知道的秘密和盘托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女人可以做间谍的理由，除非将来的事实能证明我是错的。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足以证实我的观点。

## 二

路易丝也许刚刚读完一本关于间谍的刺激性的小说，她认为自己是“漂亮的女间谍奥尔加”。我见到她时，她大约二十四岁，生得楚

① 迈得斯王（Midas），希腊 Phrygia 王，相传一切东西碰了他的手就变成黄金。——译者注

② 克劳斯·福克斯，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避难入美国，参与了美国的原子弹研发工作。后因向苏联提供相关核武器资料被捕。——译者注

楚动人，稍具异国情调。她仪态万千，乌黑的漂亮的头发衬着一对深邃的蓝眼睛，显出热情奔放的性格。路易丝不仅美，而且聪明，有教养，能流利地讲三四种语言。她大胆、诚恳、无所畏惧，处处流露出喜欢追求惊心动魄的事业的性格。

她具有许多人称之为“性感”的难以捉摸的特点，不管走到哪儿，都会引起男人的顾盼、女人的注意，虽然后者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路易丝的情况确实证明现实胜于虚构。她无须任何训练就可以成功扮演一名电影中的间谍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路易丝还是荷兰一所大学地理系的学生。她父亲是个富有的企业家，在德国和荷兰都开有工厂，一般人认为她是德国人的同情者。父亲和母亲分居，路易丝和母亲、妹妹和两个哥哥住在一起。母亲是个有天赋的画家，路易丝继承了她艺术家的气质。

战前，路易丝和所有家境富裕、刚进大学的女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愉快生活。像大多数女孩子一样，路易丝很开放，有过几次短暂的、对她来说根本不当回事的恋爱经历。1940 年德国占领荷兰，有着天不怕地不怕性格的、渴望火热生活的路易丝只有一条路可走：反抗。她参加了大学生组织的一个地下抵抗小组，她哥哥是这个小组的领袖，未婚夫——她的一位大学的同学——也是小组里的重要成员。

路易丝学会了这个无所畏惧的、生气勃勃的抵抗小组的各种战术：帮助隐藏在荷兰上空被击落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和其他受德国人追捕的人；为飞行员和其他逃亡者去英国提供方便；帮助埋藏武器以援助盟军；参加传递关于德军调动和布防的各种情报，向英国报告它们的集结地点，等等。除了积极和英国配合，抵抗小组还尽力给入侵者制造麻烦。路易丝帮助起草和散发小册子，号召人民反对德国入侵。慢慢地，她在抵抗运动的地下工作中成了一名重要角色。

1940 年秋，路易丝所属的抵抗小组被一名叛徒出卖，德国人立即进行搜查，逮捕了几乎所有的成员，包括路易丝和她的未婚夫。盖世

太保在路易丝未婚夫家搜出三张荷兰机场的草图。路易丝知道这些确凿的证据对未婚夫很不利，他有可能因此被处死。她知道德国人还没有处死过一个反对他们的荷兰妇女。她和未婚夫正好关在相邻的牢房里，他们通过犯人都会的敲墙办法互相传话。她告诉自己的情人说，她准备承认图是她画的。她的未婚夫为人耿直，不同意路易丝这样做，并且要她答应什么也别承认。

在阿姆斯特丹德国人的法庭上，路易丝一口咬定机场的图是她画的，不慎遗忘在未婚夫家里。法官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毫无惧色地回答说："因为我想让英国皇家空军了解这些机场的情况。"法官和起诉人以这种方式提问，目的想使她收回讲过的话。可是，路易丝坚持自己的口供，并一再肯定这些图是她，而不是她的未婚夫画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路易丝被判有罪。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她没有被判无期徒刑而是被判了死刑，被押往在荷兰以"奥伦治饭店"著称的斯赫维宁根监狱。可悲的是路易丝的勇敢行动并没有救了未婚夫的命，他还是被处死了。

路易丝在死囚牢里住了整整六个星期。让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景吧！一个勇敢、聪明、多情的姑娘身陷囹圄。她挺身而出，本以为会被判无期徒刑，但没想到坏得多的命运在等着她。

读者中恐怕谁也没有体会过等死的难受滋味。等待一天或一个星期已经够可怕了。等待漫长的六个星期！关在与世隔绝的死囚牢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的最后时刻。忽然听到走廊上沙沙的脚步声，不知道是不是来行刑的卫兵，真是使人毛骨悚然。一个人在死囚牢里过一个小时，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那么他可以回首往事以挨时光。但是，在这种痛苦的感情状态中度一千多个小时，这是无法忍受的。路易丝不能接受亲朋的探视，人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大致了解她的处境。

1940 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路易丝的母亲每天都给女儿带一小篮食

品和日用品，和别的女人——都是犯人的亲戚朋友——一起在斯赫维宁根监狱外边冰天雪地里整小时整小时地等候，希望能和亲生女儿一起待上一会儿。但是，她总是白来，从来没见到自己的女儿，因为斯赫维宁根监狱是不许探监的。

路易丝的父亲尽力为女儿的事斡旋。他是当地一个重要商会的会长，正要做一年一度的演说。为了讨好德国人——他也同情他们的信仰——就极力为纳粹事业辩解，他后来还把自己的讲稿油印出来分送给可能在路易丝一案中施加影响的德国要人。我本人很怀疑这一做法曾对德国人产生过什么影响，但是，六个星期后，路易丝的判决突然被减为十五年苦役。在前一章我曾提到，战后我有幸看到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文件，从这些文件中知道，路易丝的减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审讯中给德国法官留下了好印象。像认识路易丝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德国法官也为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身上的魅力所征服，被她那明白无误的、毫不含糊的回答弄得神魂颠倒。他钦佩她的勇气，说她是“eine gute treue Vaterlaenderin”（一个真正优秀的爱国者）。

经过六个星期之久的精神折磨，路易丝知道自己不会被处死了，虽然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一位名叫拉赫的盖世太保军官把她从斯赫维宁根监狱押到阿姆斯特丹履行减刑的法律手续。第二天，路易丝就被带到一列开往德国去的火车上。

拉赫先生也成了路易丝魅力的牺牲品。到达阿姆斯特丹以后，他请她在一家最好的饭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一再关照她。盖世太保的军官们都经过严格训练，纪律森严，口中时刻念着“一切英明壮丽的事业都来自阿道夫·希特勒”，但拉赫先生还是告诫路易丝说，到了德国，要装着赞成“国家社会主义”，而且要设法使人相信她可能成为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狱中为自己开辟一条方便之路，迅速得到自由。路易丝交朋友和影响人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拉赫先生祖国的敌人，一天前曾因为是抵抗运动的狂热

分子险些被处决，但是却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征服了这位铁石心肠的盖世太保军官。这件事对路易丝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 三

路易丝被一名看守押送到威斯特伐利亚，在一家赛璐珞厂做苦工。工作相当艰苦，一刻也不能离开。路易丝生得娇嫩，从来没有动手干过活，现在不得不整小时整小时地在德国女看守监视下弯着腰在工作台上干活。长时间站着，体力难以支持，不停运转的机器嘈杂声也使犯人的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工作笨重，令人讨厌，来回摆弄各种酸类损害了路易丝的眼睛。两手的皮肤起皱、脱落。路易丝双手上的皮很快就脱光了。

开始，她没有遵从拉赫先生的劝告，很快就得到坏囚犯和不合作者的恶名。她曾因不守纪律两次受到惩罚，在一间小黑屋里被关了三个星期，只给水和面包。第一次受惩罚是因为损坏了机器零件，第二次是因为帮助一名犯人逃跑。这名声只能使她去干更苦的活，但她对一切压制她的行为都奋起反抗。

在监狱工厂干了六个月后，路易丝似乎变了。她心甘情愿为德国人干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很快成了一名模范工人。一个星期六上午，她怯生生地向女看守要了一本《我的奋斗》，说是打算星期天看看，她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路易丝很高兴地接过书，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她读得很认真，有时还朗诵一段，甚至还就书中的某些段落和女看守讨论。

女看守对这位聪明的女犯选择的道路甚为满意。当她读完《我的奋斗》时，又要了一些德国“正统”的读物，认真学习。她对纳粹事业的热诚和不断增长的知识使看守暗暗吃惊。这个不老实的女犯突然转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高级人士耳朵里。德国官员对路易丝“奇迹般”

的转变开始感到兴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仔细研究了她的情况，希望见见她。审讯过她的德国军官都相信她最终会“弃暗投明”。

这样，经过威斯特伐利亚监狱工厂里十八个月的苦役之后，路易丝又被送回荷兰，得到宽恕，并且成了位于海牙附近一所庞大的德国间谍学校的学员。堂堂的抵抗运动的真正爱国者现在却转而学习如何搞间谍工作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在德国人看来，这个曾经危害社会的罪犯终于看到了光明，现在正在保卫伟大的德国事业和雅利安那主义。

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 四

在间谍学校里，路易丝更加勤奋好学。鉴于工作性质，她的老师比别人更加迷惑不解。看到这位女学员的突然转变，他们暗自想：“对谁有好处呢？”他们在路易丝的身上找到了答案。由于这种转变，她摆脱了枯燥、乏味、繁重的工厂劳动，得到了相对的自由。一般说来，培养间谍是为了让他们接受秘密工作，因此要经过十分谨慎的挑选，不够格的人是不会入选的。

路易丝的经历和现实表现受到当时在荷兰工作的两名德国高级军官——施莱德先生和柯勒尔先生——的仔细审查和反复研究，两人之间的分歧很大，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针锋相对。路易丝的父亲是亲德的，这是有利的一点！路易丝曾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这点不利！一开始她是个难缠的闹事的犯人，这点不利！现在她成了纳粹理想的坚决捍卫者，如果这是真的，又是有利的一点。路易丝聪明、漂亮、勇敢、能讲好几种语言、人品出众，总之，具有一个出色的女间谍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经过详细审问，施莱德先生和柯勒尔先生进行了权衡。路易丝显然具有一个女间谍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困难是如何弄清楚她的真实意

图，她是否真的皈依了纳粹主义。施莱德先生说“是”，柯勒尔先生说“不”。柯勒尔先生甚至走得更远，要求把她立即处死。他认为路易丝在德国人面前耍两面派，她赞成纳粹主义不仅仅是为了逃避繁重的强迫劳动，而且是想钻进情报机构，了解德国人的计划，这势必对德国人造成很大危害。他说人性是难改的。如果路易丝是个忠诚的荷兰爱国者——像她在抵抗运动中的行为表明的那样——那就不能相信她读了《我的奋斗》以后会突然转变。如果她一贯是个投机分子，转变的目的仅仅是赶潮流，而且准备赶上纳粹浪潮的高峰，那她也会轻易地再转到另一边去。总之，她是个危险人物，不应该继续留在人间。

他们争论的细节，因为没有记录，无案可查。有些情况不过是猜想，也只能是猜想。路易丝的性命系于两位军官的看法到底谁占上风。施莱德为她辩护，柯勒尔指控她。两个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互不相让。

幸好施莱德胜利了，他的观点占了上风。他说，路易丝的转变是真诚的，应立即受到一名优秀的间谍应该接受的技术训练。应该指出，路易丝在她短暂的经历中，已经在两位重要的保安人士间引起了强烈的意见分歧，老问题又提了出来：“是朋友还是敌人？”

路易丝就这样进了海牙附近的德国间谍学校。在那里，她接受了一个女间谍应该接受的一切训练，学会了使用摩尔斯电码和一种小巧而又强大的无线电发报机。她顺利通过了第一阶段的学习，被送到荷兰东部一个庄园里学习使用从自动手枪到冲锋枪的各种武器，学会了匍匐接近敌人和爆破，很快就表现出使用武器的出色本领，成了一名神枪手。她打靶的命中率很快超过了那些男同学，同教官们不相上下。她的绝技还在于把一只罐头盆抛到空中，在它落地之前，两次击中它。

通过这些考核之后，路易丝又回到间谍学校继续深造，学习密写、航海、航空信号以及其他间谍必须掌握的常识。她在各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能，教官总是给她最好的分数。

这时，两件令人迷惑不解的奇怪事情发生了。路易丝和两名男学

员交上了朋友，他们是混进这所学校的荷兰爱国者。这是两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青年学员，他们努力为抵抗运动工作，如果不被发现，本来有可能用学到的知识去反对荷兰的占领军。后来证明，他们都是胆大心细的人。虽然尽量避免为人注意，他们同路易丝的关系仍然发展很快。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招致大祸。和施莱德先生的看法相反，这两位青年坚信路易丝是像他们一样的爱国者。

1942 年的秋天，战局对盟国来说是暗淡的：隆美尔击溃了第八集团军，德军师团向高加索的要地斯大林格勒进逼，大西洋上的海战表面上也是敌人占上风。但是两名荷兰青年和路易丝还是相信盟国终将胜利。有一次，他们三人约定在荷兰解放后的第三个星期天，在一家饭店相聚，共进晚餐，庆祝胜利。

同两名荷兰青年的友谊和他们约定在荷兰解放后相聚一事证明，路易丝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她皈依纳粹主义是又一次捉弄了德国人。如果她真的倒向纳粹一边，就没有理由同两名双面间谍交朋友，因为事情一旦败露，她就有生命危险。她力图取得这两位荷兰人的信任，也不是为了向学校当局去告发他们。她每天都有机会告发他们，但她言谈话语中从未流露过想这样做。

这两个荷兰人是能干的、聪明的青年，否则，他们也扮演不了这种角色。他们相信路易丝的爱国精神像他们一样真诚。

事情总有两面，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利的一面，弊的一面。在路易丝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另一件奇怪的事是她同学校的一名德国教官的暧昧关系。这位德国教官是一位高大魁梧的青年，一个真正的美男子。这件风流韵事像一阵风似的很快就过去了。当然，不可能不是这样，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时常约会会引起周围的议论。情报体制完全是德国式的，对这种事的惩罚是立即开除。这并不是路易丝和男人第一次发生肉体关系，正如我在本章讲过的，她在抵抗运动做地下工作时，曾多次卷入情网中。她不会爱上这个德国教官，但是，

接受他的追求一事证明她并不是完全反德的。路易丝不是一个卖弄色相的娼妓，也不是一个色情狂，因为她的经历和人品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证实这种猜想。她一面和两名荷兰人商量如何庆祝盟国的胜利，一面又接受一名纳粹教官的殷殷追求，乍看起来这种暧昧行为会引起人们的好奇。

我力图一步步把读者引进这件扑朔迷离的故事中。在本章结尾，我将说明自己的观点，这里暂且不谈。我把故事讲给读者，不作评论，以便读者从路易丝一案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一件要判明到底是“朋友或是敌人”的典型案例，其中的脉络是难以看出的。我像一个参加判决的法官一样，凡是法官能利用的，都进行评论，而读者在这里姑且充当旁听的公众。

我不能不先讲讲路易丝和德国军官之间的事。从前面讲的，读者可以判断，路易丝是否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糊里糊涂地委身于一个男人。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有个性，充满朝气，一切都从现代的观点去对待。她很开放，对性的问题没有偏见。读者不妨想一下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在她有限的生命中，已越过了不少障碍。在抵抗运动中，她每天都有生命危险；在被判死刑后的六个星期里，忍受了难以描绘的、与世隔绝的死囚牢里的孤独；在监狱工厂里，几乎被繁重的劳动折磨得精疲力竭；获得自由之后，施莱德先生和柯勒尔先生讨论她的命运时，死神再次走近她。那以后，在好几个月里，她又要应付德国间谍学校里困难的、专业性很强的训练。两年多里，路易丝一直在压力下挣扎。要战胜这些，需要有股韧劲。她是一个多情的、富于想象力的人，精神快要崩溃了，她需要找到能够发泄感情的东西，就把性当成了排泄阀，在一位纳粹男人的怀抱和温存中找到了暂时的解脱，如此而已。在后来的审讯中，她主动回答并承认了同他的肉体关系，如果她不讲，也许永远不会有人了解此事。据她自己在审讯中所讲，她对他毫无感情可言，只是把他看做是一个为自己服务的漂亮的标本。

他并不是同她唯一有这种关系的人。

战争期间，成千上万和丈夫分离的欧洲女人让穿着军服、操着外国口音的人带走，在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是因为感情的吸引。

## 五

几个月过去了，路易丝体面地毕了业，可以执行各种间谍任务了。1944 年初，她被送往柏林，在那里停留两天，等待分配。从柏林，她被派往罗马。一名中校——德国在意大利的间谍头子，也是路易丝的新上司——陪同她前往。鉴于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推进，最高当局认为罗马危在旦夕，将在几个星期内陷落。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凯塞林元帅指挥的德国军队巧妙地阻止了盟军在半岛上的推进。但是，他们慢慢失去了地盘，已经无法阻止在人力和物力上日益强大的人流的前进。随着不断后撤，留在意大利的残余部队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不可能无限期地阻止向罗马挺进的部队。

路易丝的任务是留在后方搜集情报。一旦罗马落入盟国手中，她就用自己那台小巧但能量很大的发报机发出情报，向德国当局报告盟军的集结情况，弹药库和军需库以及军事调动情况，盟军每个师的实力、飞机、坦克的数量等。这对一个刚刚从间谍学校毕业的女青年来讲，是项危险而又重要的任务。把这件工作交给她，部分原因是她才华出众，得到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赏识。

到罗马以后，她住进一所别墅。侍候她的有一个贴身女仆、一个厨娘和两名女侍者。别墅布置得舒适而高雅。她生活豪华，常和德军军官一起出入于罗马的上流社交界，鉴于她的教养和招人喜爱，很快就被邀请出席罗马军政当局举行的各种社交聚会和宴会。她也在自己豪华漂亮的别墅里举行各种聚会，很快就成了罗马寻欢作乐的世界里

最受欢迎、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罗马那寻欢作乐的世界竭力以此来压倒沿着阿皮亚前进的盟国坦克的隆隆声。

恰在这时，在路易丝动荡不定的生活中永远打上深深烙印的一段浪漫史又开始了，她和陪同前来的中校成了情人。

这位中校是个漂亮的、极有吸引力的男子。他还是个很有个性、品行端正、忠于职守的人。

路易丝把在德国间谍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时刻到了，她情绪相当紧张。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两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在欢乐的晚会之后，在别墅告别时，一个眼色、一个动作或一次握手都可能促使两人情感的爆发。虽然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中校感到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她自己也承认，当他们到达罗马时，她就爱上了他。

这样，他们成了一部真正的间谍故事中的主角，直到危急时刻。暮春时候，盟军逐渐接近罗马南郊，春宵良夜突然变成了盛夏酷暑。德国人接到放弃罗马城的命令，向北撤退。中校必须出发，而路易丝要留下来执行任务。中校在最后一刻软下来了，不忍心丢下她听凭危险摆布，而自己撤到安全的地方。尽管有严格的纪律和多年的训练，他还是准备冒毁掉前程的危险带她一起走。他的确十分爱她。

别墅里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撤退的混乱和嘈杂、紧迫感加上仓皇逃跑的复杂心情粉碎了德国人的狂妄吹嘘。中校把紧急公事暂搁一边，跑到路易丝家中。他乞求、哀告，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分别的时刻越近，中校越是哀求，但路易丝说什么也不同意和他一起走。中校的哀求毫无用处，不能使她动心。他曾想留在地身边。但又考虑到这样做不仅会结束他的军人生涯，而且会使路易丝遭到危险，盟军到达后，她将无法否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他们最后一次拥抱之后，怀着有朝一日再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度里相会的渺茫的希望分手了。

# 六

1944 年 5 月 6 日，盟军的坦克在古老的阿皮亚大道上列成长长的队伍。吉普车往来穿梭，一辆辆运送步兵的卡车在意大利明媚的阳光下排成条条长龙，终于到达了罗马这座神秘的城市。自从渡过墨西拿海峡在靴形的意大利登陆之后，它一直是盟国最大的进军目标。

人们热烈欢迎攻无不克的盟军的到达，就像当初热烈欢迎德国人的到达一样。战争中总有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先头部队驻在城北，占据了一些掩体，还没有条件享受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但是军事机关却进入城内，他们需要住房，需要档案柜存放文件，需要桌椅办公，当然，也需要饭馆和酒吧以备在工作之余轻松一下。在这些机关中，就有英国军事情报处总部。他们高高兴兴地住进一所巨大的楼房。他们刚刚取出地图，分配好下一步每人的工作，路易丝突然登门拜访。

她用流利的英语说，要见见值班的军官。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下，听到她惊人的供述，值班军官感到手足无措。她说：“我替德国人当间谍，在后方搞情报。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用小型发报机向他们报告所能得到的一切情报。我仇恨德国人，我为他们干事的唯一目的是背弃他们。请你们给我些假情报，我乐意发给他们。”这些话出自一位似乎热诚的、迷人的陌生女郎之口足以使最谨慎的人感到迷惘。

尽管她很机敏，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并不那么容易。路易丝主动承认她是双面间谍，英国军官相当警惕，没有轻易相信她的话。首先，要弄清她的诚意，因为她不只是双面间谍，而且是三面间谍，像欺骗德国人那样企图欺骗英国人也并不是不可能。显然，情况对路易丝来讲仍然充满着危险。但是对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来说，这也许算不了什么，因为在她看来，保卫一种事业要比保卫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英国反间谍机构并没有轻易接受她的建议，而是要她在总部待上

几星期，以便观察。她没有被当做犯人关进牢笼，而是作为国家的“客人”，有活动的自由，可以在英国和美国军官中出没，参加鸡尾酒会和别的活动，就像几天前同德国人在饭店和别墅里参加各种活动一样。但是，她并不完全自由，不管她到哪里，总有一两个反间谍官员暗中跟踪。英国情报处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无可非议，因为官员们认为，对一个像路易丝这样聪明美丽的青年女子，在社交场合比在声嘶力竭的审讯压力下更容易露出真相。他们确信，在看管不太严的情况下，通过旁敲侧击，要比通过一本正经的长时间审讯能使她提供出更多的东西。

除此之外，路易丝接受了正常的审讯，她主动提供了本章已讲过的全部情况，包括她在海牙附近间谍学校时那段短暂的浪漫史和她同德国驻罗马的间谍头子的固定关系。她毫不隐瞒，对自己有利和不利的都坦率地讲出来。

这种诚实表明了她毫无防人之心的典型性格，但是，这还不足以证明她的诚意。一个真正的间谍，只会讲对自己有利的，而竭力避开对自己不利的。路易丝却和盘托出，甚至连那两次对自己不利的恋爱也毫不隐瞒。她有出众的才智，知道自己讲的和没有讲的都会得到证实。别墅里的用人肯定会讲出她同德国间谍头子的关系，人们不只一次看到他们在一起。毫无疑问，罗马社交界对此不会不议论纷纷，这些议论迟早会传到英国情报处的耳朵里。像路易丝这样聪明的女人会清楚地知道，荷兰一旦解放，那两个荷兰青年就会从隐藏的地方出来，就会把她在间谍学校的浪漫史全部说出，英国反间谍组织的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这就是她为什么不想隐瞒的原因。

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过了几周后，英国情报处决定考验她一下，让路易丝用那台小巧的发报机向德国人发送假情报。发报时，自然由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监视。他们肯定说她发的正是交给她的情报，既无遗漏也无篡改。发出的五份情报中，两份是由一个人监督的，另外

三份则由另一个人监督。第二个人没说什么，但是前一个人却说在发第四份情报时，路易丝在电文的两处加了字母“Z”。

这对一般人来说似乎无关紧要，但是英国情报处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估计，德国人也许事先已经预料到路易丝会落到盟军手里，被迫传送假情报，因此预先准备好一套特别密码夹在电文中发出，告诉收报人说这种情报不值得相信。增加的两个“Z”很可能有特殊意义。这样，情况就会十分严重。尽管路易丝一再争辩，仍然被看做是德国间谍。

她立即被置于严厉的监视之下，但是，也允许她回答电报专家的指控。她在一份详细的答辩中对此给予了回答（这份答辩有三十页，路易丝保留了一份拷贝，在我审讯她时交给了我，所以我能用第一手材料谈这个问题）。在这篇书面辩护中，她说用发报机传送情报只是间谍学校的许多课程之一，她用密码收发报经验很少。再说，离开学校已好几个月，这段时间使她对此更加生疏了。她还说，发报机不太好使。再说，如果增加的那个字母是发给德国人的警报，那她肯定不会只在一份电报中这样做。她争辩说，即使确实出了两个小小的差错，那也是无意的疏漏，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指出下列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很久之后，当无线电专家审查路易丝的辩护词时，他们觉得这份辩护言之有理，作为辩护词，在英国法庭上完全站得住脚。但是，我在本书中多次谈到，战争期间，起诉书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判罪的证据。证据必须由被控者提出，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必须在做出释放决定之前提出。在罗马的英国法庭得出结论说，路易丝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要她当双面间谍太危险了。

1944 年秋天，她被送到英国，关进了霍洛威监狱的特殊女牢里。MI–5 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审讯她，他们怀疑她是德国间谍，但证据不足。MI–5 决定找一名她的同胞——一名荷兰反间谍人员来审讯她，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和伦敦的荷兰当局接触，要

求派一名精明强干的审讯人员。伦敦没有这样合适的人选，于是他们向荷兰发报。

当时，我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官员，正在荷兰和比利时忙得不可开交——处理我一生碰到的最重要的案子之一，阿纳姆战役中的叛徒克里斯琴·林德曼斯的案子。由于我无法脱身，路易丝就只好先关在霍洛威的监狱里，等候我到达。

因为像路易丝这样的人被关在霍洛威监狱里，我想谈谈这所监狱的情况还是必要的。关在那里的女犯们在正常情况下服刑，干分配给她们的活。遇到像路易丝这种“特殊情况”，即“特嫌”，就住在单独的牢房里。这地方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旅馆，房间里陈设虽然简单，可也相当舒适，有公共食堂，犯人们常常整天在里面聊天、打牌或者围着钢琴听音乐。她们的行动不受限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拜访，到花园里散步，在规定的地方种花草和果树。

她们不必穿犯人的服装，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用自己的化妆品，吸自己喜欢的香烟。省钱的人还可以单独立个户头存款，通过女看守买书、化妆品和香烟等。路易丝关在霍洛威期间，伦敦的荷兰当局允许她得到对一个女人——特别是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必需的一些小小的奢侈品。

由于霍洛威的女犯们受到优待，监狱生活对她们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她们可以穿自己爱穿的衣服，有某种自由。但是，笼子即使是金子做的，毕竟还是笼子。

经过多少世纪的幽禁，女人没有男人那种共处的情感。男人们通常随遇而安，对别人的毛病比较宽容，易于谅解他人的缺点。但是，女人们在一起时，立刻就会组织小圈子，说长道短，制造不和，无端掀起风波，自寻烦恼。在正常情况下，女人们因为没有事打发空闲的时光，尚且会节外生枝，更何况犯人的时间更多，更无事可做。由于政治信仰的关系，她们大部分人经常生活在一种精神紧张、情绪不稳

的状态中，所以摩擦不断发生，一句话不小心，一个手势不妥当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我得知，好几个女犯为了得到路易丝的垂青而明争暗斗。她是那么漂亮、那么神秘，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被她瞧不起的那些人成了她的死敌，尽力使她那可恶和不幸的生活变得更加痛苦。路易丝苦熬岁月、心情惆怅、命运未卜，这些封建式的拈酸吃醋更增加了她的烦恼。

读过拙著《反间谍者》的读者也许还记得，由于工作过度和缺乏人手，1944 年圣诞节前后，我的健康受到损害。一位英国医生检查后说，我得了晚期癌症，并断定我只能再活几个月。我飞往伦敦安排工作，静等死神到来。幸好我又请教了我的私人医生，他否定了英国专家的诊断。他说，我太累了，但完全健康；休息几个月，就可以完全恢复。

1945 年 3 月，我已感到大大好转，无所事事开始使我烦躁不安。战争在迅速走向结束，而我待在伦敦毫无作为，远离沸腾的生活。我请求地方当局把我送去疗养，以便恢复健康之后再次投入战斗。他们立即让我研究路易丝的案件，在此之前，她一直在霍洛威狱中等候审讯。我在一名荷兰高级军官的陪同下到了霍洛威监狱，同路易丝进行了第一次长时间的会面。

从罗马运来的档案中，我知道了此案的详情，但是，我认为第一次审讯，最好不要纠缠到细节中去。通过别人的介绍，往往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情况，因为材料都经过了润色，强调什么、轻重次序都带有个人的风格和色调。深入研究别人收集的证据就难免不吸取他的立论，这样就会带着偏见开始自己的审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总是从报告中抓住主要之点，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问题。

我已经了解路易丝案件的梗概，但没有准备在会见她的房间里审讯她。

她确实异乎寻常的美丽。说真的，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禁

屏住了呼吸。乌黑发亮的头发显出健康美，淡雅的装束更突出了漂亮的脸庞。她的指甲经过精心修饰，皮肤白嫩，衣着朴素，身上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路易丝像女主人一样在自己朴素的房间里庄重而又落落大方地向我们问候，仿佛是贵人在沙龙里接待来宾。她这五年，有一半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另一半是在间谍学校里度过的。死刑判决曾两次高悬在她可爱的头上。高度的精神紧张使大部分女人——也包括男人——失去常态。我简直难以相信眼前看到的情况。许多囚犯心灰意懒，随随便便，无心梳妆，而路易丝虽然经受了许多苦难，却仍然显得庄重而矜持。

我们第一次会面持续了几个小时，她对我讲述了上面的一切，回答问题时既不吞吞吐吐，也不有意回避。她承认在间谍学校时和在罗马期间，同教官和德国在意大利的间谍头子有过暧昧关系，而且无意对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地方轻描淡写。她沉着冷静，镇定自若。她说，不管看来多么矛盾，她不相信，也从来没有相信过德国人的事业，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在以后几个星期，我又审问她几次，一方面为了澄清一些尚待解释的细节，一方面听听她的叙述，看会不会抓到什么能判她有罪的把柄。但是，在紧张的审讯中，路易丝讲的始终一致，无论如何都无法打破她那特有的镇静。越听她讲，我越觉得这宗令人迷惑的案子无法解决：各种因素盘根错节，难以理出头绪。经过长时间的、劳神费力的审讯，“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虽然我很想把路易丝的案件弄个水落石出，但还是决定把它暂且放下。

1945 年 5 月 15 日，我飞回荷兰。这时，我身体已完全复原。欧洲的战事已告结束，我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已无必要，于是，我被派到正在组建的、负责处理一些特殊案件的荷兰国家保安局

担任教官处处长。这时，斯赫维宁根德国监狱已被加拿大军事当局接管，四年半以前路易丝曾在那里受过铁窗之苦。监狱里一部分牢房被用作处理一些特殊复杂的案件的办公室，这些案件包括双面间谍、第五纵队分子、情节重大的叛徒和内奸。巨人林德曼斯——出卖阿纳姆空投计划的人——也关在其中的一个牢房里。作为部门首长，我负责审查最复杂的案子，也是唯一能够自由出入这座一向被称为"奥伦治饭店"的斯赫维宁根监狱的人。

由于工作并不急迫，我决定到附近参观一个星期，然后重新飞回英国。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我见到了曾同路易丝在间谍学校共过事的两个荷兰人，由于他们表面上追随了德国人，正在等待受审。我分别审讯了这两个人，核实了他们和路易丝相约在荷兰解放后第三个星期天在一家饭店相聚的事。荷兰解放了，但是可悲的是晚餐并未举行，因为在约定的日子里，三个庆祝的人——其中的两名看来是真正的爱国者——却都身陷囹圄，两个男的关在斯赫维宁根，女的关在霍洛威。

两个青年人不仅证实了晚餐计划，而且还表示对路易丝非常钦佩。他们坚信路易丝在间谍学校的所作所为不失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她当时最大的希望是德国人失败。他们也知道她同教官的浪漫史，但是说，这是一个漂亮的男子和一个标致的姑娘之间常有的"那种事"，他们认为这丝毫无损于路易丝的忠诚。

两位荷兰青年的话是对路易丝有利的可信证据。MI–5 的精明的法官们随时都会承认，即使在罗马爱上德国特务头子的时候，路易丝也是忠诚的。他们和我的意见一样，即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对她在这期间到底有什么影响。

# 七

我飞往伦敦，继续调查。经过仔细考虑，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件如此复杂的案子，只有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才能解决。必须深入到路易丝的内心深处，分析她当时的动机。当然，这些对她本人来说，也许都虚无缥缈、难以捉摸。

出于这种考虑，我多次到霍洛威监狱里去拜访她，每次都由上面提到的那个荷兰军官陪同。我让她整小时整小时地讲，讲她战争中的经历，也讲文学、哲学，讲她的童年以及她的抱负。心理学家一向都说，深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唯一方法是让他有意无意地谈论自己。心理学家有利的是，往往病人自己找上门来，他们可以在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听病人讲述。而我一开始就碰到了困难。路易丝发觉我是在审讯她，对我有了提防，巧妙地避开我的题目。她住的地方也不适合审讯，我开始给她完全的自由。

我是她的同乡，这就使问题简单化了。在四年多里，她不能讲自己的母语，很长时间都没有机会和一位同胞交谈。她紧张的神情渐渐为真实的情感代替，逐渐把我当成了听忏悔的牧师，就像在忏悔室栏杆后面那看不见的、冷若冰霜的牧师一样。

几星期后，我对她的了解已足以形成一种看法，我把主要的事实告诉读者，以便你们自己从中得出结论。战争期间，有些事并不是都合乎逻辑，需要了解促使一个人采取某种行动的动机，不管它是否合乎逻辑，不幸的是读者对此也许不会苟同。

为了更好地思考问题，我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许任何人——包括电话——来打扰我。

我相信自己的记忆，没有作任何记录，一切都装在脑子里。经过再三考虑，我的推论如下：

（1）不论是 MI−5 还是在罗马的英国军事情报处都满足于证明在到达罗马之前，路易丝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路易丝听从了拉赫先生的劝告，假装对纳粹哲学和文学感兴趣，以便缩短监禁的期限。在间谍学校期间，她虽然同教官有暧昧关系，但她的表现却取得了两位同胞的信任。这样，我们可以勾掉她经历中的第一部分。

（2）当她的德国情人给她机会时，她拒绝逃出罗马。这一点对路易丝有利。

（3）她自己说曾拒绝和中校一起逃走，但也许根本没这回事，因此这一条不应考虑。这样，第（3）条就否定了第（2）条。我们再往下看：

（4）退一步讲，即她确实是一个狂热的纳粹间谍和纳粹制度的同情者，并且受了德国情人的影响，听从了他的建议，那么，为什么她要留下来呢？为什么她立即到英国军事当局那里供出自己的间谍身份呢？这样做，不仅危及个人的安全，而且会失去给德国人传递情报的一切机会。她相当聪明，当然知道以后至少会受到长期监视而无法再使用那台发报机。

（5）路易丝如果真是德国间谍，她最后能做的事应该是她已经做的那样，理由在第（4）点中已经谈过。作为德国间谍，她只有两条路可走：按照指示，发送情报；如果在关键时期失去勇气，那么最好是什么也别干。可是如果说她在关键时刻失去勇气，那她就不会拒绝德国中校的建议，如果他提出过这种建议的话。

（6）上述推理也许有不周之处。如果路易丝决定洗手不干，那她一定也知道，了解她和中校风流韵事的意大利朋友立刻觉察出这一点，他们会向英国军事情报处告发此事，英国军事情报处也会马上审讯她。而在从别的途径听到她那不太光彩的经历之前，她自己亲口讲出来，那么英国情报处也许会相信她这种深思熟虑的做法。可是，这无论如

何也证明不了她就是一个德国间谍。

（7）另外一种推论和上述推论正好相反。如果路易丝消极等待英国情报处找上门来，那么被捕时，她只能说："是的，我同意作为间谍留在罗马，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德国人走后，我一份情报也没有发过，我的发报机可以证明。实际上，他们一走，我就毁掉了发报机（她很可能会当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的面毁掉发报机）。我觉得最好什么也不干，等诸位找上门来。"

她甚至会把近几年的经历讲出来：地下工作，死刑减为苦役，为自己赞同纳粹事业辩解，有关间谍学校的训练情况，等等。如果这样做，英国军事情报处不会不相信的。

读者已经看出，经过这样分析之后。事情就明朗了。如果路易丝真是德国间谍，她那么聪明，绝不会在罗马被占领时去找英国情报处总部。她的做法大胆，未经深思熟虑，这与她平时的性格不符。也许她受了某个想帮助盟国，让她尽快转到盟国方面的人的影响？

有两点妨碍证明路易丝的无辜：一是在发出的五份假情报中，加进了两个"Z"字；二是她同德国中校的暧昧关系。我想先谈谈第一个问题，然后再就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

五份电报中有四份是正确无误的。另一份电报中出现的两个小符号，很可能像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的辩护词中坦率地承认的那样，是缺乏经验或发报机有毛病所致。退一步讲，她是德国间谍，有意加进两个"Z"字。摩尔斯电码中同一个字母重复两次，唯一的用意只能是告诉德国人，她已落入盟国手里，发出的情报不值得考虑。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五份电报中只有一份作记号呢？难道像路易丝这样勇敢、经过训练又绝顶聪明的女间谍会以为德国人只把其中的一份当做真情报而其余的都是假的吗？而且警告信号出现在第四封电报中，也引人深思。如果她确是德国间谍，当然会借机通知自己的主子，这些情报是假的，是在胁迫下发的。换句话说，两个"Z"

字应该出现在第一封电报中，或第二封电报中。她不会把警告信号放在第四封电报中，让德国人受骗三次。对路易丝有利的证据是合乎逻辑的，说明她并不是德国人手中的傀儡。

现在我们来谈谈最大的疑点：她同德国中校的关系。正如她自己暗示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吸引，而是真正的情投意合，真正的爱情。她说，她爱他爱得“发疯”。

通常说，不信仰或是不赞成一个人的原则和信仰，是不会爱上他的。一个多情的女人不是会受到爱人的影响吗?

论据是有力的。但是，我认为相反的论据也是有力的。如果允许广而言之的话，女人常常爱一个男子而并不爱他的信仰。很多夫妻生活得很幸福，但思想却全然不同。也有不少宗教信仰不同，生活却很和谐的夫妇。总之，女人爱男人，而不是爱他的信仰。

此外，我亲自研究过路易丝的心理。在她那动荡不定的生活中，“性”成了她发泄感情的阀门。路易丝放纵自己的感情，当然，我不是说她是个色情狂，但是，成千上万的妇女都曾在寂寞和不断的惶惶不安面前屈服过。迹象表明她已不再是中校的情人，否则谈起他来不会那样坦率和客观。她对他的爱情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是波涛汹涌的感情海洋上的一只救生圈,事过境迁,不足以改变她的生活航道。至少,这是我从整个案件中得出的结论。

经过几天反复思考，我认为得出了满意的结论：路易丝是个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德国间谍。我决定请求荷兰政府给驻英国的代表下令释放路易丝。

## 八

我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英国当局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继续从怀疑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我确信路易丝是完全诚实的，但我应该

说，我立论的根据也可以做别的解释，甚至完全可以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我为荷兰当局起草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MI–5 仍然认为路易丝是个嫌疑犯。通过来往信件讨论之后，他们也同意释放她，但要等荷兰完全解放，直接把她送到克罗伊登机场，由一名荷兰或英国军官护送回荷兰。虽然他们没有说驱逐，但实际上包含有这种意思。

1945 年的一天，路易丝在一名女看守陪同下走出霍洛威监狱，立即被交给我和一名英国军官。她被带进一架等着我们的飞机，没有任何送行的客套，就飞往了荷兰。

飞机在瓦塞纳尔附近的机场降落，我的司机在等着我们。我们驱车驶向阿姆斯特丹，我和英国军官在美洲旅馆订了房间。

英国军官把路易丝送到了自己的国家，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不想让她孤身一人，决定陪她回父母家。和英国军官告别后，我和路易丝又回到车里，一小时后，到了她家附近。按着她的指引，我们向一片风景秀丽的住宅区开去，她父母的家就在那里。汽车经过她熟悉的地方时，路易丝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急不可待地想看到久别的家。她不时提到这个或那个地方，对发生的巨大变化惊叹不已。一切都显得小啦！

终于到了她家。这是一所气派很大的住宅，占地很多的花园把住宅和街道隔开。我停下车，转过身对她说，我先去通知她的家人。由于长期没有音讯，他们也许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现在突然出现，会很激动。路易丝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留在车内，抑制住跑上前去和亲人拥抱的愿望。她非常喜欢她的母亲、哥哥、妹妹，也很爱和家人分居的父亲。

我走上去，按了按门铃，等了好一会儿才出来一个女人。这个人和路易丝毫无相似之处，一开口，我就知道是个下人。（开始，我以为是她家的女仆，后来才知道，不少人离开被炸的家，搬到一些有富裕房子的住宅里。）

看到一位身穿戎装的军官站在门前，这女人停下脚步，深深鞠了一躬，等我开口。我向她问好，说要见见路易丝的母亲。

女人吃惊地望着我说：

“我想这不可能，先生！”

我怀疑地问：“为什么？”

“先生，她四年前就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我惊奇地问。

“她女儿路易丝被德国人判了死罪，是……让我想想……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1940年冬天。德国鬼子把路易丝关在‘奥伦治饭店’，她的妈妈天天去给她送些吃的和日用品。冬天天气很冷，她妈妈在冰天雪地里常常要等好几个小时。她得了肺炎，后来……就死了，先生。”

这对路易丝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她常常怀念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临死时还不知道女儿的下落。对路易丝来说，回家已经成了一件伤心的事。我想了一下，问道：“那么，她的哥哥约翰呢？”因为我知道，除了母亲之外，路易丝对哥哥的感情最深，他是她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后来又把她带到抵抗小组里，而且他还是这个小组的领袖。

女人更加吃惊，脸上的肉都抽动起来：

“怎么，你不知道吗？约翰失踪了！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到处抓他。”

“上帝！”我喊道，“为什么？”

“你知道，是他向自己的朋友——德国人——出卖了路易丝。”

又是一个晴天霹雳。路易丝爱她的哥哥，她十分相信约翰。一路上她还讲着家人看到她归来时将是如何高兴。而现在，她崇拜的哥哥却是个叛徒，是个逃犯，正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妹妹。

我急切地想带回点什么好消息，于是又问道：

“她父亲在什么地方住？请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女人冷笑一声说：

“噢，不远！他还要在那儿再待上一段时间呢！”

“这话什么意思？”

“他父亲关在离这儿不远的集中营里（她用手指着树林后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的人从德国佬那里夺回来的集中营。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赞扬德国佬的演说，我们一解放，抵抗运动的小伙子们就把他抓起来，投进了集中营。他是自作自受，也该教训教训他，以后再别同敌人勾搭了。”

我感到脚下不稳，天旋地转。

我怀着最后一线希望，问起路易丝的妹妹。

“路易丝的妹妹，埃尔西好吗？”

“埃尔西小姐挺好！她安然无恙，还住在这个家里。”

我马上抓住这一线希望。

“谢天谢地，”我说，“路易丝小姐还活着，而且很好，我把她带回来了。听到你讲的这些，我感到路易丝这次回来是太悲惨了。谢天谢地，总算还有点好消息，她妹妹埃尔西可以接待和照看她。”

女人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说：

“我想你弄错了，先生。埃尔西此刻不在家，再说，她和她姐姐毫无关系。”

“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

“噢，先生！战争期间，埃尔西和大家一样，是个热血青年。我们都知道路易丝进了海牙附近的一所德国间谍学校，当了德国鬼子的间谍。正派人不会像她那样当叛徒。埃尔西小姐对自己血管里流着父亲、哥哥和姐姐叛逆的血而感到耻辱，他们都投靠了德国人。现在，要是和路易丝有什么来往，她的名声就完了。再说，还有通缉路易丝的命令，还是离她远点好。”

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我甚至想也不愿想等待着路易丝的一连串的不幸。阴暗的天空中没有一线光明，家里哪怕有个人出来接接她也好，一个人也没有。妈妈死了，爸爸关在监狱里，哥哥跑了，妹妹不认她。让她处在这种情况下，心力交瘁，实在危险。我曾想找个借口，重新把她带回阿姆斯特丹，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想法。路易丝非常聪明，一定会猜到的，再说，她迟早会知道这种悲惨的遭遇。为了使她不致受到过分的冷遇和尽量推迟向她透露真情的可怕时刻，我站在门边，简单地对这个女人讲了路易丝的情况。我强调说，她完全没有犯过所传的那些罪行，作为国家保安局特殊案件审理处的处长，我可以为她作证。这些话多少打动了那位将信将疑的女人，她答应帮助我渡过眼前的难关。

我一生中遇到过很多令人心碎的事：堂堂的男子汉跪在我面前，乞求饶命；追捕叛徒；在法庭上听法官念死刑判决书；作为现役军人，指挥炮兵队……但从来没有目睹过其后两小时出现的情景。

我回到车里，尽可能和缓地把这些惨痛的消息告诉路易丝。我走到车前时，她笑着探出车门，迫不及待地准备跳下来，往家里跑。听了我讲的情况，她面色苍白，像一尊石雕像一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神经质地不停地扭着手指，说明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

过一会儿，路易丝再也忍不住了，开始绝望地、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她的尖叫声非常刺耳，随后就嚎啕大哭。我别无办法，只好用力打她的脸。她突然停止了号叫，伤心地啜泣起来。她神情痴呆，眼泪不停地顺着美丽的面颊往下流。她浑身发抖，泣不成声地说："我要自杀。"这不是呓语，看来她决心走这条绝路了。

几分钟后——好像过了几个小时——路易丝平静下来。刚才的打击使她对一切都感到茫然，我只好把她抱到家里，放在一只沙发上。她仍在哭泣，我觉得最好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把胸中的痛苦都哭出来。等她稍微平静之后，我以尽可能严肃的命令口吻对她说，自杀

是胆小鬼逃避现实的办法，活下去要比去死更需要勇气。虽然她惨遭不幸，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可她年轻、漂亮，还有大好年华可以弥补过去。眼前虽然艰难，但会好起来的。父亲会回来的，妹妹也会了解真相，家庭会重新团聚，一个幸福的家庭会重新出现。

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些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毫不生动，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作为一个劝告者，我只有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来加强说服力。看到这些话在她身上起了作用，我就继续讲下去。好在两个小时后，她逐渐恢复了理智，阴云开始消散。我把她交给那个女人，她答应照顾路易丝，一直到她完全恢复正常。离开之前，我把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美洲旅馆的地址留给她，嘱咐她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及时通知我。一种预感告诉我，事情还没有完。

我的预感被证实了。

已经很晚了，我累得要命，正要躺下，电话铃响了。我迷迷糊糊地抓起话筒，听到一个紧张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看护路易丝的女人说，路易丝作为德国间谍被地方当局抓走了，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我沮丧地穿上衣服，叫来汽车，赶到路易丝所在地区的派出所，她被关在一间临时牢房里。值班的警监拒绝释放她，直到我出示了身份证，说明了情况，他仍不肯放她。我威胁说，如果他干预司法程序，将受到严厉惩罚，他才收起那副傲慢的神情，答应第二天释放她。但是，我扬言要控告他非法捕人，我说他非法扣留路易丝的每一分钟都将对他不利，他才下令把她释放。

为了保险，我起草并签留了一项声明，声明说：作为国家保安局特别案件审理处处长，我谨声明，经过周密调查，路易丝未犯过任何反对国家的罪行，任何警方和荷兰官员无权非法逮捕她。

我又一次把她送回家，感谢那位老妇人迅速通知我此事，然后慢慢回到阿姆斯特丹。回到旅馆时，已是凌晨五点。我精疲力尽，和衣倒在床上。多么艰苦的一天啊！

# 九

虽然有文件证明无罪，路易丝还是免不了遇到麻烦。以后的几年里，她不断受到地方当局的威胁，只是慑于我在荷兰的名望和害怕后果，一些极端分子才不敢轻举妄动，再次把她投入监狱，经过五年之久的、通过信件和会面进行的法律程序方面的工作，律师才彻底弄清了她的案件，路易丝才得到正式护照。

没有遭到过敌人占领的国家是幸运的。多年来一直享有自由、没有在自己国土上经历过战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难以想象亡国是个什么滋味，更难以理解战败国国内发生的种种怪事。有些被入侵的国家依然商业兴隆，毫无变化；另一些国家则奋起反抗，决不屈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些阴影在游荡。

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里，只顾个人利益，靠和敌人合作大发国难财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也有一些正直的人，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当中有医生、警察、雇员、法官和神甫。这些人深受战争之苦,命运多舛。他们暗中为抵抗运动工作,甘冒危险。有些人虽然拿起武器，但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有些人的动机是不可原谅的。那些迫害所谓“合作者”的死硬分子，杀害可怜的妓女，烧毁卖给敌人东西的富翁们的庄园的人，正是巧妙地利用了战争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他们良心上常常闪过罪过的阴影。这是战争的灾难之一。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留下破衣烂衫，即使经过精心修补，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切身合体。

路易丝回到荷兰之后，没有得到她所指望的安宁。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如果她还活着，我祝她幸福。她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家中，是应该得到幸福的。

读者看到，这是我遇到的最棘手的案件之一。路易丝到底是“朋

友”还是“敌人”？我的结论是“朋友”，但是我随时准备接受合乎逻辑的、相反的结论。她的经历和行动好像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我相信，她内心深处的愿望是要做一名优秀的爱国者。可结果如何呢?

在我看来，这宗案件好就好在它的复杂性，就像数学大师们出的难题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毫无疑问，路易丝的案子仍然是一个谜。我开始已讲过，在结束本章时，我还要说：女人并不是万无一失的间谍。路易丝具备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中女间谍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美丽、聪明、会说多种语言、勇敢、有个性，但是，她的感情战胜了理智。如果她不是对德国军官一见钟情，也许就不会给自己的生活投上阴影。不过，那又另当别论了，依我看，故事也就索然无味了。

# 第四章　蓝衣少女

本书一开始就应该强调这样一点，即克己。这对反间谍人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修养，前几章叙述的故事也许已经说明了这种必要性。间谍猎捕者要像学者用显微镜观察细菌那样冷静、客观地研究被怀疑的对象，多情善感必然犯判断上的错误而贻误工作。

选择间谍生涯的人，不论是男人或女人，总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些人追求冒险；有些人追求金钱；还有一些人，像邮局职员德隆格尔，由于贫穷和饥饿才不得不充当间谍；更多的人则纯粹出于爱国主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刻，都会竭尽全部智慧和力量挣扎奋斗，就像捕鼠器中的老鼠那样。

反间谍人员如果急于从嫌疑犯口中提取口供而贸然从事，肯定会毫无所获。他应当忘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人，一个供出实情就会被绞死或枪毙的人。即使间谍装死耍赖或趾高气扬，他也不应该失去耐心。反间间谍的时候，要冷静，不动声色，除非故意流露某种感情能够帮助他取胜。

审讯结束，审讯人可以就间谍的品质任意褒贬，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切忌感情用事。因为感情只能模糊判断，就像口中呵出的气使镜子变得模糊一样。

话虽如此说，每一个反间谍人员在自己漫长的生涯中，都有一两件无法不动感情的案子保留在内心深处。不管如何善于克制，人总有脆弱的时刻。

虽然我本人没有卷入下面这个故事中，但我相信它的情节是真实的。

故事发生在一位备受尊敬的法国第二厅特工人员的身上，这件秘密我一直保守了二十五年，现在，当事人已经去世，我想可以讲出来了。如果才华盖世的莫泊桑尚在人间，他可以就此敷演出一篇相当精彩的因果报应的侦探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年后，我到巴黎去办一件特别的案子。法国第二厅把它最优秀的特工人员之一，一位名叫亨利·杜蓬特的人派到我那组。他的真名不叫亨利·杜蓬特，由于他的妻子和亲人都还健在，我不能披露他的真实姓名。

我们俩很熟，战争期间曾多次共事，彼此都有好感。完事之后，我们决定在巴黎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来庆祝胜利。

晚餐十分丰盛，从香烟到白兰地都使人忘形。我们都有点飘飘然了，只有美酒佳肴才能使人如此陶醉。我们似醉非醉，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作为老朋友，我们一起回忆共同办过的案子，谈起一些差不多已经淡忘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事染上了强烈的胜利色彩。后来又谈到彼此的失策之处。两个人无拘无束，随兴所至，也顾不得自尊心了。

我们回忆起一些棘手的决定，一些悬而未决的案子。曾经有宗案子，我断定嫌疑犯有罪，但缺乏物证，最后不得不释放他。但是，至死我都认为那家伙是个间谍。

讲完之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我看着心不在焉的亨利，他正在欣赏杯中的白兰地。我让侍者再斟上酒，开玩笑地对亨利说：

“喂，亨利，老朋友，你从来没有碰到过为难的事情吗？从来没有办过棘手的案子吗？难道总是一帆风顺，总能抓到要抓的人吗？”

亨利抬头望着我笑了笑，使劲握着酒杯，握得手指都失去了血色。

我想，或许这打趣伤害了他。亨利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

“朋友，”他说，“你触到了我的疼处。有件不大光彩的事，有时夜里我还常常想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身体想休息，可精神无法平静。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耻辱，可是为什么偏偏落在我头上呢？我怎能忘掉那张脸呢？”

他沉默了，聚精会神地望着燃烧不齐的烟头。他用手指尖蘸上一点水，轻轻润湿了烟灰下面燃烧不齐的地方。

我轻声说：“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听吧，亨利。”

亨利抬起头，望着我笑了笑，他笑得既亲切又悲伤。

“也许我永远不应该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但是吐露一个秘密，就像和人分担一个重负，至少对那些身背这种重负的人来说是如此。”

他停下来，晃晃杯中的白兰地，饮了一口。他把酒含在嘴里，仔细品尝着。

亨利·杜蓬特说：“谁都可能遇到这种事，但偏偏让我碰上了。”

下面就是亨利·杜蓬特讲的故事。

“我被第二厅派到 X 地工作，一年内也没有休假。你记得 X 营地吗？那里工作很紧张，每天都有新的嫌疑犯送来。为了不使工作积压，夜里经常加班。长长的队伍没完没了，就像卸一艘没底的船一样。

“六个月后，我得到了休假。我不想去，因为担心自己不在时积下的工作会使同事们负担过重。我为人拘谨，热爱本职工作，再说，和敌人周旋也令人精神振奋。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在那里工作期间的第一个生日就是在营地过的。但是，第二年，我开始感到了疲劳过度的后果：常常焦躁不安；工作中不时出现些小漏洞；一点刺激都会使我发怒；对被审讯的人发脾气；有些事记不起来，甚至理不出个头绪；常常失眠；心情烦躁。虽然这样，我还是继续工作，不愿承认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一天，司令官把我叫到一边，命令我去休假，我表面上推让，心里却暗暗高兴。

“我讨厌巴黎的灯红酒绿，于是决定到离营地二十五公里的L地去，这是一个战争尚未光顾的安静的小镇。

“当天晚上，勤务兵替我收拾好唯一要带的手提箱，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了营地。

“一到L地，我的情绪立刻就好起来了。重新看到那曲折的小巷，田间纵横的阡陌，古老的房屋和环绕小镇的河流，到处是灿烂的阳光，鸟儿愉快地啁啾。一年来，我头一回感到像逃学的孩子那样高兴。

“我在当地唯一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个房间，上楼换了衣服。我决定忘掉战争和公务，摆脱一切烦恼，痛痛快快地过它十五天。

“旅馆整齐干净，女服务员也讨人喜欢。午饭前，我坐在屋顶的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欣赏从花园后面蜿蜒流过的波光粼粼的小河。我啜饮着酒，感到休假中生活真惬意，喝完一杯，又喝一杯，然后下楼到餐厅去。

“餐厅里人不多。我本能地用职业的眼光扫了一下在座的人。两个农夫坐在一个角落里聊天，大概在谈论当年的收成吧。一位身穿黑衣、举止大方的中年男子，一看便知是公证处的文书，独自坐在一张桌旁，专心一意地品尝着他的午餐。另外几个人散坐在餐厅的几张桌子旁。但是，当我一眼看到邻桌坐的一位姑娘时，这些人统统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穿一件蓝色的上衣，独自一人坐在那儿，故意低着头，望着桌上的盘子。一种第六感觉告诉我，她对我的出现如同我对她的出现一样十分敏感。

“请你不要忘记，一年来我没有遇到过值得一谈的女人，审讯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这位蓝衣少女那样标致。当时我还年轻，尚未结婚。即使将来老了，我也喜欢女性美。休假中来一次牧歌式的恋爱倒也惬意。

“我一边慢慢吃饭，一边不时朝她望望。有一回，我们两人的目

光相遇了，我就举起酒杯向她致意。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吃完饭，我叫来侍者领班——一个老头儿，要他代我转达对姑娘的敬意。我说，我们两人都是单身客人，我提议在她的桌子上一起喝咖啡。我忐忑不安地等着侍者去执行这项使命。

“正当我担心她会拒绝时，姑娘满脸绯红，点点头，居然同意了。她朝我嫣然一笑，似有无限深情。两秒钟之后，我已经坐在她身旁了。

“开始，我们谈论对各地的印象，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爱谈天气。坚冰很快打破了。

“她叫玛丽，是巴黎一家商行的女秘书。我问她，一位年轻标致的姑娘为什么到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娱乐的小镇来。她耸耸丰满的肩膀，淡然一笑。她说，她喜欢巴黎，但巴黎太热闹了，到处是度假的大兵。这些大兵想到随时就要奔赴战场，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拼命寻欢作乐，肆意享受眼前的生活。

“她的父母住在离城不远的小镇上，离战场太近，她不能去看望他们，于是，决定和一位女友一起到L地来过几天安静的日子。L地是个风景如画、安静怡人的小镇。可是，临行时，她的女伴因家庭反对，未能成行。就这样，她只好一个人前来，她也是当天上午刚到的。

“我说，我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这也是事实，战争期间，法国的反间谍人员都说自己是通讯社的工作人员，掩护自己的秘密工作。我说，我也是讨厌巴黎疯狂的气氛，来乡下休息的。我像一位绅士似的说：‘我觉得，我的假期也许不像预料的那样平淡乏味。’玛丽的脸更红了，眼里闪着狡黠的光。”

亨利继续说道：“我决定再次发起攻势。下午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她也许有什么安排？玛丽说，她想租条船，又担心划不好。‘太巧了，’我说，‘我也想划船。恰恰相反，我划得像运动员一样。我家世代都以有最好的划船能手而骄傲。当然，租船人乐意我们租两条船，可是你没有经验，不危险吗？为什么我们不同划一条呢？’

"经过几分钟的愉快交谈，玛丽大大方方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到船坞租了一条船。玛丽躺在船尾的软垫上，我在前面划船，溯流而上。开始我划得并不好，过一会儿才慢慢顺手了。

"此情此景，使我忘掉了战争和公务。阳光照着绿茵茵的树林，鸟儿在林中歌唱。

"暖烘烘的下午使人兴致勃勃。我们像是老朋友一样，彼此不用开口就能互相了解。船静悄悄地驶在波光迷人的水面上，两岸浓密的树荫使河水变成了暗绿色。我们热情地交谈起来。

"小篮子里，我准备了吃的东西。我把船泊在一个幽静的港汊里，扶着美丽的女伴走下船，把东西摆在地上，一边吃点心、水果，一边喝起酒来。然后，两个人就躺在芳草萋萋的地上，任周围蜜蜂嗡嗡，鸟儿啁啾。我坐起来，掏出一包香烟，用胳膊肘支住身子，望着玛丽。

"玛丽温顺地躺在我旁边，阳光照着她那张美丽的脸，蓝色罩衣下丰满的乳房在微微起伏，像只晒太阳的小猫。玛丽伸伸懒腰，望着我笑了。我本能地俯下身子，吻了吻她。她的嘴唇热烈、多情。我们长久地、幸福地搂着，直到很晚才想起返回旅馆。晚霞里，我不再划，让船缓缓地顺流而下。我坐在玛丽身边的软垫上，两个人谁也不讲话，每隔一会儿，嘴唇就自动地凑到一块儿。我的胳膊搂着她那纤纤细腰，一直向那温暖丰满的胸部移动。

"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和英国人共事多年，对他们深为了解，英国人都是清教徒，不赞成真正的肉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能亲吻，只因为这是使人愉快的举动。'噢，这可不行。他们在握手之前，必须就一见倾心。'对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来说,这等于让车走在牛的前面。如果对肉体的反应一无所知，怎么能知道彼此是否钟情？我和玛丽在一起感到愉快，身体的接触和亲吻使我们陶醉。这种互相吸引进一步加深就会成为爱情。一切都应听其自然。我们在度假,远离可怕的战争，为什么要想到明天？要及时行乐啊！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过晚饭后，就出去沿着小河长时间散步。L 地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娱乐，再说，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娱乐。我们都年轻，生气勃勃，世上最古老的娱乐对我们已经足够了。

“我们对彼此的感情不加评论。回到旅馆的时候，旅客都睡下了。自然，我们到了楼上我的房间。窗子敞开着，如洗的月光把小屋照得如同白昼。

“我们不声不响地脱去衣服。玛丽站在那儿，像一尊亭亭玉立的雕塑，银色的月光洒在她白皙的皮肤上，然后，她钻进白色的被单里。我也躺下，用胳膊搂着她。她搂着我的脖子，高兴地喊叫着：‘Ah, ich liebe dich！[①]’

“听到这句话，我仿佛感到血在血管里一下子凝固了，我像抱住一具死尸一样感到一阵恶心。特工人员的本能和多年的训练使我的心翻腾起来。难道是我听错了吗？不，没有听错。这位洛林地区的令人倾倒的美人儿——她自己说在巴黎工作——在极度兴奋时竟讲德语！

“我松开她，跳下床，打开灯，抓起衣服就穿。玛丽很吃惊，困惑地望着我，她没有发现自己忘形中说了德语。

“‘怎么啦，亲爱的？怎么回事？’

“我顺口说道：‘我去买包香烟，我的烟抽完了。’

“她倒在枕头上，快活地笑起来。

“‘买烟？这会儿你到哪儿去买烟啊？’她指着床头桌上一包满满的香烟说：

“‘今晚，你即使一支接一支地抽也抽不完。我想，你高兴得把烟都忘了。要不，你就是在借口逃避？到底怎么回事？’

“她春情荡漾，笑着张开双臂。我笨拙地匆匆穿上裤子和鞋子。

“‘很遗憾，玛丽，我不能。请你不要问我，我出去买包烟，半小

① 德语：啊，我爱你。——译者注

时后准时回来。如果我回来时你还在旅馆，我只好逮捕你，并把你送给附近的值勤警察。'

"'逮捕我？亲爱的，你在开什么玩笑？'

"'不是玩笑，玛丽。如果是玩笑就好了。请你别问我为什么。如果我告诉你，我不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而是在第二厅工作，你也许就明白了。'

"'我怎么啦？'

"'别浪费时间了。你很迷人，说真的，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你如何令我倾倒。但是,我们必须马上分手,但愿这次分手成为永别。这一回，我不履行我的职责，但是我第二次再碰到你，就不能再这样做了。'

"我关上门，头也不回地朝河边走去。河边静悄悄的，几小时前，这里还是个销魂的地方。我来回走着，心潮翻滚，悔恨交加。玛丽是个德国间谍，这是不容怀疑的。我想起她讲的情况，一切都证实了她几分钟之前脱口而出的那几个德文字的可怕意义。玛丽使我这一天增添了不少情趣，她一片真情，毫无恶意。她只看到我穿着便衣，没想到我是军人。

"我们谈话中没有什么会使她产生从我身上捞取情报的念头。她也许和我一样，只是想在休假中不要虚度，根本没有什么预谋。

"她是一名间谍，作为一名忠实的特工人员，我理应立即逮捕她，但是,我是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爱国主义有时也会在血和肉面前却步。

"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我多么希望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啊！当我半小时后回到旅馆时，也许会看到玛丽对我的行为大为开心，她也许感到愤怒或是迷惑不解。她很天真，也许根本就不理睬我的那些话。时间到了，我返回旅馆，几乎确信能看到玛丽。

"但是，没有！我的房间空荡荡的。我慢慢打开她房间的门，里面黑洞洞的，我仔细寻找，玛丽和她的行李都不见踪影。

"逃跑了！这等于她自己已经承认了是德国间谍。"

亨利停下来，掐灭烟头，好像要结束这个故事。

“命运多么会捉弄人啊！”我说。

“等一等，”亨利打断我的话，“事情还没有完，后来的情形更可怕了。”

亨利又接着讲下去。

“我在L地又停了一两天，但已没有心思度假了。河边，旅馆，到处都能看到穿着蓝色上衣的玛丽的影子。别的房客使我厌烦。我长时间外出散步，一吃完晚饭就躺下，因为无事可做，心中老是想到玛丽，她怎么样了？现在在哪儿？我无法入睡。

“我诅咒自己脱下了军衣而没有脱去多疑的怪癖是多么愚蠢。如果我把怀疑藏在心里，在假期里和玛丽厮混，有什么不好？她不会拒绝我，也不会搞到什么情报。假期结束时，我可以告诉她，我什么都清楚，可以劝她洗手不干。可是，现在呢？她在哪儿？白白失去了和一个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就使我神魂颠倒的女人在一起的幸福机会。

“我惆怅、烦闷，于是提前返回营地。同事们对我突然归来大为吃惊，但大家都很高兴，工作太多。他们和我开玩笑，有时这些玩笑刺痛我的心。我埋头工作，尽力忘掉悲伤。

“两天之后，我正在工作，听到外边有嘈杂声。一个下级军官匆匆走进来，气喘吁吁地向我报告：‘请原谅，中尉先生。我的两名士兵在村子里抓到一个女特务，她现在在这儿。她企图从一位军官那儿窃取情报，结果被抓住了。她在这儿，你要审问她吗？’

“我抓起军帽，系上武装带，跟着他走出去。这种事每天都发生。但一出门，我像当胸挨了一粒子弹，呆住了。站在我面前的竟是玛丽！两名士兵扭着那纤细的手腕，她态度傲慢，咄咄逼人。可是当她认出我时，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我紧张地望着她，心好像要跳出来。

“‘怎么回事？’我问。

“一个士兵一边扭住玛丽，一边用那种麻木不仁的、毫无表情的、

尽量模仿下级军官说话时的口吻回答道：

"'中尉，我和杜波依斯在红兔旅馆站岗，这婆娘和一名骑兵军官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那位军官已有所察觉，就假装喝醉了。她问他的营驻在什么地方，属于哪个师。军官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就故意把她留下，让一个朋友来找我们。我们逮捕了她，搜了她的皮包，发现里面有这个小本子，就把她带到营地来了。'

"他把皮面的小本子递给我。我迅速翻了一下，心狂跳不已。本子的好几页上记有部队的番号和一些军官的名字，以及一张当地的地图。图上使用的是德国地图上常用的箭头和符号，标有各司令部的名称。更为严重的是在最后一页上，有和柏林联系的地址。

"我鼓起勇气，抬头看着她，尽力控制自己的声音，说：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玛丽淡淡一笑，耸耸肩说：

"'这是战争！'

"她的勇气终于消失了。她挣脱扭住她的士兵，扑到我的跟前，抱住我的腿，吻着我那沾满泥浆的靴子。那时营地到处泥泞。她跪在地上，绝望地喊着：'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卫兵走上前想把她拉起来。我看了一眼那满头金发。上次看到它时，它温柔、妩媚地躺在雪白的枕头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在上帝面上，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她哽咽着说，'我求求你，我还年轻，我不能死啊！'

"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候，玛丽也没有忘记用德语和我讲话，她不想让扭住她的士兵听懂。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心里在想，我不能再次逃避自己的职责了。

"'把她带走，先关起来，'我对士兵说，'明天她将受审。'

"审讯时间并不长，但命运又给我出了难题。我不得不主持这次审判，因为没有人代替我。审讯结束，我心碎地听着第二天凌晨枪毙

玛丽的判决。

“按照习惯，我问她在临刑前还有什么要求，她已经冷静下来，毫不惊慌地对我凄然一笑说：

“‘我想要一包 ×× 牌香烟……’她说的那种香烟正是我平时爱抽的烟。

“‘这些香烟使我想起幸福的一天。一天的时间太短了！我的朋友曾给我了一次机会，可惜他现在不能再给我第二次机会了。’

“玛丽在第二天凌晨被处决，至死都昂首挺胸，毫不胆怯。

“即使现在，当我躺在妻子旁边的时候，有时还会突然惊醒，好像看到玛丽穿着蓝色上衣。她的影子苦苦折磨着我。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亨利最后说。

我长久地望着他。

“是啊，毫无办法。你讲的太凄惨了。但是，这是战争啊！”

# 第六部分　解放



# 第一章　不要发誓，永远不要

## 一

回到荷兰后，我奉命同一个六人保安小组前往欧洲，去领导隶属于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荷兰反间谍处，任务是负责为盟军后方联络线扫清障碍，保证畅通无阻。当时，盟军正通过法国和比利时向荷兰挺进。

对一个快五十岁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野营生活，伙食很糟，吃饭无规律，整日整日地乘越野车行驶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睡不好，甚至连衣服也顾不得脱，这种日子简直把人搞得疲惫不堪。我并不是要以此唤起读者的怜悯之心，因为野战部队的处境更加艰苦和危险，然而，毕竟我这样的年龄不像二十岁的人那样经摔打了。

事情很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来工作也无法应付。每收复一座城市，便要处理无数控告内奸的案件。有的人为了私人纠葛，指控他们的仇人是内奸，这样的案子都需一一审理。事情的真相迟早可以搞清楚，或大致搞清楚，但是，这需要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另外，悬而未决的案件也越积越多。那些至死不悟的德国人安插下许多破坏分子和间谍，他们炸毁桥梁，袭击军火库，刺探盟军活动的情报，这些狗男女都必须一律清除。除去日常工作，还有一个亟待解决而又棘手的新问题——一个在我从事反间谍工作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我想在下面详加叙述。

随着我的六人小组逐渐解体，我工作中的困难越来越大了。美军急需受过训练的保安人员，把其中的两人要了去。当向他们挥手告别

时，我知道这将是我们的永别。而实际上，直到战争结束，我也没再见到过他们。不久，我又不得不把另外两人借给英军，这两人同样是一去不复返了。尔后，加拿大军队要走了我身边最后的两人。尽管我一再要求上级把我的助手调回来，仍是毫无结果。当初七个人都穷于应付的工作，现在只好由我独自承担了。如果按我原来的计划，把保安处好好搞一下，起码可以组织起一支每日坚持十四小时工作的一百名人员的精干队伍。然而，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既缺乏方便的交通工具，又无解决困难的权威，不得不跟在向荷兰急行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后面，一跑就是几百英里。

到达荷兰南部的埃因霍温时，我已是精疲力竭、颓然不堪了，本来就够轻的体重掉了十二公斤。我经常头疼，夜间失眠，食欲也从没这样坏过，加之神经炎发作，简直是坐立不安。我的精力和体力消耗殆尽，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了。果不然，没过多久，在 1944 年 12 月 22 日，我晕倒了。

一个朋友急忙把我送到布鲁塞尔，以后，又把我转到陆军医院。一个少校军医给我进行了极其认真的检查。在我的一生中，这样全面的检查还是头一次。他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询问我的家庭健康史和个人生活方式，查完了心、肝、肺，又摸了摸我的胃部和脊椎。作为从事另一种检查的专家，我不能不对他这种职业责任心肃然起敬。

当我穿衣服时，医生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诊断结果，签上字，装进一个信封，交给了我。他建议我立即返回英国，把诊断书交给我的私人医生。我曾审讯过各色各样的人，对他那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并不害怕，但对自己的健康问题，人总是对哪怕是极细微的表情也是十分敏感的。

“我不是小孩子，大夫，”我说，“也不是胆小鬼，请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他嘟哝了几个根本无法听清的、属于职业机密的字。

“让你这套职业机密见鬼去吧！”我说，“一到英国，我就全清楚了。为什么不现在告诉我？”

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据我看来，你患晚期腹部癌变，已经扩散到两肺。我本不想说，但你执意要问，我不得不告诉你。”

一听到“癌”，我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字意味着一切的结束。

我们握了握手。我不知道是如何走到了马路上。有时，我好像感到一种被判处死刑人的异样苦痛，呼进的每一口空气，像针一样刺着我的肺。我呆呆地站着，用那好像已经支离破碎了的肺深深地呼吸着。房屋清楚的轮廓，轰轰作响的军车，比利时女人的鲜艳的头巾和披肩，都好像蒙上了一层奇异的光彩。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这是我在人间最后的一个圣诞节。随着心脏的跳动，我离末日越来越近了。

我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整整徘徊了四个小时，周围的一切像是被浓雾笼罩着。我像是在做一场噩梦，希望醒来后安然无恙，然而，我分明感觉到装着死刑判决书的信封在我的口袋里，使我回到现实中来。

我不知道是怎样来到司令部的。我立即要求弄到一张去伦敦的机票，像只寻找一席葬身之地的动物，希望立即动身。然而，由于圣诞节的来临，机票很紧，我只能拿到一张 12 月 27 日的票。我从迷惘中平静下来，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心中暗想：“垂死之人应当让活着的人去欢度圣诞节。对于一个判处死刑的人，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恢复了理智，应当向朋友们解释一下我突然要走的原因。真是坏事传千里，我突然动身的原因早已在军官中传开了。只有高明的作家才能描述那些一向冷淡、举止刻板的英国朋友对我做出的同情表示。总之，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凄凉的一个圣诞节，我的不幸也感染了其他

人，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节日的骷髅。[1]

12 月 27 日，我飞往伦敦，第一件事就是约见我的医生。我把专家的诊断书交给他，他给我进行了检查，接着便问道：

“专家下结论前给你拍过 X 光片子吗？”

“没有。”

“怎么？没用 X 光？那怎么能下这样严重的结论？说实在的，我的检查并不说明你有任何癌症迹象，但是，不做全面检查，很难给你这样或那样的答复。需要透视。当然，军队有军队的做法。”

医生狡黠地笑了，一丝希望的微光在我心中闪过。

“现在怎么办？”

“你去哈利街找一位专家，越早越好。明天可以吗？”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声音还没恢复正常。第二天清早，我找到了放射专家，吞下了大量的钡糊，然后，他极其认真地为我拍了片子。

两天后，我病态地沉不住气了，急于要了解结果。我来到医生的诊室，这时，我体会到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临刑前的早晨，等待对其赦免请求的最后答复的心情。

医生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他习惯地搓着手，流露出喜悦的表情。

“好啦！”他说，“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尽管医生都不愿当众和同事唱反调，但我不得不说这一次军医是搞错了。你没有什么癌症迹象，使你难受的是过度疲劳和神经衰弱。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你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疾病，休息几个月，你完全会好起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谈谈吧，随便谈谈，好像你愿意死似的！”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感到是在处决前得到了赦免。

---

① 欧洲许多国家，节日期间有戴骷髅面具的习惯。——译者注

## 二

我连续休息了三个月。在德国人发动阿登攻势后，欧战似乎接近尾声。可能有许多工作在等着我，但对未来我已没有任何奢想了。我感到很愉快，任这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天天流逝。整整五年半没休假了，现在我的精神和身体总算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人们都叫我弗兰克·杰克逊。这样，弗兰克·杰克逊上校将死的消息很快在英国保安系统传开了，自然，也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

我想，对本人的死，真正关心的人为数不多，因为弗兰克·杰克逊是无暇交朋友的。但在敌人方面，肯定会有不少人对他的死感到庆幸。当然，对他们也无可非议。

1945 年 3 月底，我的健康和精力完全恢复了，我又重返欧洲大陆履行我的义务。六周以后，胜利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荷兰北部的省份也得到了解放。德国人在几个分散的巢穴里进行了疯狂的抵抗。6 月初，我赶到海牙，第一件事就是审讯一个冲锋队队员。他不是德国人，而是个荷兰内奸。

犯人被拘留在海牙附近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斯赫维宁根监狱，老百姓称之为“奥伦治饭店”。监狱由加拿大当局管理，它的一翼专门用来关押那些有间谍或内奸嫌疑的政治犯。

犯人被捕时，甚至没来得及脱去冲锋队队员的制服，军衣上一条黑红两色的带子标志着他曾荣获过“铁十字”勋章。这是个典型的趾高气扬的冲锋队队员。剃得光光的脑袋、狡猾的小眼睛以及他全部的外表都充分表明他的为人。我估计问题不难解决，他同几个敌人当场被捕，没什么可狡辩的余地。谁知，并不是那么简单。

“你同敌人合作过吗？”我说，“你这套漂亮的军服是个很好的

证据。”

“怎么能轻易指控我是内奸呢？我是荷兰公民，的确为国家出过力。”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你是荷兰公民？那样的话，戈林一定成了瘦子，希姆莱也成了主日学校的教师啦！既然你为国家效过劳，怎么解释你穿着这么一身制服被捕呢？难道会因为你是荷兰人而得到‘铁十字’勋章吗？”

“你搞错了，上校先生。我承认，作为一个荷兰公民，穿这身制服是有点奇怪，但这里面有原因。”

我让他继续讲下去。

“这太不公正了。我为国家尽了一切努力，好多次连命也差点丢掉，坐牢的风险更不知担了多少，而那些货真价实的内奸和德国佬的朋友却逍遥法外，耀武扬威。德国人被打败了，他们都钻出了洞，成了特权人物。他们乘车兜风，作威作福。但我决不会说他们曾同敌人同流合污。而我，什么也没做，却被关进牢房受罪。不，这太不公正了！”

我决定让他继续胡诌下去。为了把情况搞得更清楚，我说：

“继续讲下去，你讲得很有意思。”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话。相信我吧，全部是实话。我发誓！是反间谍局的一个高级官员派我打入冲锋队的。他详细地指示我应当说什么，如何回答问题等。打入冲锋队后，他对我的工作做了指示，让我每月向他的一个官员送一次情报。我们会面的地点是在鹿特丹的一个码头，当时叫‘彭介斯’。”

他讲的这一套，我连一个字也不相信，近几年来，诸如此类的交代我听得太多了。军事法庭倒可接受这一套。

在敌人中安插间谍是常有的事，这些人时时都有生命危险，而战争结束后，往往还有被当成内奸的可能。但冲锋队不是干这种工作的地方。我继续问：

“很好。既然每个月你都同联络员在鹿特丹会面，请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以便查对……”

“铁十字”勋章获得者狡黠地笑了。

“在间谍工作中，不能问接头人的姓名，少认识一个人，少一个被出卖的机会。我从没问过他的名字，他也没问过我的名字。我们谈话的内容才是重要的。”

“感谢你的提醒，这对我或许是有用的！既然不告诉我他的名字，可以谈谈他的一些情况吗？”

他沉思了一会儿。

“好吧！我刚才已经说过，是情报局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指使我同他会面的。”

“好，我懂啦。我们总算谈到了实质问题。你一定对这位高级官员有所了解，只要你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就行了。如果他能为你的交代作证，你马上就可获得自由。”

犯人难过地摇摇头，说：

“这正是悲剧之所在。如果我这位老朋友在此，我也就不致在监狱受罪了。他离开这儿也许已经很久了。不幸的是，后来他死了。”

“死啦！盖世太保把他抓去了？”

“不，先生。盖世太保从来没有抓到过他，他机灵得很，他是病死的。”

“什么病？”

“听说是癌症，是胃癌。”

我的胃部立刻有种异样感觉。

“很遗憾，怎么办呢？人虽死了，他仍能帮你的大忙。如果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去查一下他的秘密档案，一定能找到有关你的材料，他的助手也会提供你的情况。他叫什么名字？”

“杰克逊，先生。弗兰克·杰克逊上校。”

我用了很大的劲才扳住了一本正经的面孔，假装擤鼻涕，把脸蒙在手帕里。

“唉，这个名字对我并不陌生，但我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一个到处奔波的人是很难及时得到什么消息的。这么说，是弗兰克·杰克逊上校指使你打入冲锋队的了？”

“是的，先生。”

“你和他认识很久了吗？”

“啊，是的，相识多年了。我为他做过许多工作。”

“那么，杰克逊上校对你也是完全信赖啰？”

“当然！他很清楚我在为他效劳，为了他，我曾冒过生命危险。同样，要是他活着的话，他也会帮我的忙，早不让我在这里蒙受不白之冤了。”

“我想，即使他死了，你也无须过分担心。我需要履行审讯手续，我看事情还是清楚的。在杰克逊上校的办公室，我们会找到能使你得到解脱的某个人或某个材料。我从未见过他，他长的什么样子？”

犯人蹙起前额，回忆着说：

“我很难把他加以描述，我不善于形容人的相貌，另外，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好像突然有了某种灵感，“是这样，他的平淡无奇的长相正是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有利条件。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从不会引起人的注目。他中等身材，不很胖，也不很瘦，毫无引人注目之处。”

“我懂啦。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犯人看着我，大笑起来。

“我的上帝，完全不是！一点也不像你！”

“很好！”我说，“你的问题越来越清楚了。对这次谈话，我感到很高兴。一旦把你的情况弄明白，你就会得到适当的处置。”

“非常感谢！对你的好意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不用客气！对你这样的人，我总是尽力而为的。能否打搅你一下？”

“什么事？”他尽量装出一副更亲切的样子。

“你单独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一会儿，或许能回忆起许多关于你从事间谍工作的详细情况，包括一些细节，这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对你的这种回忆我也是感兴趣的。我将提供一切便利，使你能把所想到的写下来，一点也不要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细节，写完转交给我。”

“好吧，我将尽力而为。”

接着，他又补充道：

“我把材料写好后，交给谁呢？我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望着他，一句话也没说。停了一会儿，我走到他面前，说：

“想知道我的名字吗？在同行中，大家都叫我杰克逊——弗兰克·杰克逊上校。”

# 第二章　终于开口了

轻信第一印象是很危险的，受过良好训练的间谍总是设法取得别人的好感。间谍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装扮一副诚实、坦率的样子。间谍要善于取得人们的信任，善于装得与普通公民无异，不露形迹。如果不是个好的演员，决不能演好自己的角色。相反，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也绝不会训练成八面玲珑的角色，除非他是个商贩或货物推销员。善于装得讨人喜欢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无辜的人也无须苦于装出无辜的样子。他问心无愧，深知自己是无辜者，只希望审讯人弄清这一点，无须他人的任何帮助。

对于反间谍人员来说，凭第一次印象就下结论不能不说是失策。然而，经验丰富的人有时似乎凭着直觉能当机立断，而在实际上，这种判断是以对他是极其明显，对常人又是不易觉察的迹象为依据的。建筑师对平面图能一目了然，一个出版商浏览一下便能鉴别一个手稿的真伪，一个好的审判员一眼便可把嫌疑犯估量个大概。刚开始便下结论固然是轻率的，然而，最初的判断又往往是最正确的。

我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使我一开始就断定埃米里约·布朗格尔是纳粹间谍的了。

当时，德军正仓皇溃退，盟军的坦克和摩托部队进入了比利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了。我们在两条大路的交叉点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其实，就是用沙袋垒起来的、像碉堡一样的东西。师指挥部设在附近的农舍里。他们认为我们掺在里面不合适，我们只好自行安排。这倒

也有好处，可以不受别人的干扰而往来自由。不利之处是，谁也不管我们，一到驻地，好地方全被占了。

我们还是说埃米里约·布朗格尔吧！有一天，师参谋部安全科的两名士兵把他带了来，他是在比利时一个被炸毁的小村庄附近流浪时被抓到的，这个可怜虫张皇失措地在一片废墟中徘徊。他的穿着和谈吐完全像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口音是地道的瓦隆地区的土音，但是，他的举止和眼神的某些东西引起了我的怀疑。他的颈部像牛的脖子，他那魁梧的运动员体型和当地常见的惰性十足的人截然不同。

“你是农民吗？”我问。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德国鬼子抢走了我的牲畜，连鸭子也没留下。土地荒芜了，我的房子成了一堆瓦砾，我的女人被倒塌的房子压死了，家里其他人全部失踪。”

他绝望地摊开肮脏的双手，指甲像爪，满是泥土和凝结了的污血。

“我想把我的女人扒出来，她被压在黑洞洞的废墟下面。她在世时就特别害怕黑暗。我像疯子一样把她扒了出来，但她已死了。”他陷入了沉思。

“会数数吗？”

“数数？”他吃惊地重复道。

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盘豆子，是部队从农民那里“收复”来的。

“把豆子数一数吧！”我大声说。

他慢腾腾地端起盘子，声音颤抖着，开始用法文数：“un、deux、trois[①]……”当他数到七十二时，我命他停止。他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他若是个化装的德国人，一定要说 soixante-douze[②]，而不用瓦隆农民

---

① 法文数词：“一、二、三……”——译者注

② 法文数词：“七十二”。——译者注

惯用的古老方式：septante-deux[1]。

我没发现他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是，我并不死心。我不相信布朗格尔是个像他所说的、失去了房屋和妻子的、憨厚的比利时农夫。正巧，那时我的时间比较充裕，使我可以更认真地研究布朗格尔的案情。若能证明他是无辜的，这对谁都没有坏处。如果他是个坏蛋，我们就为自己部队的安全做了件好事。

我命令把他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屋里，这原是马厩的一部分。屋门的外面上了锁，从门板的缝隙中可以看到临时拘留所的内部，布朗格尔却不知道他的一切行动在被监视。他睡觉前，跪在褥子前面，虔诚地祷告起来。他的祈祷很谦恭，简直近乎幼稚，很像农村牧师的传授。突然，一只老鼠从屋里穿过，他一下跳起来，低声说了声“Dieu[2]”这是瓦隆人的习惯用语。然后，他躺在褥子上，睡了。过了一会儿，我让人在窗台底下放了几捆草，一个士兵点着了火。烟从门的下面进到屋里，值勤的士兵开始用德语喊起来：“feuer！[3]”布朗格尔醒了，动了动，又睡了。于是我用法语喊道：“Au feu！ Au feu！”[4]布朗格尔一下跳起来，绝望地敲打紧关着的门。我打开门，他正用当地的方言祈祷着。

我的疑心仍不死，又设了第二个圈套。我命令把他带到营地，他来之前，我同一个朋友商定了一个小小的计谋。过几分钟。我将用德语说：“Armer Kerl.[5]”他将笑着问：“Warum？[6]”

布朗格尔来了。在一张极糙的桌子上摆着他被捕时我们搜到的全部东西，没什么显眼之物：一支用了很久的铅笔，一条绳子，一点鼻

① 古法文数词：“七十二”，现比利时、瑞士等地尚用。——译者注
② 法文：上帝。——译者注
③ 德语：火。——译者注
④ 法语：着火了，着火了。——译者注
⑤ 德语：可怜的家伙。——译者注
⑥ 德语：为什么？——译者注

烟末，一个旧的耶稣受难像和几个硬币。这堆可怜的什物中没有任何离奇的玩意儿。

布朗格尔站在那里，像个即将被屠宰的动物。我把他的东西归拢一下，把铅笔头拿了起来。

“你带这个干什么？”我用法语问。

“不就是支铅笔吗？”他耸耸肩说。

“用它给敌人写情报？”布朗格尔微微地，几乎是蔑视地笑笑，好像问话是那样荒唐，简直不屑回答。

我用德语对军官说；

“可怜的家伙！”

“为什么？”他用德语问。

“为什么！”我用德语说，“他还不知道今天上午就要被绞死。已经十一点了（我看了一下手表）。他肯定是个间谍无疑，不会有别的下场。”

说话间，我紧盯着布朗格尔，特别是他的眼睛和喉头。不管一个人是多么勇敢和镇静自若，也很难控制几乎是自发反应的神经活动。就跟眼睛受到刺激时会本能地眨动一样，当他得知死亡的消息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他的脸色可能变白，张皇地眨眼，或者做出像极度口渴时的吞咽动作，但是，布朗格尔却无动于衷。尽管他知道被怀疑，但仍泰然自若，毫无惊惶的表示。他的神态证明他不是德国间谍，也不懂德语。

这时，我不得不承认我凭第一印象所做的判断是错了。或许由于自尊心被伤害，或许由于固执，我仍坚持我的看法，决定对他进行新的考验。我把他带到一个真正的比利时农民家里，并看着他们两人见了面。在我的请求下，当农民同他谈起庄稼活时，布朗格尔兴奋了，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他的谈话像是很在行，事后农民告诉我，他谈的耕作方法和当地

的习惯没有任何出入。

我又失败了，差不多要相信布朗格尔讲的是实话了。我劝告反间谍局的新手不要相信第一印象，大概是基于这次的失败。晚上，我躺在床上，分析了使我在初次见面后就对布朗格尔产生怀疑的感情因素。我把他的行动和同他的谈话在脑海中理了一遍，想从中得到能证实我最初的疑心中有用的东西。

绞尽了脑汁，也没有找到能说明我的第一印象是正确的东西。临睡前，我决定在第二天早晨进行一次新的考验；若再失败，我马上承认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并当场释放他。

布朗格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沉着、平静。我装作正聚精会神地看一份文件，看完后，拿起笔在上面签了字。我抬起眼，突然用德语说："So，jetzt bin ich zufrieden. Sie können gehen. Sie sind frei.[①]"

布朗格尔长长地舒了口气，动了动肩膀，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仰起脸，愉快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当他发现我的嘲笑时，重新恢复了沮丧的面容，但是，已经晚了。旁边的两个士兵已把他紧紧地抓住了。

"Mein lieber Freund.[②]"我站起来说。从那时一直到几天后他被处决，我们就只用他的祖国的语言——德语——来交谈了。

---

① 德语：好啦，我满意了。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译者注

② 德语：我亲爱的朋友。——译者注

# 第三章　毅力的较量

当一种间谍手段被敌人发现后，应该立即弃之不用，这是谍报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法则之一。因为秘密一旦公开，也就无所谓秘密了。培养一个好的特工人员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轻率地让他去冒险是极大的浪费。

在两次大战中，德国间谍机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培养一个合格的间谍是不容易的。我们可以把本书一开始就提到过的范·德·克彭和他的同事做个例子。德国间谍机构给这些青年发了英国的衣服和什物；他们的身份证上印章齐全，颜色亦无不妥之处。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若不是我们的反间谍人员预先得到情报，这些年轻人会轻而易举地混入居民中，而不被任何人发现。

使德国的情报工作遭到最大损失的原因是德国人的因循守旧，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按部就班”。他们的特工人员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但都缺乏独立处理问题的充分自由。技术事故是经常发生的，没等这些事故得到及时的处理，我们的反间谍机构对敌人的意图已心中有数了。

以上的一席话可算做我所遇到的最难处理的一个案件的前言：这一案件后来竟使我获得了最大的胜利，同时，也是我最大的悲剧。这就是科尼利斯·维洛普之案。

1944 年 10 月末，我仍在领导隶属于盟国最高统帅部的荷兰反间谍处，当时我正在埃因霍温，那儿的治安是很成问题的。在这个被敌

人占领了四年之久、刚刚获得解放的地方，耸人听闻的事件经常发生。几百起勾结敌人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其中有真的，也有个人报复。

一个社会的主要成员很难同占领他们的城市和村庄的入侵者共处。当地的医生被迫继续接待病人，但要听外国人的指使，难道医生应当放弃自己的岗位，让患者自己给自己治病吗？牧师和行政长官是冒着当卖国贼的嫌疑坚持自己的工作呢，还是加入爱国者的行列，把自己所管辖的人民甩手不管？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什么恰当的答案。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每个人都要自己去思考。上帝总会帮助那些选择了崎岖道路的人。

我在埃因霍温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尽最大的努力想把一堆乱麻理出个头绪来，以便使泾渭分明。这实在是个伤脑筋的工作。

一天，一个叫亨德里克的人来找我。三年来，他一直在领导一个抵抗小组，并以反侵略的优秀战士而著称。看起来他其貌不扬，中等身材，肩膀宽厚，手很粗大。他不是个轻量级，我想，他会像庄稼汉扭断鸡脖子一样把我的脊梁骨弄断。他走路有些跛，这是同盖世太保的一次遭遇后留下的痕迹。在盖世太保的审讯中，他什么也没有交代。

我一到埃因霍温，便认识了亨德里克，并对他十分信任。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功绩是理应受到嘉奖的。他的抵抗小组经常给德国人制造麻烦，对盟军的进军做过有益的贡献。亨德里克是个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的话完全值得信赖。现在，他坐在我面前，揭发他的小组的一名成员。

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烟斗，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激动情绪。他已经给我说过被他指控为叛徒的人的名字——科尼利斯·维洛普，以及怀疑他的原因，他现在来向我介绍情况。

“你认识科尼利斯有多久了？”

“从小就认识。”他立即答道，“我们的父母是老朋友。我比他大得多，大十岁或十二岁。我们从小就很熟。”

“这么说，他现在该是二十五岁上下？”

“可能还大些。我快四十了，他起码有二十八。”

“他什么时候加入你的小组的？”

“两三年了。是 1942 年中。”

“在这之前，你没怀疑过他吗？”

“对不起，上校先生！（在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了。）如果对他有怀疑，我就不会接收他参加小组了。”

“那也不一定！”我反驳说，“英国有句俗话，‘放长线，钓大鱼’。我就知道好几个嫌疑分子被接纳到抵抗组织中来，但他们是被严格监视的。”

“这次不是。”他说，“我们小组中的成员是经过严格审查的。”

“好！他干什么工作？”

“指日常工作还是在抵抗组织内的工作？”

“日常工作。”

“在无线电厂。这家伙还挺能干，进厂不久，就被提拔了。那时，战争刚爆发。”

“看来，德国人来到这里后，首先把工厂占领了。”

“是的，正是这样。工厂立即开始为德国坦克和飞机制造零件。”

“这么说，四年来，维洛普是为德国人工作，或者是在德国人的监督下工作了？”

“那当然！但是，我们也不能苛求他。本市几乎有半数居民在这家无线电厂工作，如果不干，只有饿死了。我并不为此而指责他。”

“总而言之，根据你刚才所说，在他加入你的组织时，你对他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怀疑他呢？”

亨德里克耸了耸他那宽大的肩膀，说：

“我也不是认为他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些积累起来的小事使我对他的行动产生了怀疑。”

“是些什么小事？”

“比如：这里一直设有德国的保安机构。夜里，总是派人看守一些要害部位，像桥梁、无线电厂、铁路。马路上整夜都有巡逻队，夜里出来活动是很难躲过他们的。”

“会是这样？”

“当然，可是只要维洛普参加夜里的活动，就从来没碰上过德国巡逻队。德国人都神秘地不见了。于是我们发现，只要维洛普同小组在一起，事情总是一帆风顺。”

“有些人的运气就是好。”我反驳说。

“我们也这样想过！只要维洛普夜里出来活动，全组都愿意出来。他简直成了大家的吉星。”

“他说他经常用钱收买德国人，所以德国人也就让他行动自由。会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但是，谁也没见过。也许偶尔有一次巧合。”

“也许是！但只要维洛普不参加小组的活动，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天夜里，我们的小组遭到严重挫折，他就没在场。”

“他为什么没在场？”

“他总有借口！科尼利斯身体是不好，经常生病，只要一肚子疼，马上就要找大夫。”（亨德里克说话的语调流露出健康人对臆想病患者的讨厌情绪。）

“轻微的咳嗽并不妨碍他活动！但是，一个人过分关心自己也不能成其值得怀疑的理由。”

“但是，当他在场时，一切便平安无事了；而他不在时，我们会立即遭到逮捕。难道你不感到奇怪吗？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不只是两三次。你不感到奇怪？”

“那倒真奇怪。但证据确凿吗？”

“当然确凿！关于桥的事怎么解释？”

“什么桥？”

“我还以为他们早就告诉了你！在离城二英里多的地方，有一个公路与铁路的交会点，立交处是座石头桥。第二战场一开辟，我们奉命把桥炸毁，想用桥的废墟把铁路堵塞。盟军打算切断对荷兰和比利时的给养供应，皇家空军几次想把桥炸掉，但都没成功，因为附近防空武器密布，特别是八十八毫米的武器。我们应邀去执行任务。我们是轮流出动的，这次轮到了科尼利斯，他负责给几个青年带路。他们带着足以毁掉半个城市的炸药。上帝保佑，炸桥成功了。”

“你还认为科尼利斯是叛徒吗？”我不解地问。

“但不是计划要炸的那座，是距立交处很远的一座小桥。半天之内，德国人便排除了障碍。我记不准了，小桥那儿好像偶尔有一二辆火车通过。而大桥上却增岗加哨，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大桥了。”

“维洛普怎么解释的？你肯定质问过他的这一过失！”

“当然质问了他！他找了许多借口。说什么天很黑，又没有时间仔细辨认，在黑暗中，把桥弄错了。”

“是真弄错了吗？”

“我不愿指控一个朋友，特别是一个幼年时期的朋友。由于紧张，弄错的可能是有的。从这点出发，弄错也许是真的。但和别的一些类似的疏忽联系起来，就不能不证实他是：叛徒！”

“最好我见见他，同他谈谈。”

“我很希望你这样做，上校。如果你认为他是无辜的，我将第一个同他握手。但愿他是无罪的，怀疑一个朋友是令人遗憾的。如果你认为他有罪，他对别人也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你不必担心判决的形式，我们懂得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这类事情。（他无意地把他那粗壮的大手放到我的办公桌上。）我发誓！亨德里克决不饶恕一个叛徒！”

“如果他真有其罪，你负责判决。”我严肃地说，“这里没有专门的行刑队。”

亨德里克放松了肌肉，不好意思地笑了。

“请原谅，上校先生！我早就把法律忘掉了。我是否可以告诉维洛普，你想见他？”

“不，不要这样！他若知道你怀疑他，他会做防备的。他和其他人知道我在此地的任务吗？”

“不知道，肯定不知道！”

“那好！我想是否这样告诉他，就说我要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完成一项特殊任务，需要了解一下荷兰抵抗运动的情况，所以，我要同埃因霍温抵抗组织的每个成员见见面。这样，他就会感到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见面了。”

“好，就这样办吧！”

“请把他叫来！”

其间又插了些别的事，我还会见了当地抵抗组织的一些人士。一周后，终于维洛普来为我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提供材料了。我同亨德里克商定的、避免引起维洛普怀疑的计划并没付诸实施。前一天，我得到我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员的通知，说自卫队的一个军官刚刚被捕，他交代说科尼利斯·维洛普是他在埃因霍温的接头人，并要求我马上审讯维洛普，把他拘留到将事情的真相彻底搞清为止。

维洛普立即被捕了。午饭过后，他被带到我的临时办公室。尽管情报已经证明了亨德里克的怀疑，我仍然有保留看法。战争还没结束，德国人可能还想重新占领埃因霍温，一个德国军官中断他在此地的联系是不明智的。德国军官供出维洛普，可能是由于他在无线电厂的工作岗位的关系，也可能是军官伪造的经历，以此干扰反间谍工作，掩盖罪责。

首先进行了例行的程序。对维洛普搜身后，把他的随身之物拿到我的面前，这时嫌疑犯被关在拘留所。我已说过多次，审讯前，对嫌疑犯的所有物品都要认真检查，检查人员可以从中了解他的为人。比如，如果他带着梳子、小剪刀和指甲挫，毫无问题，嫌疑犯是个很注意修饰外表之人，或者是个纨绔子弟。如果他的小本本里夹着乌七八糟的照片，这可能是个私生活不满足的人。根据这些特点，审讯人员便可制定出自己的审讯方案。

但最重要的是要看看嫌疑犯是否带着同敌人进行联络的特殊器械，间谍的最大目的是把得到的情报传递出去。例如：德国人发明了一种微型照相机，样子像一支自来水笔，拍出的照片大小像大头针头，经过高倍数的放大后，一点也不失真，将底片贴在一张邮票下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除非地址出了问题。

所以，我仔细地察看了维洛普的东西，没有什么特殊玩意儿。我把自来水笔拆开，检查了内部，没发现异常。粗制手绢也没藏有地图。钱包里的几张票子在强光下经过检验，也没发现什么。手表是荷兰产品，我细心查看，并把蒙子也取下，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可疑之物。除了几张钞票，油乎乎的钱包里还有身份证，一个微笑的女人和一个小孩的照片，两张邮票，一个记事本。这个小本子马上引起了我的兴趣。每一页上都记着星期几,星期几,还有些像是密码的记号。我一问，才知道是搞错了。另外，还有一盒火柴。

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检查这些东西。我让人给维洛普拿了点吃的东西，我也草草用了饭。审讯定于十三时开始。

维洛普和一个押送的士兵准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审视了他一两分钟。这是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三十来岁，表情坦率而坚定，走起路来身子笔直，体型很好看。我从亨德里克那里得知，维洛普对自己的身材很是欣赏。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所走的步伐，我看他真像个运动员。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没有要。的确，尼古

丁对一个受审者显然是不适宜的。

维洛普有些激动，不明白为什么同伴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对他产生怀疑，难受地说：

“他们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把我抓了来。我知道我是无罪的，你马上就会明白，但我的朋友们如何想呢？他们会成年累月地在背后指着我说东道西！”

“如果他们这样对待你，肯定不会是你的好朋友！”我说，“不用担心，维洛普。如果真像你所说的你是无辜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的。”

“好吧！他们检举我什么？”他问，“那么多人，为什么单控告我呢？如果我麻木不仁，在战争期间不同他们合作，也情有可原，但我是全力以赴地参加抵抗运动，连生命都在所不惜……难道就是这样感谢我吗？为什么你不问问我们的头头亨德里克？他是个好人，他可以证明我是尽力而为的。”

我让他继续说了一会儿。突然，我插话道：

“维洛普先生，你只要能尽早证明你是无辜的，我们这出哑剧结束得也就越快。为什么不把你的全部情况，你的年龄，你的工作，怎么加入的抵抗组织……都讲清楚？别着急，随便些！”

他沉不住气了，一股脑儿讲了下去……

他在学校时是个运动员，在径赛方面得过几个奖章，主要是四百米和八百米，还当过国家游泳队的队员。

他笑着说，他当记账员不灵。但他的手很巧，从小对电这一行很感兴趣，所以，1923 年一离开学校，就被无线电厂吸引住了。他工作很卖劲，受到管理人员的器重，后来就调到了装配组。他干得很出色，在 1939 年战争爆发前结婚时，刚满二十岁的他，就被提拔为推销助理。1940 年，他有了一个女孩。虽然德国人已入侵荷兰，他仍在无线电厂工作，支援战争。

我决定向他提几个问题。

“在 1939 年，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当法国人和英国人宣布参战时，你为什么不参加荷兰军队？当然，有一个时期荷兰没被卷进去，但军队总要扩充，总要招募志愿人员。”

“我承认我的勇气不大，爱国心不强，但是，许多人认为战争不是我们的事。第一次大战，我们保持中立；大多数人认为，现在也应该中立。另外，我刚结婚一两个月，工作又很顺心。”

他的回答极贴切。按照战争的原则，没有利的事不会有人干。一直到德国使用闪电战后，人们才看到形势的危机。

我继续问道：

“你刚才说在 1942 年加入了抵抗组织，也就是说，是在德国人入侵两年之后。为什么这么晚？”

“你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不愿找麻烦。我有工作做，妻子和小女儿要靠我养活。我知道，德国人对一些人很坏，但也要实事求是。对我来说，工厂的头头都很公正，只要我们好好干，他们从不找麻烦，另外，工作干得好时，还有奖金。我要养活女儿和妻子，不得不想这些事。我并不认为我没有一点爱国心，换作别人，也会像我一样。”他一定观察到了我的表情，因为他立即补充道：“你不要认为我很坏，我没做任何越轨的行动去帮助德国人，我只是在尽我的义务，如此而已。我承认，我生来就不是英雄。‘自己活着，并让别人也能活着’，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没指责他。对没被征服过的人来说，很容易认为全体民众都应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但是，把经济收入、女儿和妻子弃之不顾又谈何容易！

停了一会儿，我问道：

“你怎么参加的抵抗组织？”

“说起来很奇怪，是我的妻子让我参加的。我所加入的组织的领导者，一个叫亨德里克的人，早就邀请我加入。他知道我的工作较自由，

需要我为他们搞点破坏或探听消息。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搞破坏不是我干的工作，德国人控制很严，很容易发现谁生产了次品真空管和开关，他们马上会怀疑到我。但我答应，若有大宗货物出厂，立即通知他。我想，这样不担任何风险。”

“你就这样开始为抵抗运动提供情报吗？”

“是的！这样干了好几个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夜里，他们决定炸毁一个正在进行几项实验的实验室。我比谁都更了解工厂的地形，也知道德国士兵的巡逻路线，这样，他们就让我引路。说实在，活了这么大，从来也没这样害怕过！”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对维洛普产生了一种同情感。他那隐藏在魁梧身材的后面，天真的，几乎是稚气的微笑，的确是感人的。维洛普肯定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这么说来，在 1942 年底，你成了抵抗小组的正式成员！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情报，好像你的生命没有受到过任何威胁。只要有你参加活动，德国巡逻队是从不找麻烦的，反之，就会遭殃。这又如何解释？”

他绝望地张开双手说：

“怎么解释呢？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像玩牌，有的人赢了，有的人输了。这要碰运气。我知道在这方面对我有议论，特别是那些死者的亲属。我决不抱怨他们，多么可怜！如果我死了，我的妻子也会这样议论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谣言会成为事实！”

“你不参加这些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听说一点伤风或轻微的咳嗽就可成为你不参加的借口？”

“是的！我不知道上校你是否参加过夜间行动。四周漆黑，大气也不敢喘，任何一点响声也会使人联想到扣扳机。个个像木雕泥塑的，板着面孔，不说话，暗中却在祷告千万别被发现。在紧急时刻，若有个倒霉鬼打个喷嚏或咳嗽一声，就会把整个小组葬送。你不同意吗？”

“是的，我同意！另一件我要知道的事情是为什么炸了一座没有计划炸的桥？”

维洛普脸红了。

“不知是谁告诉了你这些事。肯定不是我的朋友。我是炸错了桥，但这不意味着我就是德国间谍。不管怎么说，我到底是炸了一座桥。难道不是吗？皇家空军也会遇到过这样的事。难道能把驾驶员和全体机组人员都当成德国间谍吗？”

回答并不令人信服，但我却为维洛普的单纯所感动。我承认他不是英雄，但他对自己的任务还是尽力而为的。亨德里克的怀疑或或许是无根据的。我一面想，一面点燃了一支烟，并下意识地把烟盒推到维洛普一边。他笑着很客气地挡了一下我的手。

“不，谢谢！我不吸烟！”

烟是放在靠近他的票夹的地方。我拿起票夹，取出一张相片说：

“是你的妻子和女儿？”

“是的！”他骄傲地回答。

“祝贺你，多漂亮的照片！这，这是什么？”我拿起一张长方形的白色硬纸片，一面印着字，另一面是空白。在印字的一面角上，有维洛普的照片和签名。

“哦！这是工厂的出入证。许多工人的出入证是绿的，只能进大门。我的是白的，什么地方都能去。”

“我懂了！”我想，现在该是拿出王牌的时候了。我拿起小本，一页一页地翻起来。一边翻，一边察看他面部的每个表情。他仍是无动于衷。

“请看！每一页都有些数字！瞧，这里写着六十六点五，下面是六十二和十六，再下面是六十六点四、八十四和十六。下面也是这样。这是些什么东西？”

他拿起本子，看了看，接着，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请原谅，”他发现了我的惊愕，说道，“请原谅！我真不该这样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不是那么回事。这不是同德国人联络的密码。答案很简单，我经常运动，每天都记下体重、脉搏和呼吸的次数，这些都写在这个小本子上。请看：六十六点五，就是体重六十六公斤半；六十二是脉搏的次数，十六是每分钟的呼吸次数。对吗？”

我也不得不笑了。一个运动员做训练记录是可以理解的。

“刚才我竟把这些数字当成了密码！”

我的烟放在一个原来盛烟灰的金属盘里。在我看小本子的时候，伸手去拿烟盒，结果发现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了。我便无意识地把维洛普的火柴拿了起来。我瞥了一下他的面部表情，他像触了电似的，一丝阴影从他的脸上掠过。我把火柴盒摇了摇，发现声音异常。我打开盒，把里面的东西摊在桌子上。维洛普好像呼吸都屏住了。

我把火柴摆开，一共十二根，样子都差不多，但仔细一看，我发现其中的四根火柴头的颜色更浅些。我紧紧盯着科尼利斯·维洛普的眼睛，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四年前，有两个荷兰人，是弟兄俩，乘船到了英国海岸。他们马上去报告英国当局，因为过去曾表面上对德国人表示过友好，便被弄去进行间谍训练。他们被迫混在难民里，一旦被收留，就为德国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但是，德国情报机关的运气并不好，他们俩是真正的爱国志士。他们骗了德国人，并十分希望能为盟国做些事。为了证实他们的话是真实的，就把一种非常巧妙的传送情报的方法告诉给了我们。想让我告诉你是什么方法吗？”

“如果你愿意，”他漫不经心地说，“尽管我不明白这同我有何相干……”

“别着急！”我说，“事情是这样的。他们随身带来了几盒火柴。有的是真的，可以把烟点着——当然，你是不吸烟的，这一点我竟忘记了。其他火柴是假的，是化学物质合成的，只要湿一下，就可用来

密写。样子同别的火柴很相似，只是火柴头的颜色更浅些，就像这里的几根一样。你真不愿陪我吸支烟吗？你的确不吸烟，否则会对你的外表有影响。你带着火柴只是为朋友们点烟。我们来看看这根火柴。奇怪！划不着！不顶用！当然，它可能非常有用，不是吗，维洛普先生？德国人发给你一种特殊工作证，背面很白，再加上这种火柴，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有关抵抗运动的情报传递出去。只要进门时把证件交给警卫，出门时再收回就行了。不是这样吗，维洛普先生？”

维洛普颓然坐下，眨动了一两下眼睛，好像在吞咽点什么。我从桌上拿起两三根火柴，在手指中间来回摩擦。维洛普好像被磁石吸引着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两分钟后，他完全垮了。

他老实地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在妻子的坚持下，他参加了抵抗组织。他若不参加,妻子拒绝和他同床。她说,如果他不参加抵抗组织，就不配和她同床。就这样，他加入了进去，但同他们貌合神离。后来，他实在太害怕了，就去找了德国人，并同他们达成了一项交易：以提供抵抗组织的情报换取自己的活命。德国人也帮他的忙。为了证实他的确在为抵抗运动做事，他炸毁了一座小桥。

当一个人屈服后，他供出的东西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多。由于维洛普急于要赎罪，向我提供了关于“阿纳姆的叛徒”的线索。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但却没被作为叛徒和间谍处决。

两件事暴露了他的罪行：一是不吸烟，但随身带着火柴；二是德国人继续使用那些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的方法。

# 第四章　阿纳姆的叛徒

## 一

我下面要讲述的，无疑是我整个反间谍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起案件了。

我们首先看看几个至关重要的，也是我最关切的情况，这不是因为我曾积极地参与其中，而是因为对其结果颇为关心。如果蒙哥马利元帅在马斯河和下莱茵河大胆的进攻计划获得成功，如果主力部队在阿纳姆同伞兵部队会师，那么，对德国的那次致命的打击也就成为事实。如果对这次初步胜利再加以因势利导，毫无疑问，战争的进程就能大大加快，在 1944 年圣诞节前，敌对状态就可望结束。这样，无数军民的生命就能保全下来，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得以节省。仅英国政府每日在战争中的消耗就达一千六百万英镑。如果欧战提前六个月结束，巨额的美元就省下来了。再算上其他国家——如美国——在战争中的消耗，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盟军能迅速深入德国，在俄国人到达前就占领柏林和东欧，那么，1945 年以来盟国之间令人痛心的关系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可惜，现在做这些假设为时太晚了。不幸得很，这一切都没能够成为现实，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军事素养或勇气。在阿纳姆，英国人证明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有一个人——仅仅是由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把这一战役变成了一次悲剧性的冒险，此人叫克里斯琴·林德曼斯，荷兰人。不管我们是否想把战争最后六个月的责任归咎于他，

他毋庸置疑地要对十天内落入虎口的七千名伞兵的死亡负责。很少有间谍或叛徒能对国家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

## 二

作为隶属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荷兰反间谍处处长，我的任务是负责后方的情报组织工作。那时，一支包括英国第一军、美国第一和第三军以及加拿大第一军的部队正向荷兰挺进。这样众多的人数和军械所经之处，免不了搞得废墟遍野。解放大军的沿途，无辜百姓的家园毁于轰炸，尤其是德军撤退时进行了报复性破坏的地区。社会治安几乎不复存在，因为德国占领期间的地方官员，或者威信扫地，或者逃之夭夭。掠夺、饥饿和暴动是战争的产物。德国人利用这种局面，安插了许多破坏分子和间谍。这些人到处兴风作浪，在盟军的后方继续进行着战争。混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许多人趁机进行个人报复，抢占他人财物，而不怕受到惩罚。

法律和纪律必须建立。若盟军被迫在后方维持治安，这正中德国人的下怀。尽管我们使用的方法是粗暴的、强硬的，但起码效果是好的。设立了许多大型的集中营，四周围上铁丝网，并设置了重炮，荷枪实弹的哨兵把守大门。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难民、嫌疑犯，统统关在里面，逐步加以处理。被拘留者一旦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便立即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这样就慢慢剩下那些真正的罪犯，然后对他们进行审讯，并根据其罪恶进行制裁。无辜者在几天之内要失去人身自由，但在战争中，好人总要为世界大业受些委屈。我们不能马虎从事，这些人对盟军的前进是巨大的障碍。

安特卫普解放后，我在那儿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有一天，我正从大门路过，忽听到吵嚷之声，转回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一个彪形大汉正与门卫作难。此人身高过两米，前胸宽得出奇，像要把他的卡

其布衬衫撑破似的。手腕像运动员那样粗壮有力，体重足有一百公斤，整个形象如锻造的一般。大概还嫌这样一身肌肉不够壮观，又在腰里别了两把匕首和一支自动手枪，外加一支施迈瑟枪。他的口袋样子也很奇特，好像里面装满了手榴弹。

这位巨人神气地在每只胳膊上悬挎着个笑容可掬的舞女；一群荷兰青年簇拥着他，不断向他欢呼。挡着他的去路的哨兵有些不知所措，犹豫不决。我走近人群，听到巨人雷鸣般的声音：

“哈哈！这两个小妞儿是荷兰的爱国者。告诉上校，大‘金刚’替她们担保，马上把她们释放，好陪我去喝酒。”

我早听说过这位“金刚”，他是荷兰抵抗组织勇敢的领导人。由于他力大无穷，浑身是胆，打击德国人赫赫有名，博得了这样一个绰号。然而,他无权进入集中营,无权在有关领导审问前把两个姑娘带走。在他的组织中，他可能是个英雄，但他无权干预超越他的权限范围以外的事。

“过来！”我高声说道。

“是说我吗？”他转身问道。

“对，就是你！过来！”

他犹豫了一下，向我走来。没等他说话，我指着他袖子上的三个闪闪发光的金星说：

“你有什么权力戴这个？是上尉吗？在什么军队服役？”

“金刚”长嘘了口气，像是打了个鼾，回答说：

“是这样，我是作为荷兰国内武装力量地下军的领导佩戴这些星的！”

“是这样吗？”我天真地问，“你是谁？”

“我？”“金刚”好像很惊奇：竟有人还不认识他……他放下两个姑娘，看了看我，似乎要说他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不允许竟有人不知道谁是“金刚”。

“我是谁？哈哈，上校，大家都知道我是谁。我住在荷兰抵抗运动总部所在地——维托克城堡。”

说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好像觉得他的衬衣扣子要崩掉了。

“我是……是‘金刚’。”

“我只听说过一个‘金刚’，那只不过是个草包猩猩。”

周围的帮闲不怀好意地笑了。他那副可笑的丑相的确和电影上的同类一模一样。我本能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如果这个庞然大物用他的巨手把我抓住，会把我像干柴棍一样折断。幸好他没这样干，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意识到自己的权威，继续说：

“你不是正式毕业的荷兰上尉，无权佩戴这些星星。”

我猛地把他别在衣服上的星星扯了下来。

他顿时面无血色，惊慌失措。我的手紧紧握住口袋里的手枪。如果“金刚”由于自尊心受到侮辱而闹事，对我有对抗性的举动，我准备自卫。但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大“金刚”像受了责备的小学生，屈从地退缩了。他从惊惶中恢复了平静，说；

“我要对你这种态度提出正式控告，马上就去！”

他大踏步地走了，甩下两个舞女和一群追随者，他们对他的猝然离去感到莫名其妙。

## 三

这就是我同“金刚”的第一次会面。换个场合，我可能很愿意结识这位抵抗运动的伟大领袖，这位从盖世太保爪牙下拯救过无数难民，以非凡的勇气赴汤蹈火，并单枪匹马从德国警察的魔爪下逃出来的荷兰骄子。

如果他事先提出进集中营的要求，我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他，同他

对酌一番。但是，作为集中营的领导，我不能允许一个平民——不管他的名望有多大——损害我的权威或无视我的规定，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

回想一下这次会面，我觉得对这位不速之客有点缺乏礼貌。在大庭广众面前，我对他的态度未免太粗野。他的行为不好是事实，这可能因为他不了解军事条例。但我对他过分严厉，也是欠妥，或许比他更坏。

于是，一个奇怪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是一种可以点燃一系列联想的火星。为什么我对“金刚”那样不客气，而他却表现得唯唯诺诺？一个像他那样的彪形大汉，即使知道自己理亏，也一定会有所反应，特别是在一群追随者面前。但是，“金刚”却任人当众侮辱，唯一反应只是一句威胁性的话，然后就狼狈地溜之大吉。

他的举动令人奇怪，看来值得调查一番。

回到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我命令把助手叫来。这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什么都干过，在外籍军团当过军士，在丹吉尔[①]当过间谍。他有非凡的记忆力，对欧洲友军或敌军的特工人员了如指掌。

“告诉我，威廉，你了解那个外号叫‘金刚’的抵抗组织的头头吗？”

威廉想了一下说：

“他的真名叫克里斯琴·林德曼斯，在鹿特丹出生，是个汽车库主的儿子。当过拳击手、摔跤手，在格斗中打死过不少人。成打的姑娘承认是他的情妇。”威廉狡黠地笑了笑，补充说，“需要这些姑娘的地址吗？”

我摇摇头，表示对此不感兴趣。

“还有别的情况吗？”

“他们弟兄四人，都是抵抗运动的成员，他是老大。”

---

① 丹吉尔，摩洛哥北部古城，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湾口，战略要地。——译者注

“他的弟兄都死了吗？”

威廉也记不清了，走近档案柜，拿出一个大卷宗，翻了一会儿，说：

“没有！都活着。最小的一个弟弟和夜总会的一个叫薇罗妮卡的舞女一起被自卫队逮捕过。这个舞女是林德曼斯的女友，他们曾协助过飞行员逃跑。”

他又翻了一页，继续说：

“后来被释放了。”

“怎么？”

威廉耸耸肩说：

“这就是我们掌握的全部材料。而且也违反德国人的惯例，可这里就这样写着。”

“还有别的吗？”怀疑的念头在指使着我，疑团的轮廓正在形成。

“不久，林德曼斯本人在一次大搜查中也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肺部中了一弹。抵抗组织从监狱医院把他劫走了。”

“死了许多人吗？”

“冲锋队的一个卫兵死了，另外两个受了伤。抵抗组织的损失更惨。林德曼斯同三个人逃走，但另外四十七人却全部死了。他们从医院出来时中了埋伏。”

“德国人好像知道要去劫狱。”我慢吞吞地说。

威廉猜测着我的想法，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肯定地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

“这份文件我先借用一两天。”说着，我把手伸向放在面前的卷宗。如果运气好，我将为这份报告再增加一两页新材料。

第二天我动身去布鲁塞尔。

## 四

一到布鲁塞尔，我发现困难的不仅是寻找林德曼斯的熟人，最难办的却是摆脱那些自称是他的密友的人的纠缠。荷兰的民族英雄在比利时也是头面人物。许多人想借树乘凉，自称是他的密友。从这些自称密友的人那里听来的东西足可供我写一本书。但，我的希望是找到真正同他接触过，并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以便帮助我肯定或否定我对他形成的判断。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我约定同他在明星咖啡馆见面。

我们谈了许久。从他所做的介绍里，我肯定他的确很熟悉林德曼斯，并是他的战友。

“你就是那次袭击医院的幸存者吗？”

“不是！很遗憾，我没参加那次行动。我是差不多在一个月后才得到这枚‘战争勋章’的。”他摘下头上的脏帽子，骄傲地指着头顶上一块很明显的伤疤。

“差一点。”我看了看说。

他苦笑了一下说：

“如果再往下两厘米，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

“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们去炸一座桥。我正弯腰装导火线时，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我不知道纳粹怎样得知了我们的计划并设了埋伏。我突然中了一弹，倒在河里。幸好，我借此钻到水里，一直到湍急的河水把我冲到远离敌人视线以外的地方。我们的队长‘金刚’实在了不起，他终于逃了出来，可是其他人……”

他意味深长地耸耸肩。

“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武器？”我问，“机枪？”

这位憨厚的市民戴上那顶脏帽子，回答说：

“不是！奇怪得很，不是机枪。他们用的是步枪，把我们像靶子一样一个一个撂倒。我们全被击中。不算‘金刚’，一共八人。他没中弹！了不起的人！生下来就有护身符！”

“奇怪！”我平静地说道，“块头最大，却没被击中！”

“正是这样！个头比谁都大！但‘金刚’比别人更机灵！”

我的脑海里渐渐理出了个头绪。这个人以他的胆量、超人的气力和风流史成了荷兰爱国者的偶像和比利时的英雄。他是天生的领袖，曾给纳粹造成过巨大的损失，并为自己的国家屡次出生入死。但有四件奇怪的事却证明他并非如此。我当众侮辱了他，他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屈从，而完全不像一个无所畏惧的人；盖世太保释放了他的弟弟和女友，但盖世太保是从不放弃一个间接报复它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机会的；抵抗运动被出卖过两次，使德国人有充分的时间设置埋伏；在这两次行动中，唯一逃掉的便是作为领导人的“金刚”。尽管这些证据不足以下结论，但却也远远不是什么巧合。

我又为比利时人斟上酒。

“据说他很爱女色！……”

“是的，完全对！林德曼斯喜欢追求，没有一个姑娘能抗拒他的追求。只要他需要，她们甘愿奉送一切。据说，维托克城堡漂亮的女主人把家中所有的珠宝和纪念品都献给了‘金刚’领导的抵抗小组。”

他微笑了，似乎含有讽刺与宽容……

“据说他把那些珠宝转送给了布鲁塞尔的姑娘们。当然，这都是些流言飞语，但忌妒者的是非之言是最能损害他的声誉的！”

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结束了这次的会见。我立即来到拉肯附近的城堡，见到了女主人。寒暄之后，我们便谈到了林德曼斯。她的确把家中的珠宝献给了抵抗运动，但她坚持说这完全出于爱国主义。林德

曼斯是伟大的，但也有其弱点。这位伯爵夫人也怀疑林德曼斯占有了那些珠宝，而没有卖掉以支援抵抗运动。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夫人？”

“我并不想说他的坏话，因为，他是个伟人，为比利时做过许多事。但是，有一天，我在城里看到一个姑娘戴着我的项链。这不是个值得尊敬的女人，懂吗？项链是我母亲的，我觉得这种阶层的女人用它不合适。我还以为是抵抗组织把它卖掉来积累资金呢！我问她愿不愿意卖给我，但我没告诉她项链本来就是我的。她说是‘金刚’送给她的，还说，如果知道她卖掉，‘金刚’会把她掐死的。”

“她叫什么名字？”

伯爵夫人吸了口气说：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叫米姬·蔡丝特，另一个叫，请等一下……哦！对了，叫玛加丽塔·德尔登。这是当地两个有名的女人。”

幸好这时伯爵夫人没看我，否则，她肯定会发现我面部的奇特表情。这两个女人——米姬·蔡丝特和玛加丽塔·德尔登——是作为自卫队的两个女间谍登记在我的卡片中的。

情况一弄清，我便告辞，立即赶到布鲁塞尔。到达后，我马上给安特卫普挂了电话，同我的助手通了话。我要米姬·蔡丝特和玛加丽塔的地址，他当即告诉了我。

我同布鲁塞尔的荷兰秘密警察的两名保安人员立即找到第一个地址。我们去得太晚了，房间是空的。事后得知，米姬·蔡丝特已经逃往维也纳。

我们又乘车赶到玛加丽塔·德尔登的住处。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没带合适的工具，但这已不是讲礼貌的时候了。我们破门而入，进去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活着时一定很漂亮的玛加丽塔·德尔登已被毒药毁了容。她的脸色发青，紫色的嘴唇阴险地张着。她还在喘息，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了，连一句话也没说。

此案——我称之为林德曼斯案件——至关重要的证人中的两名应当从我的名单中抹掉了。一个及时外逃，另一个直到死仍然忠于她同其他女人一起侍奉过的男人。我们捡到了伯爵夫人的项链，但它也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安慰了。

我又在布鲁塞尔待了一天一夜，穿行在肮脏的小巷，出没于下等的咖啡馆，寻找关于林德曼斯更有力的材料。曾使我绞尽脑汁的许多情况逐渐集中了起来。大量事实证明，当林德曼斯的弟弟被自卫队逮捕时，他正负债累累。尽管声望不小，但那些借给他大宗钱款的小商人和社会平民都来对他进行威胁了。我还得知，舞女薇罗妮卡是“金刚”从小的朋友，她同他的弟弟是一起被逮捕的。尽管情夫有数不清的浪漫史和桃色纠葛，她却始终忠贞不渝，而他对她也是另眼相待。看来，纳粹是了解到了这一情况，所以也就既没敲断他们的腿，也没拔下他们的指甲留作纪念，就把他们释放了。对纳粹分子来说，这种怜悯是不正常的。

另一些事实证明，当林德曼斯的弟弟和薇罗妮卡获释时，“金刚”突然发了横财，同时，他对德国人的鲁莽的袭击也越来越频繁。计划一次比一次大胆，代价也大得可怕。而这位英雄的领袖却总是安然无恙；然而，奇怪的是叛徒从来也没找到过。自愿投奔“金刚”的人不计其数，他们认为死在他的身边也是光荣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金刚”显赫的声誉从来没有人产生过怀疑，幸存者仍然不遗余力地赞扬他们领导的胆识。

他总能躲过敌人的枪林弹雨，这一点迟早要引起人们的怀疑，然而，他那不断膨胀的声誉无可争辩地掩盖了对他的怀疑。这个被无数女性热恋的、摇头晃脑的庞然大物，在那些不了解他的人眼中，总是个高人一头、无往而不胜的人物。他是真正的英雄，这位传奇式的领袖的一个微笑或一个友好的表示能使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去担风冒险。

但是，他的确被德国警察打伤过。一颗子弹曾穿过他的肺部。一

想到这一事实，我就感到迷惑。有时我想，我是否在武断地判断一个无辜者，尽管许多事实表明他不是无辜的。在荷兰的纳粹秘密特务头子，大腹便便的施特劳赫先生，决不会为了消除对他的无根据的怀疑，而拿一个这样有价值的间谍的命来冒险。

我一小时一小时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

一切迹象都是否定林德曼斯的，只有那处伤口对他有利。突然，一颗火星在我的脑海闪过。

我开始对链条的每一环进行思考，想到了伯爵夫人讲起米姬·蔡丝特和玛加丽塔·德尔登时的情形。尽管我就在她们所住的布鲁塞尔，但我不得不打电话向安特卫普了解她们的住址。保安处不知道，荷兰特工总部也不知道，只有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了解。我们同是一个阵营，为共同的事业而斗争，但我们并没把调查深入下去。总是存在着一种敌对情绪，一种损害共同利益的可笑的醋意。尽管目的是同一个，但这些愚蠢的分歧却妨碍了工作的进展。

人的本性是相同的。类似的分歧也同样存在于德国的三个特务机构中：盖世太保（冲锋队保安警察），自卫队（反间谍组织），安全部（德国治安警察）。如果真如我所怀疑的那样，林德曼斯是自卫队豢养的叛徒（他经常光顾的两个女人也属于自卫队），盖世太保和安全部很可能根本不认识他，把他打伤之后，才发现是自己的盟友。

如果我的观点成立，林德曼斯应当为自己的枪伤感到庆幸，这一事实对任何指控他是叛徒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辟谣声明。由于这种可笑的运气，使他可以把戏继续演下去，继续背叛和出卖无数英国和比利时的特工人员。

我的怀疑论据充分，为了加以肯定，我提出对他传讯。我给设在维托克的抵抗运动总部捎了个口信，林德曼斯肯定在那里对我的不文雅的举动大发牢骚。其实，这是完全无用的。我的口信只说我想再和他见一面，但没透露他使我感兴趣的原因。作为抵抗运动有名望的领

袖，林德曼斯自然有许多有影响的朋友，我决不会拿自己的计划去冒险。我只请他第二天十点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官员下榻的布鲁塞尔宫廷饭店。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赴约。这是个恬静、温和、阳光明媚的早晨。但战争并未远离，在这座豪华的大饭店里，到处可见战争过后的劫痕。在一个宫殿式的大厅里，布鲁塞尔的社会名流享用的舒适家具被粗制的桌椅所代替，显出一副惨淡的景象。时钟的指针指向十一点，林德曼斯没有来。他的迟到并未使我不安，“金刚”不会不来的。不用说，他是要我等一会儿。我一面检查我的瓦尔特手枪，一面思考着马上就要向他提出的问题。“金刚”并不知道这次会面对他生死攸关，而我则很清楚。在体力上同他相比，我简直不过是一把稻草。当然，我不会赤手空拳，冒生命危险去和他进行自杀性质的格斗。百老汇的作家丹蒙·鲁尼恩不是曾把自动手枪描写成古老的挖土机吗？我是一名优秀射手，可以说颇有名声。不管怎样，如果“金刚”不服判而动武，他这样一个巨型靶子我是不会打空的。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林德曼斯仍然没来。他也许要以迟到十分钟、十五分钟，甚至半小时来为他在安特卫普受到屈辱的自尊心进行报复。但是，当听到十二点的钟声时，我开始对他的傲慢产生了怀疑。难道是他的骄傲或依仗有权势的朋友使他违抗这一特殊命令？

我等了差不多两小时，才知道他不来的原因。两个年轻的荷兰上尉专程来到饭店，从他们佩戴的徽章看，估计他们是荷兰总部的军官。他们径直走到我的桌前，同声向我问候。其中一个问道：

“你是否在等林德曼斯？”

“对，正是！我已等了他近两小时。”

“很遗憾，林德曼斯来不成了，他另有任务。”

“任务？什么任务？”血液开始在我的血管里沸腾，但我不想让

年轻的上尉发觉我的愤怒。

他们站得更直了，用一种屈从恭敬的声调说：

“林德曼斯今天上午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我的喉咙哽咽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我相信，若能同他见这一面，即使在当时抓不住他的确凿罪证，林德曼斯的危险活动也该结束了。而现在，他不仅在嘲笑我，还很可能在把另一些重要人物引入陷阱。

“他同国内自由力量一起去的吗？”我问。

他们以那种掌握了某种机密的人共有的傲慢神态回答说：

“不，不是，先生！他同加拿大反间谍局的代表去执行特殊任务。但我们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任务。”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加拿大人需要一个能够秘密进入仍被德国人控制的埃因霍温，同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的荷兰人。这位使者的任务是通知抵抗运动领导人，一支庞大的伞兵部队将在 9 月 17 日降落。他必须在指定地点附近集结自己的人员，以便协助伞兵制造一个混乱局面。加拿大人来到荷兰总部，总部立即想到了林德曼斯，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人选正是我所怀疑的一个叛徒。加拿大人是无可怪罪的，尽管他们也知道林德曼斯的放荡生活和神出鬼没的冒险史。但这个明显的事实在短短几天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把这一使命交给林德曼斯，有如让 BBC 电台广播伞兵降落的消息。

然而，这一军事行动我事先并不知道。知道后，我唯一的希望——可悲的希望——是这次冒险不要牺牲过多的生命。对于我这个预感到失败在所难免的人来说，除了正式通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外，已别无良方了。

## 五

三天后发生的事已经名闻世界，我也就无须细讲了。9 月 17 日凌

晨，进行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次空降。英国空降第一师的一万人在阿纳姆降落；同时，二万美国伞兵和三千波兰伞兵在格雷夫和内伊梅根降落。伞兵的任务是在马斯运河、瓦斯河以及下莱茵河上建立桥头堡。与此同时，陆战部队沿大陆前进，同伞兵前哨部队会师后，一起渡河。在密码中，这次行动被称为“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是大胆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不能在敌后突然集结部队。如果当地的德国人被这一突然举动打得措手不及，毫无疑问，他们要组织反击得需要几天的时间。而那时候，大股部队已经出发，伞兵得到弹药补充，完全可以支撑几天，最后取得辉煌的胜利。

一切好像在按计划进行。16 日凌晨，飞机侦察证实，阿纳姆的德军一切如常。但是，当天夜里，德国的坦克部队就悄然而至，占据了战略点。

第二天早晨，伞兵自灰蒙蒙的天空降落，敌人已在等待他们了。从一开始，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妙，但大家却认为德国人在这个没有任何集结先兆的地方集结部队纯属偶然。

在整整九天的时间里，伞兵同把包围圈超缩越小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在日趋紧缩的包围圈里，弹药、给养越来越困难了。这一被称为“阿纳姆红色魔鬼”英雄战役的两千四百名幸存者艰难地打开了一条通往瓦斯河方向的退路，抛下了七千具尸体。这次大胆的袭击失败了，蒙哥马利早已预感到他生平遭到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惨败。战争还要延续八个月，死亡与破坏的八个月。随着冬季的来临，水闸毁坏了，大水淹没了田野。大约二十万荷兰人丧失了生命，一部分死于洪水，一部分死于饥饿。然而，我却是唯一一个对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产生怀疑的人。但是，人们都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偶然”，什么“运气不好”等。我本人完全确信林德曼斯是个叛徒。当我得知“金刚”为加拿大人执行的任务时，我把各种事件联系了起来，肯定了过去的设想完全是对的。

# 六

当时，我正在处理几件疑难案子，但林德曼斯之案一直活跃在我的脑海里。可以肯定，我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引起了他们对议论纷纷的林德曼斯案件的较大注意。特工工作千头万绪，这一案件仅是其中之一。上级只是了解那些正式上报的案件，对我的猜测，他们肯定会认为是夸大其词。怀疑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忠诚不仅荒谬，也是居心不良。

这种严厉的指控会引起政治和外交的纠葛。在战争中，任何战士也不想承担这种责任。大家总是本能地尽量忘却这种惨痛的事件；即使对他的真实性确信无疑，仍不免把问题的严重性由大化小，从而，对所发生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反间谍处有个同事，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后来，他在政界做过出色的贡献。只要遇到他，我总要向他提及林德曼斯。我发现，我的谈话虽使他感兴趣，但总打动不了他。如果一个聪明绝伦、深知反间谍工作的人对我的论证都不感兴趣，也就不可能指望得到被无数紧急事务搞得焦头烂额的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任何人的支持了。

六周过去了，我打算逮捕林德曼斯的努力仍是毫无结果。到那时，我还没掌握关于他的真凭实据。但是，在一天夜里，我的怀疑被全部地，相当戏剧性地证实了。

尽管在阿纳姆遭到惨败，但盟军仍在缓慢地向前推进，继续收复着失地。当时，我在刚被盟军解放了的埃因霍温，历时近三小时的一次审讯结束了。如刚才所说，我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连一辆车也没有。我的工作没完没了，既是审讯人，又是法官和监狱看守。

我审讯的是一个荷兰青年，叫科尼利斯·维洛普。他供认自己是

间谍，恐惧使他不停地发抖。

我慢慢地站起来，弹掉军服上的烟灰。荷兰青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他忐忑不安地问：

“我会被判死刑吗？”

我耸耸肩，什么也没回答。一旦承认是间谍，就要被处决。

“我的妻子在阿姆斯特丹，上校。她是荷兰人，清白无辜，我发誓！”

“我们并没有想处决你的妻子，我们不会像你的主子德国人那样干。”

绝望的荷兰青年又变换了手法：

“如果能让我活下去，我将向你提供重要情报。”

“可怜虫！临死前，你要主动提供我们需要的一切，而不是被迫！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他狡猾地淡淡一笑。

“你们可以强迫我说出你们认为我知道的事情，但是，你们不知道的就无法办了。”

“那么，年轻的哲学家，你知道什么呢？”

我的声调是蔑视的。维洛普紧抱双臂，俯身在桌上，努力地回忆着。他一个一个地说出荷兰反间谍组织里所有人员的名字，参谋部的军官可能对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的身份还搞不清楚，维洛普却熟悉每个人。

“布鲁塞尔的主要反间谍人员是保罗·洛伊文，阿姆斯特丹的是个叫达姆布雷尼的人和……”他坐在我面前，把我们在比利时和荷兰间谍网所有的人员都说了出来。

我内心深处为我们在德占区工作的间谍感到羞愧。这个叛徒知道的已经这样多，他的主子知道的就更多了。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缓和，装出一副十分平静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的这一切？”

维洛普在寻找着每一个微小的时机，慢慢地，一丝希望在他的血

管里出现了。

“我从自卫队和德里贝根司令部的克塞维特上校那里知道的。谁告诉克塞维特上校的，我不说，这是我的秘密。想做笔交易吗？”

我深为蔑视，简直是厌恶，人竟能堕落到如此地步。有人像关在笼子里的耗子一样为活命而挣扎，为了活命，可以出卖祖国和朋友。维洛普的交易是肮脏的、可悲的。无人帮我的忙，也没有车，我不得不陪同维洛普步行去监狱。监狱在城市的另一边，夜又是那样黑，我真担心他会趁黑夜逃跑。我拿出手枪，恶狠狠地看着他。

“好吧，维洛普，你说的不少了。你是个叛徒，同我搞任何交易都无济于事。你的纳粹朋友已经制定了规则，我们还是遵守它吧。是谁告诉克塞维特上校的？”

“这要以保证我的生命为条件，先生……”

他做了个绝望的表示，我用手枪立即对准了他。

“站起来！”我厉声说。

如果他能再考虑一夜，一定会恢复理智的。但是，维洛普错误地估计了我的举动，以为我是要枪毙他，于是叫道：

“等一等，我全说。是克里斯琴·林德曼斯，是‘金刚’，是他把这一切提供给克塞维特上校的。”

## 七

我对林德曼斯怀疑的链条的最后一环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我逼近一步，用手枪对准脸色更加苍白、直咽唾沫的维洛普。

“是‘金刚’出卖了阿纳姆吗？”

维洛普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回答说：

“是的，是他在 9 月 15 日去自卫队总部把英美部队的空降行动告诉了克塞维特上校。”

“说在什么地方了吗？”

“说了！他说星期日一个师的英国军队在埃因霍温附近空降。”

我放下手枪，注视着卑鄙的维洛普。这个胆小鬼在同我的意志较量中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他弄不清我的态度的含义，扑倒在我的脚前。

“我现在什么都说了，可以不杀我了，不是吗？”

“是的，我本人是不杀你了，但我不知道军队将如何处理，你的运气好坏要由军事法庭决定。起来走吧！”

实践告诉我，对反间谍工作来说，激动是个极大的危险，但我已难以抑制了。愤怒使我全身颤栗，我气得许久说不出话来。尽管我一再提出警告，“金刚”还是得到了一切权力，并利用它给盟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一直怀疑林德曼斯，现在，多亏叛徒维洛普，我确信我的怀疑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然而，太晚了！阿纳姆的悲剧已经发生。只是他的叛变活动现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把维洛普一关起来，我便忿忿地到了荷兰总部所在地——反间谍机关就设在那里——突然出现在军官中间。看到我的同胞们坐在舒适的软椅里，喝着威士忌，沉醉在收音机正在播送的一首小夜曲里，我感到怒不可遏。在盛怒之下，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个朋友看了看我，说：

“怎么啦，平托！你的脸白得像纸！”

这一亲切问话像一滴水，使一杯饱和的水四溢了。

“停止这鬼音乐！”我敲着桌子喊道。

大家惊异地望着我，关了收音机。面对这群目瞪口呆的人，我甚至感到憎恨。我愤怒地大喊：

“上帝！现在你们该懂啦，当我怀疑一个人时，总是有原因的。现在怎么办？你们把他派到了敌人后方，传达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你在说什么？”有人问。

“林德曼斯！‘金刚’！你们应当马上去两个人，到维托克逮捕他！”

“逮捕林德曼斯！你疯了！他一下子能消灭几个。他时刻都是武装到牙齿的！逮捕他等于自杀！”

一个年长的军官问：

“平托，逮捕林德曼斯的理由是什么？你想，这一丑闻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把知道的情况很快地讲了一遍。我的表情证实我的话是诚恳的，但逮捕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急中生智，办法想出来了。

“有了！”我大声说，“你们两人（我指着其中的两人）去维托克找林德曼斯。告诉他，我们要表彰他的卓越工作，给他授勋，以取得他的欢心。然后，说服他离开放武器的地方，穿上干净的衣服，梳齐头发。我通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派十个身强力壮的军警去那里等候。当他准备出发时，进去把他逮捕，懂吗？”

两位军官笑了笑，出发了。

这一小小的计谋成功了。傲慢的林德曼斯没有拒绝对他的授勋允诺，他像个羔羊一样答应不带任何武器，稍加整理，便神气地向准备好的大厅走去。

以“金刚”为前导的“仪仗队”走进大厅，接受嘉奖。授奖者是十名警察。经过一番搏斗，终于制服了他。

在全荷兰竟找不到适合这位巨人手腕的手铐，只有用钢绳将他的双手捆住。我命令把他的双脚也捆上。在飞往英国的途中，这个被激怒的庞然大物完全可能把驾驶舱打破，在自尊心的驱使下，纵身跳入茫茫太空。

过了拉芒什海峡，林德曼斯被带到一个私人宅第，这里住着反间谍机构最出色、最机敏的审讯人员。他们不用任何刑罚，可以得到理想的口供。他们具有打动嫌疑犯心理的非凡力量，他们的雄辩术可以

征服任何意志最顽强的人。对林德曼斯的审讯进行了两个星期。

他的双手由伦敦警察厅特制的手铐紧紧锁着，回到了荷兰，关在布雷达监狱。我把他一直送进牢房，并趁此机会仔细观察了他一番。他已经不是过去那种趾高气扬、令人生畏的样子了：在他那巨大的身躯上，没有任何遭受暴力的标记，也没有皮下注射针头的痕迹。他的双眼低垂，但好像不是因为惊恐，也不是由于几夜不眠。二十四页蝇头小字的一份报告记录着他的叛变经过。

没施加任何体刑，反间谍人员取得了“金刚”的全部口供。我把报告带回办公室，详细研究。它比任何一个警察局的任何一个案件都更加动人，而且，在文件上看到自己所怀疑的东西被证实，也是件惬意的事。林德曼斯的叛变活动开始于1943年。那时，他作为荷兰国内自由力量抵抗组织的主要成员已经颇有名声了。他是女性的征服者、宠儿，而且放纵无度。他那可怜的财富不足以馈赠为数众多的情妇，于是就想了个巧妙的计划，弥补这一不足。他动员那些被他的外表所诱惑的有钱的妇女捐献首饰，为抵抗运动筹集资金。他说用这些钱帮助他的同伴从比利时和荷兰逃往法国，再由法国去葡萄牙。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有朋友或亲属正在集中营受难，或者她们自己的华丽的房屋被德国军官占领，所以无不为能向抵抗运动的“英雄”们提供帮助而感到自豪。

林德曼斯把首饰卖掉，但所得的钱从未做过抵抗运动的资金，而是消耗在酒店、无节制的放荡或收费高昂的姑娘身上。卖不掉的就作为礼品赠送给了情妇，并说是从德国人手里弄来的。

直到那时，他还只是有些越轨行为，仍是个诚实的公民。他可能还不知道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往泥潭的道路。他的勾当迟早会暴露，除非他能为抵抗运动筹集到大量的资金。

他的这种生活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一两个领导人的怀疑。在被占领的欧洲，老老实实地一下子搞到大宗钱财是不容易的。做贼心虚的

林德曼斯开始寻找一种掩盖自己骗局的方法，而不影响其奢侈的生活。

1944 年 2 月，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在搜查一个逃亡者的避难所时，他的小弟弟和舞女薇罗妮卡被捕了。在他的历险生涯中，情妇是无数的，有时候，一夜就三四个，然而，这位征服者对薇罗妮卡却颇有些忠诚的情感。他虽多次离开过她，但还是要来找她。除了自己之外，巨人林德曼斯只有一个爱人，这就是薇罗妮卡。

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比自己最心爱的人落到像纳粹这样的刽子手的魔掌中，而又无能为力更惨的事了。这种感情在抵抗运动的成员中是屡见不鲜的，但他们咬紧牙关，进行残酷的报复。真正的抵抗者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草率行动，置他人的生命于危险境地。

十天之后，林德曼斯证明自己较之那些不知名的同伴要软弱得多，他在精神上屈服了。他为薇罗妮卡和弟弟的命运担忧，为经济所困扰，决定同敌人进行交易了。

他了解到两个住在布鲁塞尔、为德国人豢养的荷兰人，一个叫安东尼·达曼，另一个叫科尼利斯·维洛普——我在埃因霍温的"老朋友"。在布鲁塞尔罗吉尔广场大陆饭店的咖啡馆里，他同德国人进行了秘密接触。林德曼斯呷着咖啡，答应为德国人效劳，条件是：(1) 立即释放薇罗妮卡和年轻的弟弟；(2) 巨额的报酬。

维洛普立即去同自卫队的头子吉斯克斯谈判，吉斯克斯马上看到了这笔交易的利益所在。用两条沙丁鱼换一条鲸鱼是笔不亏本的买卖。两天后，吉斯克斯约定同林德曼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黑暗旮旯秘密会面。他们谈了很久，最后达成了协议。第二天，薇罗妮卡和小林德曼斯获释。他们被迫在文件上签字，证明受到了优待。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们恢复了失去的自由。他们沉醉于自由的狂欢之中，而没想到一系列的事件便由此发生了，使得鹿特丹二万五千市民在第二年那个"黑暗的冬天"饿死。

好长一段时间，"金刚"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交易的成果。他把第

一笔报酬挥霍在变本加厉、令人作呕的穷奢极欲上。

正如我所估计的，由于矛盾，或由于不愿将如此重要的秘密传出去，自卫队没有通知其他警察机构——特别是盖世太保——关于林德曼斯在为他们效劳的事。

一天，盖世太保命令在鹿特丹进行大搜查。他们持枪闯入一群抵抗者集会的地方，林德曼斯也在内。真是个尴尬的时刻。怎么能在荷兰同伴面前暴露自己是叛徒？或者就豁出去，听任被自己的主子打倒在地？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采取了胆小鬼惯用的方法。他做了个暗示，德国警察明白了林德曼斯是自己人。但是，没等头目下达不要射击的命令，他已经被瞄准了，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肺部。

他立即被送进盖世太保的医院，误会解除了。普通人是经受不住这种伤的，由于其非凡的体力，“金刚”闯过了危险期，三周后，进入了恢复期。自卫队的头头去医院探望他，同他商定了“逃跑”计划。在和同伴接头时，林德曼斯却在暗暗地为自卫队筹划着。他制定了一个连德国上校也感到吃惊的阴险计划。他建议抵抗组织从医院把他劫走，同时设下埋伏，把他们残酷杀死，自己却逃跑。计划执行了，而且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多么不幸！四十七个抵抗者在拯救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领导时中了埋伏，被血腥地残杀了。

由于出卖抵抗运动，林德曼斯连续几个月得到德国人的赏赐。在比利时德占区工作的一个英国小组被捕，投到斯赫维宁根监狱。他们受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折磨，直到死神将他们带走。海牙附近的斯赫维宁根监狱有个设备齐全的刑讯室，那儿的刑具把我们的先辈变成了儿童玩具。例如：刽子手把一个钢盔戴在受害者头上，钢盔里满布螺丝钉，把受害者的头颅和眼睛钉住，然后通上电流，直接刺激中枢神经，巨大的电击使人疼痛难忍。德国人仓皇逃跑时，没来得及带走这些刑具，这些东西便成了迫害者残暴罪行的证据。当亲眼看到只有那些精神变态者才能想出来的玩意时，我坦率地承认，我感到血管里

的血液凝结了。然而，林德曼斯却因不堪忍受弟弟和情人身陷囹圄的精神压力，肆无忌惮地出卖了成百名抵抗运动的同伴，将他们奉送给刽子手，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金钱。

我读完了名单，其中许多是我的朋友和相识。我被愤怒所冲动，发誓要让林德曼斯以他的鲜血偿还罪孽。

出卖阿纳姆是林德曼斯叛徒生涯的顶点。他在一瞬间嗅到了这一良好时机。他在埃因霍温完成了加拿大第一军交给他的使命。但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抵抗运动负责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怀疑他，并命令逮捕他。（具有绝妙讽刺意味的是，加拿大人竟派了一个特工人员保护他，确保他的人身安全，直至他把情报送到埃因霍温抵抗组织的领导人手里。）但这并未能阻止他的背叛活动。在发动攻击的前两天，即 9 月 15 日，他同自卫队的克塞维特上校在德里贝根会了面，透露了掌握的全部秘密。当然，林德曼斯并没提到阿纳姆，所以，荷兰报界想为他的罪责开脱，宣称他不可能出卖阿纳姆，因为他不知道确切的降落地点。

这种论据实在幼稚到了极点。林德曼斯也许没提到阿纳姆这个名字，但他告诉了克塞维特上校空降地点是在埃因霍温北部。在他签名的交代材料上，他也承认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大规模的空降总是以占领和保持战略据点为目的的。一般说来，伞兵是军队的精华，不可能数量少，而又分散。狡猾的德国人只要在地图上看一眼，便可懂得“埃因霍温北部”意味着什么。空旷的田野决成不了军事目标！但是，如果伞兵部队占据了格雷夫、内伊梅根和阿纳姆的大桥，并坚持到陆战部队的到达，这样就打开了一个通往德国心脏地带的缺口。

决不能把林德曼斯的卑鄙当做幼稚。在他向克塞维特上校透露伞兵将在“埃因霍温北部”降落后的两天，阿纳姆之战便被出卖了。

## 八

发誓判决林德曼斯和兑现这一誓言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是只身一人独立工作，连一辆专车也没有。对林德曼斯的指控使荷兰军界许多人颇为不满，这些人通过林德曼斯得到过好处，所以不愿让世人知道他们短浅的目光。另一些人认为被荷兰人所崇敬的一个抵抗运动的成员成为叛徒有损荷兰军队的声望。这是个相当微妙的案件，牵涉到一些颇为棘手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但是，这一切毕竟都是事实！所以，我还是被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召去，受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亲自嘉奖，他祝贺我取得的这一成绩。

1944 年圣诞节，我病倒了，领导批准我休假三个月。这时，英国报刊登载了秘密监禁林德曼斯的消息。那时，他正被关在布雷达。他在伦敦的短期逗留不知怎么也传了出去，还谣传说一个荷兰军官在伦敦塔被秘密逮捕。这些浪漫故事成了那些专门猎奇的报纸的大标题。我要求设在伦敦的荷兰政府派代表去新闻检查局，制止刊登关于林德曼斯的消息，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他们接受了我的要求，记者们也以特有的敏感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1944 年圣诞节，我的神经衰弱大发作，全休了整整三个月，连被严严地关在布雷达的林德曼斯也扔到了一边。

1945 年 6 月，我又重新办理此案。我首先命令把林德曼斯从布雷达监狱转到“奥伦治饭店”，这是斯赫维宁根监狱的一部分。被他无耻出卖的许多朋友中的一个也曾被关押在他所在的牢房。林德曼斯深知司法处理的时刻快到了。

由于孤独，由于他偷香窃玉的习性受到强制性的节制，由于自尊心和傲慢受到压抑，一个大名鼎鼎的汉子很快变成了一个弯腰驼背、唯命是从的人。他几乎很少进食，人越来越短，由于缺乏运动，他那

结实的肌肉松弛了。尽管个子很高，衣服却耷拉着，活像个稻草人。头发斑白，眼睛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我每次去，他都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在地上扭动着身子，口鼻冒白沫，大声叫着："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

他等着什么样的怜悯呢？为了钱，他出卖了自己的同伴，导致了阿纳姆的惨败和七千生灵的死亡，使战争延长了差不多六个月。他根本不可能忍受被他出卖的同伴所受的遭遇，也未曾像他们一样受过德国人施加的长期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折磨。这样一个人只能引起人的鄙视。我希望他尽快受到严厉惩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那时，我仍在荷兰反间谍处工作，希望立即着手处理林德曼斯之案，进行判决。总部保管文件的单位是严密看守的，只有上级军官才能入内。取走文件需要登记，负责人要在卡片上签字。身份证也是控制的。整个建筑物被警察四周重重把守。我从未见过这样严密的安全措施。

尽管看守如此严密，里面却找不到林德曼斯的卷宗。原来的地方没有，我把文件柜仔细翻了一遍，仍没找到。我查看了总目录，看是否我不在期间换了地方，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卡片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

我恼怒地提出质问，最后才知道，他的档案在前几天被一个高级军官取走了。我对该军官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最后他说只是取来参考一下，并说看完后立即交给了另一个高级军官。我又找到第二个军官，他显得张皇失措，说从未见过林德曼斯的档案。第一个军官得知此事感到惊讶，他肯定地说第二个军官是在某日某时取走了档案。

此案到此告一段落。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关于林德曼斯案件的一张纸。

## 九

1945 年 10 月，由于我不断呼吁对林德曼斯进行判决，突然被调动了工作：晋升一级，派往德国。

这次调动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我曾在私下同朋友们谈及此事。俗话说，谁想杀死自己的狗，就说它得了狂犬病。自从我指控了“金刚”，我料定他们会重新给我安排工作。

我毫不为所做的事感到遗憾。我热爱故乡胜似爱自己的生命。但我总想，一个民族应当勇于正视真理，即使这个真理对它是不利的。至今许多荷兰人还不知道阿纳姆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是时机不好，运气不佳，或说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执行了一个条件不成熟的计划。他们哪里知道，在战斗打响前，他们的一个同胞就出卖了他们。好像林德曼斯在监狱关得越久——看来是无期的——人们就越不会了解真相似的。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污泥下沉，表面显得干净了。但是，1946 年 5 月，当我确信再也不会听到关于林德曼斯之案的议论时，一起不寻常的事件发生了。报界无须再保密，战争结束已经一年了。

一贯维护平民、抨击官方的报纸开始刊登文章，质问出卖阿纳姆的荷兰军官和伦敦塔的俘虏到底怎样了。

这一强大的舆论连续了几天。欧洲的报纸，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一致要求澄清。大家都在关心着同一个问题：这个荷兰军官十八个月以前就已被捕，判决了吗？如果判了，内容是什么？如果没有判，为什么拖延这么长时间？在这一连串的质问下，荷兰政府的回答只有一个：1946 年 6 月，一个特别法庭将对被指控犯有叛变罪的克里斯琴·林德曼斯进行判决。

从那时起，关于林德曼斯的消息，我只能听荷兰政府官方的宣传

和一些谣传。因为我已不在荷兰，对第二手的材料也应满足了。

如果真理的标准之一意味着“比臆造还离奇”，那么官方的言论也就堪称真实了。因为事实无法核对，也就不得不相信它了。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许多质问都毫无回音。

斯赫维宁根监狱是荷兰最大的、曾被纳粹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无数惨遭毒刑的荷兰爱国者死于高墙围绕的牢房。当盟军把德国人赶走后，可怜的幸存者无法转移到别处，于是，在监狱里设了个医院。只有大楼的一翼保留了原来的用途，里面关押着叛徒、内奸和间谍。克里斯琴·林德曼斯也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的关押把林德曼斯搞瘦了，打了褶的皮肤沿着巨型骨架耷拉着，他已经半身瘫痪。医生以为他得了肺痨，把他送往疗养室。荷兰的监狱医院不用女护士，护理工作由男人担任。由于斯赫维宁根由监狱变成了医院，这项严格的规定也被废除了。林德曼斯已不是富有魅力的健儿，不是像唐璜那样的征服者了。然而，好像为了卫护官方宣传的声誉，林德曼斯并没失去男性诱惑力，一个女护士爱上了他。

他们的相识可能是在林德曼斯还能每只手举起一个人，并把两者的脑袋相互撞击致死的时候，是在被灌得酩酊大醉的同伴个个瘫倒在地，而他却能每夜绰绰有余地对付三四个姑娘的时候；也可能是由于敬慕这位抵抗者的大名,或是不相信对他的指控。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从没弄清过这些原因——她帮助他逃脱了对他的判决。

林德曼斯关在一个外面上锁的单人牢房，狭小牢房里的光线是从一个小木窗射进来的。牢房在楼的顶层，逃跑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尤其对一个半身瘫痪的人来说。据官方的宣传说，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险些获得成功。护士巧妙地把窗棂锯得从外面无法发现，而从里面稍一用劲就能打破。

护士还有一个帮凶，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说中所说的“会唱歌的耗子”，她负责在大门放风。在计划的整个执行过程中，竟无一人发觉。

这样的事若发生在普通的医院已经是够惊人的了，发生在监狱医院就更是不可思议了。

计划的第二步比第一步更困难。取掉窗棂是轻而易举的，问题是林德曼斯如何下来。牢房是在最高层，没有任何突出物或管道可用来抓蹬。于是，“会唱歌的耗子”弄来一条长长的浇水用的水龙带，把它紧紧固定在林德曼斯隔壁牢房的窗户上。只要犯人从窗台抓住橡皮管，便可一直滑到地下。

如果在林德曼斯身体相当健康时，这个计划是不难实现的，但这时的林德曼斯已是四肢无力，骨瘦如柴，半身瘫痪。尽管这样，他还是扮演了杂技演员的角色，趁着夜色朦胧，像房上的耗子一样跳出了樊笼。

据官方说，他冒险下跳，但过大的声响惊动了哨兵。几分钟后，他又被关进了牢房。

如果犯人在第三者的帮助下逃跑，这些第三者们一定要归案严惩。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发现忠心耿耿的护士卷入了夭折的逃跑计划。即使不追究她的过失，为了慎重，也应调换她的工作，由另外的护士护理林德曼斯，然而，却没有这样做。他们说了一条什么理由，我始终也没弄懂。护士没受到指责，也没丢掉原来的工作。

判决的日子临近了。全世界马上就要知道林德曼斯是个叛徒，偶像即将倒地。但是，命运或者人们自己（谁知道呢？）改变了他的结局。判决的前两天，当大夫例行查房时，发现林德曼斯躺在地上，已经死了。护士趴在他身上，尚还活着。人们立即把她送走，给她灌服了大量催吐剂。当她醒来时，交代说给林德曼斯服了八十片阿斯匹林，她自己也这样做了。他们约定，发誓死在一起。

这一死，叛徒逃脱了判决。但是，为什么护士能一直伴随他至死？她的罪责是严重的，她是自杀的帮凶，又寻死未遂。总之，她是杀人犯。然而，她不但没受到审判，还在荷兰得到了一个官方的工作。为什么？

我不想作任何回答。

科尼利斯·维洛普，这个承认是林德曼斯同谋的叛徒，没在任何法庭露过面，也没受到任何指控。我从另外的渠道得知，他还代表荷兰政府在德国担任着重要工作。一个叛徒受到那样大的奖励是很奇怪的，我很难相信这一事实的真实性。

审判林德曼斯的特别法庭解散了，几家荷兰报纸公布了“金刚”的死讯，这一案子也就算正式了结。

林德曼斯这个胆怯的、被人收买的叛徒，在女性的配合下，逃脱了公开的审判，然而，也正是由于女性他才被捕的。如果他不把两个女人带到安特卫普，也就不会有人对他产生怀疑了。

我曾遇到过许多叛徒，但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令人深恶痛绝。他不仅要为战争最后的六个月担负责任，而且阿纳姆“七千红色魔鬼”之死，他的战友们之死，被他出卖的、被可怕的折磨致死的所有特工人员也要直接或间接地算到他的账上。谁也没有从官方了解到他的叛变，然而，他的叛变却把他的美名一笔勾销了。

当报界准备把林德曼斯的生平和死亡消息公布于众时，荷兰政府的一个代表来找我，他希望我能声明“金刚”不是阿纳姆的叛徒。然而，我认为林德曼斯绝不是个“迷途的孩子”，不是个无辜者，而是一个为了满足个人肮脏的欲望、出卖有价值的机密情报的卑鄙的叛徒。这是我第一次广泛而深入地透露了这些事实。我保留评论官方宣传的权利。读者可以自己去分析事实，得出结论。

# 第五章　健忘的朋友

1944 年底前后，荷兰反间谍总部迁至阿纳姆西南大约五十英里的埃因霍温。由于空军受挫和冬季来临，盟军的前进速度放慢了，直截了当地说也好，转弯抹角地说也好，前线实际上是冻结了。先头部队的进军遇到很大的困难，荷兰人民只好耐心地等待着解放。虽然攻势基本上停止了，但是，为数众多的荷兰爱国者在德军占领区自发地采取了行动。有时，一天能有六十或更多的人越过德军防线，穿过无人区，投奔英国或美国军队的前哨。逃出来的人必须经我的小组审查，由我亲自加以审讯。这些人当时被称为“越界者”。

他们到达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得到一份热饭，然后就被带去进行详细审问。反对这一规定的人不多，对那些为了盟国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来说，接受审问的确算不了什么。我向他们解释这是我的任务。这是一项需要极大的耐心的工作。虽然大家对德国人的活动和防线都有所了解，但是，重要情报的取得必须通过反复的盘问才能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恰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所缺乏的组成部分。

此外，德国的间谍机构仍在高效率地工作着，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那些出生入死的真正爱国志士中间安插一个间谍是毫不费事的。在战争初期的重重困难情况下，德国统帅部曾几次企图把间谍打入英国，现在，他们当然不会放过眼下这一大好时机。

审查一个“越界者”和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并不难。在黑暗中越

过敌人防线的人所带的东西是很少的。此外，在一个被敌人占领了四年之久的地区，人们的财物也所剩无几了。

我的办公制度是：只要一个助手；我们两人中，一人去张罗难民的伙食时，另一人就去了解他们的诸如姓名、住址等情况。然后，让“越界者”把自己的口袋掏空，所有的东西经过清点，分别包好，并标上物主的名字，发给一张收条。难民休息时，我们就打开包裹，把东西摊摆在桌子上，逐一检查。必要时，甚至要用显微镜。

书籍也要认真检查，因为里面可能藏有收报人姓名和住址的密码符号。自来水笔一律拆开，看是否有伪装的微型照相机，如此等等。从一开始干这一行，我就懂得对这类东西不能掉以轻心。一个人的随身物品是一个人的反映。例如，一个人的手指上有浓厚的尼古丁气味，但没发现他带有火柴和香烟，这就需要查明指上的烟痕是怎么回事。也许他没有问题，但我们有责任把事情搞清楚。

一天，来了大约十二个“越界者”。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和助手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全面检查。他们的所带之物差不多都一样：一张弄脏了的妻子同儿子的照片，一支钢笔，一支铅笔，一把小刀，有的还有表。有的人一分钱也没有，但大多数人在他们那可怜的随身之物中也有少许零钱。

有两个包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一个里有个钱包，装有二十张崭新的面值为二十五荷兰盾的票子。按当时的兑换牌价，这些钱大约相当于五十英镑。在长条桌另一端的一个包里，除了其他东西外，也有一个钱包，里面也有二十五盾一张的新票子。这事真有些蹊跷。多亏我的观察力和对细节的记忆力，我想起了第一叠票子的号码顺序，使我惊异的是另一叠的号码是这一叠的继续。

我悄悄地将此事告诉了同伴，并表示要审问包裹的两位主人。为了不引起他们的疑心，我把其中的一位排在被审人名单的第四名，而另一个放在后边，说得确切些，第九名。头三个审过了，他们都没有

问题。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都是老相识。他们三人的陈述完全相符。我高兴地同他们握手，祝他们在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把他们送往艾琳公主大队总部，即荷兰军事训练学校。

下一个便是二十张崭新钞票的主人。此人体格健壮，三十来岁，像个乡下人或农夫，看上去并不很聪明。在这种工作中，第一印象不值得重视。我瞥了他的手一眼，指头生着厚厚的趼子，指甲也没剪。这一切证明他经常干的是粗活而不是数钱。

“叫什么名字？”我问，尽管从包裹的标签上我已知道他的名字。

“巴克胡伊斯·弗林特，先生！”一般农夫是不用双名的，但我把这个问题放了过去。

“从什么地方来？”

“埃梅内斯，先生！”（埃梅内斯是乌德勒支省的一个小镇。）

“干什么工作？”

“种地，先生！”

“多大年纪？”

“三十六岁，先生！”

我又问了一些普通问题：信什么教、上过什么学校、政治信仰、母名、籍贯、有无活着的叔辈、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等等。编造一个假身份是不容易的，即使非常狡猾的德国间谍，也会在连续不断的问话中被搞得结结巴巴。有时，提到一个人，问他姑姑的教名。如果能流利地回答，说明他的话是真的。但是，忘记第一个名字是常有的，结果搞得矛盾百出。由于这些小问题被识破的间谍是屡见不鲜的。

基本情况的审问结束后，我继续向巴克胡伊斯·弗林特问道：

“你喜欢德国人吗？”

他马上怒容满面地答道：

“我！喜欢德国人？我恨他们！”

“你说话倒蛮像个真正的爱国者。”我说，“可是，巴克胡伊斯·弗

林特先生，你是用什么方式表达你这种仇视他们的感情的？”

巴克胡伊斯·弗林特没听懂，问道：

“我不懂，先生！”

“也就是说，你同抵抗组织进行过合作吗？”

“啊，是的！现在我听懂了。我不喜欢吹牛，如果不是急于参加同他们的斗争，我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很好！可是，来此以前，你参加过抵抗运动吗？”

“当然参加过。”

“有什么行动？”

他稍停了一下，说道：

“是这样的！有时，我在铁路附近的田里干活。火车一出站，我就抽掉一两根枕木，火车就出轨了。”

“可是，如果不是军用列车，而是满载善良的荷兰人的客车呢？”

巴克胡伊斯·弗林特笑着说：

“我事先得到情报，准确地知道车上是德国人。”

“如何得到情报的？”

他抬高声调，一字一句地说：

“我自有方法。”

“什么方法？”

回答前，他再一次镇静了一下，然后说：

“前一站的信号员是我的朋友，是他提前通知我的。”

“两站的距离有多远？”

“五公里，也可能六公里，先生。”

“你怎么得到情报？他可以离开工作岗位？”

“当然不行，除非你是这样想！”

“怎么说我这样想呢？”

“谁知道呢，先生！”巴克胡伊斯·弗林特好像，而且也应该觉

得是很扫兴的。

审问就这样继续着。连这样的蠢货德国人也用来当特务，我深深感到他们的同情者是少得可怜。他的交代漏洞百出，任何一条都能定他的罪。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带那么多的钱，他会马上被捕。但我打算把他当做诱饵，以便把他的可能更为狡猾的朋友也捉住。

我急于把真相搞清，于是问道：

“桌上放的钱是你的吗？”

“是的，先生！”

“你怎么带这么多钱？”

“是我的积蓄，先生！”

“看来这些钱是不久前的积蓄！”

“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钱好像都很新！”

巴克胡伊斯·弗林特想了一下说：

“是的，先生，我保管得很好！”

对他的话，我已不感兴趣了。他所讲的是那样令人难以置情，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发展他的间谍头子会教给他这样一个奇怪的交代，实在让人莫名其妙。我又问道：

“这里有三四十个人，是今天同你一起来的。他们当中有你的熟人吗？”

“没有！”他立即回答。

“真没有吗？”

“绝对没有，先生！来这里之前，我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

我叫来一个士兵，吩咐把弗林特带到拘留所。我脑海里的计划开始萌芽了。把他单独关押两三个小时，这个蠢货的记忆会恢复起来的。

随后的审问中没发现任何问题。每个人都毫不费力地进行了回答。我同他们握过手，吩咐把他们送往艾琳公主大队。下面轮到第九个了，

他带的钱的号码也是按顺序排列的。

他一进来，我发现这是个与前者无论是外表还是精神都大不一样的人，他的轮廓像只狐狸，看上去很聪明。

我开始提些普通问题。他叫范·德阿，来自乌德勒支省埃梅内斯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巴克胡伊斯·弗林特也是该省人。他现年三十二岁，是机器配件厂的师傅。虽然是独身，但好像对女性并不是无动于衷的。

“为什么你要冒着生命危险来这儿？”我问道。

“我是来参加艾琳公主大队的，先生！”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来参军？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先生！我对盟国没做多少工作。虽然为抵抗运动做了点事，实在微不足道。我想，这是最后一次做些有益的工作的机会了。”

他的回答很得体。这位谦逊的骑士把自己的工作说得一钱不值，确实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懂了！你在抵抗组织中干什么工作？”

“哦！”他谦恭地笑了笑，“你不要把我当成英雄，我不够资格，差得远呢！有的朋友很喜欢夜间出来活动，给德国巡逻兵制造麻烦，或破坏他们的机器。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喜欢安静的生活，并希望永远如此。小时候，我就喜欢看来往的火车，懂我的意思吗，先生？”

“是的，我懂！”

“我和一个寡妇同居，住在铁路防近。我的卧室在后院，无事可做时，便饶有兴致地观看过往的火车。我能数得出车厢的数目，看得出车上是军队还是平民百姓。我把这些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告诉我在抵抗组织的一个朋友。”

“你怎么同他会面？”

“我和他同在一个工厂工作。他开的机器经常出毛病。尽管这种

现象很奇怪，但作为班长，我只得去排除故障。我们不能帮助德国人延长战争，懂吗？”他说，“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情报告诉他。”

“看来，你的工作很有价值！”我评论道。

他耸了耸肩，表示厌恶。

“你可以这样想。我并不希望你把这种工作看得很特殊，小孩子也能干，很可能会干得更好。”

尽管他的样子很谦恭，但却相当自信。同巴克胡伊斯·弗林特相反，他的话有些含糊其辞。接着，我问了些细节，诸如过往火车的数目、行驶方向等。我对德军在荷兰的情况是了解的，因为皇家空军情报部门发过一个空中侦察情况的备忘录。范·德阿所讲的同实际情况几乎完全吻合。

一直到那时，我对他还没形成偏见。范·德阿可能是个真正的荷兰爱国者，钱的问题只不过是巧合。当然，也可能是用来蒙蔽最高明的审判员的别出心裁的骗术。如果他没带那些引起我怀疑的钞票，他肯定会很容易地通过审查。我的小组人手单薄，根本不可能进行过细的审查，除非真有值得深入调查的疑点。

我决定把提问的内容换一下。

“请告诉我，范·德阿先生，你为抵抗组织干这种工作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三年左右，先生。”

“在这期间，你肯定认识或听说过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

“是的，有成打的人。”

“请告诉我几个人的名字。”

范·德阿犹豫了。我问道：

“怎么啦？”

“好吧，说起来也不容易！有的人为了安全，使用的是代号。比如，有个人叫威廉·特尔，还有个叫‘金刚’，这一定是个彪形大汉。另

外一些人用假名，或借用别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拿不准。”

“没关系，记得几个说几个。”

“好吧，先生！第一个是登·特克斯男爵，他的确是个伟大的人，无与伦比的伟人，下面是费尔贝克、弗莱克斯、桑德斯、舒特、罗洛富斯……和范·迪克。”接着，他又罗列了半打人名。

我记起了其中的几个，特别是第一个，登·特克斯男爵，他的确是个伟大的爱国者，抵抗运动著名的领袖。范·德阿要么真在抵抗组织中工作过，要么是受过德国间谍头头的训练。

我把话题一转，抛出一个重要问题：

“你为什么带有那么多新票子？怎么弄来的？”

沉默了一会儿，他终于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

“说实话，这是我出来之前偷的。你可以叫我小偷，但是……被我偷的人是我们那儿的一个有名的‘鲨鱼’——肉店老板，我相信你不会见过比他更大的卖国贼！德国人一来，他就投敌了。大家都在挨饿，他却能搞到大块大块的肉，这种肉只有那些卖国贼才能买得起。我想，两手空空出门是不行的；他发了不义之财，减轻一下他的负担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

他回答得很妙。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总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更容易相信那些贬低自己的话，而不是抬高自己的话。如果不是还有个巴克胡伊斯·弗林特，我肯定会马上接受范·德阿所做的解释。

“有人帮你……从肉店老板那里偷钱吗？”我问。

“没有，先生。是我自己干的！”

范·德阿第一次出现了个小小的疏忽。一切迹象表明，他同巴克胡伊斯是一起干的，他应当把偷窃肉店老板的合作者供出来。我仍然不动声色。突然，我又把话题拉回到前一个问题，对他说：

“我的记性真不好，请你把抵抗组织的人名再说一遍。”

“好，先生！他们是登·特克斯男爵、费尔贝克、舒特、罗洛富斯、

桑德斯……和范·迪克。不知顺序对不对！”

“很好！”

但是，这次他没说全！我还记得他刚刚说过的一大串名字。他漏了弗莱克斯。这可能是偶然的，但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

“现在请把你离开埃梅内斯前的几周中德军在那一地区的情况谈谈！”

范·德阿流利地作了回答，但并不是完全没有犹豫和停顿。这使我感到他的回答不自然。

“城东有一个供坦克使用的燃料库，附近驻有一支小部队。离此不远，是一个军的陆战部队，其中的一个师装备齐全。对了，离城约三英里的地方是德国的空军机场。盟军一逼近，机场就被抛弃了。”

他所讲的与我掌握的情况是相符的。我对他说：

“今天上午来了大约四十个‘越界者’，其中肯定有人来自你们的省。有认识的吗？”

“没有，先生！”范·德阿立即答道，“好像认得一两个，但没有一个真正称得上是朋友或熟人。你对抵抗组织很了解，认识的人越少越好。在我那个县，我不认识任何从事抵抗运动的人。一旦参加了抵抗组织，马上就要学会隐蔽自己。”

“谢谢！”我一面递给他一支烟，一面漫不经心地、颇有些窘意地说：

“范·德阿先生，我感到我的记性越来越坏了。过去，我能记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但是，今天……”我停了一会儿，把一只手慢慢放在前额上，“我是需要休息一下了。这种审讯工作简直把我的脑袋变成了筛子。你已经给我讲了两三次抵抗运动的人名，可我还是都忘了。对不起，能再说一遍吗？”

“怎么不行呢，先生！”他和蔼地说，“我也觉得你是该休息一下了。”

"我也有同感！无论如何，战争不会进行太久了。"

"好吧，他们的名字是……"'

范·德阿又把名单重复了一遍。当然，我的记性并不像我说得那样差，范·德阿又漏了弗莱克斯。为了确保无误，我对他说：

"没漏掉谁吗？"

他想了一会儿，把所讲的名字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肯定地说：

"没有，先生。谁也没漏掉！"

"非常感谢！我今天要了解的就是这些。对不起，请到旁边的会客室等一下，如果需要什么，请告诉值勤的士兵，他会照顾你的。当然，这里不是里茨饭店，但我们尽力满足那些出生入死的爱国者的要求。"

"要等很久吗，先生？"他问，"我希望立刻到艾琳公主大队去。"

"我的好人，不会的，不会久等的。就差几个手续了。如果你过去不懂，现在会明白'衙门'是怎么回事了。"我笑着同他握过手，出去了。

范·德阿被士兵押出办公室，我便回来，重新坐下，吸了五分钟烟。一个计划已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我断定范·德阿和巴克胡伊斯·弗林特是德国间谍，但需要设一个圈套，把二者捉住。考虑成熟后，我叫来助手。我向他讲述了我的疑点，并教给他如何行事。他一离开办公室，我便把范·德阿叫了进来。

他进来后就坐下了，好像有些疑惑。看来，他对这样快就把他召来颇感奇怪。

"想让你帮个忙！"我对他说，"很显然，你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但我很怀疑同你一道来的一个人，或许你能帮我把他的假面具戳穿。"

"很高兴协助你，先生！我已说过，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但我会按你的吩咐去办。"

"非常感谢！我知道，给一个朋友定罪会使人尴尬。刚才你说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你的真正朋友，即使有你的朋友，你也应履行自

己的义务。为德国人当间谍总是可恶的。”

“我应该做些什么？”

“很简单！你先看看他，他就在隔壁。你可以看到他，他却看不到你。然后你告诉我，是否认识他……”

范·德阿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转过身，做了个不认识的表情，说：

“不认识！但他的面庞并不生疏，因为我们是一起来的。就这些！”

“好！现在我们到隔壁屋里去，我把你介绍给他。然后，我对他提些问题，请你认真听他的回答，然后把你对他的印象告诉我。就这样。”

范·德阿把他的角色表演得很出色。他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巴克胡伊斯·弗林特时，肯定吃了一惊，但他表面却没动声色。相反，他好像很乐意当这个哑剧裁判。“请相信我，先生！”进屋之前，他对我说。

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巴克胡伊斯·弗林特马上站了起来。我对他们说：

“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可能会认识。这位是巴克胡伊斯·弗林特先生，这位是范·德阿先生。”

两人相互问候。我心中着实佩服他们的表演。他们的动作、表情都很贴切。我请他们坐下，提了几个普通的问题。范·德阿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但他那机灵的眼珠却转来转去，活像个观看网球赛的观众。

过了几分钟，我中断了审讯。我摸摸衣袋，取出香烟，递到他们面前，并用比平时说话稍高的声音问道：

“吸烟吗？”

这是约定好的，通知门外全神贯注听我讲话的助手的信号。他突然进来，用军人下达命令的口气大声说：

“弗莱克斯先生！”

巴克胡伊斯·弗林特一下跳了起来，应声答道：

“有！”

这出滑稽戏就这样结束了。我假意地笑着，转向范·德阿。尽管他还在尽力控制着，但也不由得跳了一下。我说：

“弗莱克斯终于出现了。我第一次问你时，你提到了他。但是后来却完全把他遗漏了。”

“白痴！”范·德阿对他的朋友说。他很清楚，这场毅力的较量结束了。

“不！”我插嘴说，“白痴是你！你永远也不要轻视对手！既然你提到了他的名字，就应坚持提下去。后来，你不提了，这就引起了我的怀疑。既然要搞阴谋，你们在来之前就应统一口径。你们携带的钱是德国人发的，你们带那些崭新的票子太愚蠢了。另外，票子的号码都是顺序排列的。好吧，先生们，你们谁愿意作个彻底的交代？”

战争仍在继续，我也随着战事的推进而转移着。范·德阿和巴克胡伊斯·弗林特被押送到巴塞，他们将在那里受到判决。以后，我再也没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愿他们受到应得的处罚。当一个人出卖自己，以五十英镑出卖自己的国家，尽管所得到的票子是崭新的，号码是顺序排列的，这个人也就分文不值了。

# 第六章　魔鬼三角

欧战业已结束，但追捕间谍的工作并未因此而停止。虽然此时间谍对世界大业的危害已无关宏旨，但我们的工作仍在继续着。德国是战败了，然而许多顽固不化的纳粹复仇分子仍在暗中搞鬼。另外，正义必须得以伸张，内奸和战犯应该受到判决。

战争结束几个星期后，我便在海牙附近的斯赫维宁根监狱安顿下来，那里为我保留了被称为“奥伦治饭店”的监狱的一翼。我在那里处理了许多荷兰最重要的案件。一天，我收到一张纸条，上面用哥德体写着：

萨德尔夫人是德国人的情妇和间谍。应当对此事进行调查。该死的叛徒！

纸上没有署名。我收到此类控告信已不是第一次了。一般说来，都是匿名的。正如我在本书已说过的那样，战争总是遗留下一些难以干涸的泥潭，特别是在一个被敌人占领了近五年之久的国家。

有的人向入侵者妥协，或同他们同流合污。那么现在，他们应该继续效忠于敌人，还是为了民族，牺牲个人利益，起来斗争？……总之，战争一结束，不少的男男女女都感到有义务揭露那些货真价实的，或可疑的“第五纵队”。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要么是出于爱国之心，要么是想揭露自己的

仇人，或者是下意识地二者兼而有之。

我仔细地研究了匿名信，上面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匿名者好像有一定的文化，但信是在匆忙中写成的。句号的圆点外面又加上了一个圆圈。我不是福尔摩斯，很难断定控告信是否由一个一手架拐、一眼斜视的欧亚混血儿用左手写成的。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把信一揉扔出去，那时，我的工作十分繁忙，手下又缺人，一封匿名信不值得牵扯我过多的精力。但是,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改变了最初的想法。我常说，只要有控告，就应当进行调查。如果有人非常怀疑萨德尔夫人，并匿名控告她，她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她是无罪的，我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调查，证实她的无罪。

萨德尔在荷兰是个司空见惯的名字，我不得不花两天的时间来查找姓此姓的已婚妇女。我把查到的名单看了一下，只有一个可疑，此人可能就是被控告者。她的丈夫是个小印刷厂的厂主。德国人占领荷兰后，接管了印刷厂，并强迫厂主为他们工作。这样，作为抵抗组织忠实成员的萨德尔就开始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干起来了。事情很简单，因为他是印刷厂的主人。工厂是幢两层楼房，上下两层都属于萨德尔。他从小就在此生活。后来，除了他和妻子的两间卧室，其余都被德国人霸占了，住着一个盖世太保的军官和他的副官及工作人员。

看起来，萨德尔的印刷厂并不寻常，它竟在德国人的控制下生存了下来。小型的印件和每日对该区驻军下达的指示都在这里印刷。德国人自己带来了一个排字工人，因为每日下达的命令有着重要的情报价值。萨德尔的工作仅限于指导，并有一个士兵在一旁监视，防止他偷看印件的内容。尽管表面上他什么也不看，但却把有用的情报转送给抵抗组织。

1944 年 7 月底，即盟军大反攻的几周后，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也许由于缺乏慎重，也许纯粹因为不信任，盖世太保暗中下了手。他被捕后，在盖世太保的司令部关了几天，以后便失踪了。没有一个抵抗

组织的人知道他的下落。估计他可能被关进了集中营，或是被处决了。

然而，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月，即1945年4月初，萨德尔又出现了。他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他说曾被德国人拷打过，并让人看手上的一块鲜红的伤疤，这是被审讯官用燃着的香烟烧的，盖世太保担心抵抗组织用武力搭救他，把他弄到了德国北部的一个集中营。盟国进入德国，逼近集中营时，关押的人被徒步驱赶到北部一个更远的地方。在一次白天的空袭中，萨德尔逃跑了。他在野外流浪了几天，从废墟中捡点东西聊以充饥，直到被加拿大的先头部队抓获。经过盟军的审问，他得到回原籍的许可。他就这样回到了家。

自然，他被当成了英雄。一个为抵抗运动出过力，在严刑拷打下不屈服，最后又逃出虎口的人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就在他回来的前几个星期，关于他妻子的耸人听闻的谣言传开了。萨德尔夫人过去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所以在此地一无亲，二无友。她住在丈夫家里，盖世太保的一个头头和他的随从人员也住在里面。对此事，人们议论纷纷，谣传说她成了德国军官的情妇，而且是在丈夫还在家时就勾搭上了。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当丈夫在楼下欺骗德国人时，她却在楼上欺骗着丈夫。

在盖世太保统治下，人们无能为力。随着德国人的撤走，丈夫回到该城，事情就麻烦了。在我的第一次审讯中，警察署长本人就曾说过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指控一个在欢呼声中荣归故里的英雄的妻子。萨德尔先生并未对此表示任何怀疑，重新在妻子身旁开始了生活。然而，大家对萨德尔夫人的不忠和对丈夫的英雄气概同样都是坚信不疑的。

正如警察署长所说，问题是棘手的。我一直权衡了几天。是掩盖这一丑行，让狗继续酣睡，还是调查此案，将狗唤醒，断送这一对看来还幸福的夫妻？

最后，我虽决定继续调查下去，但仍是犹豫不决。为了平息那些

摇唇鼓舌之人，我到萨德尔夫妇家中进行了一次表面看来是社会调查性的走访，避免把萨德尔夫人召到办公室来。我选择了一个萨德尔不在家的时间。

萨德尔夫人亲自在大门口接待了我。自我介绍后，她给我端来一杯咖啡。这种饮料与其说是用咖啡豆做的，倒不如说是从某种叶子中提取的。闲谈间，我仔细地把她打量了一番。萨德尔夫人大约三十岁，身材苗条，相当标致，虽算不上绝色佳人，但却性感十足。总起来说，她身上有种迷人的，看上去十分舒服的东西。我内心深处思忖着那个远离故乡和家庭，生活在这样一个诱惑力十足的女人身边的德国军官的感情。

萨德尔夫人一点也不傻，闲扯了几分钟后，便微笑着，以一种坦率而亲切的口吻说：

"平托上校，你一定很忙！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谈谈天气和已经结束了的战争。你这次来一定另有原因，不是吗？"

我笑了笑说：

"是的，萨德尔夫人，我这次来的确另有原因。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把我的目的谈谈吗？"

萨德尔夫人也笑了。无须多说，我从皮包里取出匿名信，递给她。

"请你看一看！"

萨德尔夫人看着信，突然抽动了一下，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又变红，样子十分窘迫。看完后，她把信扔在了地上，我又捡了起来。她双手捂住脸，茫然地坐下。

我一直等她平静下来。最后，她抬起眼，谦恭地说：

"你对审讯工作一定很有经验，不是吗，平托上校？"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回答。

"你喜欢听实话吗？"

"差不多最后都能讲实话。"

“看来，骗你是无用的。早晚你会知道一切的。这封信……是事实，但又不全是事实。请允许我说明一下。”

萨德尔夫人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开始，她显得有些慌乱，讲话颠三倒四，后来便镇静自若了。在五年被占领期间，他们家住过好几个德国军官。他们都很安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事时，才同她说几句话。

大概在1944年中，当时住在她家的军官被提升，接替者是冲锋队军官豪普特曼少校。他在俄国前线受了重伤，来到荷兰维持治安，同时也顺便养伤。他年轻，比他的前任英俊得多，更主要的是，他没有那么狡猾。他笑容可掬，只要遇到她，总是说：“你好。”他曾邀请她，还有她的丈夫，到他的房间喝过一次名副其实的咖啡。在当时，喝杯咖啡或应邀赴宴都是十分难得的排场。奇怪的是，是她首先拒绝邀请，她认为同敌人欢聚是不适宜的。但是，丈夫却坚持要去，并希望她能对豪普特曼少校有所谅解。她知道丈夫同抵抗组织有联系，但他却从未透露过。她对此也不加过问。她猜想丈夫可能要对少校表示点友好，但不知原因何在。

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少校到他们家不到两个月的一天早晨，她的丈夫被捕了。萨德尔先生匆匆跑上楼梯，吻了她，并告诉她发生的事情。接着，两名士兵把门叫开，把他带走了。

当夜，有人缓缓叩打她的房门，是豪普特曼少校。他说，她的丈夫被监禁，但时间不会长，他是德意志帝国的敌人，要被处以极刑。决定她丈夫命运的权力落到他——豪普特曼少校手上。虽然他不能释放她的丈夫，但可以设法免除他的死刑，不致立遭处决，改判徒刑。如果她，萨德尔夫人，对豪普特曼少校能够有所表示，丈夫便可免死，因为少校和将要审判他的法官有私交。

形势很微妙：以声誉换取丈夫的生命。萨德尔夫人说，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想扑上去，狠狠揍他一顿，报复这一卑鄙的建议。然而，细

想之下，她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再三斟酌，她决定接受豪普特曼少校的建议。她爱丈夫，同别的男人没有任何交往。她曾想到拒绝，但她确信，若不屈从这一肮脏的交易丈夫将被处决。

少校对她说，若对协议更改半个字，他随时撤回建议，并命令杀死她的丈夫。当然，她无法同萨德尔先生的朋友们商议此事。

又一个念头袭来。做了豪普特曼少校的情妇以后，谁又能保证他履行诺言？萨德尔先生的案件可以由别的法官处理，而他们是完全可以判处他死刑的。但是，她最后还是决定冒这个风险。如果拒绝，丈夫便被处决，接受了，起码还有拯救他的一线希望，少校看来是个言行一致的人。

经过再三权衡，第二天上午，她通知少校愿意接受建议，甘愿当他的情妇，但是，要以得到丈夫免遭处决的证据为条件。两天后，萨德尔夫人从少校处得到一份盖世太保秘密决定的拷贝，决定证实丈夫被法庭以反对帝国罪判处无期徒刑，监禁于集中营。第二天，他将被武装押送去德国北方某集中营。

豪普特曼少校说，她可以同丈夫见一面，同他告别。这次匆匆的见面实在难以描述。丈夫安慰她，但她想到为丈夫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便放声大哭起来。当丈夫拥抱和吻她时，她全身颤栗了。据她说，她感到肌体已经被这笔即将履行的交易玷污了。

当夜，她成了豪普特曼少校的情妇，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六个月。她偶尔得到一点丈夫活得很好的消息。一次，她看到丈夫送来的一张便条，她认出了字迹。少校想送些礼物给她，暗中改善一下她的生活，萨德尔夫人断然拒绝了。她出卖了尊严，这一代价已经够大的了，如果再接受报酬，她简直感到真的成了娼妇。

简而言之，希特勒在阿登遭到惨败后，德军便开始成批地往本土撤退。豪普特曼少校的伤已经痊愈，完全可以重返部队。1945 年初，他被召回柏林。

此后的两个月间，萨德尔夫人家中没有再来任何人，她独居了。她知道，当地在流传她与豪普特曼少校同居的事。一上街，人们都蔑视地瞥她一眼，连她平时最要好的女友也都故意把后背转向她，就差对她口出不逊之言了。虽然无人公开指责她，但这种无声的谴责也够使她难受了。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在折磨她，少校一走，她再也得不到丈夫的消息了。圣诞节前，还听说他活得很好，但是，德国正处在混乱中，简直是一团糟，各种传闻都是捕风捉影的。有人说希姆莱命令枪杀了集中营所有的人；有的说，通过秘密串联，集中营的囚犯举行了暴动，用武力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她过去爱丈夫，现在仍然爱他。她曾幻想过他已经安然死去，她实在不知道倘若他真回来，怎么接待他。

一天，他回来了，面容瘦削，憔悴，宽大的衣服褴褛不堪，满身是瘀伤和疤痕，但是，他仍然活着。他精疲力竭，萨德尔夫人不得不一连几天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他。他很冷淡，从不打听他不在家期间发生了什么，三句话不离集中营和那一群群被送入瓦斯室的人。

他身体恢复后，他们重新开始像夫妻一样生活了。那时，她感到永远也不能向丈夫透露真情，永远不能透露为了他的生命她所付出的代价。萨德尔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失去了原有的果断和干练，经常说机器的噪音使他难以忍受。他沉默寡言，但是，萨德尔夫人发现，当他以为无人注意时，总是用眼盯着她。他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不得不由她决定一切。他每穿件干净衣服或喝杯咖啡，总要请求她的允许。

萨德尔夫人说累了，陷入了沉默。谈起当时的心情，她感到更加茫然不知所措。我内心深处回味着她讲述的一切，想把链条的每一个环节连结起来。看来，她所讲的均系实情，我的责任是调查清楚。

“我知道，你对我讲述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我说，“但是我仍然想提几个问题，可以吗？”

她无精打采地表示同意。

“第一，你们没有孩子，我是否可以问问是什么原因？”

“不！”她断然地说道，“我不认为有什么原因。我们结婚时，只想到要快乐。后来，当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建立家庭时，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感到时机已经不适宜。从那以后，问题就更复杂了，一直到现在。”

“谢谢！豪普特曼少校走后，你是否见过他或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

“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萨德尔夫人肯定地回答，“他临走时说，一切就像一首结束了的插曲。如果他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对此我是相当怀疑的——也决不会再找我。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一定会遵守这一诺言的。”

“你感到他对你的感情怎样？”

萨德尔夫人踌躇了一会儿说：

“我想他是爱我的。”

我下面要提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略停了一会儿才说：

“你对他呢？”

萨德尔夫人的头动了一下，又耸耸肩，看来她在寻找一句恰当的回答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她终于答道：

“我自己也搞不清，我想你同样也搞不清，但是，我对他有些好感。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我应当恨他，和他同床应感到恶心。他总是个敌人，由于他，我背叛了丈夫。但是，他善良，又殷勤，而我又是孤身一人。另外，他也爱我。”

这一席话，不管在道学家的眼中是多么罪过，萨德尔夫人给人的印象是无辜的。如果她是在扯谎，如果是她勾引了德国军官并合谋赶走了丈夫，再退一步说，如果她背叛了荷兰的战争事业，她一定会说她是恨豪普特曼少校的，一定会说她仅仅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才忍受了和他的同居。她在承认豪普特曼少校对她不是冷漠无情时所表现的明显的诚实，使我相信她是无辜的。

我继续问道：

“请告诉我，萨德尔夫人，你丈夫是否谈起过或怀疑过你同德国军官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是非之人又很多，他不可能听不到一点流言飞语……”

“没有！”她说，“他可能会怀疑，但没有任何表示，从未问过他不在家时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我行我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我懂了！你刚才说不久前你丈夫对工作失去了兴趣。印刷工作的确很苦，但是，你们靠什么谋生？即使在战前你们很富有，现在也不会有多少积蓄了。”

“这里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她说，“警察署长筹集了一大笔钱庆祝我丈夫归来，那些大财主也是很慷慨大方的。”

她停了一会儿，略带窘意地说：

“接受这些钱，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为什么？”

“这不是因为你所能想到的原因。我丈夫回来时，极端狼狈。我不得不像对小孩一样，为他脱衣服，服侍他睡觉。我发现他的胸前结结实实地捆着一叠大面值的钞票。我没数，我想会有几百万。”

“你丈夫说过在什么地方弄到的吗？”

“说过！”她天真地说，“他身体稍好些时，我问起了钞票的事。他说，从集中营逃跑后，遇到一队满载德国士兵的卡车。他躲到了一个坑里。突然，出现了一架皇家空军的飞机，对卡车进行了轰炸。离他很近的一辆卡车着了火，车上的两个士兵逃跑了。在混乱中，他跳上卡车，拉下两只箱子，想找点日用什物。打破箱子，里面没有吃的，但发现了许多票子。这无疑是给当地驻军送饷钱的卡车。他想，这是敌人发的战争财，于是就可劲把钱带回来一些。”

“我认为这是无可责怪的。”我说，“如果我从集中营逃出来，也应付给我旅费和生活费。”

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

“一定是我丈夫！”萨德尔夫人猜测说，“快！我们得为你的来访找个理由，使他不致怀疑……”

“这事交给我，请不必担心！”

门开了，进来一个男人，中等身材，瘦削，神情忧伤，一头蓬乱的黄发。他两眼惊恐，像是对一个身着制服的军官待在妻子房中感到诧异。没等他开口，我便站起来，向他问候：

“我可以自我介绍吗？”我说，“我叫平托，平托上校，在本地的荷兰反间谍处工作。我来做社会调查，好客的萨德尔夫人招待我喝咖啡。”

“你要了解什么？”他突然问道。

“我是在执行设在柏林附近的反间谍总部的命令。他们抓获了一些冲锋队的高级军官，这些人将作为战犯受审。其中的两个曾在你们家住过，我奉命来调查他们是否有罪恶和他们的表现如何。”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

“一个叫冯·布赫瓦尔德，另一个叫豪普特曼。”

萨德尔震动了一下。我发现他的眼珠在转动，面部的肌肉也绷紧了。

“冯·布赫瓦尔德……对我来说，这个名字很陌生。四年来，一打以上的德国军官在我家住过，有的仅住过几天或几个星期。不，我不记得这个名字。可是，豪普特曼……就不同了。我们俩都记得豪普特曼，不是吗，亲爱的？”说着，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妻子。

在几秒钟的瞬间，我想到他这句话的双重含义。

“对！”我说，“你的夫人刚对我说的就是这个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的豪普特曼少校。他在这里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不满吗？”

“你是否说他被判决时，我要去作证？”萨德尔先生问。

“可能！如果证人确实不能出庭，司法当局也可以接收书面证词。但一般说来，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庭尽可能等待证人出庭。”

萨德尔耸耸肩说：

“尽管我对德国人是痛恨的，但我不认为我可以昧心地诽谤豪普特曼少校，他始终很守规矩。如果我毫无根据地把被盖世太保逮捕之事归咎于他，别人会说他只不过在执行任务。众所周知，我是因反对帝国罪被判处的，并不是由于豪普特曼之过，我才落得了这样。”说着，萨德尔伸开那只有两三个伤疤的左手，“豪普特曼把我交给了盖世太保，以后的事……”他转身看了妻子一眼，“当然，在我离家期间他干了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在家时，对他无可指责。”

从他的似乎诚恳的谈话中，我发觉了某种不寻常的东西，萨德尔先生好像有种不可言喻的得意。他的妻子插话道：

“不用担心这个。豪普特曼少校作风正派。另外，在他行前的几个月中，他有许多比搞女人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我想，该是中断这次谈话的时候了。

“就这样吧，萨德尔夫人，十分感谢你的盛情。我现在该回办公室了。”我又转向萨德尔先生说：

“希望你能到我的办公室签署一个我亲自起草的证词。今天还来得及，但是得下午了。司令部需要这些材料。我的办公室离此很近，外面有路标。”

“战争好像已经结束，”萨德尔先生说，“但是看来，只是军装的颜色变了一下。我们仍然是任人摆布。”

“不是摆布，”我勉强笑着说，“只是一个建议。案中牵扯的两个军官在你家住过。不管他们是否有罪，你也希望正义得以伸张，不是吗？”

“如果能如你所说，我很高兴。没有印油，我无法工作。他们在时，我的机器没停止过转动。”

“好吧，下午见！”

“下午见。”

午饭时，我不停地吸烟，喝咖啡。一个念头正在我的脑海里形成。

随着思维的发展，它变得越来越清晰，并使我感到不快。在我从事的职业中，我多次看到人的本性丑恶的一面，经常想同部队的卫生兵换一下工作，今天也有此感。然而，正义是要主持的。我叫来值日军官，问他是否有德国人扔下的文件。我让他把一本有军旗标志的账本取来。军官回来了，他取来的正是我所需要的，封皮上有鹰和卐字。

一切准备停当，我便坐下等待萨德尔先生。他被带到我的办公室时，天已很晚了，大约已经四点多钟。我们一般地谈了一会儿，我感到他比上午要精神得多，同时也发现，他很谨慎，并有了戒心。

“萨德尔先生，我起草军事报告可能要比你有经验。如果你愿意，我大一点声说，你来写。我说得不对，你可以打断并纠正，好吗？”

“一切照你的吩咐！”他回答说，但语调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自然。

“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你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哦，对了，埃恩斯特！请让我从头说。我，埃恩斯特·萨德尔，是……你的详细地址下面再说。我宣布，1945 年 7 月 14 日我所提出的证词完全是自发的，自觉自愿的。”

我停了一下，凑近他。

“我们就这样开始，”我说，“以便在法庭上用你的证词时，辩护人不致说它是被迫写成的。好吧，我说到什么地方？哦，对了！‘自觉自愿’，好！从荷兰被德军占领，一直到我去年年底前后被盖世太保逮捕，具体时间下面再写，有几个德国军官曾住在我家。我得知法庭主要对他们之中的两个人感兴趣，即冯·布赫瓦尔德上校和豪普特曼少校。第一个名字我记不得了；但是，我要说明，据我本人所知和确信，他们谁也没有对我或我的妻子有过越轨行为。

“豪普特曼少校是在我被监禁期间住在我家的德国军官，他有着军官和绅士的风度。我还要申明，他的友谊和支持对我的工作是一个帮助，还是说，能使我继续为德国的事业而工作？我向他提供了许多

关于荷兰抵抗运动的防卫计划的情报，我也由于叛变而得到了优厚的报酬。我的被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我……”

萨德尔跳了起来。

“你在说什么？”他大叫道，“你想骗我？这样的证词我不签字！”

“你可以不签字，但是，你不能否认我说的事实，不是吗？难道你是抵抗运动的英雄？你只不过是个祖国的卑鄙的叛徒！”

他的蓝眼睛射出怒火。

“谁出卖了我？知道了，是我的妻子，那个狗娘养的！”

“请坐下！”我平静地说，“不是你的妻子，对你这个恶棍来说，她是太老实了。两件事暴露了你：这个本子和你自己。”我用手指敲了敲德国账本的封皮，“我真不敢打开它，上帝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又接着说：

“你肯定想不到豪普特曼少校是多么老谋深算，又是多么粗心大意。无疑是两者奇怪的结合。他一丝不苟地记下了付给你的报酬，临走时，又粗心大意地扔下这个账本。其实，这个证据是多余的，使你暴露的是你那段愚蠢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萨德尔插嘴问。

“请听我说！印刷工作是由德国士兵监视的，但是，你在被逮前却能跑上楼和妻子告别。盖世太保没有事先通知被捕者的习惯，他们只知道抓人，如此而已。一个人在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的瞬间就会被抛进牢房。但你却不然，你知道什么时候被捕。抵抗组织迟早会发现谁给德国人传递情报。关于你手上的伤疤，你肯定没见过用燃着的香烟所烧的伤疤是什么样子。伤口是人工拉大了的。怎么弄的，说呀！是不是盖世太保帮你弄成了这个样子？还有……还有那个把钞票捆在胸前的离奇的故事。你那时是在德国，记得吗？刚从集中营逃出来，至少，你是要我这样相信的。那辆满载荷兰纸币的卡车要干什么呢？那时，没有任何德国军队驻在荷兰。用荷兰纸币给德国士兵发饷实在

不可思议。那些钱是德国主子给你的报酬。”

萨德尔嘲弄地笑笑说：

“你说的可能是事实。但是，你有什么证据？谁会相信你这一套损害像我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抵抗运动英雄声誉的话？谁也不会相信！你没有证据！”

“豪普特曼这本日记上说的什么？”我用手敲打着账本皮说。

“我说这是假的。豪普特曼原打算让我帮他的忙，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荷兰公民，我拒绝了他，他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报复。”

“如果豪普特曼本人出庭作证呢？”

“豪普特曼已经死了，或者已经躲起来了。总之，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冲锋队队员诋毁一个英雄的话。”

“你全部承认你的回答，对吗？承认我所说的是事实，对吗？”

“完全对！”他讽刺地笑着肯定地说。

“那好啦！这就是我的证据！”我说，“你看到写字台上那盆郁金香吗？枝子都弯曲着，但这不是因为花的重量，而是因为上面有一个麦克风。不，萨德尔先生！”我说着，从枪套里拔出手枪，“站远点，不要逼着我处决你！”

一个叛徒没能被处决使我扫兴，另外，我的不愉快还有另外的原因。由于仓促，我没来得及问及萨德尔为什么要写妻子的匿名信。信肯定是他写的。为了便于同逗点区别开，印刷匠通常是把句号划个圈。而且，我还记得妻子看到信时的反应，她认出了他的笔迹。

难道萨德尔是故意试探妻子的忠诚，才在被豪普特曼少校“逮捕”前想出了那个鬼计划吗？难道是豪普特曼强迫他用妻子的声誉换取生命？难道豪普特曼欺骗了二者，在向妻子提出条件前就释放了萨德尔？这些问题我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了。然而，萨德尔一回来，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除了妻子，他不可能把自己的痛苦分摊给任何人，于是，病态的醋意使他去责怪这魔鬼三角中唯一的一个无辜者。

# 第七章　贿赂

我历来认为酒会和聚会是一项鬼发明。我不由得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青年被征入伍的老故事。当他安然无恙地回来时，人们问他对战壕生活的印象，他回答说："战争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那些人，那种吵嚷，简直不堪忍受！"对于一个酒量过人者来说，参加酒会并无不可；然而，对我这个沾酒就醉者来说，同那个小伙子确有同感。我总是尽量躲避那些令人生厌的社会团聚。

可是，欧战一结束，有几次，我不得不出席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聚会。一次是在海牙，我无法逃避，出席的有盟军首脑和外交使节。我尽力婉言拒绝，但是，官方人士告诉我，拒绝邀请是一种无礼的表示。我只得穿上最好的军服，带着万分不快的心情去出席。

我感到是在逢场作戏。身着绸裤丝袜的管事来来往往，用银盘子托着香槟和鸡尾酒招待大家。除去那些身佩肩章，为了保持军人的风度而动作十分别扭的军官外，所有的女士和她们的衣冠楚楚、趾高气扬的绅士们，在大厅里转来转去。为了躲避嘈杂的人群，我躲在一根柱子后面呷着饮料。七星灯光彩夺目，照耀着女士们裸露的肩膀和绅士们高高挺起的胸脯，嘁嘁喳喳的闲聊声时高时低地传进我的耳朵。一切都闪耀着奇光异彩，一切是那样富丽堂皇，但是，在人们的微笑和谈话中，却笼罩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室外，一个新的欧洲正在废墟中挣扎，我忧伤地感到，这群人是在阻碍进步的泥淖中打滚。

陷入这些痛苦思绪中的我，突然看到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几乎靠

在了我的肩上，正对我微笑。我不认识他，但他知道我的名字。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范·阿斯滕上校，海牙外交秘书处的武官。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一阵，随后他让我看旁边墙上挂的一幅非常好看的画。研究荷兰画家，特别是16、17世纪的画家，是我的业余爱好。范·阿斯滕对画家的研究很有独到之处，对艺术有丰富的知识。

最后，他微笑着对我说，现在我出席招待会的使命已经完成，该是退席的时候了。他邀请我去他的住所欣赏他的藏画，我听了很高兴。范·阿斯滕平易近人，十分风趣，我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可以共同探讨荷兰绘画的人，于是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告别了盛情的女主人，向范·阿斯滕的住处走去。

他的住所陈设简朴，显示着他的生活悠闲、志趣高雅。在他的陈列室里，有年轻的布勒盖尔的学生们画的饶有风趣的作品，然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张与众不同的画。这幅画挂在范·阿斯滕卧室的墙上，画面上是一个身穿典型的17世纪服装的少年。这是一件名副其实的艺术珍品，它起码顶得上阿斯滕全部藏画的价值，我见过这幅画。我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努力回忆着在何处见过它。

阿斯滕发现我的兴致很高，便问道：

“上校，我看你真是个鉴赏家。这是我藏画中的精华。知道作者吗？”

“我想可能知道。”我说，“是费迪南德·博尔[1]，对吗？真是幅精美绝伦的画。”

“对！”他异常敬佩地答道，“是博尔的，我真赞叹你的鉴赏力。许多艺术评论家都拿不准。大家都承认这是一幅名画，却很少人知道作者是谁。”

他的赞扬使我有些不大自然，我只得谦逊地说：

“别这么说，没什么！这幅画我今天不是第一次见，十五年前就

---

① 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译者注

见过。这是林德尔的藏画，对吗？”

“完全对！”他说，“现在仍属于可怜的林德尔。我是借来的。”

“可怜的林德尔？为什么？他怎么啦？”

“你还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最后听到林德尔的消息是在战争爆发前夕，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画的时候。那时，他很富有，事业很兴旺。”

“后来就不行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范·阿斯滕给了我一把软椅，我便坐在了博尔的名画前。他所讲的故事并不长。战前，林德尔是荷兰最大的艺术商。他不但了解拍卖品的价值，还有鉴别艺术珍品的特殊直觉。在贩卖名画中，他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他的学识对现代各绘画流派也产生了影响。他总能巧妙地以高价出售博尔的作品。

但是，成功冲昏了林德尔的头脑。他的经商才能在个人生活中却没表现出来。他耗费巨资购买了坐落在高原之巅的一座巴洛克式城堡，并进行了豪华的装饰。尽管他是荷兰最富有的商人，但过度的排场把他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为了确保他在艺术界的声誉和弥补日渐枯竭的财源，他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战争爆发近一年后的一天，一场神秘的大火将林德尔的城堡付之一炬，里面有他珍藏的一部分名画。保险费是惊人的。保险公司对起火的原因进行了调查，林德尔以破坏和讹诈罪被捕，并受到了判决。荷兰被占领前不久，他得到人身保护令。鉴于无法恢复过去的财富和在荷兰社会上的声望，他跑到德国汉堡，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

盟军进入汉堡后，保安机关奇怪地发现了一个看来与敌人共处得不错的荷兰公民，于是，把他作为内奸和叛徒逮捕了。他被送到“奥伦治饭店”，即斯赫维宁根监狱。那里的积案甚多，林德尔已在牢房关了许久，无疑，他将继续被关下去。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何管他叫‘可怜的林德尔’了。”阿斯滕说，“第

一次审判，他因罪被罚了一笔钱。假如你处在他的地位，曾受过大家，包括他的对手在内的人的奉承，当时该怎么办呢？你一定也会离开荷兰的。但是，他不幸地选择了一个敌对的邻国。英国人曾说道，‘先给狗加一个罪名，然后把它勒死’。我想，林德尔正是这样一个遭遇。”

“你的话使我感到很遗憾，”我说，“尽管我和林德尔不太熟，又事隔多年，我也从未听说过他被捕和判决。你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件事呢？”

“这次谈话是由一幅画引起的。”他说，“另外，作为我们的反间谍首脑，我想你对此事可能会感兴趣。”

“你知道我是谁？”

范·阿斯滕笑着答道：

“我们外交人员消息灵通。我想帮林德尔点忙，也许你也能对他有所帮助。”

我没说话，疑惑地望着他。

他慢吞吞地说：

“我曾去监狱看望过林德尔。可怜的他受了不少罪。关了好几年，监狱的伙食和他那单薄的身体很不相适应。谈话中，林德尔表示谁能帮他出去，他将给以重谢。无疑，如果能彻底离开‘饭店’，林德尔肯定会有所馈赠。”

“这是什么意思？”

范·阿斯滕意味深长地看着博尔的画。

我屏住呼吸。他的打算是荒唐的。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谈话却包含着贿赂的企图。

“也许我没有很好地理解你的意思，”我冷冷地说，“是否你认为我会受贿？”

“贿赂这个词太过分了，上校。还是说……”

“贿赂是个大问题。”我反驳道。

“我是说，”他继续和颜悦色地说，毫不理会我的插话，“林德尔只不过想永远铭记对他的帮助，只是对你的鉴赏力的酬谢。”他亲切地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我一直认为外交人员说话是严肃的。我不会把价值至少几百万的一件艺术品当做一件小小的纪念品。”

“你很了解艺术品的价值。”他顺势接着我的话说，“不错，博尔这幅作品目前差不多能值这么多。如果放在伦敦的克里斯蒂和索瑟拜的拍卖店，能值二万五千英镑。平托上校，我不好冒昧地打听你的个人财产，然而，我估计你不会是个富翁。”

“你可以这样估计！”我讽刺地说。

“对！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有义愤，而应从实际和客观出发。首先，我相信你没听懂我的话。我并不要求你昧着良心把一个罪人释放。林德尔不是罪人。确切地说，先生，他并没同敌人进行过名副其实的合作。我只是请你调查，上报，并尽快解决。像他那样一个年老多病之人，正与流浪汉、叛徒关在一起受罪。只需你一句话，第二天他便可获释。像现在这样，他将继续在斯赫维宁根一个月一个月地等下去。林德尔应当过一个较为舒适的晚年。”

他的呼吁是动人的，然而，说实在的，并没能打动我。

“如果你对我的要求仅仅如此，为什么要想到贿赂呢？司法工作进展缓慢，特别是现在，嫌疑犯很多，审讯人员又少得可怜。从原则讲，我总是尽量加快审查。如果你仅仅对我说，他是一个你认为无辜的朋友，我可能对此案产生兴趣。但是现在，你却把事情搞得不好办了。”

“这是林德尔本人的主意。”他伤心地说，“我去监狱看他时，他知道你负责处理案件，并记起在战前就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无代价的效劳。这些商人有种奇怪的物质观念，他们认为不给点好处就不好求你帮忙。我并不因此而说他们是利己主义者。他们是按商人的方式行事。如果你肯帮忙，他自然乐于酬谢你，如此而已。”

“请不要忘记，”他补充道，“林德尔仍很富有。不管对你还是对我来说，这幅画都是一笔财富，但对他来说，仅是他财富的一部分。你为祖国和盟国都已效力多年。但是，当你退休时，能得到一笔养老金吗？我想是得不到的。可能会给你一枚奖章或一个漂亮的证书，但是，人不能靠感谢为生。你是荷兰绘画大师的鉴赏家。英国诗人不是说过美是永恒的快乐吗？难道……”他指着博尔的画继续说，“不仅看着它有无限的乐趣，而且也是一笔可靠的财富，不是吗？战后，整个欧洲将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平静了。我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情形，你也肯定会记得。钱在一夜之间就贬值了。但一幅名画的价值会越来越高。在战后发迹的幸运者们迟早会转而购买艺术品的。”

“听我说，范·阿斯滕，”我说，“这场喜剧演得太长了。我赞赏你彬彬有礼地向我介绍这一情况，但是，我不会给人以笑柄。林德尔将自己去应付一切，不会有人帮他的忙。你给我的报酬是诱人的，相当诱人的。对我进行贿赂的，你不是第一个，但我都一一拒绝了。在我所从事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决不会摔跤的。”

“这可是个最好的时机！”他嘟哝着说。

“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我反驳说，并从软椅上站起来，最后看了博尔的画一眼。“我该走了！真感谢你……说什么好呢？我们有趣的谈话！”

我不是柏拉图式的唯心主义者。我越想自己那种堂吉诃德式的傲慢，特别是联想到林德尔之案，就越发感到内疚。在范·阿斯滕和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林德尔之案经过审理，他本人无罪获释。他一直在汉堡安静地生活，从未卷入过间谍纠葛。他曾同发了战争财的德国人做过几笔交易，但是，这只是为了谋生。据说，他曾以向雇主索取高价的方式给予盟国以巨大帮助！当局接受了他出狱后突然离开荷兰所做的解释。他们理解林德尔在荷兰确无前途。案件澄清后，他获得了

自由。

如果接受范·阿斯滕的建议，此时我该拥有一件价值二万五千英镑的精美的艺术品，而又丝毫不触犯司法权。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向他们说明我确实干预了此案，而且无论林德尔还是范·阿斯滕都无法否认这一点。这样，我也问心无愧——当然，这样说是勉强的。另外，也没有一条军法禁止一个军官在完成任务后接受一件礼品。

但是，此案也有反常之处。当时，在我的脑海中还没形成完整的疑点。除去盲目的直觉外，某种东西使我对林德尔的慷慨馈赠产生了戒心。这一念头就像“鞋里的沙子”，不管你愿不愿意，它总转来转去。最后我得出结论，要得到答案，必须查看战前关于林德尔诈骗案的判决书。我认识荷兰一家最有名的报纸之一的发行人，他保存着许多刊登社会名流消息的报纸或剪报。幸好，在德国占领期间，书店未受损失。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去翻阅关于林德尔的消息，包括在法庭上争论了一个星期的证据。

我幸运地在一页报纸的末尾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一共只有四五个字。我满意地笑了，把一叠报纸放在满是灰尘的书架上，就去痛痛快快洗了个澡。

然后，我去荷兰政府和行政机构所在地的海牙参加一个大会。范·阿斯滕也在场，他仍然是那样悠闲，那样和蔼可亲。喝咖啡时，我们俩面对面地碰到了。

“艺术界的行情如何？”我问道，“最近成交了什么艺术品？”范·阿斯滕笑了。

“你永远是位不可腐蚀的上校！我还没很好地向你道谢呢！”

“什么？”

“你一定还记得那幅你不愿当礼物接收的博尔的精美图画。你走后，我设法释放了我们的朋友。为了对我有所表示，他把那幅画送给了我。”

“祝贺你！”

“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使我记起了它的原主人。那幅画第一眼看上去很漂亮，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件复制品。”

“复制品？不，不可能！单凭眼睛不可能确定它是复制品。你现在这样说，只是因为你当时没敢接收它。”范·阿斯滕沉静的表情早已无影无踪了。

“亲爱的范·阿斯滕，”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一个故意把自己的珍藏品付之一炬的人决不是君子之辈。他缺乏灵魂！不值得信任！他完全可以欺骗一个帮助他的朋友。”

“空话！”范·阿斯滕嘲弄地说，“心理学……去它的！……”

“好！”我说，“你可以不信我的话。你不妨也像我一样，读读保险公司鉴定官判决林德尔时的声明。林德尔抱怨大火毁掉了他许多艺术品，而实际上，他却把这些东西妥善地保存在安全的地方。为了让人信以为真，林德尔不得不把几件优秀的作品烧掉，其中就有博尔这幅著名的画。你手中的是件复制品——一件出色的复制品，这是无疑的，然而，也仅仅是件复制品。可能值一千先令，但绝值不了二万五千英镑。一件复制品，我的朋友！只是一件复制品！”

# 第八章　约翰尼·斯皮特法尔

我听说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的时候，欧战结束已差不多两个星期了。最近几个月，随着盟军的挺进，荷兰的许多省得到了解放。最后，除去战犯外，德军在荷兰的土地上销声匿迹了。世道一变，趾高气扬的征服者成了栏中温顺的羔羊。他们的国家吃了败仗。

这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棘手的审查工作。被指控同敌人合作过的男男女女都要经过我的审讯。有些案子顺利地得到解决。像在其他被敌人占领了近五年的国家一样，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免受皮肉之苦，许多投机分子以信义做交易，背叛了祖国。如果不是那条狭窄的海峡在1940年阻挡了德军，类似的情况也将在英国发生。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当巨大的压力来临时，一小部分人屈服了。

除了真正的里通外国案，也有少数无辜者横遭诬陷。有的人乘机发泄私愤，报复政敌，或者解决个人纠纷。这是被占领状态的恶果之一，它挑起仇恨，产生恐惧，而这种仇恨与恐惧在正常的社会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正如把含盐的物质加热，水分蒸发后，剩下了结晶体。

我已说过，处理这些案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因为，不能单凭控告来进行判决，另外，据精神病学家的观点，探讨某种行为的真正动机需要时间、耐心和智慧。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有些人民的代表，如市长、神甫和内阁官员，他们的处境在被占领状态下是很困难的。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帮敌人的忙，或者蔑视他们。但不管采取哪种立场，到头来总要受到批评和指责。

在三十，或三十多年的反间谍工作中，我学会了如何发现人的本能的弱点和一个人出卖祖国时内心深处的动机。然而，我也承认，这种心灵深处的爱憎感情渐渐使我讨厌了起来。大约在 1945 年 5 月底，我幸运地摆脱了这种缠人的工作，接受了一个新鲜的使命。我脱离了审查内奸和叛徒的工作，去埃因霍温参加抵抗运动领导人的一次大会。大会将讨论对爱国者的嘉奖事宜。

在大会进行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有人提到约翰尼 · 斯皮特法尔。大会结束，我同抵抗运动的六个代表去喝咖啡（对酷爱烈酒的荷兰人来说，喝了几年的代用品，能喝杯名副其实的咖啡，就算一种很大的奢侈了）。有个叫布洛特的战友，身材瘦削，微微驼背，稀疏的头发已经斑白，很像个学者。他说话总是慢吞吞的，咬文嚼字，颇有些大学解剖学教授的风度。实际上，他是一个我所认识的目光最锐利、最机智的战士。在座的人中还有个叫里滕的，体格健壮，个头敦实，右手缺两个指头。他参加过多次空战，同侵略者做过卓绝的斗争，击落过不下一打德国人。

在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皇家空军尚未提供弹药前，这些人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抵抗。起初，他们不得不徒手或用菜刀杀死一个德国哨兵。我认为这些人都应佩戴上一枚大勋章。

战友相聚，话题总离不开为国捐躯的烈士。不知是谁，好像是里滕说：

“我们应给约翰尼 · 斯皮特法尔追赠一枚勋章。”

“不是追赠，”布洛特反驳道，“他还活着！”

“不，他死了，没错！”

“他不会死！……除非最近几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两个月前，我的一个朋友还见过他。”

“不可能。我见过他的坟墓，真的见过！就在聚特姆附近的一个农庄里。”

“一座坟墓不足为证！”布洛特大声争辩说，“谁都可以挖个坑，在墓碑上写个名字。不见尸体，我决不会相信约翰尼会死。”

“如果见到一个尸体，你又怎么能确定是他呢？”里滕说，“你从未见过活着的他！”

“你说得很对。但我仍相信他没有死，除非有证据。”

“他的坟墓还不算证据吗？”

争论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也开始被这个奇怪的角色吸引了，我想，不管是死还是活，这一定是个抵抗运动的成员。

为了弄明白，我问道：

“谁是约翰尼·斯皮特法尔？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我很想知道这位抵抗运动的人物。”

“从未听说过约翰尼·斯皮特法尔？”里滕实在难以相信。

“没有，从来没有！”

“上校，”他加重语气说，“我们大家都为祖国做了点事。要说我们袖手旁观，或说我们为敌人的入侵而兴高采烈，这是虚伪的谦虚。然而，我们在座的诸位（他用粗壮的胳膊划了一个圈）谁也不能同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相比。使我惊异的是在英国竟对此一无所知，而他生前是个英国人。”

“他是个活着的英国人。”布洛特纠正说。

“活着也好，死了也好，但据我所知，他已经死了。多么不幸！约翰尼真是好样的，他应当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到底他是谁呢？”我又问，“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

“我们提到他时不要用过去时态，”布洛特插嘴说，“我相信他仍然活着。他是英国人，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在大战初期，降落到希尔维瑟姆[①]。因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不能飞回基地，便折向阿佩尔

① 希尔维瑟姆，荷兰地名。下文的阿佩尔多恩及聚特姆同是。——译者注

多恩，最后落在该地几英里外的地方。着陆时他受了伤，躲在了阿佩尔多恩和聚特姆之间的一个农庄里，并在那里养好了腿伤。后来，约翰尼不但没设法逃走，反而决定同敌人开展斗争。荷兰北部的抵抗运动一直开展不起来。那里的德军很多，离边界又近，是个平静地带。但是，约翰尼一去，形势大变。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他能使火车出轨，破坏军车队，袭击敌军司令部……当伞兵在阿纳姆降落时，他正在后方开展斗争。若再有三四个像他那样的人，德军将被全歼，阿纳姆也不致失陷。这是完全可能的！约翰尼真了不起！”

“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真名是什么？”我问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这次，里滕和布洛特不谋而合，两人同时用手拍拍前额。里滕说：

“我不知道他的真名，都叫他约翰尼·斯皮特法尔。‘斯皮特法尔’[①]是他驾驶的飞机型号，而‘约翰尼’，噢……对了！他的名字就叫约翰尼。你知道，上校，我们抵抗组织的人都用假名，真名是从不暴露的；这是因为一旦被盖世太保逮捕，不致使家庭受到连累。我从未问过任何一个抵抗组织成员的真实姓名。”

“他长得是什么样子？高还是矮？头发多还是少？大致轮廓怎样？”

“我说不清楚，不知道！”里滕说，“我从未见过活着的他。”

“我也没见过！”布洛特说，“两个多月来，我们同他所在的地区毫无联系。”

“肯定会有人认识他的！”我又说，“不可能一个人驾驶着斯皮特法尔飞机降落，同德国人斗争了近一年，而没被任何人见过。他用什么战斗？在什么地方落脚？从何处得到武器弹药？在什么地方吃饭？肯定有人协助他，是谁呢？他们又在什么地方？”

布洛特嘿嘿地笑着说：

① 即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译者注

“上校，你很善于提问题，可是，我们无法回答。你为什么不到聚特姆去一趟？那里会有人向你提供更多的情况。”

“听说他的助手是个很漂亮的女人。”里滕补充道。他用粗大的手比划了一个可笑的女人形象，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吹了声口哨。

“你怎么不去和她谈谈呢，上校？”他们说着便大笑起来。

“如果可能的话，我一定找她谈谈。”我坚定地说。由于职业关系，麻烦事总是让我遇上。

于是我们就转换了话题。一个小时后，我们便相互告别。两天后，我又回到原工作岗位，投入到并非本人所愿的审讯内奸和处理控告案件的工作中去了。一连过了几个星期，我都无暇顾及神秘的约翰尼·斯皮特法尔之案。偶有空闲，我便从日常工作的思绪中摆脱开，跑到埃因霍温的聚丰咖啡馆，探索那个故事的真伪。里滕和布洛特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传说，但二者都对约翰尼 · 斯皮特法尔的存在深信不疑。

凡被德国人击落，又没有被俘的皇家空军飞行员都同抵抗组织有过接触。他们均早已回国。据我所知，他们当中个别人曾在乡村中隐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等待着国家的解放。有的还同收容他们的人家的女孩子结了婚,成了家。他们幸福地生活着,除非战争再来打扰他们。一个飞行员被击落后，同当地的抵抗组织一道同入侵者开展斗争，他决不会不被人知道。在战争期间,谣言的传播是很快的,一件事发生后，人们往往添油加醋，最后把它弄得面目全非，神乎其神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约翰尼 · 斯皮特法尔一定早有了下落。因为荷兰北部已经解放，他可能已经归队。设在伦敦的皇家空军情报部的特工人员肯定会对他的情况提供报告，而空军部也会有详细的登记，并期待着这位失踪已久的飞行员的归来。

这时，我遇到了皇家空军情报机构的一支部队。他们是来寻找战争期间帮助并掩护过皇家空军人员的荷兰人，代表官方向他们表示感

谢。这支部队的负责人叫凯里。他高高的个子，戴眼镜，母亲是荷兰人，所以，他的荷兰话讲得很流利。于是，我们两人就共同担负起了调查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的任务。我们一连几夜谈论着这起神秘的案件。凯里对此案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我们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他和我一致认为这位飞行员早已回到了基地。

“十八个月已经过去了，”凯里笑着说，“如果他胜利而归，该是多么出人意料啊！战争总算结束了。尽管他那个中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也不会再去执行任务了。”

我对他说，出于好奇心，我很想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凯里以最大的兴致满口答应给我以各种可能的帮助。首先要搞清的一点是1944年初对希尔维瑟姆空袭后，是否有个飞行员没有返航；战后，是否有过关于此事的声明。凯里和空军部的领导很熟悉，而此事又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于是，他发回了一个长长的报告，请求优先调查此事。

凯里的部队即将转移,他向我辞行时,尚未得到答复。我大失所望,约翰尼·斯皮特法尔案件使我煞费苦心。但冷静地分析一下，我想空军部肯定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对一个失踪的飞行员并不十分感兴趣。凯里走时，答应一有情况马上通知我。

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履行了自己的允诺。电话铃响了，凯里在远方对我说：

“很遗憾，耽误了这么长时间，部里忙得很，我简直抽不出时间和你通话。”

“有什么情况吗？”

“有是有，但进展不大。我把电报给你念一下。”他念道：凯里亲收句号1944年1月22日赴比瑟姆—希尔维瑟姆执行任务的七二一中队飞行军官约翰·布鲁斯可能被俘句号现在情况有变stalaglufts已解放并未发现此军官可能死于战斗中句号感谢你通报情况战役结束后同时同地未发现其他军官失踪。

“怎么样？”他问道。

“奇怪！”我反问，“解放了的 stalaglufts 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这是皇家空军的一个特殊用语，”他回答说，“我想，大概是说如果他降落后活着被捕，一定会被送到德国鬼子专门关押飞行员的 stalaglufts 去。现在所有的 stalaglufts 都撤空了，关押的人都获得了解放。由于没得到布鲁斯的消息，当局认为他是死了。”

“如果他曾同抵抗组织一起进行过斗争，那么，在集中营里也是找不到他的。”我补充说。

“完全对！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已经这么长时间，我想他总会透露点消息的！”

“好吧！我们现在起码知道了要寻找的对象。他的绰号来自他的圣名约翰。根据电报，那次空中行动没损失其他飞机。你是否知道他那个中队是什么飞机？”

“知道！是最新式的斯皮特法尔。”

“好，这就对了！约翰尼·斯皮特法尔，一切全清楚了。”我评论道。

“正是这样！可他现在仍无下落！”

“好吧，我继续找下去！你呢？”

“我希望同你配合。”他沮丧地说，“可是，我的工作离不开，我得经常向海牙汇报情况。如果有什么新情况，请你通知我，我非常感谢。我把常住地址留给你，如果我临时不在，他们会把信件转给我。”

这是我寻找约翰尼 · 斯皮特法尔的第一阶段。

由于一些内奸案占去了我很多时间，第二阶段不得不往后拖。那时，我和我的小组仍继续向荷兰边界推进。我们将沿着阿佩尔多恩和聚特姆之间的一条小路到达阿纳姆。三百五十年前，一个叫菲利普·西德尼的英国人就是在这里获得了不朽的名声。他在一次战斗中受了致命重伤。有人送给他一杯水，他谢绝了，并把水让给了一个受伤的士兵，

说:“你比我更需要。”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敌人是西班牙人，不是德国人。聚特姆人民的心中没有忘记菲利浦·西德尼先生。1945 年 6 月底，一面随军前进，我一面在想是否也能得到当地人民的优待，帮助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的这种担心不久便消失了。我打听到当地抵抗组织一个有名的领导人的姓名和住址。在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便去寻找此人。他叫哈林，在聚特姆以东几英里的洛森附近有座小小的庄园。哈林个头很高，平易近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一谈起约翰尼·斯皮特法尔，他的兴致来了，讲述了这位英国人的胆略，对德国车队的袭击，如何炸毁铁路和抢夺军械库。在一次神出鬼没的袭击中，约翰尼和他的助手搞到了两门三十毫米机关炮和一批手雷。他们学会了使用各种武器，并在阿纳姆战斗中驱散了前来增援的一支坦克部队。六个人用这些武器把一队德国坦克阻挡了十二小时，击毁九辆 V 型坦克、两辆虎式坦克，重创许多小型车辆。

这仅是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的功绩之一。哈林又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别的，他讲了近一小时。在他的独白中，我好不容易才插上嘴，提了个问题:

“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现在哪儿？”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还不知道？真可惜，他已经死了，尸体埋在聚特姆的一个农庄里。”

“怎么死的？”

“是一次横祸！可以说是命运的嘲弄。约翰尼·斯皮特法尔在皇家空军多次执行任务，无论在飞行和降落中从未负过伤。在地面，也同德国人进行了多年的斗争，都是安然无恙。战争结束了，他却在一次事故中糊里糊涂死去了。”

“怎么回事？”

“唉！敌人从这里一撤走，抵抗组织奉命上缴所有的武器弹药。当时，有些老问题有待解决，我也不相信英国人会牵扯到当地的纠纷中去。好啦，不管这些！约翰尼的指挥部设在农庄里，农庄的后院存放着一些炸铁路和桥梁用的炸药。炸药放在一个小木棚里，由他从里面往外搬。你知道，炸药如果长期保存不当，易爆性是很大的。谁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这就是约翰尼的结局。他的断体残肢就埋在农庄里。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正如法国人常说的：c'est la guerre[①]。”

“你当时在场吗？”

“不在场！我离得很远，我是后来从安妮·戴凯尔丝那里听说的。”

“她是谁？”

“你还没见过她？也难怪，你刚到这里。你应该见见她，她比任何人都了解约翰尼。约翰尼的飞机掉下来后，就是躲在她家的，是她同弟弟一起照料约翰尼完全养好了伤。她一直同他在一起，成了他的名副其实的指挥助手——多么出色的战士！简直胜过她周围的许多男子汉！说来也真可笑，安妮和她的年纪尚幼的弟弟想参加抵抗组织，但没一个头头愿意接纳他们！谁也不愿意对两个孩子担负责任！这时候，约翰尼·斯皮特法尔来了，以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安妮参加了抵抗运动。她发号施令！——你想想！——她比许多男人都善于同德国人进行斗争，除了约翰尼·斯皮特法尔本人。我们都以为安妮爱上了约翰尼，战争结束后，如果他在英国还没成家，他们肯定会结婚的。”

“这个约翰尼·斯皮特法尔是什么样子？”

哈林搔搔头，犹豫地说：

“我也说不清！从来没在白天见过他。”

“肯定会有人见过他，一个人决不会在一个地方待了一年多而没

① 法语：这就是战争。——译者注

被任何人见过。”

“好啦！安妮和她的弟弟会告诉你约翰尼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很了解他。你了解抵抗组织的情况，他们彼此都不交谈。约翰尼很谨慎，总是白天睡觉，他不想让盖世太保见到他。另外，我记得安妮曾说过，他在飞机摔下来后毁了容。飞机着陆时，他被抛到前面，脸撞在机窗上。他肯定是很敏感的，不愿让人看到他那毁了的面容。”

“可是，即使在夜间，也总会瞥他一眼呀！”我说，“不能说说他长的样子吗？”

哈林想了一会儿，说：

“他像一个影子！中等身材，瘦削，但并不像安妮的弟弟，他的肩膀可能更宽些。”

我想：这位老兄虽是个抵抗运动出色的战士，但决不是个好的调查员。他的描述含糊到不能再含糊了。即使这样，我也不能抱怨。我已经了解到了某些情节，材料丰富多了。我也知道如何把最后的问题端出来。

哈林已告诉我去戴凯尔丝家的路，第二天早上，我便动身了。我打算来一次突然袭击，所以事先没通知。

荷兰农民是勤劳的、智慧的，他们把每一小块土地都利用了起来。戴凯尔丝家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家距大路一两英里，尽管刚刚受到战争的破坏，仍是那样干净、明亮、别致。精心饲养的肥壮的牲口在平房周围吃草。我的车开近时，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青年在修整刚刚粉刷过的围墙。女人用裙子擦擦手，过来向我问候。

她身材修长，举止大方，样子很动人。长长的头发束扎着，脸上没施任何脂粉。她是那样朴实，又是那样漂亮、妩媚。她的蓝眼睛冷冷地看了我一下，便走过来，像男子一样伸出了手。我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是奉上级之命来调查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的下落。当然，这样说是不很确切的，但是，作为中队长的凯里让我来做一番调查，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也算得上是“上级”。

尽管安妮的脸上和身上毫无男子气概，但她还是接受了我递给她的香烟。她一边说话，一边慢悠悠地吞云吐雾的样子，使我感到很扎眼。很难断定她有多大岁数，但起码二十岁是有的。看来她是这里的管家，她叫了弟弟一声，弟弟便放下锤子和木桩跑了过来。

安妮的弟弟简·戴凯尔斯大约有十六七岁。正如哈林所描述的，是个瘦高个。他同姐姐的轮廓很相似，但姐姐是无拘束的、有主见的，而他却是怯弱、顺从的。他站在我们的后面，听姐姐说话，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她。然后，又把头低下，认真地观察着脚下的土地。

我说，打搅了她的工作，感到很抱歉。安妮笑了笑，表示不介意。她把我请到屋里喝咖啡。这是一间舒适的厨房，戴凯尔丝小姐用一把亮晶晶的大壶烧水时，我们便闲谈了起来。简已经舒展地靠在一张软椅上，仍然静静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她说，前年1月的一个深夜，外面一个奇怪的响声把他们吵醒。她还说，她和弟弟管理着家业，因为他们很小时母亲便死了。德国占领荷兰不久，父亲又被公牛踩伤，他们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那时，她只有十七岁，弟弟比她小三岁，又加之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人手少，盖世太保又没收了他们的劳动果实。但是，他们最终活下来了。

话题又回到1月的那个夜晚。她说，她和弟弟一听到响声，起初并没想去理它。没有必要那么好奇，特别是在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国家。后来，她想可能是一头牲口跑了出来，怕它糟蹋东西，于是就决定出去看看。当看到一个受了重伤的英国飞行员倒在门槛上时，简和她不禁大吃了一惊。

他们把半昏迷的飞行员抬到屋里，给他脱去衣服，洗了伤口，安置在另一间屋里的床上。幸好，安妮懂一些护理常识，家中又有些药物。飞行员的大腿上部有道很深的伤口，满脸是血，鼻子肿胀，无血色，左眼微张着。安妮给他敷上消毒药，把伤口包扎好。虽然没有骨折，

但由于冲撞和失血，伤员仍是神志不清。

他在农舍里躲藏了几个星期，腿和脸上的伤渐渐好了。这时我插了一句问话，安妮仓促回答说，因为害怕，没去找当地的医生。窝藏一个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是大逆不道的，是有生命危险的，把秘密透露出去是不慎重的。幸好,农舍很偏僻,约翰尼——大家都这样称他——体质又结实。

他们俩用英语谈话。他告诉她，他在地上爬行了好几公里才来到她家。他们去原地看过几次，才知道他离开不久，他的斯皮特法尔飞机的油箱就爆炸了。在烧坏了的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他的靴子的碎片，无疑，德国人是认为他被烧死了。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没在周围进行搜查。

安妮又说，约翰尼·斯皮特法尔刚能用手杖支撑着走路时，就说要同敌人“会会面”。她和弟弟对德国人恨之入骨，几次要求加入抵抗组织，但因年纪太轻，遭到拒绝。后来，在深谋远虑的约翰尼的指引下，他们决定组织自己的抵抗小组——三人小组。

起初，他们只在夜间开展些小型的斗争，包括袭击军械库，以便装备自已，进行更大的行动。约翰尼教给他们使用各种武器和用导火线或遥控引爆炸药。这样，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其他抵抗小组都想同他们联合。约翰尼在幕后，安妮负责同其他小组联络。

说话间，咖啡喝完了。安妮便带我去看约翰尼那样突然、那样嘲弄人生地死去的小木棚的废墟和他的坟墓。墓前有块木牌，上面写着：“飞行军官约翰·布鲁斯——约翰尼·斯皮特法尔”。下面是皇家空军的标志“Per Ardua Ad Astra”和日期。回到屋里，她把约翰尼飞机失事时使用的身份证和子弹夹交给了我。

我谢过她，然后平静地说：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约翰尼的尸体也找到了。他的亲属可能要来起尸，改葬在英国。”

一直默不作声的简·戴凯尔斯急忙说：

“不，不行！”

安妮马上补充道：

“简是想说约翰尼更愿意埋葬在他进行过卓绝斗争的地方。”

“那么，”我说，“他的尸体就应当埋在他的斯皮特法尔飞机坠落的地方，他是在那里结束了他的斗争生活！”

我的话好像把周围的一切声音都窒息了，只剩下老时钟在嘀嘀嗒嗒地响着。简像是一个压缩了的弹簧，马上就要从椅子上跳起来。安妮冷冷地望着我。最后，当沉默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她才慢慢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在推测。”我说，“我把数字排列起来，然后相加，看是否和答案相符。两个荷兰青年，一个是女的，另一个是她的弟弟，都想同抵抗组织一道进行斗争。但是，二者都被拒绝接纳，因为他们都很瘦弱和年轻。后来，一天夜里，一个第三者偶然出现在舞台上，一个受了重伤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他们把他抬到屋里，并精心进行照料……然而，由于伤势过重，他没能活下来。不管怎么说，当时他们完全可以请个大夫来。附近有很好的大夫，而且也是优秀的爱国者。他们是不会把伤员的事声张出去的。然而，伤员死了，死去的伤员是不需要大夫的。于是，姑娘和弟弟把死者埋在了院子里，收藏了他的随身之物，身份证和子弹夹……他虽然死了，但是，出现了一个神奇的传说，一个关于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的神奇传说。这个传说可能是姑娘虚构的。由于她的天赋，姑娘成了一个领袖。无人了解飞行员之死……确实无人知道他曾到过这家农舍。由于出现了一个在飞行员领导下的抵抗小组，别的小组也就对它格外注意和敬佩。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但是，谁也没看见过毁了容的、神奇的飞行员约翰尼·斯皮特法尔，他只在夜间出现。黑暗中，他很像简，他的确也是简！就这样，约翰尼·斯皮特法尔的小组继续活动着，给其他小组以鼓舞，给敌人以致命的打

击。然而，战争结束了，约翰尼·斯皮特法尔怎么办呢？姑娘和弟弟知道他该回皇家空军了，一定会有人来找他，询问这位传奇式的人物。这样一来，就需要彻底结束这个幽灵。于是就策划了一个事故，木棚被炸毁，约翰尼·斯皮特法尔也就随之而去了。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对吗？”

“一个聪明的人，可以从同样的事情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安妮说，“可是，有什么证据呢？”

“就埋在十字架下面。”我说，“如果我的设想是对的话，那具尸体差不多已被埋了十八个月了。如果你讲的是真话，底下埋的只是一具残骸，而且仅仅埋了两个月。我们把墓掘开好吗？”我慢慢地从椅子上起来，说，“一看便知道谁对了。”

安妮做了个手势说：

“不，不需要了！你说得对！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也不需要！”我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我只要紧握为祖国尽了一切努力，并进行了卓绝斗争的两位爱国志士的手！”

我郑重地同他们握过手，便向门口走去。当我刚要出门时，几乎一直不说话的简·戴凯尔斯问道：

“飞行员的尸体怎么处置？”

“让他安息吧！”我回答说，“并不是每一个年轻的战士在死后都还能继续战斗的！”

我上了车，回到聚特姆。

# 第九章　将来呢？

历史有其现实意义：过去的经验对现实和未来都是一种借鉴。如果说经验可以使人更加成熟，那么，历史便是世世代代人民的经验的概括。本书所讲的事实并不是为了引起国际的关注，但是，“林德曼斯事件”的后果却超出地区的范围。本书所讲的事件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因为从中可以引申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教益。

我们不妨看看这动荡的现实。只要俄国存在，我们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和平与繁荣。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要求世界霸权。苏联政治局正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一目标。

世界霸权的取得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

第一，通过表面的民主方式。

第二，对自由国家进行经常的威胁。

第三，闪电战。

我（当然不止是我）认为，在目前，我们宁肯保持“冷战”也要避免任何可能的世界冲突。

一个只进行过一百米训练的运动员，最好不要参加马拉松的角逐。我们应当懂得，真正的和平并未到手。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目前这种捉摸不定的威胁和消耗着联合国巨大财富的连年的游击战局面将持续多年。

完善我们的反间谍工作是冷战中进行自卫的一种积极方法。由于这种工作不为公众所了解，所以，也不可能受到人们的赞扬。捕鱼时，

应把精力放在漏网之鱼上。

漏网之鱼是不计其数的！自1945年以来（这里仅举几个重要的人物），因给俄国人提供情报而被捕或仍逍遥法外的，就有美国的艾伦·纳恩·梅，阿尔杰·希斯，以及福克斯和彭德科尔沃教授。英国外交部的两位要员——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同样是神秘地、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据说，后两人从未接触过国家机密，但是，另外四人却都在工作中掌握了当代最重要的机密。如果说俄国人正在储备原子弹，以便把它扔到世界各地，那么，这四位科学家是应对此负部分责任的。

在战争期间，需要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和自由。进行新闻检查，颁布法令，其严厉程度会使我们感到遗憾，但是，它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在和平时期，我们无法忍受某些限制，渴望彻底的自由。这是合理的！如果为了保卫我们的民主体制而把民主体制全部牺牲，这是多么不明智啊！

在"冷战"时期，我主张我们的科学家、外交官和民众都要像我们的士兵一样，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当一个人自愿入伍，或者响应军事召唤时，他十分清楚要失去一般平民百姓的一些权利。他必须服从严格的命令，派到哪里就去哪里，不能搞罢工。士兵罢工在军事术语中叫叛乱。一个科学家、一个外交官，或一个从事政府工作的政治家，也应像军人一样，放弃类似的特权，因为这种特权同国家的安全要求是不相容的。好在谁也不能强迫他们成为政府官员。然而，一旦成了政府官员，为什么不像对士兵一样给他们规定某些纪律与条例，使他们保守国家机密呢？

不管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反间谍机构的任务和警察是一样的，即：追捕间谍和叛徒，逮捕一切嫌疑犯。

反间谍人员应具备许多通过长期训练所获得的、颇不寻常的条件。

总体来说，这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反间谍人员要随时待命，因为这不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他们简直不可能过家庭生活，往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奔赴某地。他们不能参加社交活动，因为他们的工作不是同第三者，乃至自己的妻子交谈的话题。

这种工作要求有丰富的司法和心理学知识，掌握多种语言和经常身历险境。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要求得到很好的报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当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的首席审讯官时——这是英国反间谍系统的关键工作之一——工资却不比一个熟练的打字员高。

战争期间，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和平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个公民在私营工厂每年能得到一千五百英镑，而一个政府职员仅能得到此数的三分之一。这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我们不能说得高报酬的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同样，一个当选国会议员投票赞成提高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并非是缺乏爱国心。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为了吸引人们从事一种艰巨的、不大众化的工作的人选，可采取两种方法：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鉴于反间谍工作的性质，第二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以经常吸收新的人选，这对国家是毫无损害的。这样，我们的间谍就不致被认为是雇佣的，就如上面我们讲的议员不是雇佣的一样。

在安全问题上吝啬，不仅是最大的浪费，也是莫名其妙的小气。如果俄国人把在纳恩·梅和福克斯的帮助下生产的原子弹扔到世界上，损失将是无法挽救的，世界的全部黄金也无法拯救在轰炸中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如果多花上几千英镑，原子秘密也就保住了。在必要时多花一个便士要比不得已时花几百万英镑来弥补损失划算得多。在冷战时期，这一点是有教益的。千万不要忘记，只要俄国人一点头，这个“冷战”便可变为“热”的。

尽管为加强欧洲的防务已做了巨大的努力，但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需很长的时间。如果今天俄国军队发动进攻，用不了半个月，他们便可到达拉芒什海峡。难民的浪潮将达到敦克尔刻失陷后的十倍。

面对这种形势，从现在起，反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就应开始大量招募间谍人员。

作为情报系统的一个部门，国家领土安全机构无疑是很好的培养现役的或预备役的审讯人员组织。

审讯人员应首先学会检查嫌疑犯的随身之物，在里面往往能发现间谍的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另外，保安人员应流利地掌握几种外语，特别是法语和德语。上次大战中，保安组织中有学识的、头脑伶俐的人员因为不能审问嫌疑犯，落了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结局。

有一句拉丁谚语是这样说的："Si vis pacem，para bellum——如果你需要和平，那就准备战斗。"我们谁也不希望再来一次战争，那将是我们文明的末日。但是，把双臂高高举起，并不能使我们避免它。

只有苏联政治局才能断言是否发生战争。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头子们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我们的斗争越有力，我们的防务越有效，苏联政治局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反间谍人员被幽默地称为"斗篷下的匕首"；但是不要忘记，斗篷是很好的防身之物，而匕首可以杀死国王的敌人。